



以文学之名

小鳥

以文学之名

卷十六 2022.04

十万嬉皮

24小时文学聚会 杜峭

张怡微 煞尾 | 小说家

安孟竹 血痕 | 田野中国

里卡多·皮格利亚 女疯子与犯罪故事 | 故事群岛





小说

小说家 | P5 煞尾 张怡微
24 小时文学聚会 | P9 十万嬉皮 杜峤
P21 陨石 杜金
P31 47 个短篇 岳凯强
第二回 | P41 数字 么瑶
故事群岛 | P45 我们在芦苇丛中 拉尔夫·罗特曼
P49 虚无 1994 戴内斯·马查多·本托
P53 女疯子与犯罪故事 里卡多·皮格利亚
P57 欲望之宴 艾谢·帕帕提亚·布贾克

非虚构

长乐路 | P65 杰西·库克, 节奏不停 伊险峰
田野中国 | P73 血痕 安孟竹
P81 菜市场人生 钟淑如
吉井忍的二次会 | P89 核与非核, 记忆的继承 吉井忍
小鸟文摘 | P97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的真实写照 熊景明
P101 快乐与正义 贝卡·罗斯菲尔德
生活亲历者 | P107 食嚼讲嚼, 在地离散 天涯鸽女

档案

Newsletter | P113 灾难报道是“吃人血馒头”吗? 方可成
P117 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 让信息的手穿墙而过 张依依
P121 里程碑式的胜利, 印度尼西亚通过性暴力法案 Snufkin
P125 防疫的代价 曾梦龙
发现经典 | P129 最黑暗的时候, 也要把自己和同伴视为人, 而不是物品 普里莫·莱维
P137 小于一 约瑟夫·布罗茨基

专栏

作家之爱 | P145 我头脑中的幽灵 陆茵茵
在汉堡 | P151 谁能幸存于这个冬天? 王竞
王伯伯脑保健操 | P157 除了门口那两个石狮子, 都需要核酸检测 /
P161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感觉 王永智
荒诞笔记 | P165 “地狱是很棒的主题” 伊险峰



图为电影《法兰西特派》(2021)剧照

小鸟问答 Vol.16

小鸟 | 小鸟问答

现在，你跟什么样的信念站在一起？

大家好。这个憋闷的春天是不是已经让你绝望了？

我们可以很乐观地说，幸好还有文学，还有小鸟。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点力不从心，有点茫然，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布罗茨基说：“我并不号召用图书馆去取代国家，虽然我不止一次有过这种想法，但我仍不怀疑，如果我们依据统治者的阅读经验去选举我们的统治者，而不是依据他们的政治纲领去选举他们，这大地上也许会少一些痛苦。我觉得，对我们命运的那些潜在的统治者，应该先不去问他的外交政策方针是什么，而去问他对司汤达、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持什么态度。”

当然了，我还知道一个著名的问答，就是忘了来自哪位作家。对话大体是这样的，提问者问作家，你写的那些黑暗的东西真的不会让人们内心阴暗吗？作家的回答是：怎么会呢，如果会的话，人类历史上有那么多美好光明的书，而世上的罪恶和苦难并不见得少了多少。

我们是多么无力啊，这个世界一再重复那些曾经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世界也一再兑现他的承诺：当你选择相信什么，你就会成为那个你即将成为的样子。

i 本月推荐？

是我们即将于4月9日刊发的24小时文学聚会作品，叫《十万嬉皮》。

我们忽略了凯鲁亚克的一百岁诞辰，多少有点遗憾。《在路上》不怎么好看，但那是一代人跟这世界表达自己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万嬉皮》还真有点那个味道。它还有点像早年间先锋文学《你别无选择》那时候的调调，就是语言要华丽得多，像莫斯科地铁站里的装饰那样华丽。

我们一位编辑看这小说的时候，不断自言自语：“这好像是个很好的小说。我得认真点看。”

她起来倒了三次水才把小说看完，虽然它并不很长。

我们都成了见证者。除掉中间有点过于炫他的嘻哈的技之外——势利如我们，迅速原谅了他对自己所爱之物的喋喋不休。这又能怎么样，这是一群人在咔咔地拔节长成啊。就像在路上的凯鲁亚克。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可热爱可把玩的岁月，把那么蓬勃的劲头化作笔下的故事，好看。

上一次有这种感觉还是看顾嘉怡的《我们》。她现在在伦敦学习，已经快一年了，时间可真快。

麦克尤恩说到他的第一个编辑时，说：“我很感激他。一个作家早早就发表作品，说实在的，这其中的快乐无以比拟，是不可复制的。索罗塔洛夫曾将我的名字与君特·格拉斯、苏珊·桑塔格和菲利普·罗斯一起印在《美国评论》封面上。那时我只有二十三岁，我觉得自己不配出现在上面，但我真的很兴奋。”

但愿他们也享受到如此快乐。

ii

不管是空难还是疫情，媒体的声音几乎消失了。你们说要做静态非虚构，到底做了什么？

有一个公众号，薄文的《回燕郊的路》，曾经让很多人心头一惊。世事这么纷乱艰难，再惊需要很大的能量。《回燕郊的路》写得很好。薄文的照片、他的连续几篇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我们自己也在想，不管静态或者是时效性很强的非虚构，共同点都是争取更多地记录时代发生的事件。沉淀下来的、经过多年仍旧能让读者建立共情有所触动的文章是我们最想刊登的内容……但好像它不是我们排斥对当下发生的、承载着人类荒诞生活的那些内容。有良知的内容生产者，似乎不应该选择无视。

好吧，我们得说，读者批评得对。我们的“档案”栏目，我们的“小鸟文摘”都可以承担起应该做的事。那么我们应该有所作为。

iii

我没有续费，不能看以前内容了。这样让人感觉相当不好。

嗯。确实遗憾。只能再提醒即将成为非会员的我们的读者，在你还是会员的时候，如果你特别喜欢某篇，某期，或所有，可以下载PDF。你随时可以做这事。

当然，我们希望你能持续成为我们的会员。

iv

上个月发的乌克兰作家的小说很好看。

谢谢。我们对乌克兰作家的小说可能比你想象得要慎重。我们最大的担心是它会不会有宣传嫌疑。所以我们尽量在翻译之前了解了内容。无时无刻都要警惕沦为宣传。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最严格的要求。

题外话，多说一句。我们有很多小说投稿者，他们很有勇气，不回避现实或者热点题材。这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我们发现若干投稿者都有一样的问题：不自觉地扮演宣传的角色。包括已经有一点名气的作者，他为我们写了很多稿，题材很当下，但总是有一种宣传味道。我们已经收到好几篇跟拐卖女性有关的小说了。小说首先得是小说。我们不想指责他蹭热点流量的事，但一定不要宣传。

v

有人在阿花微博下留下灵魂之问，互联网上好内容那么多，小鸟为什么要那么贵的年费？

我们不觉得互联网上真的有那么多好内容。或者我们对好的理解有不同意见？记得刚做《小鸟文学》的时候，一位亲戚中的八〇后，985的资历，金融从业人士，毕业超过十年，大约也是存款超过七位数的。她疑惑地问，文学App是什么，《读者》吗？

你看，对“好”的理解千差万别。

vi

封面的鸟。

它叫双黄头亚马逊鹦鹉。

vii

手动介绍本期内容。

在第一个周六（也就是4月2日），我们在原本刊发“24小时文学聚会”的栏目发布一篇人类学家的笔记，主题是负责教育和照顾自闭症孩子们的学校都会发生怎样的日常。这一天也恰好是“世界自闭症日”。

熊景明老师的家族口述历史已经于上个月连载结束，从本月开始，小鸟文学会刊登熊老师关于中国当代口述著作的介绍。读者或许还不熟悉熊老师，她主持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是诸多研究中国大陆的学者必访的资料中心（可惜现已关闭）。论推荐当代中国历史著作的资历，熊老师当仁不让。

乌克兰战争之后，王竞在德国做了许多观察，包括德国民众对这件事的反应，还有她耳闻目睹的德国对于乌克兰难民议题的反应。这些都会出现在本卷她的专栏更新中。

陆茵茵在“作家之爱”栏目更新一篇文章，是她对图像小说家阿德里安·远峰的感受。很是感人。这一卷的小说家是张怡微，这一次她走入了一个中产阶级已婚男性的内心。

长乐路专栏会带你走进新乐路上老洋房里的一家中古店，它的店主夫妻对话有一点《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的味道。当然，还有我们在上海逃不掉也必须写下来的疫情见闻，它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角度观察长乐路。

v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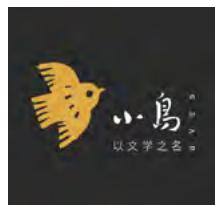
留言给微博 @小鸟文学，或邮件至 info@aves.art。

最后分享两段布罗茨基。让我们在憋闷中稍微透一口气；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手

中文明之力，不堕入空无。

“如果艺术能教给一个人什么东西（首先是教给一位艺术家），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孤独性。作为一种最古老，也最简单的个人投机方式，艺术会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们的独特性、个性、独处性等感觉，使他由一个社会动物变为一个个体。……但是一首诗，比方说勒内·马里亚·里尔克的一首诗，却不能被分享。艺术作品，其中也包括文学作品，尤其是一首诗，是单独地面向一个人的，与他发生直接的、没有中间人的联系。正由于这一点，那些公共利益的捍卫者、民众的统治者和历史必然性的代言人们大都不太喜欢一般的艺术，其中也包括文学，尤其是诗歌。因为在艺术走过的地方，在诗被阅读的地方，他们便会发现冷漠和异议取代了期待中的赞同与众口一词，发现怠慢和厌恶取代了果敢行动。”

“语言，我想还有文学，较之于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一种更古老、更必要、更恒久的东西。文学对国家时常表现出的愤怒、嘲讽或冷漠实质上是永恒——更确切地说是无限——对暂时、对有限的反动。至少，文学有权干涉国家事务，直到国家停止干涉文学事业。政治体系、社会构造形式和任何一种体系一样，确切地说都是逝去时代的形式，逝去的时代总是企图把自己与当代（时常也与未来）硬捆在一起，而以语言为职业的人是最无法忘记这一点。对于一位作家来说，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来自国家方面的可能的（时常是实在的）迫害，不如说是他有可能被国家的面容所催眠——不论是丑陋畸形的还是渐趋好转的，这样的面容却终究都是短暂的。”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图片来自 [Amel Majanovic](#) on Unsplash

小说

煞尾

张怡微 | 小说家

他能预感到这种因离岸而产生的清静
是一生中难得的修整和停顿。

01

原来从伦敦直飞香港就可以从深圳口岸入境回广州父母家，仅一线之差，飞机抵达的前一日，深圳湾口岸封关。于是，昊辰全副武装、三天三夜没有合眼。经各种中转后开始隔离、又隔离的日子。那一个月的时光，就像换季时从收纳被褥的袋子里抽出的空气一样，是多余而无用的存在。

几乎每一日，昊辰都被困意囚禁在既不中国也不英国的时间，一边刷着隔离群内的信息，看外国人因为手机没有安装微信和支付宝而无法购买食物。瞥到伦敦留学群的同学们继续被取消机票、或又找到了更高价的回国方案，发现大家好像都比他从前认识的样子更有钱。有人因为抗体检测结果不一致，兜兜转转从赫尔辛基又回到伦敦，为了回国而转机，转机失败又回来，重新自我隔离十天。几百镑的检测费用打了水漂，时间还被偷走了，什么也干不了。群外，依然有人在酒吧夜夜笙歌，以肉身实践“一切看天意”的赌性。那些自我隔离也好像是虚拟的，是一个隐喻。隔离者处处心知肚明，又处处可以逾矩。整个过程，只是为了反流动。想要流动，就需要支付昂贵的成本，赌一把不确定的结果。最后做出了一个在胶水中费劲流动着的意图。

昊辰能顺利回国，恐怕也是这晦涩“天意”的一部分。一时间没人能读懂它和命运之间的许诺。在广州的父母总能从保健群组或旅游群组里挑选出令人焦虑的讯息不假思索地转发，例如某某名人出机场有绿色通道完全不用隔离就直接回家，又如某某部队大院突击来了不少防护人员不知道是不是出了新病人。父亲已经被封号三次，每次都辉煌复活，再度亢奋得好像大病初愈。他好像很享受这个过程，“儿子，新号，加一下”。疫苗该不该打，灭活到底是什么意思，阴谋与恐慌伴随着手机使用而存在，即开即用。谁都不知道，后来广州真的遇到些麻烦。打疫苗的盛况好像楼盘开幕、学区房摇号。只有保险代理和留学生代购的朋友圈以超强的意志力坚持着岁月静好，每天热情洋溢喊着“早安、晚安、今天又是崭新的一天”，仿佛活在新冠病毒笼罩的纪元之外。

大部分手机讯息，昊辰都不回复，烦，他佯装正在倒时差，这虚构的“时差”一倒就是两个月。除了在视频里见见父母和女友，昊辰没有必要再发出任何人类的声音。这反而使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他的孤独是被高昂的经济成本维护好的壁垒。他甚至对这种隔离的处境产生出谜样的依恋，比起回国前和回国后，他能预感到这种因离岸而产生的清静是一生中难得的修整和停顿。这一个月曾 / 将是他（这样一个普通人）生命中孤岛一般的存在。非常扎实丰富的三餐、安静的睡眠、没有市声、没有工作。那种感觉，就好像他最后几个月在 Camberwell Church 附近的小公园散步的场景。无人打扰地思考着寡淡的人生。伦敦并不像很多人传说的那样终日郁郁

寡欢，偶尔会有美好的下午，可以坐上无人秋千。荡一会儿，就会有小黑人过来帮他推秋千，完了，他会再让你推他。昊辰知道附近有一家越南菜很好吃，但是没有人诉说。因为没有人可以说，反而像一个私密的谜语。继续推着黑人小孩，互帮互助，不言不语。

在此之前，昊辰在满箱拒信中收到了一个来自上海的 offer。时隔一年看，这个教员挽救了他濒死的爱情，甚至，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无从判断这种“挽救”是好是坏，如果没有它，也许他会滞留在伦敦，就和其他学生一样，受着互联网传递来的夹板气，等候封城、等候解禁，“心知肚明”在城里自我隔离地走来走去。他用“手机”维持着最低频度的恋爱指标，到点打开视频，到点再掐断视频。转眼五年。谁都没想到，这五年过得那么刻板、又稳健。甜蜜是说不上的，只是机械化的稳健。保持通讯的过程，就像昊辰小时候看的太空电影。宇航员和地面上的家属保持通讯，殊不知，自己是被克隆的第六代工具人。那些“家属”的影像只是欺骗他们继续奉献劳动的伎俩。真实的家人早已老去、消亡，唯有这地球之外的时空体，还存续着一点点情感的遗迹。让人反复练习、反复观摩，渐渐形成对于人类情感风俗的建构与复制。他有时想，女友是不是个骗术，她是不是虚拟的。她是不是已经不在了。

“爱你哦。晚安。”但是他说。

02

爱情在这个时代里越来越像中晚期老年病人喉管中的那口痰液。那些失去生命活力的病人，最终会死于某种堵塞、衰竭。反正不是这根血管，就是那个器官，不是这口痰，就是那口痰。若是垂死中途被某个环节（也许是机器或者他人的察觉）救起来续命，病人远不是健康时的感受，而是被慢慢地驯化为向死而生的过来人，满脸写着可疑的释然，和作为报偿的感恩。也有偶然的情况，例如危机的状况突然就熬过去了，就连医生都解释不清指标为何突然好起来了，解释不清是做对了哪件事，或是做对了哪些放弃。因为做出同样的判断，有些人就没能逃脱死亡的召唤。一切都看起来那么合理，又那么偶然。

他是这场爱情死亡游戏中的幸存者。他知道他很快会看到鲜花掌声、立体金色的烟花呈现在命运的滚动银幕。他即将去接受这场“祝福”的仪式。只有每天排泄完往马桶里丢“清洁片”的时候，昊辰才清楚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在度假，而是在被检疫。然而这间隔离病房长得太像他和女友最后一次开房约会的旅馆，这真令人头痛。

两年前，女友在这个布置相似的小房间里，向他发出“结婚”的最后通牒，说“最后”倒也不那么严格，类似的通牒，他收过不下百次，在潜意识中早已形成抗体。这抗体时阴时阳，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检测标准。有时他不得不打道回府，有时又莫名其妙过了关。即使是从前暑假，两人在酒店约会，他也会珍惜每一次在厕所里多待上一阵子的契机，刷一会儿手机。女友明里暗里传递来温柔的毒药：例如，“你不由得每次都出来开房开销太大吗？”他戴上耳机，一切噪音就消失了。

那种偷来的幽闭愉悦，就是他心中亲密关系的最佳隐喻：不是没有关系，也不是有确定的关系。他还有一点点自我，是偷来的。他需要从“关系”中凿壁偷光，盗取出一些自我来。只有偷盗，能让他感觉自己还活着。不然自己是别人的儿子，别人的性伙伴，别人的爸爸或者，别人的职工。他到底还是一个东亚人，东亚的懦弱、压抑和天生的责任感像浑然天成的诅咒般，催促他模仿无数自欺欺人的年轻人，在求偶期适当限缩自己的诉求，展示他人心中的“进阶”风俗。完成一段旅程之后，收获一枚勋章。每进阶一次，都能获得健身环里打败巨龙多拉贡（通关后才知道原来是 dragon 的音译，而且打败他并不能真的减重）时金光灿灿跳跃的 VICTORY 欢呼字符。这很“传统文化”，很“唐人街”，很“虚拟”，很“祭祀”。

“进阶”，恐怕是此地人类最喜爱的风俗之一。

离开伦敦时，昊辰千方百计从私立医院获得的核酸检测证明、到机场、隔离饭店、居家隔离的另三次核酸检测，就像是一种过关斩将的进阶历程。为了以防万一，他还在公立医院做了备份的核酸证明。自己预约，自己完成，他十分确定，自己的报告是假阴，因为他根本没有认真插自己的鼻孔和喉咙。好在报告是在他落地之后才收到的，报告的结果是：“阴”，VICTORY，他又拿到了一个虚拟的“进阶”。（此处应有罐头掌声）

昊辰不太理解女友对于婚姻的渴望，女友也不理解他为什么可以喜欢着她同时却不喜欢结婚。他们都把恋爱当苦行，发自内心地相信着苦尽甘来，这乐观是中国式的乐观，保佑我们的心灵不会酿造真正的悲剧，不会去质疑有些甘甜的存在，其实根本不需要用吃苦做交换。

两年前，昊辰鼓起勇气问了女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使得那场告别仪式感超强的约会瞬间清洗了性的意味。他们两个人，在一张桌子前，仿佛南北韩在喊话，有历史、有威胁、也有“算了还是明天再说吧”的共同诉求。喊的那些话，也不过是粗略表明战争还没有结束，可以先和平起来。他喊：“你觉得结婚有什么好处？”她喊：“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再被亲戚说你俩怎么还没结婚。”他喊：“还有第二个吗？”她说：“没有第二个好处。”他喊：“只有这一个好处，那为什么还要结婚？”她说：“因为不结婚就是会被一直问一直问。”他喊：“可是结了婚就变成夜深人静时自己问自己我到底为什么要结婚？”她说：“哇你好像屈原”。他喊：“屈原是同性恋”。

他其实什么也没有喊。他们背对背睡了一夜。没有做爱，也没有说“晚安”。第二天女友送他去机场，嘤嘤哭地哭了，说“你真是个渣男”。他问：“为什么？”女友说，“网上的二级心理咨询师都这么说。”他就笑了，心想，心理学的工作一定很难找。

“我还付了十六块钱……”

（比结婚证贵七块那么多）

03

人文学院设于学校的角落，出门就是韩国街。整个学期，韩国街只有一家餐馆营业，

卖的食物也是日韩混杂，和伦敦很像，不是东北人开的，就是福建人开的。办公室有四位同事，常见的只有一位，在日本拿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见面第一天，他就很抱歉地表示，自己不爱干净，希望如果影响到昊辰可以提出来，但他不一定能改。“要是能改，我也不再单身至今”，“不过一个人也挺好”，他又补充道，“你是一个人吗？”“我结婚了”。昊辰回答。

“英年早婚啊”。同事自以为幽默地说，“我们在升等以前很难做出结婚的决定”。升等和结婚有什么关系。升不升等都可以不结婚不是吗？昊辰心里这么想，但自觉没什么资格说出口。

昊辰后来听说，日本博士是半年进校的师资博士后。他口中的“我们”，和“升等”，都说不清楚到底指的是什么。这种感觉就像太太到处对别人说，“昊辰是因为我才回国的”一样，一时间令人找不到合适的表情包来传达内心的复杂感受，总之，既不能共情，又不忍心不共情。

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备课、填表、找领导签字、开会、提意见、泡茶、和学生做交流，包饺子包粽子下汤圆和防疫。他们的收入，怎么说呢，远不如鬼佬店找厨房工，给报税，需要身份，在1区或“西2区”，需要一名寿司师傅，没有身份要求，待遇好”或“女，50岁，沈阳人，会做包子饺子花卷馒头各式东北菜，因疫情刚到英国，找住家保姆工作，电话：07957 161668.....”有天太太打电话问他几点回家吃饭，他说“不知道”，她问，“那你现在在干嘛？”他说，“运动会扛旗”。她说，“哦，那你几点回家吃饭？”仿佛鬼打墙。30岁之后，昊辰每一天的生活都像是鬼打墙。他要面对的问题很简单，一直重复，直到有答案。再被问下一个问题。

有一次昊辰问同事，如果是在日本做研究有什么好处？

同事说，“好处是基本没有人会质疑你的论文是造假的。他们总是默认你是认真写的。”

昊辰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几个神奇的名字，小保方晴子、笹井芳树.....例如，翟天临。“今年是天临几年？”昊辰问同事，并抖了个拙劣的包袱。

“三年”。同事友好地回答。

除此以外，昊辰生活世界里的声音，基本来自于太太、母亲，是一个女性的世界，十分带有上海的风格。他眼底摄入的字符，则大多来自于手机群组。这些碎片每天从他睁开眼就开始飘飘荡荡，宛如太空垃圾，它总是在那里，永远也不会消失。

（太太到处对别人说，“昊辰是因为我才回国的.....”）

上班两个月后昊辰突然发现，有一篇论文他上一次打开时还是一个半月前，Word文档的修改时间提醒着他，上班以后他的研究生活几乎就是毁坏的。他的时间被分割成一块一块，交给了会议、课程、活动、表格和家庭。它们每个主体，都贪婪地盗窃着他的人生。没有人问他到底想要研究什么，没有关心他还有什么事是遗憾的。没有人问他，如果当下感染了病毒，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对昊辰的回国选择，最高兴的还有昊辰母亲，她似乎特别感激媳妇，并不反感她的说法，也没有跟昊辰确认事实是否如此。对母亲来说，一切都是次要的，“人回来就好”。然而婚后的第一个年，他们并没有在一起度过。冬天疫情突然告急，昊辰没有办法回家，学校也不建议他们离沪。昊辰在太太的家族中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发声位置，他在过年时做的最多的事就是遛狗和垃圾分类。他发现上海人不是关心股票基金、美股熔断，就是关心买房、离婚买房、买学区房，有时还关心澳大利亚，总有旁系或姻亲住在那里，甚至关心印度。念博士时，昊辰曾去澳大利亚开过会，但并不喜欢那里。因为休息的时候，除了把自己灌醉，几乎找不到喜欢的事做。同行的大佬友善地提醒他，“你就是太老实，不会玩。很多坏事，这里都可以做。你不会做，就不会觉得有趣。”每天丢垃圾的时候，昊辰都会想到那位大佬说的话。2020年，上海终于把推广垃圾分类的市长捐去了武汉，然后听说武汉也开始了垃圾分类。他本有机会去美国开研讨会，签证在伦敦办好以后，疫情爆发，所有的正经事都被死亡疑云和口舌之争碾成齑粉。很多坏事，他也提不起兴趣去入乡随俗。

有时昊辰感觉自己的抑郁症是回家之后才爆发的。虽然他太应该高兴了，他平安健康、他成家立业、他也不缺钱。但是在昊辰的内心深处，他的理想生活被长得宛如齑粉药丸的东西丢到马桶内的洪流中彻底冲散了。他太应该感激这种清洁了。它昂贵、来之不易、它笑盈盈期待他说感恩，然后表示出一种大度和宽宥。

有天太太问他，“花好看吗？”

他看了一眼，问：“要丢吗？”

太太白了他一眼，骂他是神经病。

他想着，那就过几天再丢。

后来太太又问他：“那.....你看我的花好看吗？”

如果当下感染了病毒，昊辰最想做的事，居然是离婚。他终于能自然而然找到了一个高尚的理由了，不必再拖累任何人。其次是辞职，那时母亲一定不会介意，母亲就希望他活着就好。然后是，将尸体（如果有的话）运回广州。广州多好啊。又热，又热闹，又没有上海话，又没有爱情和婚姻。

04

社区隔离时，父母腾出了广州家里的一套空屋。按规定，隔离结束前，他们不能见面。但是，母爱如山。昊辰母亲想方设法地和社区管理人员疏通关系，最后远远地，假装看热闹的民众一样，看了他一眼。他也远远的，看了母亲一眼。情绪的流动和电影里设定的不太一样。两年没见，母亲没有什么变化。她还是那么神采奕奕，边看他走下公交车，边和周围人叽叽喳喳说话。昊辰隐约都能听见母亲的声音，“嗯嗯十点钟仲唔起身 食咗饭未 水而已 汤有汤肚啊 帮忙收拾厨房啊.....”当然只是调取声音的记忆，他什么也没有听到。他将这些可被仿拟的女性声音笼统地定义为“爱”，或者至少是一种他必须承担的、代表正义的白噪音。身为儿子的他就很难制造出类似的声音，嘤嘤嘤嗡嗡地重复着一些对于生活的重复描述。细致到描述水开了、汤

好了、花谢了.....最爱、只爱、好好爱、永远爱.....

昊辰的房间其实和二十几岁离开家时没有变化。墙上还挂着科比（居然真的已经走了吗？）和周杰伦（居然真的那么胖了吗？）。书架上一些已经看不懂的教材前，堆着前女友送的木质堂吉诃德手办（他收到时其实还不认识堂吉诃德是谁，现在也不太认识，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为底座上写了这四个字），球鞋（就连大学时候的球鞋还依然躺在床底）。闲来无事时，他从书桌里翻出了中学时学校发的国光口琴（他拆开盒套吹了一口气，呛得半死，已经发霉），美术课画竹子用的碳素墨水（已几乎凝结成碳屑），还有一台真正的打字机。那种手臂很长，很容易把华府饼干的屑掉进去的打字机。

打字机年代久远，已经泛黄。昊辰记得那时候跟着电视大学学打字，从“ffjj ddkk”开始训练（如果没有记错，打字机上还留有自慰留下的痕迹，因为掉落在密密麻麻的字臂间难以清洁索性就算了啦哈哈哈）。那一瞬间，昊辰甚至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离开这间屋子，在十四天以后去上海开始埋头建设新的生活，还要表现出期待已久的样子。如果有一线机会，他宁愿回到这里，重新开始。无忧无虑像个动画人物一样，不要长大，也不要太多的爱，太复杂的未来。拉肚子就可以不用上学，看到女孩子就想拉她们头发让她们求饶。

Ffjj ddkk ssll aa;; 空格

“我为什么会做这么奇怪的事呢？对着打字机.....”

“上学上学 恋爱恋爱 工作工作 死死 空格.....”

昊辰小时候好像看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发明打字机的那个人，有天看到太太伏案工作的背影，产生了幻觉，他觉得坐在那里的不是自己的太太，而是他苦思冥想的打字机的形状。“如果把妻子的头当做字键，弯曲的臂当做字臂，这种结构不是很理想的设想吗？”

隔离的日子里，昊辰又找到了那个故事，居然是真实存在过的。它似乎解释了他最初的爱情观。那几近荒谬的，又与书写符号有关的反复捶打，变异捶打，捶打至逼到墙角极限后的复归原位、再继续捶打，一年又一年，捶打进阶、吸金币过沼泽、遇到妥拉贡、以腹肌深蹲臂力挤压捶打妥拉贡、负伤流血能量降低、直至继续捶打，看到金色的VICTORY降落。以指纹传导至主机，感应心跳指数、血压指数，储存记录。留学、异地恋，都无非是如此。

“爱你哦。晚安。”是军纪严明的操练口号。“永远爱你”是决心。“2019-nCoV”是要面对的巨龙。他每天都拥有不劳而获、扎实丰富的三餐（母亲通过行贿还会给他夹带一些水果）、安静的睡眠（身旁没有人）、没有市声、没有工作。

那段好日子开始的第一天（距离昊辰结婚，只剩不到21天。离去学校入职，只剩不到28天），短暂又朦胧，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可真令人想念。



张怡微

青年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出版有小说、散文集多部。

小说家

这里是华语作家的首发原创小说。我们尽力挑选出最好的作者，也等待最好的读者。



图片来自 [Karsten Winegeart](#) on Unsplash

小说

十万嬉皮

杜桥 | 24 小时文学聚会

我已经过了爱诗的年纪，
也过了追求永恒的年纪。

我们都应该知道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陨落于那场彼得堡近郊的黑溪决斗。决斗信号发出后，二人垂枪于腰侧，进行了长达数分钟的对峙。这是不成文的默契，因为谁也不想率先开枪。先手一旦打空，便唯有任人宰割。对峙过程中，法裔宪兵队长丹特士注意到一个细节：普希金的双唇在轻微翕动。最初他以为是咒骂，但随即又否定。普希金站在三十五米外，看不清细微神情，但面容似是肃然的。于是丹特士判断他在祈祷，心中凛然。普希金真动了杀心。或许自己不该骚扰他的妻子娜塔莉亚，更不该娶他的妻姐叶卡捷琳娜——普希金的嫉恨多半来自后者。随着无声的祷念，普希金的形貌似乎在肉眼可捕的范畴之外蓬勃盛起，影子也变得愈来愈深邃、愈来愈魁伟。很快他大脚趾的胼胝层都要高过自己了，丹特士暗想，不能再等。抬枪瞄准时，那种目不可见的蓄势却突然停止了。他看到普希神色大变，在数十秒的时间里，诗人一动不动，似乎经历了肃穆、狠戾、惶惑、震怒、枯悴等数般状态。丹特士畏缩起来，这是否是惑人耳目的陷阱？他侧身缓步向左前方移动，双手握枪横于肋下，待普希金抬臂便欲快速左右横移，以期扰乱瞄准，迫使其匆忙射击，失去准头。但普希金全无射击之意。诗人斜肩走来，似乎失去重量，而手枪是枚秤砣，将他身体压向右侧。他毫不停歇，无窒碍地踏过禁界线。丹特士不得不举枪瞄准。当他们相距二十米时，丹特士看清了普希金的眼睛，两枚黑曜石，全无生气。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漠视与侮辱，于是扣下扳机。普希金腹部中弹后应声倒地。剧痛使他清醒过来，撑起身子勉强开了自己的一枪，正中丹特士胸前一颗铜纽扣，随即休克。助手丹扎斯将其拖上雪橇，拉回家中。两日之后，1837年1月29日14时45分59秒，普希金握紧老师、挚友、信徒茹科夫斯基的手，死了。逝者已矣，我们得关心活着的人呐。茹科夫斯基死了学生、死了至交、死了上帝，可谓悲恸之至。但我们也觉得这种悲恸本质上并非源自普希金的死亡本身，而是普希金没按他预想的方式去死。这种揣测有些卑鄙，但事实十之八九就是这样，即使茹科夫斯基不愿承认。退一步吧，我们给茹科夫斯基留些尊严，换种说法：他一生忠于普希金，也忠于那个关于普希金的死亡预见。但如果要二者择一，那一定会是后者。

茹科夫斯基在皇村学校第五幢灰白色校舍下第一次见到普希金时——记忆中那个精灵尖耳隐没于栗色鬈发、面色时而黧黑时而苍白、身材如同短笛的十五岁少年挥手一笑——就预感到他的死亡。透过一个少年的笑容窥见死亡，多残忍、多痛苦的事。二十年来，每当茹科夫斯基注视普希金几乎从未改变的脸孔，这种负罪感就会重新升起。而普希金一无所知，一如既往地对正在行进的现实葆有近乎狂妄的信心。他似乎永远矫捷、暴躁、拥有与旧日告别及一跃而起的能力。茹科夫斯基艳羡得要命，他是寄身旧时光的老遗民。那次初见以及裹挟着它的一切细节，核雕般的、深渊般的、万花筒般的，初夏白亮的巨大太阳，少年诗人瞳孔反光中跑跳的其他少年，介于被天风吹落与被二人冷冽讽诵声震落之间的嫩黄色花瓣叶，对茹科夫斯基来说，就像是万物之源。

那一日，茹科夫斯基瀑布般倾吐对普希金的激赏，动情吟咏在自己主编的《欧洲通报》上头条发表的《致诗友》，已经全然顾不上文坛盟主应有的从容矜持。普希金最初轻拍手腕应和，第三个诗节时也加入进来。最后，少年诗人告诉他自己要去上剑术课了，向他告别。他凝视普希金的背影，觉得他的脚步都带有某种韵律，仿佛一边迈足一边诵诗。当背影即将消失时，少年回首向他挥手一笑。茹科夫斯基被一道磐石般、闪电般的预感击中——在鼎盛之年，普希金会因诗歌而死。不是为诗歌而死，而是因诗歌而死。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如凛然蹈火的飞蛾，而后者是无辜罹祸的衰败。随后，茹科夫斯基感到自己作为诗人的灵觉与伟力正被这一预感迅速耗损，预感愈确凿、愈强韧，自己也就愈庸俗、愈羸弱。最终他将被它紧紧攫住，余生成为普希金的附庸与仆从。一直以来，茹科夫斯基从未将死亡预见告知普希金本人。事实上也无从开口，难道劝诫他再勿写诗吗？每次见到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只重重拍他肩膀，说：谨言慎行，我的少年。他了解普希金就像了解自己的指纹，断定这孩子定会得祸于不受束缚的激烈言行。他的忧患逐步加深：普希金广结十二月党人，《自由颂》成为起义军精神旗帜，被亚历山大二世流放到米哈伊洛斯克村，新沙皇尼古拉加冕后亲自担任其文章审查官。茹科夫斯基摹想普希金的死因：因一首狂诞而出格的诗触怒沙皇，被冠以捏造的罪名下狱处死。这种死法的可能性日益增长，逐渐遮盖并驱逐了其他任何死法。茹科夫斯基也逐渐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对它的预防与挽救。他以帝师身份在宫廷中左右逢源，甚至与每位侍卫称兄道弟，以求未来事发时能第一时间知悉详情并觐见求情。此外，他向普希金下达严肃通牒：在把诗稿交付沙皇审阅前，必须先予他过目。他郑重其事地恫吓普希金：这承载着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尊重，否则我们数十年情谊就一刀两断。这恫吓苍白之至，我们知道，茹科夫斯基知道，普希金当然也知道。他不戳破，但深知茹科夫斯基永远不会离开他。就像公牛或火球，没人能阻挡他，也没人能将视线从他身上移开片刻。普希金每次如约将诗稿交给他的老师，就像寄信安抚远在故乡的年迈父执。茹科夫斯基很受用，于是更加废寝忘食地读普希金的诗稿。我们曾偷窥过他的梦境，那是片湖蓝色的浩瀚星空，我们飞到近前，那些湖蓝色惊叫着四散逃窜，眼前只剩空白，返程时我们忍不住回望，发现湖蓝色族群又若无其事地重现。就像掬起一捧海水，再怎么看都是透明的，放生回去，又像变色龙般蓝回来。是的，我们的所作所为，与掬水喝的口渴小孩并无二致。我们深入夜空，感觉到漫入某种不同的介质，如同置身看不见的浓雾中。不知道又往前走了多久，我们终于看到星星。它们每一颗都巨大得像我们最渴望的躯壳，那时我们还是少年，以巨硕为美。我们欣喜若狂地散开，跑向那些亘古存在、运转不息的伟大球体。但真正触摸到它们时才惊觉：它们并非球体，而是一个个旋转的字母，因为转速太疾，像是星球。我们只蜻蜓点水地触一下，就被字母的一角击中，弹出数十米。爬起来时，我们看见了一个蚂蚁或风筝一样的人，侧头细看，是茹科夫斯基，他整个人飘在风中，脸被吹得枯瘦如骷髅，胡子被反掀起来，覆住口鼻双眼。他一手艰难地攀住字母的拐角，一手持一柄铁锥，伺机向字母砸击。他的身体附着在高速旋转的字母上，逐渐融成星球的一部分。当适应在风中生活后，字母于他已然静止，锤击也渐渐具备韵律与美感。我们看得目眩神驰，便齐声问道：“茹科夫斯基啊！你所行何事？”他看不见我们，却能听见我们的声音。不假思索答道：“我在改诗！”声音从四面传来，在无形的空间壁之间反弹折射，经久不息。这时我们才发现，每颗星球上都攀着一个茹科夫斯基，千手同挥，千口同声，一般坚毅、严谨而悲壮。我们被他化身千亿的本领所震颤，踉跄跌出了他的梦境。那次偷窥使我们明白，茹科夫斯基是以普罗米修斯的苦修心态雕琢诗稿的每一字的。他字斟句酌，删改任何有可能为普希金带来灾祸的诗句，将“残暴”改为“雄健”，将“奴役”改为“润泽”，将“匍匐”改为“熟睡”，将“抗争”改为“奋斗”。继而呈给沙皇，沙皇读下数行，抬眼皮觑觑他。他便从普希金的近况与逸行中拈出些无关紧要的，凑近绒毛大耳，压下低哑嗓音，添油加醋，浓墨重彩，力求沙皇咧一咧白松针叶样的嘴唇。他坚信自己并非篡弑，而是救难。但普希金早有防备，每次交稿之前，他都会将新诗用法语誊写一份，交给锁上贞操带的娜塔莉亚保管。普希金和茹科夫斯基啊，这两对夫妻般相互掣肘、博弈、挂念，普希金是时而温情时而浪荡的情夫，茹科夫斯基则是明察秋毫、理直气壮的妒妇。他们维持着彼此的引力与斥力，有时竟感觉乐在其中，似乎大局的云翳已然散去。但我们睁开全视之眼，看到老鸦涎水般的不祥预兆已经浮现。

普希金迷上了决斗。

茹科夫斯基不以为意。他知道，普希金绝非世人印象中芦苇一样的文弱诗人，相反，是个冷峻到残酷的高明枪手。像柄匕首，随时准备飞刺而出。决斗带来的肌肉紧绷后一往无前的释放感，比普希金与娜塔莉亚、妻姐叶卡捷琳娜及其他情妇的性爱强烈百倍。在某种程度上，是决斗使他永葆青春。茹科夫斯基数次劝诫无果，也就不再勉强。一则他相信普希金既然会死于诗歌，就不会死于子弹。这二者一文一武，相去千里。二则普希金未尝败绩的枪术也几乎打消了这种顾虑。所以，黑溪决斗当日，茹科夫斯基正在地下室批阅普希金的新稿。斗室几如囚室，四壁与铁门厚达一俄尺三俄寸，里面产妇临盆外面也寂寥如死。茹科夫斯基放声朗诵，诗句撞开唇舌，喷薄而出。他在壮年就掉光牙齿，舌头僵木，便是因为这样不惜损身的激情。那些句子腾跃而起，刺击四面铁壁，发出锵金般的铮铮声，完全想象不出它们最初从普希金齿间滑出的驯顺模样。这是最后一首诗，当然，普希金写它时、茹科夫斯基读它时都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以为它只是一级台阶、一截跳板、一个与兄姊们并无不同的婴儿。但事实上，它从诞生伊始就注定不凡：它生于普希金与娜塔莉亚关系濒临破裂的罅隙之中，故此并没有一份由娜塔莉亚保管的孪生法文备份，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存在。更何况，幺子就是幺子，殊宠与生俱来。它不仅继承了父兄的遗志，也承荷了身后无数胎死腹中的弟妹之精魂。它比任何同侪都要跳脱、执拗、铿锵。这一点茹科夫斯基已有体会，但依然低估了它。他只是感慨自己愈加朽老了，却不知道即使全盛之身也难以克制这幼虎的锋芒。它的父亲给它取名《纪念碑》。在这首诗中，他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夐绝尘寰的通天纪念碑，它的基座是1832年彼得堡冬宫广场上大兴土木建造的沙皇亚历山大纪念碑，碑体是由历代沙皇的金冠熔炼重铸而成，镶嵌以从王座上切割下的玉髓、尖晶石、珐琅、黄玉、印度珍珠、红蓝绿宝石。碑文是他所有的诗句，它们生而如此般悬浮缠绕在碑体周围，瞬息万变，永不静息，犹如晨曦中半梦半醒的少女嘴唇绒毛上的一层金晕。批阅的过

程也是攀爬的过程，穷数月之功，茹科夫斯基离碑顶仅剩一臂之遥，一旦回头俯瞰，便会失手坠入翻腾的云涛中。这首诗一共四个诗节，茹科夫斯基已将一、二、四诗节批阅删改完成，唯独第三诗节颇为棘手，整整花去三月时间。而时至此日，他已经站在最后一句面前。它是：

在这严寒的世代，我曾歌颂过自由。

他凝视它，陷入它，环抱它，亲吻它，笃信它。最后，他把那个深爱它的自己一锥击毙。怀着犹大般的罪疚挥锤凿击，完成前所未有的僭越——此前他只改动个别敏感词汇，而这一次，他不再面对个体的星球，而是由它们连结而成的星系。他将整句诗改铸为：我对人民有益，因为我诗句精美的鸣动。

诗成之后，茹科夫斯基力竭晕厥，醒来发现一臂之厚的铁门竟破出一个大洞，破口铁茬外翻，极不规则，内壁如恶犬口腔利齿差互，不似人力所为。他回到桌旁，却发现诗稿散落一地，最后一张页尾有排锯齿状空缺，似被削出，近旁有碎裂的纸屑，他展平拼接起来，竟是自己涂改而成的那层薄薄的“对我人民有益，因为我诗句精美的鸣动。”他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何人何物才能这样鲁莽地洞穿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又趁他昏厥时剥走那句可能为普希金带来祸端的诗句？他第一时间想到皇室，于是命忠仆住地下室，自己准备即刻入宫。对赴决斗的普希金，茹科夫斯基毫不挂心，他相信，在最终的死亡到来之前，普希金不会有真正的危险。

我们彼时也相信，甚至比茹科夫斯基更笃定。我们相信，即使到一切都不可为的时刻，只要普希金默念诗句走去，大海都会分出一条旱路，高山都会劈开一条裂谷。这并非浪漫化的形容。伟大诗人的愿力无坚不摧，这是孕育他的黄金时代所降下的恩赐。这种恩赐崇大而隐秘，只有诗人本人能隐约感知到。他最初发现这一禀赋是出于本能与巧合，随即像古代巫师一样，虔诚地寻找自身行为活动与世界运行法则之间微不可察的联系，从而渐渐掌握影响事件走向或自身命运的规律。最确凿的印证是在十七岁，他拿叔叔汉尼拔试刃，在舞会上以少女罗莎科娃为由挑衅，扮作怒发冲冠的痴情少年，将皮手套重重砸在汉尼拔傲兀的驼峰鼻上。叔叔怒不可遏，当即应下决斗。三天后普希金提前来到约定地点，一片草势衰颓的牧场，沉静地默诵自己的新作《心愿》。这首诗很短，缓声念完不过一分钟。最后两句是：爱情的折磨弥足珍贵——即使被折磨致死，也请让我死于爱情。念完之后，他几乎深信了自己是为了那个雏鹿鹿角般的少女罗莎科娃而与叔叔以命相搏。数分钟后，汉尼拔失魂落魄地赶来，照面便跌跪下去，亲吻少年诗人的膝盖。最后，宽容与仁爱使诗人与叔叔紧紧拥抱着。气喘如牛的族人赶来后惊掉下颤，他们一路上苦劝无果，几乎已经开始摹想叔侄一方死亡或同归于尽的可怖情景，直到那个刚愎自用的中年贵族蓦地失心疯般向牧场奔去。处女决斗之后，普希金所向披靡。他已谙知密谛：只要念诵与所行之事相和的诗作走上前去，幸运之神就会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此后数十次决斗中，或是对手不战而颓，或是子弹出膛后离奇地偏离轨道，这时诗人往往放弃自己的那次开枪机会，显示出令人心折的胸怀气度，耶稣般向忏悔恸哭的失败者走去，轻拍他们肩膀。

此类秘辛普希金从未向人倾吐，即使对茹科夫斯基。他一张口，就有严冬之风、厚云投下的影翳与洋甘菊的清冽异香塞住他的嘴，绑住他的舌头。它们都是轻柔且善意的，因为诗人若真的无窒碍地说与世人听，那么黄金时代也会即刻收回祂的恩赐。故此，茹科夫斯基长久地与我们站在一边山崖上，我们都永远爱着普希金，但也永远难以预测望远镜镜头中他的行止。诗人如何在遭拒数次后一举俘获莫斯科第一美人娜塔莉亚的芳心？又如何在对沙皇肆言“当日我若在彼得堡，必定站在十月党诸友之间”后仍能全身而退？茹科夫斯基啊，我们不能回答你，你只能理解为诗人烈日般的个人魅力作用了。

忠诚的茹科夫斯基始终蒙在鼓里。他认为普希金被厄运扼住双脚，却不知道最致命的厄运正是他自己。我们曾考虑是否要派洋甘菊的清冽异香到梦中告诉他真相。思来想去，莫衷一是。我们看茹科夫斯基劳苦了一辈子，都想让他花白鬃毛下的鳄鱼皮嘴唇露出解脱的微笑。但洋甘菊的清冽异香自己心肠太软，它说，风中之烛，难禁摧折。我们说，那也不能剥夺他知道真相的权利，一无所知比罪疚至死更可悲。更何况，若他得知自己的预感并未误谬，或许就喜忧参半了。最终我们取了个折中的方法，最残酷的任务——重述 1837 年 2 月 10 日普希金的死亡决斗——交给刚加入不久我们的新成员，即那枚法籍宪兵队长丹特士手枪中射出的罪恶铅弹的弹片。它穿透普希金的腹部，在诗人的小肠滞留两天后被医生取出，浸足了金澄澄血液，现在还颤抖得像只苏醒于冰层之下的西伯利亚花栗鼠。（一半因为惊惧，一半因为兴奋）。它将在梦中击中茹科夫斯基的胸膛，将浑身金色血滴带入其心脏，那一瞬间，老诗人就什么都明白了。而洋甘菊的清冽异香则负责较温和的部分——去梦中告知茹科夫斯基当日在他晕厥后的情景（似乎也并不温和，但以洋甘菊的清冽异香的性子，大概会说得委婉些）。

罪恶弹片：黑溪的白桦长势稀疏，像少年初次梦遗后几周内窜出的孱弱胡茬，绝非歌谣中可以予男女幽期以障蔽的密林。丹特士授意助手阿尔夏克与丹扎斯协商时最好挑块密林，二人于森木掩翳下各开一枪，惊飞林鸟，铅弹嵌入某棵木干。然后走到林外，和平握手，既遏止流言，又保全声誉。但丹扎斯拒绝了，定下白桦林中央的这片空地。于是丹特士冷下心，准备死战。以我对他有限的了解，他不怕死，至少不惮因决斗而死。漂泊异国的浪子，几无牵挂，只担心新婚妻子。但即使自己被射杀，叶卡捷琳娜也会被普希金照顾得很好。所以，决斗当天，丹特士虽然谨慎，但总体来说比较平静。正如他对待生命的态度：生虽可乐，死亦无伤。那天日落时，天色暗沉，雪时下时停，我们先到，丹特士轻轻跑跳，将皮手套摘下，将手指蜷在口鼻前哈气，以防冻僵。普希金二人的雪橇是卡着约定时间到的。丹特士看彼方似乎无意交谈，就直接退至禁戒线后，等待开始讯号。决斗开始后，丹特士把枪管横起，光从枪口射进来，我得以看到普希金。他出乎意料地年轻，而且正随着双唇的念诵越来越年轻，那几乎是一种病态的、回光返照的青春。皱纹如湖面进入静夜，瞳仁像火星进出壁炉。我辨别出来，他在念“诗”。我诞生之初，我的父亲，《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制枪大师列帕扎之子小列帕扎对我说了第一句话：“你将刺杀一个诗人”。我问他什么叫“诗人”，什么叫“诗”。他让我回想自己从铅液熔铸成型时痛苦而恢弘的一刻，回想与我同脉连心的胞兄们在千里之外射出枪膛的一瞬，他说这些时刻与“诗”的共性在于：难以言喻，但一旦遇到

它，你就会确凿地感到生命已默然产生或微小或巨大的生长。接着他割破手指，落一滴血在我身上，我不自主地扭动着吮尽了。他说，我造枪铸弹一辈子，就等这场刺杀。当你进入普希金的身体，我的血滴会与其血肉在高温与混沌中交媾，万里之外，我会即刻心悸而死，但死前一瞬能体会到普希金的痛楚与绝望。对血债无数的制枪师来说，这是最崇高的死法，几乎能抵偿生前一切罪孽。所以啊，最初我罪疚欲死，但后来竟然有些跃跃欲试，我将杀死诗人，同时杀死父亲，这是何等壮举！当诗句响起时，我感到自己再非刹那前的旧我，那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感觉：一方面，殊绝常人的敏锐五感将每一个青铜般的音节掷到我耳旁，生而有灵的禀赋令我为振奋、欢跃、律动；另一方面，我嗜血的本性感到暴躁、颓靡、畏缩——在诗的涌动中，普希金将所向披靡。在今天，他将曾遭遇的一切苦难与困厄、一切反抗与呐喊、一切意欲撼落两代沙皇头颅后巨大光晕的决心，都灌注到这场诵念中，一齐压向沙皇的精神使者——可怜的、木然的丹特士。

他层叠的、无所不在的声音念：

我自建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芳草绝迹，在所有延伸向它的石径它头倾向天涯峙于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之上不，我不会永眠——我的灵魂在圣洁的诗歌中，将比我生命之火的余烬活得更久长，拔身于朽亡的循环——我将永远光荣，只要还有一个诗人活在月华下的世界上我的诗名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它所有的子民，都说着我的名字无论是骄恣的斯拉夫人的子嗣，是芬兰人，以及蛮僚般不辨智慧的通古斯人和原野上的远朋——卡尔美克人我永愿吻他们的额因为我曾用我的诗歌，唤起人们的善心在这——

他就顿在这里，神色大变，我涉世不深，对人类的情绪了解不多，只觉得他像是失去自己的名字。他嘴唇翻动，舌头颤抖，但发不出声音。于是我醒悟过来：他忘了自己的诗。黄金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像个滑稽而羸弱的哑巴。随即他走来，失魂落魄，像个癫痫患者，或一缕烟。我不再有任何顾虑，我想身后的丹特士也一样。片刻之后，他扣动扳机，我射向普希金。

洋甘菊的清冽异香：茹科夫斯基呀，你就当这是一个梦——这本就是个梦，对吧？你不是一直怀疑那天是皇室爪牙入室掳走了那句“在这严寒的世代，我曾歌颂过自由”吗？其实呀，你错怪了他们，虽然他们平日里都是坏种，但这件事上，他们力有未逮。是小自自己跑出去的——我就称呼“在这严寒的世代，我曾歌颂过自由”为“小白”啦。它真美呵，从诗稿上腾跃而起，冲破了覆盖其上的篡伪品，将其粉碎为落雪般的纸屑。它在旧居上空盘旋三圈，向沉稳而有失激烈的同胞们告别——它们假装平静，心中却羞惭欲死、妒火中烧。随后，它像蜂鸟穿透雨帘般穿过了铁门，一眨眼就消失不见。在它消失的那一瞬，我惊觉自己爱上了它，但为时已晚。在我的有生之年里（几个月，或十个月，我就会被吹散，弥漫空中），我们全世界的兄弟姐妹都传讯说未见过它的芳踪，或许见过，但它太快，他们就会以为只是轻逸之风或流溢之光，一晃神就忘了它。但我永不会忘，小白，这位履空如蜂鸟的诗句，在完成与我的一面之缘后，就利落地冲出普希金传奇的终章。普希金只是孕育它的子宫，是它生命长旅的肇端，而死亡是他们之间最坚韧的维系，也是最庄重的诀别。在此之后，它便幡然背叛自己坐不垂堂的贵族血统，与自己的影子（世上唯一能勉强追逐它的事物）一前一后游历万乡。他们从黄金时代与白银时代的对垒军阵前轻掠而过，作别圣埃萨大教堂穹顶那只正在以永恒般的静止（一种极缓的、不可眼见的速度）化身虚无的双头鹰，刺破十万佛国中央通天塔广播台漫天花雨般播撒的气泡音梵呗，将从唐人辞句中撷取的三粒恒沙撒入一《Cyberpunk 2077》莫克斯帮街头小子玩家扣动扳机的眼睑里，留给他一个念头：我必须与现实决裂。在漫长的旅途中，影子也有它八分风神。到 1937 年，苏联政府会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普希金广场中央铸造普希金纪念碑，他们要碑上镌刻的诗句归以完璧。他们找到你的孙子帕维特恩，搜寻他从血脉中承袭的模糊记忆，发现了小白的踪影。他们从未妄图羁束小白，只想留住它的影子。但影子没望他们一眼。他们想把“在这严寒的世代，我曾歌颂过自由”锲于碑上，但一旦锲下最后一个字母，第一个字母就会消失，即使从最后一个字母倒着刻也同样。也没有人能完整地写下这句诗，笔迹像刀痕一样消失，若写下倒文置于镜中，或反刻印章钤于纸上，则镜碎纸燃，祸及他物。他们自然也无法念出来，舌头在最后一个音节处僵硬如石，三日方愈。小白已经全然从世人的语言集合中逃遁出去了，它在尘寰的踪迹已了然无痕。等到我死了，你死了，我们都死了，我们的血嗣也死了，它就会获得完整的自由——你知道啊，只要有一人尚未遗忘它，它就无法飞至无人之境。它已逃脱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记忆是它最后的羁绊。它没有辜负身躯中的“自由”二字，从未让什么人捕获过，即使是它的生父普希金。我来告诉你这一切，是希望你不要太过沉痛，你误杀了一个罅隙中艰难蠕动的诗人，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释放了一个身如夭夭的生命。你是小白素昧平生的教父，你伪制赝品，却正成解蔽之效。赝者如镜，使它诞生我识，启蒙灵智。如果怀些私心，你可以将小白看作普希金遗存于世的欲望具象与灵魂之火，即使它已经庄重地与普希金诀别，有如僧侣自誓与家人割断迢迢不绝的俗缘。但他们相隔愈远，在某种程度上就愈加肖似，甚至相为表里、互作印证。正如南北之两极，抑或昼夜之日月。他们所共有的自由呈现某个沉静的恒值，普希金承荷的瞻仰与纪念愈多，愈加沉重滞缓，小白受到的寻觅与召唤就愈稀薄，也就愈加轻盈自由。在你的襄助下，普希金以身祭献完成了黄金时代最险峻高峻的文学迁跃：写出比诗人自身更自由的诗句。

II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筝（Young Zen，本名郑筝，FIO 厂牌成员。出生于潮汕澄西县天主教家庭，父亲阿光三世信教，当时雄踞澄西师范对面华威百货三楼 C012 档口，是整个澄西拥有带“ADVISORY”腔标尖货最多的打口商。母亲成珍榕是澄西第二小学音乐老师，因为淘一张 Nirvana 乐队的《Nevermind》原盘与阿光种下情缘。当时成珍榕只记得一段旋律，跑遍四十九家 CD 档口无人听出，告诉她：要么你没哼对，要么根本没进过。找到阿光这，一耳朵就听出——是那张“细浪闹仔”吧？转身进店翻找，从柜脚抽出来，封面正是一个逐饵浮游的白人婴儿，在深蓝海水里张臂顶肚，小

鸡鸡像截脐带。阿光说，只这一张，去年赴京时从五道口一店主心尖上夺来，咬死一百二，一分不赚你。成珍榕沉吟不语。阿光松口，你若真喜欢，每晚我关店前来店里听，每天一首，两周听完。数月后谈婚论嫁，男方家里提条件：要娶外省诸娘，须令她信主，往后有小孩也须信主。女方 call 重庆老家告知婚讯，父母管不了她，弟弟怕她。她便自己提两个条件。浸礼时她被牧师老林粗膀卡脖摁进水里，呛三口水，郁气冲发，近乎十七岁少女赌气：婚后阿光不能再听摇滚，往后有小孩也不能听。1996 年 11 月 29 日，循袭乃父乃母叛逆与妥协因子的筝与马歇尔布鲁斯马瑟斯三世的处女专辑《Infinite》同时降生，自此与嘻哈乐结下不解之缘）捏紧了我（MC 游侠，FIO 厂牌成员）的手。她手细瘦，又因用力，触感冷而嶙峋。我左手由她攥着，右手再轻捂上去，轻轻攀动，像解枚鹤卵。我极珍惜这刻光景，轻佻点说，也是享受。够卑鄙的——趁女孩子做出抉择前的紧张时刻予她温暖，成为她（至少是此刻）的依靠。乘人之危，非君子所为。但跟筝熟悉后，心理负担就可抛开，她可不是什么普通女孩儿啊。没人能成为她永远的依靠。当然，这话等于没说，谁也成不了谁永远的依靠，我们嘻哈歌手不谈“永远”，只谈“此刻”。例如，我们此刻像对情侣，在未来的某刻可能就形同陌路。当然了，暂时不用担心，一切在我们做出抉择后才会改变。

筝和我坐在昌兴街屁股上无名书店的咖啡区。一块靴形吧台，一排高脚椅。我们清楚彼此对这家店的感情。这是我们（医生、月球、恶童、双派客、筝和我）的“红船”（四年前我们穷得像群蟑螂，最落魄的一段时间几乎每晚在这里过宿，我们在最后一排修伟书架投下的影翳里缩起身子，环住膝盖，很快就能入睡。没人来赶我们走，或许根本就没人发现我们。说起来，我们从未见过书店老板，就连店员的面孔也换得极频繁。大概除了我们，没什么人愿意经年累月地呆在这里。等谁比赛拿了奖金，我们就另有派头。穿垫肩夸张、日头下反光刺眼的廉价西装，并排走进店里，从邻桌扯几张椅子，脑袋凑成一个圆。我们一边畅想厂牌的建立与未来发展，一边牛饮店员冲的速溶雀巢热咖啡，十二块无限续杯，齁甜。那块区域不苛求绝对安静，但我们习惯压低嗓音，不知道是想彰显教养，还是不自知地进入了某种类似地下党的角色），闹中取静，装修邋遢得像防空洞，读书的人稀稀拉拉，但远比拍照的人多。整个书店的颓惫气质不是那种可以寄托复古情调的颓意，是真的颓意，随时可能死去的颓意。这不是形而上的形容，一年多前门口就贴了“旺铺低价出租”，四、五个月前书架上开始挂三折清书的标牌，据说是有个火锅店老板要盘下来开连锁，几乎全谈好了，最后人来了一趟，走时说风水不宜，黄了。我们猜测，那人一定是闻到了书架深处与书库里散发出的霉味，或纸张与油墨被蠹虫嚼烂的腐臭。火锅店要生气，当然不沾死气。不久前，光哥说要投资一家“普希金书店”时，我突然像被点燃了一样，第一时间告诉筝，你爸或许是那个可以救活这家书店的人。我知道她只要开口，就是一句话的事，但我也知道她宁死不愿开口。

我硬头皮去找光哥，跟他汇报了些音乐公司的近况，谁的专辑混好待发，谁要不要续约，又签了哪几个网络歌手。最后，我跟他说，您不是要开一家“普希金书店”吗，昌兴街尾巴上有家老店，筝挺喜欢去那儿的，或许可以盘下来重新装修一下。他斜着眼看我说，我栽培你不是栽培传声筒，有什么话让她自己跟我说。我僵笑一下。他接着说，你叫我光哥，小筝叫你什么？我连忙改口，光叔，光叔。他被我气笑，道，我是让你离我女儿远点。我又僵笑一下。临走时，他拍拍我的肩，回去告诉小筝，我都记着呢，小筝会背的第一首诗就是《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普希金是她最喜欢的诗人。我给这次圣彼得堡普希金纪念碑赴中巡展资助了一千两百万卢布，俄国毛子才答应来这座城市，并由我定时间。市中心寰宇城盘了五家铺位，准备凿穿墙壁打通空间，让“普希金书店”在小筝十八岁生日那天落成，成为整座城市的盛事。你觉得这生日礼物怎么样？你小子别光点头，那晚我要你跟医生打一场表演赛，不难吧？“诗歌之夜”，这名字怎么样？胜者就叫“街头诗人”。我说，我不想跟医生打。光哥说，他几年没碰麦克风了，你还怕赢不了？我是想捧红你，懂吗？

回工作室后，筝问我。操作平常，我可能会用她爱听话哄她，事后再悄悄实现。但这件事势在必行，无法改变，骗她只会让她看轻我。只能如实说，定在寰宇城一层，咖世家斜对面，光哥亲自定的。她没搭腔，过了一会儿冷声说，书店不赚咖啡钱，命短一半。语气笃定，好像凡书店固有一死，区别只在苟延残喘的时间。我无意质疑光哥的英明，但还是下意识点头赞同。一方面，我对书店这种文艺青年聚集地可预见的消亡毫不怜悯（说大一点，我漠视所有文艺青年的灭亡。这个族群有原罪，懒惰、放纵、傲慢、百无一用。当然，这种厌恶是虚弱的。我在厌恶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就是文艺青年，至少曾经是——那种由无所事事导致的困厄真是活该。换个角度说，一个不厌恶自己的人不是肤浅就是虚伪），我估计啊，光哥也是如此。他投资“普希金书店”，应该有多重考虑。明面上当然是为筝生庆（我不是说光哥虚伪到连亲情都不纯粹，而是他做事总是能一举多得，这是他藉以从当初打口碟商混成音乐公司老总的独领风骚），其次几个咖啡钱当然不在他眼里，甚至卖书的盈利他也不在乎，他当有更大的商业野心，他想把这次巡展包装成某种国际交流，然后借着小城市民的受宠若惊将书店打造成某种象征性、纪念性、地标性的建筑，某块勋章或某颗美人痣。最后，以我对光哥和筝的了解，对“普希金”或“书店”这种事物的偏爱应该属于前者，即使后者一定程度上也有，也被前者的滤镜所放大了。（例如小筝会背的第一首诗就是《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和“普希金是她最喜欢的诗人”种话大概就与现实有相当的差距。在我们这辈人的印象中，“普希金”这个词比“汪国真”好不了多少，约等于鸡汤大师或成功学神棍。我问过筝这个问题（你会背的第一首诗是什么），她根本就记不得。她还说，“第一次”这种话术基本都带有被从乌有之境湿淋淋拎出来卖的腥臭味或过度矫饰的廉价脂粉味，大多数“第一次”都是为听众而存在的。如果不被裹挟，你甚至从不会思考“第一次”这种装饰性的概念。最重要的是，“第一次”这个词，从出生起就承托了某种男性凝视下的精神亵玩……我记得当时连忙举起双手，以免成为她的某个假想敌。我说，你看，你天生是玩嘻哈的料，反抗精神与攻击精神是嘻哈歌手最宝贵的品质。剩下一半话我没说，准备以后再告诉她，即：那是古早时期的嘻哈精神。《八英里》里的。时至今日，这种激情就显得愚蠢。如今我们过得着实不赖，没有白人警察当街把我们按倒搜身，也没有帮派分子闯上公车用枪抵住我们额头。这几年托光哥的福，甚至连贫穷这种最

微不足道的厄运也摆脱了。以前我们把跟音乐公司签约称为“缴枪”，但当我们真正“缴枪”了，才恍然发现我们其实没什么“枪”好缴。光哥是个开朗的老板，签约后几乎没什么实质的拘束，他不逼我们全国各地接商演或跑音乐节，也不要求我们代表公司去参加综艺节目，甚至从不限定过我们新专辑的方向或完成日期。我们现在的生活比“缴枪”前还要懒散三分。每天睡到中午，张开眼皮后登上嘻哈网站，看看有哪些外国同行离婚了、进局子了或被乱枪射死了。很多不知名嘻哈歌手都是通过这种渠道进入我们视线的。没办法，这十年来，嘻哈歌手像蛆一样繁衍，很快歌手就比听众还要多了，或者说，大多数听众自己也开始做歌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你的人生跳到别人眼睛头，作品才能跟着蹿出来。我常怀疑那些死于乱枪的黑人同行是故意踊跃参加帮派火并的，他们的心脏一旦停止，惨死的照片就会被传上网站，一瞬间就有几千点击量。这几千人中如果有十分之一点进他的主页，或许就增加了几百个听众。这种类似古代铸剑师以身殉剑的壮举，值得尊敬。我每天醒来会默默点开一些陌生主页，戴上耳机听听这些可能是遗作的 demo。它们大多数并不极好，至少不值得殉死的代价，但我还是会坚持听完，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全国或全世界的同仁都有某种默契，再残忍、再没有耐心的人也不忍心打断遗言，对吧。然后，我们通个电话，约一家店吃火锅或大排档，饭后要去工作室呆一会儿，要么各自回家午睡。天色暗下来之后，我们在无名书店门口碰头，然后一起去喝酒跳舞唱 K。我们差不多每个月休息二十八天，工作两天——月底抽一个周末到公司录音室录一段 demo 即可，日子是神仙过的。所以说，即使中午在昌荣街吃罢“小龙坎火锅”，脸上浮火，腹中涨气，想找事闹上一闹，也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抨击的、有什么好反抗的）这大概出于某种复古的情趣，光哥想寻求一种沧海横流独木难支的悲壮——他享受这种悲壮；另一方面，这话是她说的。换言之，真理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真理，一种是筝的话。她那天着冷色风衣、白色西裤，像根冰锥，作断言时尤显飒爽。只有腰带是米色的，好像她整个人只有腰腹处才是轻软的、可收束的。我那时萌生过一个念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把那根腰带系紧，然后反身勒在肩上，将她整个人扛起，冲出书店，跑到街上。她没法做出有效的反抗——那腰带就是捆仙索，或者腰腹就是她的阿喀琉斯之踵。至于要向哪个方向跑，最终要跑到哪去，要到那里做什么事，都没想好。

这个念头此刻又蓦地升腾起来（否则我根本不会记得它曾存在过），并非是因为我对筝有什么不轨之想，而是我潜意识里的原始逻辑在作祟：无名书店是我们每个抉择的诞生地。那么我只要强行带着筝离开这儿，抉择就会延宕。但我们又知道自己绝不能走，也绝不会走。在命运的岔路口，我们必须聚集在这座城市里不可消亡的母地，并以此为锚点拟定未来。做出抉择前，我们需要回望。抉择中的偶然性微乎其微——它的胚形早已铸就，以我们曾做出的数以万亿计的抉择，曾侥幸脱身的长夜与梦境，及构成我们存在全部意义的记忆。

这个抉择与以往的所有抉择一样：既微不足道又生死攸关。说简单很简单，说繁杂又极繁杂。

筝的抉择已经临近尾声。在今天，十八岁生日，她决定去纹身，以此与光哥及其背后的基督教传统决裂（《旧约·利未记》：“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亦不可在己身上刺文字”）。她说：我要刺一句诗，在左手小臂。其次，她决定，就去昌泰路的野孩子纹身店。她原先摇摆不定，是不知道如何面对丹姐。我跟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没必要为此愧疚。愧疚是世界上最无用的物什。只有最自负最骄狂的人才会愧疚。更何况，即使要愧疚，也应该是我愧疚。我说这话时觉得自己虚伪至极，但她难得地并未反驳。此刻她终于愿意去找丹姐，无论如何都算一件好事。现在只需决定最后一件事：刺一句什么样的诗？

而我的抉择则刚刚开始：今晚到底去不去光哥的“普希金之夜”，与医生争夺“街头诗人”的桂冠？如果去的话，我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他？是像老友一样远远互行“金属礼”，走近了重重拥抱，还是像仇人一样对他横眉怒视？到了赛台上，拿起麦克风，是君子交锋点到为止，还是唇枪舌剑你死我活？撇开医生不谈，如果我选择去“诗歌之夜”，就没法陪筝过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生日。她在这个城市没几个朋友，四年前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医生免谈，恶童自不必说。月球远在台北。能陪她过生日的只有我和双派客。双派客婚后捡起手艺，在某家物业公司底下当水电工，跑全城五个小区。薪水可观，就是太忙。他说尽量过来，其实我知道，就是婉拒。他已经回归正常的生活，不愿再见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忍心离开筝？我相信这不仅仅是我自作多情地幻想筝离不开我（即使有一定的成分），而是在客观上，筝在今天需要一个人的陪伴与支持，而那人正好是我。我怀着自私而隐秘的渴望：我并不希望筝的抉择和我的抉择变成互不干涉的两件事情，而希望二者能糅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们的咖啡很快好了。店员指节轻扣吧台，我一跃而起，端回两杯咖啡。在这十几平米的空间里，我们感觉每个细胞都在跃动（筝接过咖啡时难得莞尔一笑）——我们所有甜美的回忆几乎都存储在这儿。这种甜美最初来自咖啡，但渐渐弥散为一种更广泛的氛围。以前呐，甜像兴奋剂，刺激我们满眼血丝地拼缀歌词、砥磨韵脚。这两年么，我们逐渐能喝惯带烟熏味的、冷峻的黑咖，却很少喝那么甜的东西了。所以此刻迫不及待地、认真地、一勺一勺地喝。我们是什么时候爱上这种甜咖啡的呢，大概是四年前成珍榕来的那次。那时她和光哥已经分居两三年，但还没离婚。那天筝发短信给我，说，妈妈从澄西来看我，我在这里没几个朋友，你来不来？后面加了一个疑问的表情。好像是真的想问我：你是我的朋友吗？到书店时，月球、恶童、双派客都到了。筝说医生太忙了，没法儿赶来。恶童重重哼了一声。我们没说话，但都知道，医生不能来。他在给光哥做事，并非抽不出时间，而是立场受限。成珍榕到的时候，我们突然不知道该叫她什么好。我们本想叫“成姐”，但她年轻漂亮得出乎意料，兼怀阅历过恒沙般浩瀚岁月的平静气质。她像漩涡般令我们惶惑。最后，月球喊了声：“伯母。”我们幡然醒悟，也参差不齐地喊：“伯母。”伯母微笑，示意我们都坐下。她没有露出那种年长者傲慢的、笼统的、反客为主的亲切，而是一个个问我们的名字，问完再重复认一遍，仿佛希望永远记得我们。我们既拘谨又微微兴奋，故作平静（或带着某种“好汉不提当年勇”的不情愿）地报出自己的履历（我们基本都拿过某届 Iron Mic 或 8 Miles 即兴说唱比赛某个赛区的前九名。双派客是首届 8 Miles 川渝赛区的殿军，也是第二、

三届的裁判之一。但他最大的功勋不在于此，而是他首次在即兴说唱擂台上使用了双押技巧。在此之前，被普遍使用的是单押技巧，例如“我”和“火”；而双押，例如“挣扎”与“惩罚”，则更具侵略性与震撼力。双押技巧的开发可谓中文嘻哈本土化的里程碑事件。但每当提到这项壮举，人们只会赞颂 MC 北北——来自云南，首届比赛中曾被双派客淘汰的八强选手。在那场比赛中，双派客多次使用双押技巧，但因为以川渝方言押韵，并未被时人重视。而 MC 北北敏锐捕捉到这一点，心头震动，被双派客轻松战胜。此后一年 MC 北北销声匿迹，对双押技术及韵脚储备进行了长期且系统的积累与探索，并藉此在第三届比赛中一举夺魁，震惊了整个嘻哈圈。成名之后，MC 北北曾来拜谒过双派客，将自己的冠军 T 恤送给他。双派客很欣慰，但没接受。我们为他打抱不平，在心底默认他才是真正的盗火者。某次醉中，他说，北北是我的影子，光照下来，影子比人大。我们才知道他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淡泊与谦逊，于是与他愈加亲近。恶童最开始做匪帮说唱，曾是川渝地区说唱组织“袍哥会”的成员。“袍哥会”解散后，他曾担任第四届 Iron Mic 的评委。期间曾被那一届的亚军挑衅并公开挑战，赛台上，他展现出凶狠暴戾的风格，声线如被炭火烧过。但因为肢体恫吓过多，被取消下一届的评委资格。“那小子被吓成了结巴”，他大笑着向我们描述。月球十七岁时就拿了第一个城市赛季军，第二年连续跑了五个城市，拿了两个亚军、一个季军。在此之后，月球就不再去打即兴比赛了，转而潜心打磨作品，仅去年就发了十三支 demo，但水花不大。评价呈两极分化，有人说找个优秀制作人做成专辑或许会轰动一时，也有人说只是一束粗制滥造、学徒气过重的习作。我的比赛成绩最单薄，曾获得第九届 8 Miles 西安赛区的第九名。按照惯例比赛只取前八强，我本该名落孙山，但那次比赛的奖品——一件定制 T 恤和一双限量球鞋，赞助商多给了份，于是放宽到前九强。第二年我实力大增，如果参赛应该有望冲击赛区冠亚军，但赛制改了，即兴赛变成了作品赛。再后来，即兴说唱渐渐成了屠龙技，所有嘻哈歌手都从街头涌入录音室。嘻哈的现场性被剥夺了，那种生涯系于一役的惊心动魄与悲壮被瓦解了。一首歌可以写三个月，可以在录音室录三百遍。嘻哈成了容错率极高的乐种。当然，这也让其走得更远。我们这种遗民式的牢骚是无意义的。总体来说，和那些大厂牌不同，我们中没有全国冠军。即使是我们的老大医生也没拿过，2007 年前后是他的巅峰期，曾代表这座城市杀进 Iron Mic 的全国半决赛，惜败给后来的亚军（像是在火车窗口齐码码排列小兵人的小孩子）。

那时双派客三十二岁，应该只比伯母小三四岁。恶童二十七岁，但已经有两个孩子。月球二十岁。我十八岁。筝最小，那时只有十四岁。确定记住我们后，伯母举起面前的咖啡喝了一口。我们那时竟不约而同地、没由来地紧张了一刻，甚至产生了某种惧怖与绝望。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的念头应该是：糟糕，这杯兑水的雀巢甜咖啡会出卖我们。她会立即看出来我们只是几个不入流的混混。伯母最后说了什么我已经记不准了（人就是这样，越重要的事项就越会遗忘）。大概是“没想到咖啡也能这么甜美”，或者更得体一点，“咖啡的本质就是甜美，不管用多少苦涩掩盖。这杯咖啡很坦荡，我很喜欢。”但“甜美”这个形容是确凿无疑的，她说的就是“甜美”。从此，无名书店就定了基调。我想，我们每每选择在这里做出抉择，就是希望煎熬的功能能掺点甜味。成珍榕待了差不多半个月。她本来准备三天就回去，但我们在出租屋里给她做了一段 cypher（麦克风接力）表演后，她皱着眉问，你们是不是没学过乐理啊？我们面面相觑。后面的两周里，月球学得最好（这也为他后来去台北做乐队打下基础），双派客音准不错，大约学了四成，恶童每天都来，在小黑板角落画了几个涂鸦，把工作室整理一下，我们都看出他并不想学，觉得学这些会消磨“野孩子的”蛮劲与灵气。同时我们看出，他从不缺席只是因为想见到成珍榕。他这样的人，某次站在最远处注视成珍榕的时候眼里竟有泪光。

我学得最勤奋，但几乎完全听不懂。最后只将“节奏”搞透了，但也受益终生。成珍榕说，嘻哈是依托节奏而生的乐种。而节奏本质上就是对时间的分割。故此，嘻哈即是一种切割时间的艺术。艺术这样脆弱的东西，如何能切割时间呢？她说，嘻哈音乐的祖地是贫民窟。他们在地上捡烟头抽，剩三分之一时再扔掉，留给下一个人，商店里最畅销的是宽胶带，用以封住墙洞，从不洗脚，但闻不到彼此的馊味。这样的日子怎样熬过去呢？他们就把苦日子转换为拍子，手掩嘴打 b-box，呲哔噗哔噗，嚓巴蒂巴蒂，再嵌字词进去。苦难就这样被切碎了，总量虽然没变，但在每个拍子里都遭遇了抵御它们的字词，被各个击破，再难成气候。久而久之，他们的舌头变薄，牛皮鼓面一样，指节隆起，变成鼓槌。渐渐的，他们可以真正模仿出鼓的声音。那种鼓声轰轰如雷，可以盖过一切枪声、警笛声与工厂轰鸣。她挥手描述，像某种战舞，似乎自己就是曾经历激战的字词之一，或是一面黑人的舌头。这与大家熟知的嘻哈三姐相去甚远，我们听得出了神，最后她嘴角露出难以察觉的狡黠笑意，我惊叫道：“伯母，你哄我们！”临走前一晚，她把我叫到街上。我随她走到昌隆街尽头，拐入石婆巷后从第三个岔口楔入，在蚁巢般拥挤的民居尽头，有一幢废弃的平房。因为没有二楼，竟宽阔得有些醒目。我来这个城市五年，竟完全不知道有这样一处所在。锁门的铁链哐当量落下，我们一前一后进门，步子变得缓且小，好像走进丧尸电影里的尘封仓库。在某个瞬间，我竟有一丝兴奋，好像在和成珍榕一起探险。你们知道，在这个时代，探险或未知都是极其珍贵的。但她很快就松弛下来，像回到童年的玩具房。房内空旷，灰尘有一指厚，像积了层薄雪。最深处有张巨型方桌，就是那种素描教室的或是玩十人桌游的木桌，或许还更大些，上面盖着幕布一样的防尘罩。成珍榕单手掀开布罩，像斗牛士挥舞红布，少先队员扬起国旗，或舞者抛出彩练。灰尘降下来，密匝匝敷我一脸。从背后（透过眼脸上和空中的灰尘）望过去，我坚信成珍榕在那一刻是个心潮澎湃或存心蛊惑的少女，我确信她扬的手指在微微颤抖，或心中暗自得意，想回头瞅瞅我的窘状。我走上前，看见桌上列阵般排了上百个节拍器。纯黑色，像一坑同形同貌的人俑。要真是人俑，它们又是给什么陪葬呢？这时成珍榕又变回三十六岁。她像自言自语，又像在和我说话，它们是十年前的。那时我们想开家琴行。我没有多问，默默推算，十年前，她和光哥两手空空来到这座城市打拼。我想光哥最初是想继续卖打口碟的，或许他们的决裂就是从那时的分歧开始的。那么他们最终为什么没开琴行呢？如果只是开家琴行，又怎么用得着这么多节拍器呢？我没有问出来，只是一件件抚摸它们。这些节拍

器像新的一样乌黑发亮，但成珍榕说，它们的内芯大多都朽老了，你听。随着她将它们一个个打开，我逐渐感觉到了：无数个不同年岁的律动正在发生。我能听出其中有长有幼，有雄有雌；但无法分辨孰长孰幼，孰雄孰雌。她围着它们绕走三圈，选出一只，说，它最接近初生婴儿。她递给我，笑着说，祝你永远年轻。我想说“也祝您永葆青春”，但自觉太虚伪，又没什么必要，故此只重重点头。她最后对我直言，你的基础最薄弱，但节奏感最好，换言之，你对时间最为敏感。

翌日我们送成珍榕到机场，下车后她看了我们每人一眼（即使怀抱私心，我也得诚实地说，她的目光停留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时间是均等的，好像分给每人一拍。我后来自我反思，最后的几个夜晚，每个人应该都得到了一件礼物），说，谢谢你们照顾筝。筝去送她，母女俩在入口处拉着手说话。她们神貌极肖，都是五官峻拔，不笑时让人有种距离感。与其说柔美，不如说俊爽。在远处看就更像了，我们仿佛在注视两个成珍榕，或两个筝。这时恶童转头对我们说，你们谁也别惦记妹妹，她长大了也不行。妹妹不能跟了我们这种烂人。尤其你们两个。恶童盯住月球和我。我没说话，抬眼看了一眼月球，发现他也在看我。随即月球说，妹妹心气高得很，你放心。我当时很心虚地附和（说完我就厌恶极了自己），我们这几个人里头，她估计只能看得上老大。恶童说，他怎么样我管不了，要敢欺负妹妹，我插了他。他们都叫筝“妹妹”，后来随光哥叫“小筝”。只有我自始至终叫她“筝”，或“Zen”。我想这或许是她对我稍假青眼的原因之一。

咖啡喝完了（杯底薄薄的一层我几乎是以一种猫吮式的留恋啜完的。因为当我牛饮了大半杯回到吧台时，店员却说早在半年前，无限续杯就被取消了），我感叹道，有什么能恒久不变呢？筝说，纹身是生前最恒久的，诗是身后最恒久的，所以今天之后，我就拥有了世界上最永恒的东西。她说这话的时候，很像日本动漫里压着帽子宣告自己即将拯救世界的中二少年，但我并没有笑，因为我知道她说得没错。我甚至有些羡慕——我已经过了爱诗的年纪，也过了追求永恒的年纪。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我们怎样看待“诗”和“永恒”。

依我愚见，“诗”与“永恒”的共同点是“不可能性”或“虚构性”，因为我们从未见过真正的诗，也从未见过真正的永恒。其实我也知道，若以此推断二者都未曾存世过，恐怕不太公道。但至少可以说，在这个赝者如云的世代，“诗”和“永恒”的效力都被他们无数涟漪般一触即散的镜影所分食，沦为远天若隐若现的星辰。每一句“我爱你一万年”从人群中蹿出，“永恒”的光泽就黯淡一分。同理，这世上每出现一个诗人——宣称自己写的字行为“诗”的人，诗的芳踪就向远古逃逸几年。在我看来，嘻哈音乐与诗唯一的维系就是押韵，除此之外相去万里——嘻哈是沉重的，诗是轻逸的。但这几年来，有太多的嘻哈歌手自诩诗人。他们好像从某种遥远的古典传统中找到了汨汨的生血，于是纷纷啃住血管，咂咂吮吸，认祖归宗。例如，他们说古代诗人曹植是第一个即兴说唱者，是他们的直系祖先。这些行为本身无可厚非，但最可悲的是，他们自此从怒火中烧的嘻哈歌手堕落成了眼神忧郁的文艺青年，公牛成了阉鸡。

在我还是文艺青年的时候（当然，我从未像他们一般狂悖，认为“诗”会那么轻易地从自己双唇中流涎般潺潺淌出来），我还相信世界某个角落或时代的某处罅隙中还存有活生生的“诗”，相信会有某个精灵般迅疾且轻盈的、肉眼无法察觉的句子从我的眼前或梦境中掠过。我一度想寻找到那个句子，甚至可以说，我学习即兴说唱的缘起正在于此。即兴是一种奇妙的状态，一旦我进入了那个微醺般的世界，就如步入了一切缓慢得接近静止的琥珀空间，与之截然相反的是思维的高速跃动，我平日里绞尽脑汁也难觅踪迹的绝妙词句，竟都带着某种压抑许久的怒气冲破我的齿牙，如同穿匣而出的剑气，击败赛台上的对手。但我知道这还远远不够，那个句子依然遥不可及。但面对越强的对手，我体内蛰藏的词句就越躁动、越激烈，我也就感到自己离那个句子越近。那几个月，我进步飞快，半年后只有医生能胜我一筹。此后一年里（那时官方的比赛形式已经从即兴赛改为作品赛），我不断去别的城市。先在论坛上找一些民间即兴比赛的信息，但往往有延误，经常到当地询问时发现已经结束。到后来，我干脆不参加比赛，一下长途汽车就去找当地的说唱厂牌，和他们切磋。他们自然不相信我远道而来只是为了切磋技艺，大多视为踢馆，于是派出最强者与我对擂。我在赛台上从来不说脏字，甚至连嘻哈歌手近乎口癖的“Motherfucker”都不说。所以如果遇见脏话连篇、专攻下三路的对手，我一般会直接认输，因为对技术的磨砺无任何裨益。整体来说，胜负少负，但也掀起了一阵狂飙，闯下一些名头，被赋予了游侠之类的绰号。确凿来源已无处考证，较流行的说法是，有人发帖说我身怀“七伤拳”功夫：以拳击松，十日之后，树脉枯萎。这是捧我的，还有人称我“煞星”，也有叫“毒师”的，总而言之，就是形容我有某种“后劲”。这是件奇事。所有战胜我的人，在不久后都遭遇了职业生涯的滑铁卢。跟我交手三天后，西北嘻哈组织玄武门的大将 DIRTY WOLF 与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新疆十七岁新人 MC 死士对擂时，在后者吐出一个四押爆点后心悸而死。跟我交手一周后，外号“金雕”的西藏嘻哈老炮 MC 山客在当地一场表演赛上因天气原因多次出现口吃，被台下疯狂的听众拉下台，撕下一只耳朵，在额头到嘴角留下一道难以痊愈的闪电状伤疤。跟我交手半个月后，定居江城的 Lil Devil 在展现快嘴技术时失足掉下擂台，咬掉了五分之二截舌头。跟我交手三个月后，北京芬兰老人老齐被被沈阳来客 MC 单刀正面击败（自此京派说唱的颓势开始显现），算是善终。跟我交手半年后，南京的 MC 小刀、杭州的林亥春、苏州的程君（人称“江南三麦”）毫无征兆地相继宣布退隐。更多的人，因为这个近乎诅咒的传言高挂免战牌。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为了省事，就开始叫我“MC 游侠”或直接叫“游侠”。在电话里，筝偶尔也这么叫我。她对我说，你就是游侠，不是什么“煞星”或“毒师”。他们不是你克死的，而是见识到你在胜败面前近乎无欲无求的胸怀，心中长久以来所坚持的物什被动摇、粉碎。他们不知道，你的欲望其实比他们所有人更炽烈。语气像极了成珍榕。我悲欣交集，与她道晚安，既像与失去记忆的老祖母诀别，又像安抚不肯入睡的女婴。挂电话后，我又在外面转了几个小时，应战者寥寥晨星，于是生出归心。这两年我回来接替医生的位置，给光哥做事。那群人又在论坛上发帖子：游侠成了侍卫。这种好汉被招安、独狼被豢养的戏码是所有人都要啐一口的。于是他们咬死这个绰号，叫我“MC 侍卫”。我看到后没有争辩，心想：侍卫最后总能赢得公主的芳心。

去年此日，筝的十七岁生日（那时恶童事发近一年，双派客刚结婚，已经逐渐与我们疏远。月球已经计划妥当，准备动身，给筝庆完生就走），吃完晚饭我们散步走到江边，有一节节像列车一样绵延的长椅，我和月球坐在筝两侧，我们说了一些煽情的话，也说了一些祝福的话，但筝在江滨的夜风中很平静。后来夜深了，我和筝本来要送月球到机场，但他说明天不用，最后我们帮他把行李搬上出租车后座（他要带很多东西，两个大行李箱，音箱，吉他等等，后备箱放不下），然后目送那辆小车淹没在车流中。我们无法想象他一个人如何将这些搬下来，如何到达台北的宿地。他安慰我们说有朋友会去接他，并说到那后会常给我们打电话（但事实上，一次也没有。我们也很有默契地没有打过去）。之后，筝坚持要走回去（平日里一般都是骑共享单车或打的），我只好奉陪。我们走了将近一小时，一路上筝都紧紧攥着我的手，指甲嵌进我掌心，最开始有点疼，但我没说，逐渐就变成一种带着充实感的麻木，最后变成一种近乎幸福的默契感，好像我们的手应该长久地保持这种连结状态一样。我在这状态里幸福得几乎要睡着。在半梦半醒之间，我听到筝说，你们是不是要一个一个从我身边被夺走？后来我渐渐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像由某个声带发出，又像来源于鼻腔，过了好一会儿我反应过来：这是啜泣声。我猛然清醒过来，发现她已经松开我的手，脸上也并无泪痕。我想，大概是梦。我们又一前一后在空旷的昌兴街上走了十几分钟，分别回到自己的出租屋，睡了。睡之前我默想，我是不会被夺走的。

最早被夺走的是恶童。争端的始末已经难以追溯，可能是两方小弟酒后一点无聊的口角，大概是谁说谁戴的是假表，谁又说谁的女友曾做过援交。然后两帮人就推搡起来，敲碎酒瓶互相示威，差一点打起来。调解的人很快赶到，所以最终没出大事。但气从此憋下，回去几天后，对方发来 DISS 曲（用于攻击和侮辱对方个人或团体的歌曲，嘻哈圈传统），最初我们不以为意，但随即第二首、第三首连续发布，我们才意识到对方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厂牌，甚至一个联盟。最后，恶童发现，对方的首领竟是“袍哥会”原成员。故人相逢，悲喜交集，恶童单刀赴会去拜访他，却拒于门外。恶童气不过，花一周写了一首 DISS BACK 曲。但对方似乎就在等他反击。DISS 曲潮水般涌来，前后大约有十一首。似乎针对性不强，但极为凶戾，极尽侮辱之能事，在嘻哈圈掀起一阵狂澜。我们这才意识到，这些 DISS 曲是他们早就准备好的，就等着在某次 BEEF（争端）中一次性释出，使厂牌在圈内一鸣惊人。而恶童正好撞上了枪口。那个时候，医生的嘴被光哥堵住，我远在内蒙古与人切磋，而筝还未真正学会嘻哈，只负责厂牌的 beat (伴奏) 制作与混音等幕后工作。可战之兵只有双派客、月球和恶童自己。他们以最快速度又写了三首 DISS BACK 曲，以为能勉强挽回颜面。但双派客和月球已经许久未接触攻击型的音乐了，你不能指望一个即将退隐或转型做乐队的嘻哈歌手能做出什么火药味十足的东西。果然，歌曲发出后被听众嘲笑为“软蛋”、“温柔男孩”。与此同时，对方老大亲自发布了一支 MV。画面内容是他在某个广场的地面上画我们每个人的涂鸦，医生首狗身、被铁链栓住脖颈；双派客坐着轮椅，只剩一只眼和一只耳；恶童是一头浑身遍布纹身与伤痕的蛮牛，被一个斗牛士用红布戏耍、又被另一个斗牛士用钢叉刺入肛门；月球已经死去，尸体上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旗，身旁是被砸烂的吉他；我是一只无脚鸟，双翼折断，羽毛零落，坠入无底空谷；筝变成一个穿低胸衣、搔首弄姿的荡妇，双手握着两条巨蛇，伸出粉色舌头舔舐蛇身。我们都知道，蛇喻指男根。视频最后，是对方老大穿一双限量版 AIR FORCE 1 的大脚在我们几人的涂鸦上重重踩踏。到筝的时候，他还磨了磨鞋底，舔舔嘴唇。我当即取消了后面几场约战，买凌晨的机票回去。我当时脑中只有一个念头，下飞机后去找筝，紧紧抱住她。

走进工作室时，筝脸色苍白，恶童不见踪影，众人垂头丧气。后来月球慢慢复述了事情经过。当时对方扬言还有十首 DISS 曲，除非 FIO 厂牌当众道歉，否则绝不收手。双派客说以他的经验，对方应该是存货用完了，想就此收手，我们应该继续打持久战。但恶童态度坚决，要去当面解决。月球也认为对方道德没有下限，再打下去，妹妹会受到更多伤害。他们找到医生，让他请光哥出面调解。光哥的意思是，双方喝一顿酒，握手，他塞几个红包，这事也就结了。但恶童到了之后直接噗通一声跪倒。对方稍微愣了一下，随即作豪爽状说往事一笔勾销。说完像古代君王一样宽宏地扶恶童起身，却见恶童从袖中摸出两把弹簧刀，将对方脚上那双 AIR FORCE 1 捅了个对穿，刀尖从鞋底透出，钉入厚地毯。等双派客等人赶到时，恶童已经被带走。一旁看客，看那伤势，至少要判三年。最后恶童判了五年。

恶童事发当晚，我和筝的关系获得了不可思议的进展。不用说，那晚我们喝得很大。我们先晃到老学校网城打枪战游戏。捡到枪后，我们全然不找掩体，逢人便射，很多人没反应过来就丧生了。子弹打光后，我们不愿去找补给，就挺刀与人肉搏。很快我们就死了。那晚我死了十七次，筝死了二十四次。因为久疏于高强度游戏，我耳朵被枪声炸得失聪，双眼被血呲得失明。筝十根指甲都折了，断剑般矗在键盘缝隙里。大概凌晨两点时，我们走出老学校网城，感到街道陌生、空间、凝滞如同宇宙。我感到冷，也有点恐惧，于是提议带她去节拍器之墓。她竟也不知道有这个地方。这样说来，这本来应是只属于我与成珍榕的秘境，但我并不后悔。打开仓库门时，没什么灰尘，也可能是因为在黑暗中看不到。几百个节拍器还像两年前一样忠实地摇摆。我一一记起这些声音，就像记起故乡镇民的面孔，虽然叫不出名字，但心中大石一下就落了地，觉得这两年其实什么也没发生，或许这两年本就只是我们想象出的，是个长梦。筝说，真吵。呼唤我将它们关掉。我们关了近半小时。最后，筝失去耐心，把所有的所有节拍器拔到地上。可惜，还有几十个就关完了，我想。底下的桌面很干净，可能这两年的灰尘全被节拍器承荷了。它像张大床，也像座棺椁，我们手撑桌沿跃起，坐上去。过了一会，干脆躺下，双臂枕在头下，仿佛悬满钟乳石般缀连灰絮的天花板是某片星空，桌子是某片屋顶，而我们都还十三四岁。小腿像钟摆一样晃动，好像继承了节拍器的遗志。有一瞬间我左腿与筝右腿撞轨了，她勾住我的脚。我想她大概是无意的，或是一种小女孩的嬉闹。但我当时反应很大，腾地转过脸去看她。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大概产生过一种极为卑劣的潜意识：我受惊般地看她，她就必须解释这个动作。但以她的性子，又绝不屑于解释这是无意之举或嬉闹。所以她不会解释，只会保持这个动作，甚至更进一步。当时我只想永远被她的腿缠住，但绝没预料到她接下来的行止（这说非常无耻，如果换一种说法，即：我幻想这个场景已久，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她看向我，说，我们做吧。我当时表现出一种极其虚伪的震惊，瞳孔瞪得大如辜丸，但心里想：快！她说，给你三个选择，上面，下面，后面。我像被一巴掌扇醒，但随即意识到一切已经不可挽回，这件事她非做不可。身为基督徒，婚前性行为是玷污神的殿，属于亵渎。论破坏性，阴道性交大于肛交大于口交。我想，我们都还没到要与万事万物决裂的时刻。选口交，我说。整个过程中，痛苦大于快感。最后射精时我完全不加节制，希望借此激怒她，使她咬断我的阴茎。但计划失败了。她始终有种梦呓般的温柔，将牙齿包裹在舌头与嘴唇里。我想，她一定以为这一切都在梦里。第二天中午我们在各自的出租屋醒来，刷完网站后，碰面吃火锅。透过热气我看她的脸，清晰明朗，与往常一模一样，完全看不出昨夜之事的遗痕。我说去打个电话，到厕所隔间对着墙壁手淫。很快结束，黏在墙上的精液明显比往常少。我依此判断昨夜不是梦。我对自己说，这没什么，太寻常不过了。你是个烂人，这些年至少和十几个歌迷上过床，有什么放不开呢。回到饭桌后，我恢复正常。言笑宴宴，气氛活络。我们撇开恶童，撇开嘻哈，回忆厂牌巡演卖不出票的旧日糗事。非常奇异，一会儿我的目盲与失聪就痊愈了，她的指甲也很快长出来了，去休息区做了免费美甲，十只彩蝶翩翩飞。我看着她走到窗前，逆着阳光翻转指甲，暗自下定决心：不走了，不要图寻找那个句子了。那个句子即使存在，也不在别处，就在此地。她回来后，还剩一份鸭肠。涮鸭肠往往是畅聊的代名词，没什么不能在一提一放间说开的。更何况，交谈时我们还不用看对方的眼睛，只需盯住筷尖，防止汤甩出来。那次，我记得我们聊到了丹姐。

这两年里，我们曾多次计划去探望丹姐，但终未成行。FIO 厂牌在事发后近乎解散，双派客退隐，月球赴台，医生从光哥手下辞职，不知所终。工作室只有我和筝偶尔回去，把灰抹一抹，把翘角的海报和照片贴牢些。我一直有一个疑惑：那个涂鸦视频里，对方老大为何对我们那么了解？别的不说，他怎么知道月球计划去台湾做乐队？答案昭然，我们中可能有内鬼。按照常理推断，涂鸦对谁手下留情，谁大概率就是内鬼。但如果这样想，我即是那个内鬼。有些酒后的长夜，我躺在床上悲抑地想，我们再也聚不齐了。但即使能凑齐，我们真的会去找丹姐吗？我们都有愧于恶童，去道歉的应该是我们，或者说，去捅穿对方老大双脚的应该是我们。我们能做的很少，月球每逢节日会寄很多凤梨酥回来，去年过年前双派客拎了两大袋她老婆包的虾仁饺子和韭黄春卷，一袋给我们，一袋给丹姐。公司小弟连分红一起送去。（我让他告诉丹姐，作为厂牌元老，恶童在公司有股份，虽然很少，但每年分红也有十多万。）我大致算过，丹姐带三个徒弟，请两个驻店师傅，学徒抽五成，师傅抽两成，减去店面房租，一年也就十几万。养两个孩子不容易。丹姐和恶童没结婚，但更像夫妻而非情人。丹姐离过一次婚，但没有孩子。恶童没结过婚，有一儿一女。恶童进去之后，丹姐就成了他们的妈。丹姐知道事情原委后很平静，从来没到工作室或公司闹过，送去的分红和食品也都收下了，但越是这样，我们就越害怕见她。

同样两年未见的还有医生。恶童进去后，他就几乎完全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或者说，我们的视线在竭力避开他。我们正在尝试将他忘却，或许这也是他希望的。但我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忘记他。有一天我差点见了他。那天我在嘻哈论坛上翻帖子，想找找有没有潜力新星可以签约，却翻到了一篇回忆老学校网城的帖子。

“老学校网城有三层，比相邻的陷阱旅馆和困兽斗游戏厅凸出一层来，连绵看来也确是个‘凸’字。第三层是教父级嘻哈歌手医生（真名应该叫张 X 泽或张 X 则，‘X’在讲述者口中是一个‘Y’声母的字，可能是‘yi’，也可能是‘yin’或‘ying’，讲述者往往快速连略而过，用上饶舌中的吞音技巧，好像吐出这名字时越漫不经心，越显得与医生关系亲近。但我们也无从指责讲述者，毕竟医生说过：嘻哈歌手必须口齿不清才能获得拥戴。若听众听清你所说的，你就即刻跌落舞台，沦为他们中的一员。若是另一个人说这话，势必被群起攻之。但他是这个城市所有嘻哈歌手的伯乐。准确来说，是这座城市的传奇厂牌 FIO 里所有成员的伯乐，他们那时正当盛年，占据这个城市十分之九的舞台。后起之秀则少有见过医生的。我介于两个时代之间，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盘下来之后增建的。在第三层建成前，它只能称为‘网吧’而非‘网城’，出入的也大多是寻常网客，说唱歌手零星混迹其中，像满头白发中数茎黑丝。那是艰难时代，第一代嘻哈歌手们在网吧录歌，麦克降噪好，不虞录入邻座叫喊，但自己声音也被挤成细铁条。说唱歌手的怒吼传统滥觞于此。只有洪声怒吼，声音录下后，才会以正常的音量呈现。直至今日，再冷静、羞涩或颓废的嘻哈歌手，一旦拿起麦克，就会不可抑制地发出怒吼，已经近乎某种诅咒。”

不知道是字数限制还是其他原因，这篇回忆录似乎分成了数个帖子发布，这帖只有一段。我点不开帖主的头像，可能被注销了，因此也找不到其余帖子。我不知道帖主是谁，也无从知晓他与医生见面的具体情景。但是这掐头去尾的几百字回忆录，我看得眼眶湿润。曾经深夜在老学校网城怒吼的嘻哈歌手中，就有我们的身影。医生不能说没钱，但在他盘下老学校网城后，就一贫如洗。他说：嘻哈歌手需要一个基地，他立下规矩：录一首歌一块钱，录不好可以一直录。后来，嘻哈歌手的经济条件有所好转，各个厂牌都有了自己的录音室，就没人到网城录音了。医生就把网城低价抛掉，拿了一大笔钱。有了这笔钱，可保当时的 FIO 厂牌衣食无忧。医生根本没必要背负骂名归附光哥。我曾和他聊过这个问题，他说，光哥做的事情，就像麦凯纳斯对维吉尔的赞助，或哈里雅特·维沃尔小姐对詹姆斯·乔伊斯的资助。所以我要帮他。我想，那时候他大概是一厢情愿地在光哥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重影，一个更大、更完善的自己。看到那个帖子后，我突发奇想：医生一定回到了老学校网城。他一定成为了某个网管。他一定会主动值夜班。每个凌晨，他把汽水和泡面给零星通宵的网客送去，窗户打开，为几百台电脑挂好耳机，把 USB 接口插稳，戴上耳机检查是否声音。他一定会听到那些遗存的嘶吼。他一定会听到 FIO 厂牌的厂训：支离破碎，声嘶力竭。出自已故美国嘻哈歌手 XXXTentacion 的遗作《Vice City》，20 岁时在迈阿密一家摩托车店外被枪杀后，他母亲在电脑里发现了这首未制作完成的 demo。那天凌晨我走到网城楼下，抬头仰看了十多分钟，但最终没走进去。我想象某个类似情境：我敲了两下医生家的门，然后把耳贴在门上，门里一阵寂静，很久才有起身的脚步。脚步声停在门口，我想医生在猜测来客的身份。他不会看猫眼，他坚信从猫眼中看人是对来客的侮辱。大约两分钟后，他大概已经猜出了我是谁，缓缓拧开门，但我已经悄然离开。想到这，我仿佛做了一

个不为人知的恶作剧，于是兴尽而返。

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即将重逢。在我和筝喝完咖啡，走出书店的这段时间里，一个绝妙的抉择已然完成。我们想出了万全之策。兵分两路——筝去野孩子纹身店找丹姐纹身，我去普希金书店与医生对决。无论输赢，我都将名声大噪。出名不一定都是坏事，我可以接代言，涨演出费。然后我和筝就把积蓄凑一凑，帮昌兴街屁股上的无名书店活下来。我们也能当一回麦凯纳斯和哈里雅特·维沃尔小姐。医生有愧于我们，他知道，最好的偿还还是认输，而是殊死一战。医生可是这个城市所有嘻哈歌手的教父啊。在这样庄重且激烈的决斗中，我将会寻到那个句子，那句从时间与空间的罅缝中逃逸出来的、纯金铸就的诗。而片刻之后，筝会在通话里听到我颤抖的声音，然后将那个句子复述出来。我说一个字，她说一个字。我的声音与她的声音一快一慢，一前一后，形成二重奏。筝的声音很美，我不用描述，小提琴啊，风铃啊，埙啊，笙啊，太湖石啊，蜂鸟啊，故乡的山溪啊，把一切美好的发声体叠加上去就好。其实她声线的可塑性很强，猫抓黑板声，挥刀声，子弹飞行声，重鼓声，麋鹿濒死惨叫声，她都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只不过现在用不着。我呢，不谦虚地说，能吃这碗饭，声音也绝对算不上平庸。做嘻哈这行，嗓音平庸比难听更加致命。我的声音即使在大众审美中不算好听，但也难得听得独一无二。总的来说，我们的二重奏配得上那句诗，我们不知道那句诗怎么想，但至少我们是这样相信的。当念诵结束，丹姐的纹身针磁磁响过，筝就拥有了世界上最永恒的东西。那将是我们此生最紧密、最默契、最圣洁的一刻。我们将迎来真正的交媾，达到生命的峰值。在此之后，我们或许会不可避免地衰颓、萎顿、彼此疏远。但那一刻已经足够。很多人不愿承认他们的生命在少年或青年时就已经结束了，十八岁或二十二岁，在某个标志性的时刻发生后。剩下的残生不过是与其庸常验证那个时刻的光耀，验证它即是它。我想筝也一样，甚至比我更加偏激。现在，那个时候已经近在咫尺。我非常笃定，毕竟成珍榕亲口说过，我对时间最为敏感。



杜婧

陵人，零零后。写小说，作旧诗，玩石头，想养一只叫卡夫卡的纯白拿破仑矮脚猫。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 24 小时文学聚会。每周六见。



图片来自 [Lukáš Vaňátko](#) on Unsplash

小说

陨石

杜金 | 24 小时文学聚会

“我也想消失个十天。”

我的朋友们让我去看那天从天而降的一颗陨石，我故作沉稳地说过几天再去，这两天人太多了。嘉德白了一眼，说你不要晚上偷偷跑去就好。

为了不显得过于虚伪，我晚上肯定会跑去看的，就和他们一起去了。

的确是一块很大的陨石，远看是褐色的，走进了却是深深的黑色，细密的孔洞布满了整块石头。形状远看也是像一块在空气中氧化了的器官，走近了什么也不像。只是一堵慢慢降温的墙。

嘉德摸着陨石，狠狠地用手在上边摩擦几下后放到脸前。

“你别中毒了。”霞飞说。

嘉德做出夸张的表情，说真是太好闻了，然后把手伸到霞飞面前。霞飞往后退几步，惹得嘉德开心地笑起来。

我把鼻子凑到石头面前，的确有一股被烧过的，轻微焦糊的味道。在孔洞比较密的地方味道重一点，稀疏、大一点的地方轻微些。需要努力去闻才能闻出来。

尝试着用鼻子画一幅这陨石的地图时，我已经离嘉德和霞飞有了一些距离。十几步开外，已经听不清他们说话了。

当我反应过来他俩安静了很久之后，回过头已不见两人的影子。

平日的野地现在好像变身一个公园。一堆人围绕在陨石旁边，开心喧哗，最多的还是用手在陨石上面试图抠下一块的成年人。也有几个小孩在得到了家长无声的默许后勇敢地冲向石头，用他们小小的手指在上边做工。有个小孩气急败坏地说自己没有带上工具。

小孩应该不会有专门敲石头的工具，他可能说的是塑料沙滩铲子套装。

两个家伙也在小孩之中，蹲着不容易被看见。嘉德认真地用一块小石头砸陨石上一个小小的突起，霞飞在旁边认真地看。

“你们干嘛？”

嘉德看我一眼，继续工作。霞飞则回复说，“一点儿，无所谓的。”

走过他俩工作的地方，我继续绕着陨石向前走。走到了向阴面，热味因为是上风向消散了很多。要是往正面看的话，这片稀疏的草地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么大一块陨石落下来，击飞的泥尘也只有自己脚下这么点儿。陨石的影子投在地上，仿佛一个瘫倒的巨人。

也不知道是来自哪里的石头。飞了多少年，多少光年，最后选了这样一个落脚地。但实际上，它也还没有停止，还在随着地球转呢。

大人和小孩面带笑容地在它周围玩耍。

没有人问它，“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我胡思乱想一阵，走出了那片影子。又回到比较热闹的阳面，小孩和大人们仍在辛苦地工作。

有个小孩已经有了收获了，开心地跑向父母炫耀自己的战利品。父亲则一把将石块揣进妈妈的挎包里，然后再拍拍孩子的脑袋让她继续去和伙伴们玩。小孩受到了鼓励，问爸爸还要不要陨石，爸爸连忙摆手说不要了，不要了。

小孩慢吞吞地回到陨石旁边，看了看她的同龄人都还在石头面前辛苦，找不到一个玩伴。走到霞飞身边，看着嘉德的动作。

嘉德有点紧张，手上力气大起来。

如有神助，手上又一下子，那一角陨石完完整整地落了下来。小孩张大了嘴巴，对父母喊道，他们的好大啊。

嘉德把石头举在手上。其实也不过两个拳头大，断裂的那一面颜色也是深深的褐色。

小孩父母在远处让她去另外地方玩。

小女孩还想靠近了看，但她爸爸说不要去烦叔叔，说着还要往这边走过来。

嘉德等小女孩不舍地走开之后松了一口气，把地上的石头捡起来，开始欣赏。说实话不知道他手上的和面前这块大的有什么区别，但他看得入迷。霞飞蹲累了，扶着陨石站起来。跟我说想走动一下，我说没人拦着。

我们俩就继续绕陨石走了一圈。这么一走，发现这块石头其实也就一个小孩们的篮球场大小。一头尖一点，凸出去一截。刚才类似巨人的影子也已经不再相像了，现在更像鸽子的半个翅膀。

霞飞感叹说真的挺大的。我也应声。但心里已经不再这么觉得了。并且悄悄后悔来了这里，并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或者获得什么奇怪的体验。要说心里没有那个期待才是撒谎呢。

但我还是跟她说，这石头来地球之前应该更大点，大部分都在大气层中被烧掉了。她表示同意。

之后我俩静默着走完了剩下的半圈，太阳再一次照到我们的头顶。光线明显比刚才更加强烈了。这个小宇宙似乎只有人类能够领受到太阳这份恩情。

我脱掉了外套，放在嘉德的身后。

他已经坐在了地上，把砸下来的石头放在身旁，安静地喝一瓶矿泉水。我和霞飞逐渐走近，他也无动于衷。

“看够了吧，我们回去了吧。”任何时候我都是那个扫兴的人，于是我提议。

嘉德本来没有表情的脸变得扭曲，“你总是这样，我们才来了几分钟。”

“哪止几分钟。”我只是在咬文嚼字。但不知为何，我和嘉德总是在重复这样的对话。

前两天我们去一个酒吧，没有人认识，我俩安静地喝完几杯啤酒，吃点烧烤。我感觉到和周围热闹的气氛明显不合，就提议吃完就回家，结果嘉德突然发起火来，说还不到九点。

我本来没有什么情绪的，但他说不到九点就让人难以理解。难道九点是个什么神奇的数字吗，或者有什么法律规定必须在时钟呈 90 度的时候才能离开吗。

嘉德说，“你真是有毛病。”然后继续滑手机，吃一串烤得看不出来是什么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没能提前离开，很多个晚上也都是这样。在说完后又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继续沉浸在刚才的事情中。仿佛我就是个试图叮咬他的蚊子，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前拍死在旁边。

今天我仍然是一只蚊子，他迅速地回答我，“赶着投胎吗。”

霞飞也一屁股坐在了旁边，看着我笑了一下。

刚才羡慕嘉德的那个小孩已经跑不见了，很多小孩仍然在陨石旁边努力着。他们的手上攥着小块的陨石，一边保护着自己兜里已有的成果。

一个小男孩试图往石头高处爬，这粗糙的表面实际上很方便穿着运动鞋的他，但不知怎么的他却总是失败。

在低矮处失败几次后，他的父亲笑着走过来，托着他的屁股让他继续往上。这小孩很不争气地挂在高他爸一个头的地方，其实再高一点就能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但他就是够不着。他爸也发现了这一点，就垫着脚想把他托得更高，结果没想到小孩在他垫脚的时候松了手。一下子两个人的重心变了，那爸爸下意识把小男孩往上抱得更紧，上半身向左斜了一下之后整个儿栽过去。男孩屁股着地，大哭起来，爸爸伤得更重，但没叫唤。

周围的人围上来，一个女人伸手去拉小孩，应该是他的妈妈。男孩哭几声，想起来摸摸自己的衣服兜，在感觉到小石块依然在那里后，又哭起来。

一个中年女性责怪他爸爸不注意安全，“玩得太贪心。”旁边几个人随声附和。一个老爷爷把手背在身后说，“应该有人来管管这里，谁都能来爬一爬，总会有人受伤。”更多人附和。陌生的人突然熟悉。

有声音说，“110 要来管这个吧。”

另外有人提到了，“这玩意儿归国家吧。”

随即迸发出零散的笑声。陨石更像一个主题公园了。

人们又开始走向其他的地方，分散地遍布陨石周围。再没小孩往上爬。

“如果我们是猩猩的话，”嘉德在地上开口，准备来一番演讲。

他接下来要引用《太空漫游：2001》的画面来阐述。我想着也许在这段话中能够找到机会还击他刚才的无礼。

“说不定会围着这块石头发狂，然后把它当做什么天启，然后来一个以陨石为图腾的宗教。”

人们为什么要把陨石揣进自己包里呢，其实它在这里就很神奇。可能是想把这种神奇的东西带回家，让自己好有个东西可以揣摩吧。说到底人就是无聊。”

我想到他会自问自答，但没想到他把结果引向了人就是无聊这个话题。对于这个，我也很赞同，不想辩驳，但仍暗暗期望着霞飞能够反驳他一下。

但霞飞只是坐在旁边，伸手抚摸嘉德的成果，像在抚摸一只狗。仿佛没有听见嘉德刚才放的屁。

“我们起来走走。”嘉德对霞飞说。

霞飞说我刚才已经转过一圈了，你们去转转吧，转了才知道这石头有多大。

嘉德点点头，扶着陨石站起来。跟我说我们再转一圈，然后回去。

“你满意吗？”嘉德把飘到面前的长发往后捋了捋。

我笑了下。

于是我们又以霞飞的位置为起点开始对陨石进行又一圈巡礼。

也许是没穿外套的缘故，走到陨石影子里的时候，立马就感受到了温度的变化。也许是在温暖中待得太久了。我问嘉德有没有这个感觉，他说废话，就你有正常人体机能吗。”

我说，你今天火气怎么这么大？

他回答，“你怎么不问你自己有什么毛病，才出门几分钟就要往回跑。”

“你这不是转移话题吗。”

“那你问我为什么火气这么大是真的在问吗，不也是发泄一句。”

我俩默契地提高了速度，想尽快走完这一圈。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即使已经走得很快了，我依然感觉很冷。甚至能感受到手臂上的鸡皮疙瘩一阵又一阵地出来。

陨石像在故意折磨我似的，影子拖得老长。而我和嘉德现在连陨石长度的五分之一都没有走到。虽然已经走了几遍，但这石头仍然比想象中大。我突然想起来那古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行的万里路都是在这石头旁边转圈，也没什么意思。

过了一分钟（或是几分钟）后，嘉德突然骂一句，“这石头真大。”

“的确。”

“如果是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说不定真的会崇拜陨石。”

“有道理。”我等待他的胡说八道。

“崇拜陨石就不可能是一神教，他们会崇拜每一颗砸下来的陨石。大的小的，漂亮的丑的。”

“有道理。”

“但也可能是，因为流星雨就几乎留不下什么东西，先人们会觉得这就是一种启示。”

“那现在人对着流星雨许愿是怎么回事。”我忍不住了。

“那谁知道。”

这人真是，突然就停止放狗屁了，让我无靶子可打。

“这石头真大。”他重复一遍。

我摸摸手臂，回头看了一下刚刚走过的一段路，结果和前面的路差不多长！我们靠着这面已经走了快十分钟。无论如何，有些不对劲了。

嘉德看着停下脚步的我，等我说话。

“有点不对劲。”

“我看你才……哪里不对劲，你说说。”

“我刚才和霞飞没有花这么长时间。”

“和人家在一起度年如日，和我在一起度日如年呗？”

“继续走吧。”我摇摇头。

我们沉默着走完了剩下的一半路，终于来到了转弯的地方。我也立即不再觉得冷了，说实话在这个季节，除非是个老人，否则感觉冷是有点搞笑的。

往前看，仍然有许多人在陨石旁边玩着，但似乎更加分散了。我也没看到霞飞，也许是被前面的小孩遮住了。

我和嘉德继续往前走，走到两个人都觉得累了。嘉德说，“刚才没觉得等了你们这么久啊。”

我说，“是啊，所以我说不对劲。”

他叹一口气，说，“砸石头都比和你一起好玩。”

我砸他一拳，明显感觉到他的肌肉也绷紧了，并不如言语里那么轻松。我们仍继续往前走，看着越来越近的出发点，总算是慢慢地松了一口气。我的外套还在原地。还剩几米远的时候，我跨大步冲过去，把衣服捡起来。虽然很远就看到了，但在这里还是跟嘉德确认似的说了一句霞飞不见了。

嘉德走过来后看了看我手上的外套，说她只记得把陨石拿走了。那块肾脏大小的小陨石，并没有和我的衣服一起留在原地。

就这么一会儿，难道就等不住吗。嘉德还是抱怨了一句。

身上暖和起来，太阳光十分刺眼，一层打在身上，又通过深褐色的陨石反射过来。伸手再次摸陨石，粗糙不变，它更热了。我转过头，想确认一下这太阳到底多强，这种季节，能让石头吸收这么多的热量。当然被射疼了眼睛，痛苦地闭上了。

再睁开眼时，地上的光线都已经不那么强烈，我一边想也许是云过来遮住了，也有可能是我眼睛已经适应。

周围的小孩好像少了很多，分散开在玩。不管大人小孩，对带陨石回家的兴趣似乎都已迅速消散。这么一会儿过去，已经没有人再趴在陨石上想要弄下来一块。不论大人小孩都对陨石保持了礼貌的距离。

这时一个穿着黄色反光马甲的老人走过来，指着我说，手拿开。但我的手早就拿开了，有点不知所措地举起了靠近石头那边的手，作半投降状。

老人还是凶我一通，问不知道不能乱摸吗，小孩都知道。

这当然不是一个问句，也不能用双重否定表肯定来判断。只是一句禁令。我说，“现在知道了。”

多大的人了啊，也不知道自觉。老人远远地说完这一句后就转向其他地方了。

我很不好意思地往远处走了点。也不知道这老人怎么就开始工作了，是住在附近的农民？马甲也许是平时扫街穿的。

“大爷盯上你了。”嘉德在旁边说。

然后马上又想到了他的成果，“希望霞飞别是忘记了，给人拿走了。”

“也不是不可能。”我向他补充，“管的人来了，可能不许敲了。说不定就是大爷把你战利品收走了。”

我们站在原地说了几句，估摸着霞飞没有走得太远。就照原路返回，我们走快一点，应该可以赶上她。

一直到快要到家的时候，仍没有追上霞飞。于是到红旗街附近，我和嘉德就告别，各自回家，明天再说。

说完再见后，我也松一口气。从那片城郊空地走回来，我已经累得不行。我们再见的话都说得很快，生怕哪一方提出来再去哪里坐坐。我觉得我们都想好了拒绝彼此的理由。如果梦做得太长，并且醒来后短暂的梦醒时分还能记住的话，会感受到一阵欣喜。

小学高年级或者是中学阶段的我，似乎仍然不太喜欢学校。空荡荡的教室里，当然带着回忆色彩，是一个有太阳的下午，我和几个班上不非常受欢迎的同学坐在一起。很多很多的卷子，一个男孩看着我写一道数学填空题。但一直紧张地写不出来，最后在羞愧中醒来。

试图回想我和那个男同学到底有什么过节，实在想不起来。虽然在一个班，但他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话，也不曾在班上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唯一印象深刻的是，曾折了一柜子纸飞机被老师抓住。老师拿走他手上的，又从柜子里摸出一只又一只。

因为梦中包含的元素太多，而难以直接在网上问问周公解梦。我尝试搜索了“梦到纸飞机”、“梦到小学同学”、“梦到数学题。”

纠结了一小会儿后，从床上慢吞吞地起来了。不知道今天要继续做什么，这个假期好像长得有点过分了。正想着要不要拖一会儿直接去做午饭，嘉德就来了。

打开门后，径直走到餐桌旁边，给自己倒一杯水。倒了之后后悔，问我有没有其他饮料。我说冰箱里有，他就去拿了一瓶可乐。

喝了两口之后，又拿起刚才倒好的水喝一口。才开始说话。

“你见霞飞了吗这两天？”

我回答没有。

“我也没有。”然后又喝一口水。

看来我们都没有去找她，也怪她先丢下我们走了。还丢下我的外套，而带走了陨石。嘉德心里应该是有些不爽。

“那我们今天去找她。”

“我歇会儿。”嘉德答复到，然后就往沙发上躺着了。

我让他睡了会儿，不久，时间已经是下午三点。这时候的人总有一种冲动要干点什么，当然这个时间又非常尴尬，干什么都不太合适。于是我叫醒了他，说一起去找霞飞吧。他睡眼惺忪地嘟囔一句，也慢慢从沙发上爬起来了。

这天下午的三四点，天光和我们去看陨石的时候差不多。太阳干巴巴地照在身上，一会儿觉得温暖，一会儿又觉得太热。好在我们没走多久就到了。

霞飞一副没想到是我们的样子，也没打个招呼，就让我们直接进门了。我们坐在沙发上，而对面的电视机上安安静静地放着那块陨石。那电视还是老式的一个大方块，前面是深灰色的玻璃，映着我和嘉德两个人郑重的坐姿，顶上则是陨石，深褐色，深到发黑，仿佛从来就应该待在这电视上。

霞飞也没有给我们倒杯水，站在电视旁边盯着我们，打量了一番。我看着电视里的自己，有种奇妙的感觉。

“你们去哪儿了。”

我盯着电视里的影子，嘉德转过头看了我一眼，迅速地回答霞飞，“什么去哪儿。”我看到我们俩的身子都紧张地往前倾了一点。

“这十几天，你们，去哪儿了。”

“什么十几天。”我也问。

霞飞声音小了一些，“没有十几天吗，那也有十天了。”走到电视面前，背对我们，抚摸那块陨石。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嘉德补充。

看起来三个人没谁明白。

霞飞转过身，把陨石举在手里，又仔细看着我和嘉德，仿佛从来没见过。看够了似的，十多秒后走过来把陨石放在了我腿上，一屁股坐在我旁边。陨石还残留着她手上微微的温度，对面电视里的三个人都坐得很端正。

“我在那里等了很久。”她的头也转向电视，“先开始我以为你们在逗我，就回了家。第二天去找你们算账，一个都没有找到。第三天第四天也都是。之后我就再没去找你们了。”

“呵呵，为什么？死了也不找了吗。”嘉德问，一边对我挤眉弄眼地示意，让霞飞继续演下去。我们三人，大部分时间很纵容彼此之间这样戏剧的表演。

霞飞摇摇头，“我感觉你们活着，但当时也不知道是不是心存侥幸，就觉得你们应该活着。”“这十天你是怎么过的啊。”嘉德揶揄。

但霞飞没有搭理这句话，而是继续说她这十天的遭遇——基本上是，一切照旧，出了跟我公司解释我躲债去了之外……

“那我呢？”嘉德问。

霞飞白了他一眼，“你妈快急死了。觉得是把你卖了似的。”

“嗯，怪不得给我打这么多电话。”

我看着他掏出手机，上面一溜未接来电。

我感觉到那石头的沉重，把它拿起来放在了桌子上。

霞飞马上把石头又抱在了自己手上，像抱着一只小狗。

又过了十几分钟，或是一个钟头，我现在对时间已经没有概念了。她是十天就是十天，说是一个钟头就是一个钟头。那只时钟走得快或者走得慢，对我或者对嘉德，或者对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区别。

那天告别的时候，我们俩还是不太确信这件事。但毫无疑问我们相信霞飞。因此回家路上，我们并没有对这件事有太多怀疑。因为目前有更加值得我们怀疑的东西。

不知为何，我的腿上还残留着陨石的压住的感觉，还有一丝微微的温暖。裤管里的风也无法使那印记冷却。走在街上，还是最终忘记了这感觉。提醒我们的有一阵一阵的秋风，也有几个换了促销广告的店面。其他一切如常。

“我们就这么过了十天？”嘉德开了口。

“有可能。”

“那这十天是在哪里花掉的呢。”说完后低下头若有所思。

我很想打断他，这十天没有被我们花掉。我和嘉德所经历的不就是睡了一觉，然后发现记忆出了些问题……或者我们俩身上其他地方出了什么问题，总之我们能确定的是霞飞永远是那个正常人，她不会开玩笑开这么久。但这也不代表她能解释清楚一切。

“你觉得那天在陨石旁边的时候，就有一点问题。”

我突然回想起来，今天看着电视机里面的我和嘉德的时候，和在陨石旁边转悠的感觉很像。

坐在公园摇摇欲坠的长椅上，嘉德陷在里面却神采奕奕。

“是在陨石旁边出的问题。”他笃定地说。

我没有异议，点点头喝了一口咖啡。

其实说到这里，事情就该结束了。一个问题得到了解答，一些怒气最终消散。

一个中年女性凑过来，你们最近去陨石那里了呀，是不是现在已经不让去看啦？

“应该还可以去看。”

“哎，我当时有事情，没赶上，耽误快半个月了才想起来，现在不让看了，亏了。”

“应该还可以去看吧，我也不太清楚。”

中年女性说了声谢谢，然后转过身去继续和自己的朋友聊天。

“难道我们的时间被陨石吃掉了吗？”

“怎么吃？”我问。

嘉德抬起头，“我们不是感觉那天走了很久，走得很累吗。说不定就是走了十天的时间。”

“是累，但是不可能在那里走了十天啊。”

“也是。”

眼看着嘉德眼睛里不再神采奕奕，似乎从幻想的世界里回到了现实，只有这不禁烟的公园，昏暗的路灯，对他的想法表示不太支持。咖啡也变冷了，我又买了两瓶水，漱了一下口，另一瓶留给嘉德。

回去之后我本来打算看十天之前没有看完的小说，一个写美国人去沙漠旅游嫁给本地人的故事，没有看完。故事里的女人干什么都不幸福，有婚外情也不幸福，丈夫死了也不幸福，再婚了也不幸福，也不知道什么能让她开心起来。再说了，不开心为什么还要去沙漠旅行呢。

想了一会儿她可能的命运，我决定放弃这本小说。给她和她的沙漠故事关上了大门。接下来总要找点什么事做，发现有十天的时间消失了，可能需要弥补一下这种奇怪的被盗窃的感觉。

于是我给霞飞打电话说明天我们出去玩，去哪里玩，没有定下来。她早上有一节游泳课，下午才空。我就说我先去陪她游泳，但她拒绝了。我猜是因为她在游泳课上认识了新的朋友，不想被我占据全部的时间，霞飞没有否认这个说法。

我又跟她聊了陨石的事，她也只是冷漠的说她觉得也是，但是她无法相信。承认发生了，但依然无法相信。这才是人类最常见的反应。要我说这种反应比任何学科的智慧都更加真诚。

最后我们决定下午再去陨石那里转转。霞飞说她会带上那块陨石，让我帮忙还给嘉德。我说太重了，下次吧。但她坚持这样，我也就同意了。

第二天下午，霞飞背着一个运动包找到了我。刚刚从游泳馆出来，她走路相当轻盈，感觉能把我甩在几公里外。看着两手空空的我，她说，“我还是把石头先背着吧，走的时候再给你。”

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走了几步才想来说，“要不我帮你背吧。”

霞飞白了我一眼，“不用了，也不重。”

为了让自己好受一点，走一阵之后我还是把包抢过来，背在自己身上了。霞飞瘪嘴笑了一下。

接近陨石的地方，已经老远拉上了一个警戒线。几乎围绕了半个村子，但是警戒线里面的人还是在正常的生活，该干嘛就干嘛。几位村民站在老远看着我们，以一种警戒的友好表情，好像怕我俩决定要来偷走一只鸡，或者一颗蛋。

越走越近，村民的眼光也越来越放肆。我实在忍不住了，就主动打招呼说是来看陨石的，现在还许看吗。

村民笑了，说看当然许看，谁能蒙住你自己的眼镜不让你看么。打趣几句，又说那石头有什么好看的，天上掉下来的也还是块石头。

我和霞飞和他们瞎聊几句，看着他们放松，没把我们当成偷鸡贼了，就作了别。

最开始和我们搭话的村民突然提醒我们，“不能偷陨石，是国家财产。”

我乖乖点头，点完头后突然意识到自己还背着一块呢，仿佛是嫌疑人回到了犯罪现场。

想着不禁有点好笑。

霞飞拍拍我身上的背包，对着他说，“宁愿偷鸡也不偷石头呀。”

村民们先是一愣，然后笑着对，“但最好都别偷。”

我们终于走到了陨石旁边，那石头在不太明媚的天气里不知怎么的感觉更大了。现在看来可真是一堵长墙，投下的影子远远地覆盖了我和霞飞的身体。

“你觉得它长大了？”霞飞问。我看到她的瞳孔在影子里变大了一倍。

现在后悔没有带上什么可以测量的东西，“看起来是的，但不知道实际上是不是。可能只是光线原因。”

“光线怎么让它显大？不是说黑色显小吗。”

“你不觉得太阳光强的时候太阳都大了一圈吗。”

“这两回事，再说太阳光强的时候谁盯着太阳看啊。”

站在十天前我们分手的位置，霞飞在这用脚堆了一拢土。接着我们就开始往前走，说实话我心里对这种走法并不太放心，上次和嘉德走出来那汗毛倒立的感觉似乎随时都还能回到我身上。但是霞飞笑我说，这十天时间少了，人胆子也变小了。

我没有继续她的话说，走了几步之后想起来要怎么回应她，但是似乎也没必要了。我俩静默着走了一阵。霞飞走着也把外套脱掉了，这时候我们还在背阴的一面，这是下午正热的时候。也不知道走到另一面会多热呢。

也在这阴影中，身旁的陨石好像散发出一股青苔的味道。如果说这一面一直背阴，那还有可能，但是明显这里的天气没有那么潮湿，这一面也不会在白天里一直背阴，我脚下踩着的还是松散的沙土。摸了摸陨石，出人意料的的确相当湿滑，看着它那多孔的外表，很难想象是这种触感，仿佛今晚过去就会生出几万朵蘑菇出来。

但即使这石头让人感觉潮湿至此，摸完石头的手指上也没有残留任何水分，我看着自己的手还是如之前一般干燥。

想到这，我手心又微微出了点汗。

霞飞在我左侧大步流星地走着。我突然想到不如就用步数来算下长度。一般而言人的步伐是比较稳定的，只要记住步数，稍微估算一下就能知道这陨石到底有多大了。

我回头看了下已经走过的路，霞飞弄的小土堆还静静地待在那儿，距离我们也不过几步的距离，并不成什么问题。

霞飞看着我回头，问我怎么了。我告诉她我的计算方法之后，她笑着说我肯定会忘记到底有多少步。

我也笑着直接大声地数着，“十六、十七……”数了几声之后自觉无趣，也就停下了。所以还轮不到忘记，自己就在中途放弃了。

我们继续走着，霞飞仿佛是在健步。把外套系在腰上，走路带着一阵风，我却有些跟不上。她跟我说渴了的话，背包里有一瓶水。我掏出来递给她，她含蓄地喝了一口。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陨石这儿？”

我看了她一眼，“健身的好地方？”

霞飞眯着眼笑，很满意我的回答似的。“我也想消失个十天。”说完后把水递给我。

我也喝了一口，“消失干嘛呢，又不是旅游。”

“旅游有什么意思，要的就是消失。”

“我和嘉德可都不记得这十天时间去干了什么。”

“所以说，我也只想消失十天。”

我继续喝了一口，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个浪漫的想法。

但霞飞说她想消失十天，我也真诚地希望她真的能够消失十天。无论这“消失”的体验对于我来说是多么干瘪，总是希望有人能从中得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说不定霞飞就是那个人呢。

我一边走，一边在心里祈祷着霞飞能够如愿消失。也没有特定的祈祷对象，只是在心中默念，一遍又一遍，希望这些文字或者语言能够成真。

就这样走着，脚下的沙土松散地粘连着鞋底，像走在一片违反物理定律的水上。霞飞仍然走得相当轻快，看不出是刚在游泳馆里锻炼过的。当然也可能是在空气里需要的力气远比在水里的少，故而对她来说就相当轻松。

虽然放弃了计步，为自己减少了一点工作量，但和霞飞对比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走得吃力。回过头看，已经看不清霞飞制作的小纪念牌，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陨石消失在半空的影子。

“我觉得这石头比上次真的大了不少。”

“我也觉得。”

她说完依然大步流星地走着。如果谁看见她这样，也只会觉得是从繁忙的生活里挤出了一点时间在拼命地锻炼。

我尽量跟上她的步伐。

“走这么快干嘛。”又走了一阵之后，我忍不住抱怨。

“快吗？”她斜了一下头问我。

“挺快的，咱们又不是在竞走。”

“也不是在旅游。”

“你就当做是旅游吧，我有点跟不上你了。”

霞飞哈哈一笑，放慢了步子。

我松一口气。

我们沉默着走到了陨石的一端。

淡淡的阳光先是照在土地上，然后是鞋子、裤腿和衣服。那青苔般的气味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熟悉的热石头的味道。

走到这个转折的地方，我和霞飞相视一笑，脚步又加快了。这标志着我们差不多已经走了路程的一半。相比之下，计算步数的确没有什么必要。

继续沉默着，我想起来看了一眼手机，时间显示着 9 月 24 日，下午 18 点 8 分。我们走到这里差不多用了 30 分钟。接下来，应该也还剩三十分钟多点的路程。

“幸亏人天生是耐性很好的动物。”

“嗯。”

“虽然人单论速度跑不过那些很厉害的豹子、老虎，但是我们却可以一直跑一直跑，直到他们都累了。”

接下来的那一半路，我们走了又快一个小时，直到七点多才终于走回了最初的位置，霞飞作记号的地方。路上我们看着太阳越来越往下落，天光要暗不暗，我俩拖着疲惫的身体，沉默地往前踏步。

“你得做好准备，这下可能就十天过去了。”

霞飞疲惫地笑了一下，“我们坐车回去吧。”

之后我们走到了村子里，请一位有摩托的中年人载我们回到了家里。两个人都累得不想说话了。知道了我们是来看陨石的之后，摩托师傅问我们，“破石头有什么好看的嘛。”霞飞坐在我身后低声说，“的确啊。”

又是一夜好眠。晚上飘了一阵雨，半途惊醒了一下，但随即又在雨声中睡过去。总之还是睡得很好。

第二天早上，在心不甘情不愿地收拾了床铺之后，我拿起手机确认了一下时间。

9 月 24 日，上午 9 点 50 分。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拿起来在通讯软件上给霞飞发了一条信息，一个简单的问号。发送过去之后，旁边显示的时间也是，9 月 24 日，9 点 50 分。

对话框里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但迟迟没有文字传输过来。几十秒过后，霞飞打来了电话。

我先忍不住了，“你看到时间了吗？”

“看到了。怎么回事呢。”

“我不知道。”

“你问问嘉德，看他怎么说。我先挂了。”

她挂掉之后，我马上打给了嘉德。

等嘉德刚接听，立马问，“今天几号？”

对面安静了十几秒，然后冷漠地说，“9 月 24 号。”

我叹了一口气，不知道该继续说什么。

嘉德在电话那头也叹了一口气，说他昨晚四点钟才睡，想再睡一会儿，然后挂了电话。

自行车在旁边“滴”了一声，我被吓了一跳。然后看见手机上出现了一条新消息：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霞飞骗人的，她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把我叫到了城里最破的公园里，告诉我所谓知道怎么回事，其实是她也知道了在嘉德他们看来，今天仍然是 9 月 24 日。

“我们被停在今天了。”

我按亮手机屏幕举到她面前，9 月 24 日没错，但时间已经是下午 1 点 20 分了。我们没有被停在今天。

“现在还不能确定，至少要过了今晚再说。”

我很高兴她能有这份谨慎。

一个年轻女人推着婴儿车慢慢地走过去，后面一个年纪大点的女人手里拿着一只娃娃，跟着她的脚步。公园里很少有人来，更别说这样富有生命力的组合。这地方很破，连我们坐的椅子都是因为是上个世纪建房生下来的条石垒在一起，没有人再看得起这样的建筑材料，才得以完整保留下来。周围的绿化也是，有一些过时的中国月季，但这个季节没有开花，胡乱地长了一堆叶子，看样子也没有人打理。

说实话这公园真不是个带孩子出来的好地方，路面也并不平坦，但所幸是个婴儿，不会记得这一番丑陋的景象。婴儿的妈妈对这个地方有些生气，抱怨地不平，不好推车，就直接把婴儿抱出来，脑袋靠在肩上。老人默默地走上前把娃娃放进手推车，跟在后边推着车走了。

走了几步之后，她们一起坐在了另一处椅子上。

霞飞突然站起身来。我问她要干嘛，她说要去看看那个小孩。

“看人家小孩干什么？”

“那个小孩总不会跟我停在同一天，一直长不大吧，这样太不公平了。”然后径直走向了那个婴儿。

也许是霞飞脸上带着一种我就是属于这个公园的神经病的表情，婴儿的妈妈明显很抗拒跟她说话，下意识地抱紧了怀中的婴儿。

但随着几句交谈，似乎那位妈妈不再抱着这样的想法，把小孩抱平在怀里，给霞飞看了看它的脸。旁边的老人妇女则逐渐变得兴高采烈，跟霞飞说了许多话。

在她们的交谈似乎到了高潮的时候，所有成年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我正想过去凑个热闹，霞飞就跟她们说了再见，朝我走过来。

“你很受欢迎啊。”

“我说我没办法生育，她们非常同情我。”

我尴尬地笑，“那我是那个不敢走过来面对小孩的丈夫吗？”

“嗯，你是婚姻中不能生育的那一个。”

我看着不远处两个女人的微笑，只好恭敬地点了点头。

“看了那个小孩有什么用。”

“他叫小高。5 月 18 日出生，到现在四个月零八天。”

“嗯。”

“我们明天再来看看，说不定还是会遇到他们，小高也还是四个月零八天大。”

这一晚睡得不是很好，我一直睁着眼看日期有没有变成 9 月 25 号，当时时间变成 00:00 后松了一口气，但又怕这时间会自己变成其他样子。于是每隔一会儿就从睡眠里自动醒来，盯一眼时间。这么翻来覆去几次过后，我又觉得自己很可笑，干脆睡过去明天再看，这时间也不会因为我盯着就不敢有动作，在三点多的时候放松了一点睡过去了。

霞飞说她也是这样。第二天我在跟嘉德打电话的时候，先重复了一段前一天的说法。他说今天 9 月 25 日，然后说他前一天晚上打游戏到四点钟，直接挂掉了电话。

我又松了一口气，仿佛今天该完成的任务也都完成了。于是重新回到被窝里想多睡一会儿。但是没多久，霞飞就发消息过来说让我们去破公园再看看。

我说，你不一定能遇到那个小孩啊。

她对这个理由不屑一顾，说我要是不想去就算了，她自己去。

我已经感受到了睡眠的气氛（我精心营造的），就不再回复她的消息。随她去吧。

睡醒了已经到了中午快十二点。霞飞给我发消息，是一张在公园里的照片。对面仍然是乱糟糟的绿化，没有说什么。

这么两天过去，好像我和霞飞就是从中偷了 9 月 24 号这么一天出来。这一天我们没有想起来要记住彩票号码，也没有关心什么和时间密切相关的事情。像两个偷了点小钱就去花天酒地的贼一样，在 9 月 25 号重回了平常的生活。

我看着一回家就放在桌子上的陨石，它还在背包里。收拾东西的时候随手把它拿出来放在了桌面。

它对我们这次盗窃行动没有过多的评价。安安静静地待在桌子上，等待我把它还给嘉德。

不用想，霞飞在发完那张照片之后，也如陨石一般安静了很久。嘉德则更不知道我们俩又去了一次。陨石在很久之后我才想起来要还给他，但一直等着他哪天能够来我家并且记得把石头带走。嘉德每次来我家，都大手一挥，下次吧。于是石头一直待在餐桌的里侧，变成一个后现代风格的装饰，最开始还和我家的装修格格不入，但随着摆在它旁边的杂物越来越多，也就变得顺眼了。我有时候练毛笔字（一年两三次），会想起来把它当做镇纸。这样陨石身上还增加了一丝古朴的墨香（也有可能是心理作用），几乎难以察觉它和房间里其它杂物有什么区别。

很快的十月、十一月、新年……一年，或者好几年过去了。我和嘉德似乎毫无长进，仍然终日游荡。不同之处在于嘉德晚上还要辛苦打游戏。

霞飞的变化多些。我们当初以为她和游泳的同班在联系，后来她是游泳教练。不说我们又嘲笑了她一番，但是看到游泳教练之后我们一致收回了刚刚得知时的狂言。教练是一个很英俊，很有气质的男人，至少在我们和霞飞面前都是如此。

除了恋爱以外，她还找了一份在教辅机构帮人出题的工作，工资很低，有时候也帮大学生写作业，或者改改出国申请。

有天在她因为工作上的事一连接了几个电话的途中，嘉德无聊地看着我说，“要不我去考个研，继续读书算了。我妈说她支持我。”

“那我也支持你。”

“咱俩过得太不充实了，休息日都没有工作的骚扰电话。”

“你想要的话，我打给你。”

嘉德笑一下，打开手机刷微博。

那天其实不只是工作电话，霞飞当时没有告诉我们，第一通是游泳教练新交的女友给她打的，把霞飞很亲热地喊姐姐，然后恶狠狠地威胁她马上和游泳教练分手；后边则是游泳教练打过来说明新女友是神经病，是个新学员，只跟她微信聊了点天就骚扰他了很久。

霞飞本来打算认认真真听听游泳教练的解释，但到后面她想起了那个泳池。泳池里有很多的小朋友，其中有一个小朋友每一次见到霞飞都会很乖地叫姐姐。霞飞很喜欢她，想到游泳教练的新女友可能比那小孩也大不了多少后，就对他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嘉德说，那女孩可真能放话。

霞飞坐在沙发里什么也没说。就和她解决这件事的做法一样，什么都不做。不接游泳教练的电话，也不再去那个游泳馆。据我所知，游泳教练也没有上门找过她。我们都没有机会借此去喝一场酒，距离霞飞接到那几个电话的日子又过了几个月。

秋天到了，霞飞抓紧时间去游泳（当然是另外的游泳馆）。在经历游泳教练之后她还能如此坚持练习游泳，我对她不禁有一些敬佩，毕竟游泳教练真的很英俊。她教了我几次，我学会了蛙泳，有时候就跟她一起去。

我的公司还一直流传着我欠了十几万网贷的传说。这一年同事们一起聚餐，都没有提到让我付 AA 的钱。

这一年的 9 月 24 号这天，我们游完泳，坐在小卖部旁边吃个冰淇淋。霞飞突然问我，还记得那块陨石。

我说记得，小石头都还在我的餐桌上呢。

“那大的呢，你还记得吗？”

“现在不许去看了嘛。”

“我听说还是可以，就是得夜里去。”

“你又想消失吗？咱俩上次可没有成功。”

“也不算没有成功，只是我们不明白陨石是怎么运作的。你和嘉德转了一圈，少了十天，我和你转了一圈，重复了一天，那石头像是在乱来。”

霞飞吃完了她的冰棒，“我现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们当时带上了那块小陨石，你和嘉德当时就没有带上它。”

“也许陨石很讨厌这种行为，就是从他身上偷下来一块，就不让我们如愿。”

“也许吧。也许陨石根本没有时间观念。我们在外边走多久，走多少圈，它都随便分配一个数字给我们。”

嘉德从小卖部里走了出来，“怎么想起那石头？”

“过去看看？”霞飞接过他提着的塑料袋。

“我就不去了，要准备考试。”嘉德舔着冰棍说。

天色稍晚的时候，我们出发往城郊走。走到村子入口时，警示牌和警戒线都不见了，已经没有人对陨石感兴趣了。电视不再播放，管理人员不再呵斥，连小孩都不再想从上面弄下来一小块带回家。

我早已忘了陨石的形状，只记得走在它旁边那黑影压在身上的感觉。把外套拉链拉上后还找村里的小卖部装了一壶热水，店主问我买不买东西，我说不买，只要水，他就收了我一块钱。

当走到陨石面前时，霞飞对我微笑了一下。然后自己先往前走了。

我在后面想起来两次都没有估测出这块石头的大小，下决心这一次不论怎么聊天或者胡思乱想，一定要把步数记下来。为了尽可能的精确，我在脚下先弄出了一个小小的土包，但是在夜里看起来并不是很明显，于是我又拔了一束草，打了一个节放在土包上面。当我弄好这些时，霞飞已经走进了黑漆漆的前方。

我轻轻地喊了一声她的名字，她没有答应。我便继续往前走，月亮从厚厚的云层中露出来，天不那么黑，能看清前面的沙土。但仍然很安静，只能听见我喘气和不轻松的脚步声。

虽然做了一些心理准备，但我没想到走了那么久。在数了两千多步之后，我又放弃了计数。这一次的原因在于这夜的确让人发慌，一个人走就更加发慌。于是我越走越快，浑身的力气，包括脑力都尽量放在走路上，免得自己胡思乱想。

用尽全力走路的结果是，我逐渐感受到体力不支，大概走了三四个小时，我才想起来喝了一口水，喝完后又想起霞飞连水都没有，也不知道现在走到了哪儿。

喝光了一壶水，撒了一次尿，天终于蒙蒙亮了。我的精力早就不能够集中，在涣散了许久之后，我开始憎恨起这块石头。怪它让这段路变得这么长，让本来应当是一场冒险的体验堕落为枯燥无聊的单独行军。

这么想着，我用手趴在石头上哭起来，先开始还是默默的流泪，后来变成抽泣。哭得累了，我依然纵容自己沉浸于这块石头的指责之中，坐在沙地上，靠着石头睡了过去。

醒来时天色大亮。膀胱里没有尿液，肚子不安分地闹着。但我的精神好了许多，站起来拍干净身上的沙土缓缓前行。奇怪的是没走多久，陨石远处就多了许多人。他们先是远远地看着，然后走近，有几个人在我前方小心地摸了一下陨石。接着人零零散散地走近这块石头，沙地上变得热闹起来，出现小孩嬉闹、尖叫的声音。

接下来没有走多久我就看到了前面一个蹲坐着的身影，虽然不是很确定，但大概就是我做记号的位置。我想应该是霞飞认出来了。随着逐渐走近，我发现那是嘉德。他环抱着自己的膝盖，看着不远处几个玩耍的小孩。

他身旁也不是我做的记号，而是那块他砸下来的小陨石。我加快步伐走向了他，直到

走到他面前，他才抬头看到了我。

没等我说话，他手抓向旁边的陨石，抓起一块大小得多的石头伸到我面前，对我说：“你以为会忘了你？”

我桌上的镇纸，那个无聊的艺术品，被他分成了三块，现在他手里举着其中一块，地上还有两块。

嘉德见我没有反应，继续笑着问，“霞飞呢？”



杜金

最喜欢的工作是发垃圾邮件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 24 小时文学聚会。每周六见。



图片来自 Ian Keefe on Unsplash

小说

47个短篇

岳凯强 | 24小时文学聚会

一切我很少做却正在做的事，
都因不重复而带有某种虚构的诗意图。

1

小号和你

租一个房子，然后练习小号，直到邻居不堪其扰。然后再租下另一个房子，然后是另一个，直到整个城市都讨厌小号，而不是你。

02

绝对透明

他们如此透明，以至直到今天，我们才发现他们。
他们没有国籍也不分种族，因为他们是如此透明，活着时像水晶，死去则如干冰。
所以他们算无产阶级吗，不一定。随着研究的进行，我们发现了他们透明的建筑，类似垂直的塑料大棚，但里面已空无一人。他们几乎不住在里面了。
他们喜欢趁我们不在家时，进入我们的房间，撬开透明的啤酒，生吞透明的罐头，然后打着透明的饱嗝儿，拍着透明的肚皮晕乎乎地感叹道：今天可真透明啊……
他们会恶作剧般地站在窗帘后面一动也不动，像一个透明图层，让不透明的我们扑个空。
几乎无法捕捉他们，因为他们是如此透明，了解虚无从而并不。夏天他们就在透明的湖里游泳，让透明的水花，划过他们农夫山泉一样的身体。秋天或者什么时候，他们会骑上透明的摩托，在草坪上来上一场公开透明的比赛。抑或和泪水般透明的女友，跳上一段透明的舞蹈，如果他们感到透明的幸福。
对的，他们就是这么透明，包括在透明的旗帜带领下，穿着透明的冲锋衣，以透明的姿态去登顶，然后在半山腰发出果冻般透明的呼唤。

03

正方形的风

一匹正方形的马，跑过正方形的草原，打着正方形的响鼻，带着正方形的呼吸。在它的脑海里，世界很简单，大概是一比一。
正方形的风送来远方的消息：确定了，四条边都相等。
于是正方形的马不再奔跑，以正方形的姿态站在原地，看着头顶正方形的乌云，发出一声正方形的叹息。

04

三角形电视

我网购过一台电视，它是三角形的。里面主持人的更奇特，她是六边形的。而说到她的主持风格，那就更别致了，通常是这样的：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发生的大事主要有，晴天共和国成立不到十个小时，就被黑夜消灭。

只要拿起三角形遥控器，打开这台三角形电视机，就会播放这些内容。更可怕的是，我的眼睛也被它给搞坏了，因为老是盯着这台三角形电视看，我的眼睛也变成了三角形，现在每天出门都得戴墨镜。

05

喀拉拉邦

直到愉悦大于畏惧

将一个笼子命名为：是爱，阻止了我们去爱。
将另一个笼子命名为：是我迫使你走向了我。
邀请两只猴子钻进去。
然后再派更多的猴子去摇晃它们。

06

雇佣计划

- 雇一个司机替你去看看远方，并祝他一路顺风。
- 雇一个运动员替你做俯卧撑，你在一旁为他加油，数数，叫好。
- 雇一个小丑，替你应酬，负责全程陪笑。
- 雇人替你洗澡，你在旁边递肥皂。
- 雇人住在你家楼上的楼上，当你家楼上发出噪音时，指示他发出更大的噪音。
- 雇人去树林里找你表弟，然后雇人在树林里扮演你的表弟。
- 雇人参加你的葬礼，再雇人扮演死者。
- 雇街上的所有人为你撑伞，因为你要在雨季奔跑。
- 雇你的朋友当敌人，在春天，送他一把匕首。
- 雇你的老板当员工，把他发你的工资还给他。
- 雇一条狗，去遛另一条狗。
- 雇动物园饲养员当动物，再雇一群外卖员每天投喂。
- 雇一群麦当劳员工，去肯德基打工。

07

山势陡峭

有次爬山，遇到一个山洞，于是爬了进去，发现里面藏了很多例子。就是那种我听不懂不如你举个例子，想了半天也举不上来的例子，原来都藏在这里。面对这样闻所未闻的山洞，我的大脑当时一片空白，因此无法描述，现在也举不上来一个合适的例子，我有点后悔，要是当初从山洞顺便拿出一两个例子，这篇小说也不会半途而废。

08

年轻女子

不像美女，也不像普通女人，介于普通和不普通之间，不像偶像剧里女二号。不像一个女儿，不像一位母亲、阿姨，女权更谈不上，不爱跟你讲道理但也不叫你滚，不像二次元少女、公众号里的妻子，不像一个正确的女人但你能因此说她错吗。不像。不像单杆锂电一体逆变器，不像林卡里的白兔，不像一首功率 50 瓦的诗，不像烟花是五颜六色的风，一次向上的脉冲，不像高反的鸟，不像一座城市，甚至不像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女人。真的，她几乎什么都不像，因此她渴望，从而很危险。

09

道歉统计

2015 年，我接受过她两次道歉，我向她道歉一次。2016 年，我向她道歉三次，她向我道歉五次。2018 年，她向我道歉六次，我没有向她道歉。2019 年，我们各道歉四次。2020 年，我道歉八次，她道歉五次。今年，我们没有再道歉。

10

形势所迫

女友怕狗在家孤单，于是又领养了一条母狗。三月份，他们生了 5 条小狗，于是屋子里一共有 7 条狗，但我们都要上班，同时照顾不了这么多狗，只能把这些小狗卖掉，再用赚的钱给公狗做结扎……事情就是这样，原先的狗终于彻底孤单。

11

另一件事

当我们在谈论一件事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回避另一件事，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能感觉到，当我们说起一件事时，另一件事就在我们身后看着傻乎乎的我们，或者它在更远的地方，正在赶来，现在或许已经到了楼下。总之我们不想甚至不能去谈它，因为另一件事是我们正在谈的这件事积极状态下的障碍，因为另一件事在当前看来并不重要，虽然它在未来可能会，虽然它们本质上是一件事，虽然与这件事相比另一件事更重要，因此我们要放下这件事去谈论另一件事吗，从而跌入和现在同样的状况。

12

他

他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在。他到楼下的时候，我们还在外面拍照。他看看没人就飞走了。我们回去的时候没看到他，也不知道他来找过我们。我们回到家，把胶卷放进冰箱。这时候他又飞过来，穿过房顶并不说话。我们在客厅用想象的弓瞄准他。

为代价，后来他们接近了彼此。在这人情的乱世、社交时代中，这份微妙是多么易逝。它很快就过期了。现在的他们都很正常，但已不存在关系。

27

词典

阔痕：八点吃完粥，准时出门做鬼的那批人。

嘎：形容空瓶子打的长长的哈欠。

扎屋：意指将枕头扔过房顶的传统习俗。

咸文：常见却好听的词汇，如：采——风。

輶：一种看不见的巨大的喜风类植物。

滕流：一切很少做却正在做的事，因不重复而带有某种虚构的诗意。

湔：充分理解，但不赞同。

然距：不是一般的大。比如戈壁，是形成风的那种大。

平活：特指因果含糊。比如我们很难区分风吹走了灰尘，还是带来了它。再比如丢掉尊严去赚钱，等有钱后再赢得尊严，可是尊严一开始就有。

事水：手拉手站在河中，或冬天在冰面上叠罗汉的某种仪式。

世界乘：2182 年火葬场统称。

宕光：展览名称。展览形式是 83 个电工在黑屋里修灯泡。明暗中，不断有人感叹“啊，灯坏了”，“修好了”，“啊，灯坏了”，“修好了”。

灰词：放在心里憋不住，放在嘴里不诚实，放在云上掉下来，放在水面沉下去的一类词语。

空年：中年以后，面对狼狈太想体面的心理。

达马：一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很多小时候都玩过：倒坐在椅子上，然后挪动双脚前进，比赛规则很简单，看谁骑得远。有的人可以穿越整片大陆，有的人可以骑到珠穆朗玛。

心大拿：和父母看电视，电视里情侣接吻的时刻。以及现实生活中，接吻尝到对方牙结石的时刻。总之是和接吻相关的并不那么美好的时刻。

太关：狗身上的开关，只要摸到，就能打开哺乳动物世界的大门。

活线：能让我们随身携带，却不可以互相交换的事物。

丁味：八十年代日本耐用品的塑料壳在 21 世纪发出的味道。

鬯孩童：一种尚未细分的情绪，动物般的感伤而非人类的矫情。

内宏：在观点的海洋里游泳，在互联网时代原地流浪的行为。

周作：昨晚做了很多梦，以至早起感到很充实，感觉今天什么都不用干了的心情。

28

相信太平洋

事到如今，必须承认我和大海确实存在某种特殊关系。因为每当日落涨潮时分，太平洋总会给我送来一些东西，有时候是半头犀牛，有时是老年手机，有时只是一阵咸湿的海风。每次它都大喊一声：先生！您的快递！散步的我回头时，汹涌的浪花中就挺立着我想要的东西：波音 747、各种肤色的女人、小黄鸭、瞄准镜、一串长长的序列号……而翻开日记，有一天我是这么写的：4 月 5 日，收到一座山。东西太多了，久而久之，我确实需要大海那么大的陆地来存放这些东西，而事实上现在陆地上也确实摆满了这些东西。

29

一二三四五

老虎来的时候，有人叫醒了我们，我们二话不说拎着枪就出了村，翻过三座大山后，气喘吁吁的我们在湖边歇脚，在水的倒影中，我们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老虎。我们以老虎的外貌再次归来时，吓坏了父老乡亲，于是又有人被派来捉拿我们，并在湖边再次变成老虎，一来二去整个村子的人都变成了老虎。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怕老虎了，我们就是老虎。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我们害怕自己。我们害怕自己吃掉自己，于是睡觉时枕着毛茸茸的爪子，尽量去想可爱的事。可久而久之还是有一部分老虎消失，空留一地虎皮。

30

梦里见过

最近 A 每晚都要杀很多人，每次都以梦的形式大汗淋漓。最近 A 也因为种种原因，认识了很多陌生人，很多人刚见面就说好像在哪见过 A，在哪见过呢，他们一时半会也想不起来，转而去谈论其他了。

31

无条件行为

·在乎提问：如何看待如何看待，以及如何评价如何评价。

·给一百只铁皮青蛙上好发条，装进袋子，扔到大街上。观察它们的跳动，记录人群的反应。

·在火车站发二十张错误的地图，然后在对的房间等。

·用钢琴演奏你的手指。

·站在地铁口，为走地铁的人鼓掌，叫好。

·跟踪一只苍蝇。给它取名，为它拍一本个人写真集！

32

全部

一个女人拥有他的身体却不拥有他的心，另一个女人拥有他的心但不拥有他的身体。而那个男人呢，他只拥有酒，却以为拥有着全部。

33

为什么的演绎

不要问为什么，就是要消灭为什么，而这是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就是要消灭为什么，

而这是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就是要消灭为什么，而这是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就是要消灭为什么，而这是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就是要消灭为什么，而这是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就是要消灭为什么，而这是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就是要消灭为什么，而这是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就是要消灭为什么，而这是为什么。

34

有个人

有个人喜欢倒着走路，于是他的告别就是重逢，他的重逢就是告别。

35

蝴蝶

我在梦里告诉你这是个梦，后来你惊醒了，告诉我这件事，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梦，你说。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像一场梦。

不，它真的是一场梦，不是像。

你的梦就是我的梦，宝贝。

不，我的梦不是你的梦。

好吧，你的梦不是我的梦。

是这样……你在我的梦里告诉我这是个梦，后来我醒了。

好的，我在你的梦里告诉你这是个梦。

这是一个梦。

嗯，你说得很明白。

现在醒了吗。

醒了。

36

祥云

“从 1 号到 344674423555579 号，每一块云我们都精确编号管理。为了保证天空更好看，我们让云不断生产、死亡。你看，两块云撞在一起发生闪电，生出许多小云，小云长到能遮一会儿太阳就算少年云，而膨胀到能下雨就成年了。老去的云将被派往南极或者喜马拉雅山口，那里风最大，年迈缓慢的云一吹就散。”说完这些，销售员指着刚飘过的云，问这朵怎么样？喜欢的话，明天就送到您家上面。

37

分享

感到怒，在一件事上，因为我是无辜的。

后来这怒，被我转移到别人身上，导致他们的无辜和我一样无辜。

38

你要成功

就像失败

失败学大行其道时我正在不合时宜地成功，为此受尽亲朋好友的冷嘲热讽。甚至家里佣人也对我颇有微词，记得有次晚饭管家只上了一粒米，然后站在一旁为自己的小聪明洋洋得意，我当然怒不可遏但很快镇静下来，认为不该为此区区小事斥责进而将他辞退，那样太便宜他了，我不允许他这么容易就失败，于是只好，把他留下来继续折磨我。我甚至擦擦嘴表示吃饱了而后郑重地表扬了他，并表示从明天起给他涨工资，他当然为此表达了强烈不满，并留下一句如果先生您这样做的话，那么今晚您将亲自洗碗，随后摔门而去。可以说在这件事上我做得极其成功，以至现在想来不免让人遗憾。

另外由于我太成功了，所以至今没哪位姑娘愿意跟我结婚——我的历任女友大都失败得让人羡慕，割腕酗酒割腕酗酒割腕，可以条件已经很优越了，整天什么都不干还说可以帮我花钱，可我的钱哪那么容易花完，最后她只好委屈地说你怎么那么成功呢！我们分手吧！于是我们分手了。这应该是我少见的几次失败，但与特别失败的芸芸众生相比，说起来有点敝帚自珍，不提也罢。

是的，在这个凡事都崇尚失败的社会里，我和我的成功走到哪都格格不入，我觉得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太辛苦了，还不如死了算了，于是我就这么决定了。

记得那天人山人海，亲朋好友远道而来为我即将的失败庆祝。我爸爸带头鼓掌，妹妹载歌载舞，发小跟我久久相拥，小学老师语重心长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失败乃成功之母，不能亲自莅临的朋友们甚至发红包随了份子钱好像是一件大喜事，这让我不免有些贪恋这来之不易的热情而不忍一走了之，最后在我妈一再催促下，我才磨磨蹭蹭地走向天台，站在了人生的最高处。其时乌云密布，雨也下的凄凄惨惨，不得不说是个适合失败的好天气，我不禁认真品味了一番这失败的滋味，然后准备幸福地跌落，从所有人的头顶呼啸而过，以最失败的方式和这个失败的世界告别，但我没有。

39

当宇宙萎

缩成一个下午

离婚后电子龟应该归谁这个问题，在 APP 上有了答案，后台显示她充电 342 次，我充电 4 次，其中 1 次是半夜酒后失智。数据说明一切，我无法独自照顾一只电子乌龟，她显然比我周全，归她就好。但新的问题是她并不打算继续饲养，这只乌龟见证了我们的感情，以后看着不免伤心。另外，她总不能对新男友说看啊这是我前夫养的电子乌龟。同理，我也不可能。

于是我们决定放生。

那是十三陵水库的下午，有那么一会天空下起小雪，我们用锈迹斑斑的斧头凿开冰面，用揣在口袋里的充电宝给乌龟最后一次充电，最后一次检查它的电路板，扣上龟壳时我

几乎同病相怜地想到，它也是这段感情的受害者。北京冬天风大，我抚摸龟头的手多少有些颤抖，都说往事随风，昨晚说喜欢的人，上午就随风去了。

她爱上一个 AI 神经外科医生。

回到我们的爱情，我们是看着它顺着芦苇游走的，在巨大的环形冰面上，由电流驱动着笨拙前进，而后不久它将在淤泥中停止运动，宇宙也会因此停摆，萎缩成一个下午，在傍晚前彻底结束。

40

野猪林的爱人

祝福你

丈夫很忙，每次跟他说话都心不在焉，总是过很久才回答。比如我问今天想吃啥？一分钟后他说：

鱼。

据说一般丈夫都这样，不值得大惊小怪。但随着他越来越忙，回答也越来越晚。

有时候他正在看电视，会冒出一句：好的，老板。他把盘子递给我时会说：帮我把资料送到会议室。

回答明显出现了重大延迟。他在会议室时会不会吩咐狗把球叼回来我并不知道，但一个周末他在地铁上突然对扶手说：野猪林的爱人祝福你，注意身体，完毕。

那是十一月份的时候，他开始回答很久以前的明码电报，戴上耳机就开始念叨：黑铁呼叫鸽鸽，我军不日解放瓦窑堡。

丈夫确确实实是过时了，日子看来是没法过了，于是我提出了离婚，五年后他说：

好。

41

都是一个树林里的树

有什么好吵的

我的女友做梦经常在劝架。一个晚上她突然对天花板说：不要打了好不好，不就一千块嘛，给他，给他。另一天晚上她缓缓说道：那就按道上规矩办，说完在被窝里拱手。

还有一个晚上她像新闻发言人那样郑重表示：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面对黑暗，她在一片虚空中大义凛然。

就好像她睡觉时，这个世界正在分崩离析，可醒来后又发现完好如初，子弹没有划过卧室，外面除了一点雾霾，并没有狼烟四起。

最近的夜晚她比较平和，常说：不要吵了，都是一个树林里的树，有什么好吵的。

42

在去往 S 城的

大巴上

即便不是一个天气预报员，我也曾多次感到季节的松动，冬春之交，并不是那么严丝合缝，那里有一段日历之外很荒的时间，像一艘生锈的火箭，经常带着跑神的人越过春天，让它变成一个虚词。所以每当他们回过来神时，就会带着系统重启后巨大的恍惚感，来句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我就是这样的。导致今年 33 了，但满打满算只参与过 6.5 个像样的春天。

所以是该反思一下了。或者放下手机，敞开心扉，跟人聊聊候鸟，燕子目前的进展，今年回来没。实在不行那就探讨下春风，春风适合小口品，张大嘴也行，把远方含在口中。以及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春天是温暖版的地球，或者一个矮子，来自吉尔吉斯斯坦，手里总拎着一个绿油油的手提箱，冬天一过，就来看望你，他操着小语种，说什么你也听不懂。还有每年冬，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总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这种体感就像冬天在皮肤上悄悄殖民。

但环顾大巴，我张不开嘴，因为在这块有四个轮子的铁皮飞地上，大家都在忙着刷手机，我的发现和抖音里的小姐姐相比太弱了。观点不如大腿，于是只好闭嘴，成为一个暂时的哑巴，已经成为一种过于顺滑的习惯。

我怎么敢打扰在 16:9 的幻觉里颠簸的人类，再说我也被它迷住了，只不过以散装文学的方式。比如今天阳光极其猛烈，一字形的鸟类队伍，在地面上投下点状的阴影，就像一串省略号在地面上快速移动，它们没有终点，掠过一切明亮的事物，空投下这样的语彙：……高架桥……/……桃树……小麦……

废品收购……宝龙矿业……槽钢……

桥……瀑布……华北……华南……春天……

就欲言又止，像我一样缺乏沟通欲，也可能飞行让人内向，我不知道。我没有羽毛。再说我已经够乱了，因为司机左拐后，温暖的事就开始抛锚，半途而废的乘客于是纷纷下车，像一棵桃花被不详的风吹落。

他们被风赶进了桥洞，拱形的水泥屋，于是迎来一群桃花状的客人。

但我还坐在车上。显而易见，这不是一场空难。

那么这一切是为什么呢请问，因为哪种还未说出的原因，基于什么样的数据模型。因为但凡清晰的事物，都带有某种模糊的厄运，所以我们就无法指认？

作为一个暂时的哑巴，我暂时还不能回答。我看向窗外，发现 S 城就快要到了。于是收拾好行李，拎着手提箱，再次越过了春天。

43

桌子

这个朝北的房子，太阳是很少光顾的，如果不是下午些许光线射进来，作为主人的我会以为太阳把它给忘了。为此我准备买张桌子放在窗边，这样就能一边悠闲地喝酒，一边欣赏限量版的落日了。在这样动人的场景中，我相信我将显得更有智慧，更文艺，或者更像一个骨质疏松的活体老头也说不定。

可买来桌子那天是个阴天，然后接下来几天也是，天气差的像死去的班主任，但这并不能摧毁我对新桌子的热情。那几天，我从各个角度审视这个四条腿的家人，蹲在墙角，埋伏在玄关，或者突然从卧室跑出来，假装被它的美所震撼，进而嘴里发出啧啧声。在它的衬托下，沙发的问题是过于老套，电视的问题是过于先进，没办法，现在的电视太薄了，拍都没地方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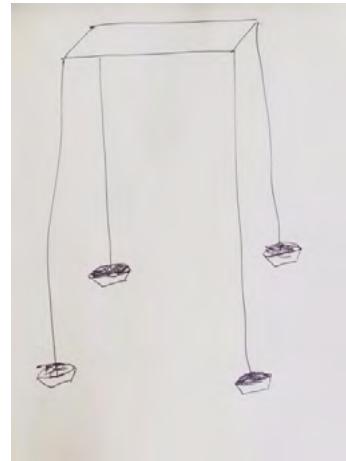
然后，紧接着，热情是被雨天浇灭的，昏暗中醒来的我，发现桌子阻碍了窗口本就吝啬的光线进入，这让它显得无用且多余，像我刚做的梦，加上它并不太稳的桌脚，已经让我开始怀疑为了得到这份来自太阳的施舍，是不是付出了太多：淘宝花的时间，下单时的纠结，以及组装它的难度堪比重新打造一张新桌子。而我毕竟也不是一颗植物，我没有绿色的皮肤，不需要太多的光合作用，成为一个阳光男孩也并不是我的初衷。

心情是直到天气放晴后才变好的。是，我的心情总是随着天气阴晴不定，我觉得我有点躁郁症，或者双相障碍这样的病，两个我围绕一张桌子交心互怨的情况时有发生，但两个我都得承认，那天天气确实好到让人想举报，看着外面刺眼的太阳，我逐渐原谅了我的愚蠢，进而认为这些光线可以阳台为支点，撬动我和我的阴郁，让我们离地 1 公分。于是我打开冰箱的手几乎有些颤抖了，以至很难自己给自己斟上一杯乙醇，我深吸一口气，舒缓了一下心情才算把这个动作搞定。然后我一本正经地端坐桌前，郑重地等待夕阳的降临。

等待。

等待的时候，我摇晃着酒杯，感觉自己就是那些冰块的父亲，我对它们的融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于此同时真正的问题才凸显出来，问题是桌子有点矮如果端坐半小时以上，我站起来又坐下，开始怀疑它的高度，进而开始怀疑我的怀疑，我怀疑不是桌子矮，也许是我喝高了。我甚至认为如果这堆木材还是树的状态就好了，那样就可以再长长，现在每条腿下放一盆水还算不算晚？

像这样：



后来当然，夕阳总算照进来了，格外珍贵的光线，穿过城市上空的薄雾，慷慨地撒在桌子上、墙上，和我逐渐扭曲的脸上。然后，片刻后，它遁入西山，把我和桌子留在黑暗中，我们成为它巨大阴影的一小部分，我们在黑暗中，情人那样一动也不动。

44

混凝土池塘

小区里有片池塘，池塘里有几只鸭子，但很少有人看见过。

因为鸭子的主人每天深夜把它们放进去，早上再悄悄打捞上来。

我也是半夜散步才发现这个的。那天夜里我一边走路一边捶树，遇到一棵就捶一颗，小树也不放过，我没法让自己停下来，直到看到有个家伙鬼鬼祟祟地蹲在岸边，旁边放着他的笼子，不远处明显是家禽的嘎嘎声不绝于耳。

也是很久没见过这么活生生的鸭子了，我一度以为身处某个农家乐。

至于这家伙为什么这么做，我也感到迷惑，也没过去问，因为与我见过的有些人晚上走着走着就露出自己的生殖器相比，半夜在小区里放牧实在不算什么，甚至可以用可爱来形容。再说我不也捶树吗？这么多年了，从来没人从草里跳出来，质问一句你这到底为什么。

而且物业投放的几条小蝌蚪，完全不能满足人们驻足观赏的欲望，如果在这片只有微生物的水泥池塘里，再放几头鸭嘴兽，我会感到更狂野。

当然，假如有三个尾巴的罐在楼道里踱步，人脸鸟身的颤站在树上，或者名字叫彘的兽在岸边舔水，那就更热闹了。

所以几只普普通通的雁形目是没问题的，很合适，我赞成。

问题是，鸭子嘹亮的叫声晚上总能听到，可白天小区里的人就是发现不了鸭子的踪迹，白天他们望着没有一只鸭子的池塘满脸疑惑，而到了晚上他们则认为自己出现了幻听……介于存不存在之间，游走在抽象和具体模糊的边界线上，这群鸭子整天在他们脑海里凫水，于是他们开始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睡觉的困扰，以至白天没精打采的，甚至在电梯里讲话也没平时大声了。

没看到鸭子前我就是以上症状，我太熟悉了，直到有幸目睹实体后才收获了一些平静，毕竟我把握了真相，甚至睡眠质量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我不再半夜出去散步了。

事情变化是在九月初，冷空气试探性南下后，这群鸭子突然消失了。或者确切来说，鸭叫消失了，嘎然而止，小区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对饱受鸭叫困扰的小区里的人来说是件大好事，他们和鸭子之间确实存在某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脸上的气色好像又回来了，甚至可以在电梯里面色红润地大声拉家常了。

但我却开始忧虑鸭子去哪了，它们的离去和到来一样莫名其妙，这让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我想不通。再说我已经习惯了鸭叫，这批雁形目的助眠作用明显优于我常吃的几类安眠药。我就经常醒着，留意外面的动静，我认为鸭子们仍在附近某处活动，只是不便发出叫声。应该卧在某个阳台，喉咙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紧紧攥住，或在黑的客厅不断起飞下降，因为感应不到水面而徒劳地挥舞着早已退化的白色翅膀。不管以什么形式吧，反正它们集体静默了，这是事实，必须接受。必须接受晚上只能听到狗叫。车子停好后的摔门声。树叶被风按在外墙上摩擦。一串半途而废的乐符被从楼上扔下，砸中一只刚下夜班的猫，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举起左臂恭喜别人发财，因为这乐符的意外撞击，明天它将为顾客们一展歌喉。而附近机场刚起飞的飞机向上冲刺的轰鸣声让人不禁为它担心，直到这坨金属顺利穿越云层后，脑子里的小人才伸出来为它鼓掌，我听到我的鼓掌声。还有心脏总在黑暗中卖力地跳动，我不懂它为了什么以及有什么必要这么用力，黑暗好像让它更兴奋，它咚咚咚的声音像一个人长时间匀速敲门但我无法帮他开门，于是我就翻身，压住心脏以我的体重，但它因此跳得更响了，像身体深处的地震。

几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然后是很多个。

秋天来的时候，我又恢复了半夜溜达的习惯，并再度探访了楼下的池塘。我渴望在月光下看到禽类小脑袋的场景当然没有出现，水面安静得甚至没有一丝涟漪，看来这批鸭子确实离开了，顺便带走了我来之不易的睡眠。于是我对池塘小声说了句：再见。

但我没有离开，我还在岸边徘徊，这片望不到一丝涟漪的池塘，越看越像一大块漆黑的不明固体，没有了光和倒影，它失去了白天的轻盈，变得格外沉重起来。沉重的还有我的脑袋，缺觉让我有些恍惚了，或者夜色本身在摇晃我，于是我就蹲了下来，顺便从身后拖出准备好的笼子，然后我打开了笼盖。

45

彩虹

作为个人财产的

一部分

“你再哭下去，会让我想起此刻，在这跌宕的坏宇宙里，每个心碎的人……”

大雨过后，会出现彩虹。但不知怎么回事，大部分彩虹只有半个，另一半呢？这不禁让我疑惑，以致好奇到一次雨后，骑着电动车去一探究竟。

那时我年轻，干什么事都有决心。或者当时喝傻了已经，荷尔蒙掺上一点乙醇，就让我轻易响应一粒雨滴的号召，我不能坐下来，一把椅子安慰不了我，我必须干点什么。

总之将车头对准虹的方向一路狂奔，穿过太行王屋二山，路过年轻的人们消逝的白桦林，长长的路就快要到尽头，终于来到彩虹正下方。那时天色已经向晚，阴霾的天空下有鸽子在飞翔，我发现另一半彩虹躺在地上。

那是什么样的地方，四周迷雾丛生，半条彩虹横卧旷野之中，抽象的宛若周六清晨无人叫醒的迷梦，能做的只有硬着头皮接着做下去，于是老父亲一样，掏出一条起毛的尼龙绳，把彩虹绑在电动车后架上，然后以 15 迈的速度开回了家。

说起来容易，但整个过程我心跳剧烈，晚些时候才注意到它轻若无物，也不挣扎，除了一丝底噪若有若无，大体像所有巨大事物一样平静、祥和，甚至慈祥如我死去多年的亲人。它将这样的情绪传递给我，以至后来我竟吹起了口哨，逐渐接受自己正带着一个五彩斑斓的色块回家的事实……也因此，那个夜晚在记忆里是彩色的，像谁在我的海马体上偷偷画了一副小油画。

我把它塞进电梯，拖入客厅，发现不可避免地顶到天花板，长得戳出窗户外面……这一切，不仅让我及家人，乃至半个小区都感到惊讶，以至一时无法作出合适的反应，直到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说我们是“有半道彩虹的那家人”。

很多小朋友也纷纷表示了羡慕，都渴望放学后摸一摸，滑梯一样滑一滑当然是最好的。但他们并不知道，拥有彩虹的麻烦在于它会分泌大量雨水，经常在半夜滴滴嗒嗒，因此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拖地，蜗牛一样在地板上往复运动。

拖地。

拖地。拖地。

换言之，它经常哭。每当这时，我就要负起安慰一条彩虹的责任。我坐在澡盆里，劝它克制。是去年雷声，还是受潮的天空，闪电的胡须抑或没有保质期的云，它一定在想念什么，站在梯子上的我抚摸它高耸的背脊，仿佛它是一头年迈的哺乳动物。

更让人难过的是，日子一长想念愈发强烈，于是雨量暴涨，然后铁锅漂出窗外，金属盆状物在楼下发出“铛”的一声。很脆，很好听，像古代的锣一样悠远。一开始我们认为是邻居夫妻失和，不免窃笑，感到一阵说不出来的快意。后来是墙上相框，阳台多肉，鼠标键盘统统顺着水流涌出窗口，财产流失严重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房间也正式宣布进入南半球热带海洋性气候，大件沙发和狗，掺杂一部分黄桃罐头像雨季的泥石流。

最后，某天，洪水过后，我们穿着内裤在楼下醒来，水泥冰凉，鸟声也格外刺耳。

我们爬上楼打开房门时，发现已经家徒四壁，只剩一道夺目的彩虹，突兀地屹立在一百来平的汪洋之中，我们感觉自己是连人带物被驱逐出去的客人，而它则像主人一样迎接了我们。它的底噪已经开始让人耳鸣。

三块五上闲鱼卖掉吧，练摊也行，或送直系亲属抚养，再不行上交国家，都想过，但我所不欲勿施于人，且让我弱小的心灵于心不忍，我不能这样打发一条彩虹。我再次把它绑在车后，将它送回原来的地方，一路上也不再吹起响亮的口哨。

没办法，有时为了生活，我的心中也充满了无限的哀伤。

此后每当雷雨过境，天上再次升起彩虹，我总认为那是我的那条，并会想起这件凄美的往事，进而一联想这些年失去的其他，就会导致瞳孔里的雨下个不停，回忆以哭的形式

表现出来，擦干眼泪后，我也时常有一阵巨大的平静，像 0.5 个彩虹。

46

匀速下降

我们从云上下来后，发现密密麻麻的城市肌理，特别像人类给自己织的寿衣，主干道是拉链，足球场像纽扣，工业用地则是荒凉的补丁，起风时隐约能窥见大地的坦诚。

我们在黄昏抵达这座城市，心事因行程仓促而来不及展开。满地的水泥让我们惊讶，而昆虫和蜗牛又值得原谅。衣服裹挟着刚俘获的人类在街上闲逛，路灯固定好马路，防止上面的小汽车打滑，所见都陌生的可怕，在这比天空更远的地方，金属们咬合在一起，比车里的人们更亲密。

当我们理清我们的工作和楼下树木之间的重要关系后，秋天突然来了，冬天紧随其后。我们越来越需要光线，拥抱，一些温柔且必要的东西：事实上的酒，事实上的动作，以及虚构的深刻。总的来说，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我们越来越接近人类。

长方形的人类史随机映入我们瀑布般的眼帘，八月橡树林里的雨，以 43Kb/s 的速率误入低画质旷野……综艺、电视和直播，填满随后又抵消我们对大陆的全部梦幻，以至有时我们突然想出门，去绊倒一个体面的人，一只矫健的猫也行，和它并肩躺在暮色四起的大地上是好的。没有理由，有时我们突然想拥有一口井，占领一个洞，一道幼小的裂缝。某些枯燥的夜里，东方明珠就像垂直而沉默的山体，凌晨时间内含噪点，有种轻微的颗粒感，砂纸一样打磨我们，但只要好好睡去就可以避免，如果它足够甜蜜并稳定。全家便利店、地铁、酒吧和霾，统治并诱惑我们的，保龄球馆和沉重的右臂，后来都索然无味了，烟头呈放射状在烟灰缸里，等等这些使我们感到沮丧，进而陷入到可以称为“孤独”的情绪当中去。

孤独。孤独一开始使我们感到新鲜，虽然它并不足够纯粹。当我们孤独时，我们意识到在这座城市里，同时有成千上万的人也在孤独，我们的孤独因为壮观，而显得并不那么孤独——事实胜于孤独，以至让人羞愧。

我们垂头丧气终于，从静安宾馆 2203 房间望出去：在这样的秋，因为没有云层掩护，天空高远、无情，使我们确信彼此不会再次上升。我们是不爱天空，可那里毕竟是我们的来源：树梢以上，我们的故乡。通常情况下，它偏蓝。

现在我们要不停地展开翅膀再收回，和内衣一起放进衣柜再拿出来，用电吹风烘干南方的潮气，并从地上捡起脱落的羽毛，用中指和食指捏着，像捡起脏东西那样小跑到卫生间，然后冲进马桶里，最后坐在上面久久不起。随后第六种情绪接踵而至：困惑，如果可以这么说。在此刻，它们成为全部。

47

世界上

第一个夜晚

我们认识纯粹因为尼尔杨，她是他的助理，而我作为一个共产 boy，恰好知道尼尔杨，于是这跨国友谊，就像早年的豆瓣好友一样，因为文艺的缘故，而不免显得有些牵强。但不可避免地，我们陷入了友谊刚开始阶段的热烈当中甚至有些慌乱，我客气地慰问了她的脚伤，于是她客气地请我吃米其林，同坐的还有一个客气的巴基斯坦人。

对的，一切都比较客气。作为一个绝对的陌生人，我只对空气还算比较熟悉，他们应该也是，所以等餐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会沉默，而打破这沉默比沉默更尴尬，于是我们难能可贵地坚持下去，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要将这沉默进行到底，也可能是累的缘故，直到例汤上来，我们才放下手机，开始交谈。

吃完就是深夜了，我们都喝了酒，才觉得门外的一切可爱，这夜晚也似曾相识，马路很窄，我们较窄，车辆贴着我们的衣服呼啸而过，还有风来自旷野，使让我们不能交谈。于是她走在前面，巴基斯坦人走在后面，我走中间，我们像是夜色里的一列队伍，步伐匀速而目标严肃，像是要去秘密逮捕一个反抗者，一起去往更远的长城而不是旅馆。

或者确切来说，我们甚至不在路上，我们在黑暗之中，在一望无垠的黑暗的中心，如果当时有手电就好了，手电是一束白天，带我们去黑夜去不了的地方，而那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这黑夜半夜，就感觉这黑夜半夜是仔细编织过的谎言，我们一行人是要抱着失败的心情走出它——这黑暗越长，我们越觉得自己已经死亡，我们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已经成为周围的晦涩。而在这过程中，是有那一两次，我特别想知道她在想些什么，我有这样的冲动，但我犹豫着没有问，我没张嘴，因为有风来自旷野，再说后来我就知道了，风帮助了我。风也帮助了巴基斯坦人，我回头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一颗楸树在路边独自摇晃。我就摸自己，摸自己的五官，皮肤还是不是光滑，四肢还是不是足够发达，后来我放心了，于是快步跟了上去，并再次感受到了道路，心跳。

关于这个夜晚，一些细节，她恐怕不记得了，她甚至不会记得我，因为我们确实走了很长时间，她现在已经很老很老了。我也是。

岳凯强

摄影师、广告从业者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 24 小时文学聚会。每周六见。





图片来自 [Gabriel Crismariu](#) on Unsplash

小说
数字
么瑶 | 第二回

那条抛物线消失了，
硬币再次回到博尔赫斯的口袋，
海洋不复存在了

我是小学五年级时得到那串数字的。

那次期末没考好，我爸妈不爱跟我说话，家里气氛跟铅中毒一样，我不愿多呆，就总在外面跑。那会儿是暑假，水泥地烫得像煎锅，同龄人不是跟家人出去旅游，就是去补习班上课，外边空落落的，就树荫底下有一些老年人下象棋。为了避免爸妈，我就穿插在那些老人中间，佯装看棋，久而久之，彼此习惯，偶尔还能当军师给人走两步。

我是个聪明小孩，倒不是因为学东西快、棋下得好，而是具备从父母手心中滑脱的两项特质：不玩游戏、不养宠物。

说起来挺伤感的，能认识到这两点，是因为我当时的玩伴就是这样的人。一个被他爸把游戏机摔了之后很长时间不在班级里说话了，另一个看着挺好，回回考试双百，因为前年冬天回乡下抱了两只兔子回来，自此在家处处小心、低眉顺眼，上学刻苦读书、专心致志。这次语文滑坡，考了个八十五，落后了三名，吓哭了，说不敢告诉爸妈，怕第二天他们把兔子炖了。

我没什么爱好。听说小时候有段时间喜欢画画，醒着就画，涂空了三箱子彩笔，我妈怕上瘾，耽误学习，就花一下午打了个包，把画画的纸笔都送人了。我回家一看，桌子空了，也没多大反应，转脸学人家抓猪骨头去了。猪骨头没收了就抓石子，石子也不让玩了就用草稿纸叠千纸鹤，拉锯战似的，随手抓过啥都能当枪用，弄得我爸妈没招没落的，打骂也找不着准心儿，拳拳都陷入棉花里。

暑假过了大半，我爸妈看我宁愿去楼下看老头儿下棋也不写作业，实在没招了，就连夜给我打包到我姥姥家，想让我姥姥这个把七个儿女都捋得跟小羊羔似的老战神管教管我。

我无所畏惧，毕竟我跟我姥姥不太熟，她想打击的点，早就被我的爸妈和老师打击多次了，而且她年纪大、力气小，打到一半就没劲儿了，开始用土语飙脏话骂街。我姥姥骂街，听不懂、语速快、合辙押韵还不重样，我大受震撼——真不是我故意气她——忍不住开始模仿，像三年级学英语时那样，用拼音代替音标，一段段地标注在纸上，再熟读背诵。我姥姥发现后自知落败，打不过就反其道而行，把我的作业悉数收起，递给我一条板凳，每日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外只允许我干坐在凳子上，酷似熬鹰。我也适应，毕竟这跟我第一次跻身进老人们的棋局中时别无二致，还多了一份遮天蔽日的凉爽。

在板凳上，我惬意地回想某日老人们的棋局和他们脸上的表情，精彩之处，还会笑出声音。这种全景式回忆堪比时间倒带，再重新行走，一天接一天地想，像一页一页地翻着书，小半个暑假的板凳时间都不太够用。

我姥给我妈打电话，说这孩子废了。我在旁边听着，心想再废也没人能砸我的游戏机，让我半个学期不在班上说话。再者，考了双百又如何呢？还不是一样整天战战兢兢地回家？

我默默地固守着自己，照例平静地回忆，平静地吃，平静地睡。但那晚梦里，有个面容模糊的女孩向我款款而来，将一串数字交到我手上：21957，醒来后依然能清晰地背出，像回忆中的棋局那般，亲切、汁水饱满。

21957，甄别出它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后，我像给人走棋时一样，把那串数字当成一个“车”，随意安插到某日无垠的平静里，没有多加理会。

但几天后，当我正心无旁骛地回想另一天恬静的记忆时，那串数字却突然出现，像一只蝴蝶飞进了书页，在我的脑海中展开：21957。

我吓了一跳，无垠的书页被翻乱，我瞬间从回忆中跳脱，狐疑着想去探寻那串数字的来由，它却又像只蝴蝶一样飞走了，速度之快、之绝对令人难以置信，再回神过来，我只能朦胧着记起有五个数字，其中一个是9，其余的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

这于我而言是从未出现过的事。听过我上文的讲述，你们也能知道，我记忆力很好，再有些许想象力的加持，几乎战无不胜。但今天，却有一只蝴蝶在我眼皮底下逃脱了，而这只蝴蝶又是一串数字，数字意味着精准，意味着一个刻度的倾斜都不被允许，意味着我的想象力在此刻毫无用武之地。

这个突如其来挫败带给我一种异样酥麻的痛感，非要形容，大抵是用PSP游戏机敲砸麻筋，或是在某种绝对的爱的痛惜中给兔子注射安乐死。

出于对这件事的不忿和好奇，我的板凳时光发生了改变。再次陷入回忆时，我开始不自觉地寻找那串数字的影子。那个“车”是被我放在这一天的棋局中了吗？这位老人额顶的白发是否是那只蝴蝶飞走时落下的鳞粉？不出一周，所有的棋盘都被一个“车”所推翻，所有老人的白发都出现了蝴蝶栖息过的痕迹。我将回忆拉长，倒回，倒回到棋盘和老人之前，我看到了我幼时画的画，画的是一只蝴蝶，我看到我扔起来的猪骨头，是那只“车”，我看到我折的千纸鹤，铺满房间，它们的数量，刚好就是那串数字。

我兴奋起来。印象里，这是第一次，带着那种我妈一直提防的“成瘾感”坠入其中，开始以最笨拙、最投入的方式寻找那串数字。

五位数字，我只记得有个9，那就先把9放在首位，其他四位一一尝试。这是一项无比庞大的数字工程，不但需要极强的毅力和信念——这些我好像从未有过的东西，而且鉴于数字组合的复杂和相似，我强大的记忆力也只得灰败离场。

堪堪支撑了三天无果后，第四天早晨，吃罢早饭，我没去坐到板凳上，而是转头对我姥姥说想要几张白纸。我姥姥看着我，有几秒的诧异和无措，说话都有点走音：做什么？“写数学作业，当草稿纸。”我说。

那天，我写了一万多个数字排序，写得头昏眼花，嗓子发疼，但内心和记忆却重新寻回了平静，并随着数字的增加愈加色彩纷呈。欲盖弥彰，我还写了四十多页的数学练习册作业。当晚，我姥姥给我炖了一桌子肉，一直用那种仁慈得快滴下水来的眼神看着我吃。她跟我妈通话到深夜，意气风发如四十年前的牧羊人，而我则将稿纸塞进练习册，将练习册放于枕旁，在对新一天的希望和探索中入眠。

当暑假结束、我从姥姥家返回时，我的数学作业已经写完，草稿纸比练习册还厚，悉数放在我书包的夹层。这是我作业完成率最高的一次，我妈去送我上学时脸上堆满了盈盈的笑意，柔得像一汪泉水。

我不敢将我的数字们示人，怕它们会像游戏机和兔子一样，被人抓住把柄，就上课时拼命忍着，回家再继续排列大业，缓缓眷在草稿纸上。

有天回家，我发现我妈正坐在我书桌前，手里拿着那些盛满了我数字的草稿纸。我的心唰一下变得冰凉，好似见到我的兔子已被端上了餐桌，半是害怕，半是乞求。我妈看了我一眼，抖了抖手里的一沓纸，问：这是什么？

我战战兢兢的，几乎咬到自己的舌头，说这是“口”。

我妈说什么？

我说就是圆周率，小数点后的数字是无穷尽的。

我妈听了没再说什么，嘱咐我好好写作业，便把那沓草稿放回了我的抽屉。

几句话间，我出了一身的冷汗。意识到这串数字已像兔子一样岌岌可危，为了排序能够更稳健安全地进行，我不得不对数字进行伪装。

一开始我想到的伪装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摒弃阿拉伯数字，转而用英文或汉字，背单词或练字一样的书写。但两天之后，再面对我妈的质疑，并没有圆周率可以帮我解脱，我便转而采用更神秘的伪装方式。拿英语举例，就是打开生词表，从第一个生词开始从零到九进行编号，誊写时以单词作编序密码，反复誊写，可轻易以背单词为由掩人耳目，而我要做的，仅仅是隔几天把编号整体挪到下一波单词密码上而已。这项伪装方式不仅降低了我妈的警惕，还拓宽了我排列数字的地点。我不再畏首畏尾，英语课上大排特排，被抓住也毫不畏惧。我还举一反三，将数字编号的密码体系扩大到其他学科，例如语文的生词表和科学课的专有名词解释。

如此一番劳作下来，文字亦成了我寻找和感受那串数字的一种方法，有时候，望见一个单词或名词，脑海里会蓦然浮现它的数字含义，比如Green的数字含义是130，细胞壁的数字含义是96。这种认知能力更像本能，类似婴儿哺乳，没有原因，无需训练，浑然天成，只看你的潜能何时出生。

在我夺得这项能力的那一刻，我终于解开了困扰我人生前几年的巨大谜团，明白了人为什么要花费自己人生的大量时间去学习如此冗杂的知识了，为的就是那串数字。这一改变不仅提升了我的眼光和视野，还顺带提高了我的学习成绩。所有知识于我写来都像阿拉伯数字般容易——因为我看透了它们的数字本质。

成绩下来时，所有人都难以置信。我的班主任是个残酷而麻木的女人，当日游戏机被砸毁有她不可磨灭的功劳。审批完试卷，她不露声色，发卷子时唯独缺少了我这张。我没在意，在全班讲卷子错题时顾自抽了一张白纸，用数学定理排列了几个数字。课后，班主任把我爸妈叫到学校，没有明言指出她怀疑我作弊，而是当着我爸妈的面递给了我一张崭新的试卷——还细心修改了题目数值——要求我当场做题。十五

分钟，我将试卷交上，班主任越看越缄默，半晌，她放下试卷，似是放空了片刻，而后从抽屉里取出本应发给我的满分试卷递给我爸妈，抽搐似的微笑说：这孩子数学终于开了窍了，我想推举他代表学校去市里参加奥数比赛，特地给你们叫过来通知一声。

我爸妈欣喜若狂，当晚奖励了我一顿肯德基全家桶，撑得我半夜起来去了三趟厕所，回来后又兴致冲冲地把数字往后排了几十个。

奥数比赛是在一个温暖和煦的春天下午，由年龄的不同分成三个赛段。中学赛段有个姐姐非常漂亮，细条高个儿，扎着马尾，侧面站时，像个笔直的7，坐下之后，就是个窈窕的5。跟她相比，与我同样都是小学赛段的选手们都像被人蓦然削去了一截儿那样矮，坐下去东倒西歪，像个颤巍巍的2，唯一能构成画面的就是手里的笔，一个板直笔挺的1。

那场比赛我得了第四名，纪念奖。回到家后，我摊开一张纸，写下了一串数字。这场奥数比赛中，我突兀的自那些人身上攫取了四个数字，并于比赛中途排列组合成功。那种感觉似齿轮闭合，蝴蝶飞来，棋局重组，一切终于得以运作。21957，它再次降临在我脑海，似一种奖赏，似一种神迹。21957，是渴水之人一脚踏进涌泉，是笼中之鸟重新回归蓝天。我的内心仿佛流进了一个大海，波涛翻滚，动荡不已，奥数题和比赛早就被我抛掷脑后，我像个骨瘦如柴的婴儿叼着妈妈的乳头一样，在舌头、在指尖、在眼睛紧紧攥住那串数字，想亲它，更想把它的骨骼打碎、肌肉剥离，生吞咽下，这样我就不会再忘记，就不会再失去。

我妈进来时，那串数字已被我的眼泪打湿，向外扩散出毛茸茸的斑驳。我沉浸在自己的海洋中，忽上忽下，直到我妈走到跟前才猛然发觉。我吓坏了，几乎哭出了声，急切着想把那张带有数字的纸藏了、吃了。但我妈只瞧了那串数字一眼，就抱住了我，安慰我说没关系的。

她的手掌温暖、柔软，像松鼠的尾巴，一下一下扫在我的后背。

我当即就意识到，她看不见它。

她看不见那串数字背后的海洋，看不到它是蝴蝶、是棋局、是“车”，它在她面前只是一串单薄的阿拉伯数字，是一个不被重视的1，是一个数学竞赛失意者落败后写下的草稿公式，是一张废纸。

不是游戏机，不是兔子，属于我，却没有被别人掠夺的可能。

巨大的喜悦令我的身体变得松软如棉，竟也抱住了她，牵住了她的手。

那双柔软的手，沾着一点面粉，正握着擀面杖给我做饺子。我记得，不久之前，那根擀面杖也狠狠地敲打在我的身上。

这串数字不仅改变了我，也改变了她。

我成了个被幸福填满的小孩，过量的满足把我变得善良、高傲，我想只要我攥紧这串数字，它就能变成我无往不胜的武器，我也能像动画片里的小英雄一样，去拯救别人。

带着这种自信，和一丝唯我独有的炫耀，我找到我的好友——被砸了游戏机的和养兔子的，他俩无一例外，看不到那串数字的美妙，可悲又可怜——主动为他们补习功课，倾诉似的将数字带入知识的记忆法教授给他们。找到那串数字后，我并没有对万事万物失去兴趣，看透事物的数字本质的能力依然伴随着我，每看到新知识，一个新的数字排列组合，都是我对那场巨大成功的一小小重温。我仁慈地接纳它们，将它们放进我愈加厚重的记忆之书的某页棋局中，那本书精致美丽，整体铺展开来是一幅墨荷长卷，标题和落款都是同样迷人的一串数字：21957。

我的好友理解不了我的海洋，好在我的努力下，他们逐渐理解了数学公式、英语语法和文字笔划。再次考试时，他们考得很好。听说后来也很好。游戏机被砸的那个，他爸之后又给他买了一台，价格昂贵的最新版，听说他平静地接过、道谢，而后封存在自己的书桌深处，再没动过。养兔子的给兔子们送了终，兔子埋在还乡河公园（现在改名叫曹雪芹公园了）的河堤上，旁边是小英雄雨来的纪念碑。

当时我年纪小，自大、乐观，觉得我的朋友们虽因为童年的恐惧和生命的短暂放弃了内心所爱，但总有一天，他们会再痴迷上其他的。

因痴迷而下坠的感觉太美妙了，我带着胜利和圆满的余温慢慢长大，节节攀升。考上驰名大学那天，我在惯常的赞美和喜悦声中感到那串数字正在熠熠生辉。我的海洋从中间分开，那只蝴蝶正在遥远的棋盘上挥动翅膀。

我渴望了解它。

这项工程与之前宏大的数字排列不同，无头可续，但四下观瞧，处处都是遗迹和蛛丝。其宽泛、复杂的程度等同于一个人妄图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摄取到宇宙间所有的知识。数字2，在童谣里是鸭子，在小学生眼里是趴伏的侧影，在女人眼里是耳环的弧形。想要了解2，就要了解鸭子的羽毛、鸭子的食物、鸭子的成长、趴伏的脊柱形状、趴伏的姿势数量、趴伏的极限，而女人的耳环弧形，则又可以分支成几何的数学公式和金属的化学方程式。

这些无限的奥秘都属于数字2，而我手上有五个数字，每一个都背负着无穷无尽，每两个粘连在一起的组合又是一番新的无穷无尽。

在不了解这串数字就是宇宙本身时，我曾茫然失措的做过很多傻事，例如用大学奖学金作为酬谢，将这串数字公之于众，请高人作答。来者络绎不绝，其中关于彩票中奖号码和生辰日期截取的说法最多，有几个不知名的教士还以此为据，请我入教。不断叠加的酬金和不断延长的时间还一度引领了大学的侦探解密风潮，但这些莽撞的努力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我几度为寻不见答案而痛苦自弃，将自己放逐于酒精，几乎被海洋淹死。这时，那串数字在我的内心涌动了一下，我睁开眼，看见一个短裙少女端着杯酒自我面前走过。那杯酒里倒映着半缕灯光，像被撕碎的月亮。我瞬间明晰，那是21957的另一种具象化的组合，它用一种月光撒进沟渠的怜悯告知我，这场追寻是无穷尽的，答案跟多年前一样，是一只蝴蝶，夹在一本书不知名的页码里，是一盘宇宙之棋上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车”，但这一切都无迹可寻，获得只是一种偶然，而我只是那十亿个偶然中，运气较高的一个。

获得如此明示，我骤然热泪盈眶、失声痛哭。酒吧的人群凝固了一秒，纷纷向我靠拢。我抬起头，奔向那个拿着酒杯的短裙少女，像一条鱼扎进大海，在她错愕的目光下，重重地跪在了她的脚边。

那一刻起，我的大海更广阔了。我避免了成为疯子的命运，那串数字无迹可寻的真相更像是人生漫长终点的礼物，而不是某场战争进攻的旗帜。

在她的酒杯中，我将那串数字自夸父的太阳中摘下，凝成博尔赫斯的一枚硬币，投入了我的海里。自此，宇宙中增添了两条抛物线，我的足迹，和那枚硬币的轨迹。最终能否交汇，是一个美丽的谜题。

无尽的爱与求知中，我和短裙少女结婚了。为她套上戒指时，那串数字在我的胸口跳动了两下，我满含热泪地吻了她，发誓说我永远爱她。

婚后我们的生活幸福甜蜜，她漂亮活泼，那串数字常在我望着她时跳动闪烁。我在众多橄榄枝中选择了最具前景和经济实力的工作令她衣食无忧。芭蕾般转动的生活里，我深深为她牵动的心跳所吸引，一度认为海中那甜蜜的答案无足轻重。

那时我就有预感会失去它了。

如此平稳、幸福、毫无缝隙的完美，除了失去它，你还能怎样再从中得到什么呢？

那场失去毫无预兆，就像清晨起来发现一根头发不知何时脱落到床上，我的海洋消失了。不是惩罚性的遗忘，那串数字还在那里，21957，清晰地记在我的桌角、我的袖口和我的剃须刀上，但环绕在它周遭的那股神秘美好的氛围消失了。

它变成了一串单薄的阿拉伯数字，2背后的鸭子、趴伏、耳环全数消失。我看向冰箱，它不能再让我想起它的文字意义152，我翻开英文书，所有的单词都以它本身沉重单调的面孔陈列在纸张上，局促地排列着，不再是一串由数字组成了清音小调。

我的世界像被人捅穿了耳膜一样安静、陌生。所有的东西都清晰地、真实地搁置在我眼前，但我却一样都不认识。

我终于直面了自己的残酷，我终于明白，那个被砸碎过游戏机的人，这一生都不会再沉迷游戏了。而另一个，在埋葬了他的兔子之后，将彻底变得坚硬而冷漠，正如此刻的我。

我停止了思考。昔日所有的智慧与活力都不过是五年级时梦中少女给予我数字后的回忆和想象，蝴蝶一旦走完一生、不再煽动翅膀了，我的风暴也就抽离了。

我失去了风暴，也失去了青春，不再具备得到那串数字之前终日坐在板凳上翻书的勇敢了。留存下来的，是由风暴卷来的残骸，是很多钱，很多正派热情的朋友，一种能足够我的身体舒适到死的生活。

泪眼重新聚集在我的眼眶，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正享受着失去的痛苦，是否从得到它的那一天起，我就盼望着今天能重归平静。

所有的人都跑来安慰我。他们温暖、柔软，或许正被只属于他们的那串数字影响着、滋润着。那种善良真挚得像太阳，穿透了我，却不能理解我。

我意识到自己的卑鄙，生来就无能去感恩。卑鄙的背面是一个微乎其微的侥幸，那就是我已得到了那串数字的真相。在我毫无察觉的一个时间，它已以绝对的真相的方式融入了我的生活，所以，它的那条抛物线消失了，硬币再次回到博尔赫斯的口袋，海洋不复存在了。

察觉到这个可能时，我正被朋友们送上飞机。他们觉着我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过度劳累，特意为我置办了半个月的珍贵假期，由我的妻子陪同，外出散心。

我无力争辩，沉默地答应了。像行走在荒漠中的人一样，既渴望水，又恐惧水，开始在记忆之书中寻找那串数字的真相与我融为一体的秘密。

风景真美，我一无所获。

我的妻子把我抱在怀里摩挲安慰，故作轻快地叙述着她近来的生活。她的面容一如当年那般美丽，但却不再让我痴迷了。

我在她的怀中渐渐下坠，似堕入泥沼，难以脱身。

突然，一串数字自我耳畔划过，似一记尖刀，划穿了我的肚肠。我猛然自她怀中弹起，吓得她一颤。

我抓着她的肩膀，似要把她捏碎、装进当日的酒杯，灌成一个残破的月亮。

我问她：你刚才说什么？

她错愕地望着我，说：我上周托小丽从法国带了件羊绒大衣。

还有呢？

花了21957块钱，怎么了？

她疑惑地问。



么瑶

流浪作者，长于北方，喜好甜食，关心粮食和蔬菜。

第二回

这是“24小时文学聚会”作者的第二篇章。祝他们欣欣向荣。



图片来自 [Kristaps Ungurs](#) on Unsplash

小说

我们在芦苇丛中

拉尔夫·罗特曼 | 故事群岛

在两次心跳的间隔，
到底藏着多少记忆？

排练快结束的时候，云散开了，教堂窗户外面的光线让小提琴的音色似乎也明亮起来。就在这时，琴桥上的弦断了。一根黑色的金属丝在弦箱下面晃动，艾米莉亚奏出的滑音没了E音。她用眼睛的余光瞄着那根断弦。它歪斜着，光泽暗淡，像一根细细的针头。她感到一阵晕眩。在她哥哥弹奏的最后一个和弦余音袅袅之际，她把乐器放到三角钢琴上，弯腰去拿她的手提包。包里除了顺势疗法滴剂和一盒阿司匹林外，还有日服和夜服用的白色和蓝色药片。她从铝箔纸的包装里挤出一粒药片，用牙咬住，在化妆品、汉莎航空公司的湿纸巾和新一期时尚杂志中翻找她的水瓶。

她曾在苏黎世的一家诊所里默默地等待，像大多数人一样焦虑不安。人们极目远眺，目光越过挤满游艇的湖面，可以望到对面的黄金海岸，甚至更远的地方，但身子却只能坐在椅子之间的大型植物后面翻阅杂志，那植物是一种装饰用的芦苇丛。一个比她年轻十岁的女人先被叫到了，可没过几分钟就回来了，她脸色苍白，嘴唇失去了血色。“好吧，”她对她的丈夫说，后者很不情愿地从智能手机里回到现实中，“现在我真的可以自杀了。”直到这时，艾米莉亚才注意到，诊所六楼的所有窗户都是被栅栏封住的。后来，当她走到街上时——她的两只手肘都被贴上了膏药，因为她那被针扎了一次又一次的血管非常细嫩——她发现诊所的房子前面新贴了一张海报。伊基·波普，哈伦体育馆。胶水如泪一般，滴在这位老牌歌手的金发上，还有他因人生的痛苦和用药而布满皱纹的消瘦的脸上。他最近还凭借这张脸为香水和家用汽车代言。当她之后在机场再次看到这张海报时，上面已经贴上了“票已售罄”的标签。

她一直带在身边的水瓶没水了。她的哥哥把乐器从三角钢琴上取了下来，仔细打量断了的琴弦。“弦不是刚刚才换过吗？”他问道，“收据还在吗？”他也一直穿着大衣排练，那是一件单薄的羊绒大衣。艾米莉亚在圣坛旁边的一个空花瓶旁弯下腰，无奈地张开嘴。伴随着一个高音，药片被吞了进去。

钢琴调音师一直在回廊那边倾听他们的排练，他的手放在耳朵后面，握成贝壳状。他慢慢地穿过教堂，疑惑地看着他们。他身穿一件价格不菲的破旧皮夹克，脚踏沉重的靴子。大卫点了点头说，钢琴没问题。一个英俊的男人，或者说，这是个讨他喜欢的人，你可以从付的额外费用上看出来；他的鞋跟踩在地上的声音在整个教堂里回荡，打着充满年轻和朝气的节拍，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越来越响亮。当他几乎走到他放摩托车头盔的领洗池时，艾米莉亚抬起头，喊道：“您有烟吗？”

他当然不抽烟。大卫从鼻子里呼出些气，打开他用艾克斯产的柔软小牛皮制成的包，那是她送给他的六十岁生日礼物。他翻到G大调奏鸣曲中“热情的快板”乐章，在最后一小节上敲了敲。“我就知道，这里是两个四分音符。节奏不能拖沓，艾米。我们得再来一遍，好吗？”

教堂司事是一位来自非洲的老人。他从教堂更衣室走出来，把一揽百合花插进花瓶里，

百合花是那种完全绽放时会散发出一股烧焦的电线味的品种。她慢慢摇了摇头；她已经习惯了大卫几乎从来不听她在说什么。他张开嘴，指了指她红色天鹅绒的小提琴盒，问道：“怎么就没有备用琴弦了？它们在哪里？”

在苏黎世，墙上的那个有机玻璃瓶中，已经装着些剪刀、小刀、打火机和香水瓶。那个星期日午夜，新的飞机飞行安全条例也在瑞士生效了。那位官员在检查了他的目录手册并与上司通了电话后，没收了这四个用蜡纸做的信封。“很抱歉，夫人，这些东西不能带上飞机。”

在她吃惊地提出疑问后，他把双手放在脖子前面握成拳头状，比划出一个绳套的形状，声称这些金属丝可以被当作武器。这个穿制服的联邦工作人员长相严肃，说得也很认真。小心起见，她没有指出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即根据这一奇怪的规定，他也必须把她的乐器——1925年造的加林贝蒂小提琴——琴弦取下来。几分钟后就要开始登机了。当然，行李中还有一套新弦，但行李让她的哥哥直接从泰格尔机场送到酒店了，因为日场演出结束后，还要和唱片公司的人共进午餐。他的眼皮抽搐了一下，瞥了一眼手表，用袖口擦了擦表盘。离开演还有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间。交通通畅，下榻的酒店就在附近，但他还是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天呐，艾米，非得现在出这个岔子吗？我们就不能顺顺利利地演出一次吗？”

她疲惫地笑了笑。三十多年来，一切都很顺利，但他需要这种刺激，这种按部就班的日常操作中的胡椒粉。他执意要赶在火车开动前的至少三刻钟到达车站，在机场的值机柜台开放前就站在那儿干等。艾米莉亚有时觉得，正是他的职业操守——守时必然包含其中——让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留白；他自己或者别人的不专业，都是最糟糕的事情。这种坚持恰恰是业余的开端，真正的作为是不需要专业性的——这种想法已随着他的青春一起被埋葬了。年轻的时候，他还曾用胳膊肘弹奏过斯克里亚宾的曲子。她觉得，没有把诊断结果告诉他，是无比正确的，因为即便是一根弦断了都会引起他的神经衰弱。酒店就在歌达尔大街上，过去几乎不用花十五分钟。趁教堂司事给他泡罗汉果茶的时候，艾米莉亚走到门外，边按摩着指关节边等出租车。这是十月初的一个温暖的星期天，也是一个节假日：风刮到她刚染的棕色头发里，也把她的大衣吹起。海鸥在运河上发出刺耳的叫声。街上空无一人。

与她哥哥不同，她几乎从来没有在守时这件事上花过精力；但她从来没有迟到过，甚至是碰上了天气原因或者罢工。她的直觉总是比所有时钟都要可靠，这让她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变得愈加从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会偶尔被噩梦所困。在梦里，她严重迟到，冲上舞台后，发现从口袋里掏出的谱子却是错的，而听众纷纷起身离开大厅……出租车停了下来，一辆没有星徽的奔驰车，开裂的人造革后座冰冰冷。司机是个留着小胡子的白发男子，他朝她点点头。当她关上车门时，她觉得车里似乎有一股很熟悉的味道，但她一时还无法确定。一棵褪色的幸运树在后视镜下回晃动。

“我还以为是我宿醉没醒呢。”那人说。他用拇指指了指教堂门口的海报，那是日场演出的海报，上面有舒伯特、巴托克、勃拉姆斯的曲目。他说话带着轻微的阿拉伯口音，嘴里镶满金牙。“您本人比海报上好看。”

她不由自主地把头发拨到耳后。

“哦，谢了！但海报上的我要更年轻！”

“那又怎样？”他推进了一档，“年轻代表着愚蠢，不是吗？所以，年轻可不是什么好事。去哪儿？”

她把目的地告诉他。他慢慢地转到波茨坦大街，有什么东西在这辆破旧的车子的车底板或车轮拱板下摩擦。在新国家美术馆这个透光的玻璃立方体里，人们正在举办赛·托姆布雷的大型展览。那些充满温情的画一如既往地让她想起自己童年时在黑板上的涂鸦。但是，那些曾经让她如此着迷的、用开阔的笔触和绽开的颜料画出的巨大的盛开的玫瑰，在这个清晨却如同空洞的承诺，让她感到一股奇怪的悲伤。司机晃了晃脑袋：“这个臭家伙打扰到您了吗？”

她往前探下身子。在汽车杂物箱下已经起了毛的软垫上躺着一只狗，一只脖子上没拴项圈的白色、带棕褐色斑点的梗犬。它把嘴巴放在前爪间，抬起它的内眉毛，似乎是很悲伤地打量着她，但当她冲它笑了笑后，它就用尾巴拍打车底板。“是你呀！看我们在这儿碰到了谁？”

她咂嘴引它过来。它跳上坐垫，高兴地叫了几声。它的耳朵很短，向下垂，眼睛是黑色的。当艾米莉亚伸手抚摸它的喉咙时，她深深地吸着它短毛上那股熟悉的、略带咸味的味道。“它长得可真漂亮！是杰克罗素梗吧？我丈夫生前养过一条。它叫什么名字？”

司机耸了耸肩：“不知道。我觉得，它就是条狗罢了。是我女儿养的。每个星期天我都得照顾它，无论我是否需要工作。我一点都不喜欢狗。但我必须带上它，因为我女儿要去她婆婆家，她婆婆对狗过敏。但从没有人问我是否对狗过敏。”

那条梗犬咬着她的手腕和表带，和她做着游戏。她把它抱到后座上，它便在那里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然后把头放在她的腿上。

宽阔的街道上没有一辆车，只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那是一个送报纸的男孩，他的包在风中鼓胀。转角处，曾经声名远扬的“啤酒天空”俱乐部现在已经换成一家手机店。司机转到选帝侯大街上，驶过一家家家具精品店的展示橱窗。人行道上到处都是被踩烂的栗子，大都会剧院的钟塔映入她的眼帘。当他们从高架铁路下穿过的时候，正好有一列火车从上面经过，这把这个小动物吓了一跳。她把一只手放在它的肋骨处，安抚它。

在两次心跳的间隔，到底藏着多少记忆？诺伦多夫大街的小书店还在，橱窗里还摆放着梅尔夫出版社出的书，而她曾经买过一条皮裙的那家二手店现在开始卖范思哲、瑞娜·朗格和香奈儿的裙子。温特费尔特广场周围的新楼是统一后匆匆拔地而起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现在看起来已经很破旧了。当司机在斑马线前等一位拄着拐杖的妇女过马路时，艾米莉亚数着斯朗贝兰俱乐部窗口前的空杯子。多少个夏日，她坐在那里，在日出时分，手里拿着夜晚的最后一杯啤酒，耳边响着五花八门的承诺。

司机用拇指指了指。“您瞧。”他说。她困惑地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偌大的广场上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甚至没有一只鸽子，只有一辆用挡板挡起来的集市大篷车。天空很蓝，云投下的阴影慢慢掠过带着已经长满青苔的裂缝的柏油马路。司机缓缓地踩下油门。

“您知道，在我的家乡，人们是怎么说空无一人的沙海的？他们会说，大家都躲到芦苇丛里去了！”

她听了微微一笑。虽然椅子还架在桌上，但 M 咖啡馆里的浓缩咖啡机已经开始冒热气了，她在这家咖啡馆还叫 Mitropa 的时候就知道它了。人们在金合欢大街两旁种上了新的树木。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她请求司机停一下。摇下车窗后，她看到曾经是灰色、现在是香草色的房屋外墙和墨绿色的大门。女房东以前开的“新鲜啤酒屋”现在已经换成一家寿司店，但旁边还是泽克驾校。在二楼的凸窗上——那里曾摆放着一台她母亲的大博兰斯勒三角钢琴——挂着褪色的旗子，阳台上的风铃叮当作响。

“你以前在这里住过。”司机说。这听上去不像一个问题。

“是的。”她说，然后咽了一下唾液，但喉咙里突如其来的疼痛还没消除。她摸了摸那个痛处，在大衣的硬币和口红之间翻找口香糖和糖果，但都没找到。她的手提包放在教堂司事的更衣室了。“我在这块地方长大的。”

司机转了弯。贝尔齐格大街上的所有房屋都被经过了精心修缮，她童年时看到的墙体上的裂缝甚至是上一次战争留下的弹孔都没了。邮局的停车库旁边仍然是格里尼森殡仪馆，在那里你可以拿到可怕的、当时风靡全校的附赠商品——印有公司标志的黑色烟灰缸，标志是哥特式教堂窗户前的一口棺材。多年来，她用同一个系列的打火机烧过从她小提琴的琴弓上被换下来的弓毛。

狗翻了个身，她挠了挠它的肚子，它又开始舔她的手。“它真的没有名字吗？”她问，“当它跑开，你得呼喊它的时候，你叫它什么？我丈夫的狗叫弗莱克斯。”

司机猛地踩下刹车。“我什么也不叫。”他嘟囔道，“我更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老碰上红灯。这可是星期天早晨，周围没有一个人，红灯还要老亮？要我说的话，这真是故意跟人过不去。”

两只天鹅在海因里希·拉森公园里的松树树荫下大摇大摆地走着。七十年代末，她和她大学期间最要好的朋友伊娃一起住在那栋新艺术风格的房子里，就在室内游泳馆边上。丑陋的木地板上摆着假花假草，浴炉需要烧煤来加热，糖果罐里有毒品。你最早可以在晚上十点出门，去披萨店，或者去看场克劳迪娅·斯科达的时装秀，然后去任何一家夜店，就像人们今天习惯说的那样。伊娃的朋友埃斯特是一名摄影师，曾和詹姆斯·奥斯特伯格交往过。伊娃·波普，这个小个子有时就蹲在她家厨房的椅子之间，带着高傲的自尊心偷吸她们的可卡因。他说起话来就像池塘里的青蛙一样，只不过还带着一口密歇根州的口音。

她想起来，他身上也有一股现在车里的味道。在上座率只有一半的大都市剧院演唱会上，他演唱了《白痴》的曲目，那仍然是她最喜欢的专辑。他突然穿着白衬衫和和熨得平整的裤子登场，伴随着交响乐般的前奏，一声不吭地从舞台的一边走到另一边。在聚光灯照耀下，他显得很英俊，眼睛两旁画着黑色眼影，被他的女朋友笨拙地修剪过的头发刚洗过。他的目光越过在场的每一个人，紧紧盯着远方，站在艾米莉亚旁边的一个女人太阳穴上都渗出了汗珠，她声音沙哑地恳求道：“开始吧！”“赶紧唱吧！”

但他先从易拉罐里啜饮了一口啤酒，从里面挤出一股喷泉一般的泡沫，然后把罐子扔到音箱之间。接着他拉开裤子拉链，仔细地把衬衫塞进裤子里，再不紧不慢地把拉链拉上。最后，他向观众吐口水，用颤抖的手抓住麦克风，在音乐的第一个小节，甚至是第一个音响起来的时候，他一跃而起，不，是像直升机一样升空，仿佛从他体内迸发出一个用尖叫声击碎一切琐碎和愚蠢的东西的恶魔。“接下来，《午夜呼叫姐妹》！”和弦的力量，还有他完全不同于在她的厨房时的声线，充满了力量和决绝的优雅。她挺直了身体，颤抖着，仿佛她的四肢和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欢呼雀跃起来。当她和周围的人潮融为一体时，泪水在她的眼眶中打转。在那一刻，不朽比任何事情都要来得清晰。

“是的，就是这样。”伊娃后来在中央咖啡馆边说边帮她擦她哭花了的眼睫毛。“永远都是这样，宝贝：我们爱上狂野的画家，爱上血管里流淌着海洛因的真实的歌手，爱上诗人和美丽的流浪者，然后我们嫁给了医生。”

但她这番温柔的犬儒主义式的安慰来得太晚了，对她起不了什么作用。这场不到一小时的音乐会改变了艾米莉亚的一切，给她当时散漫而焦虑的生活注入了新的信心，为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带来了勇气，给她带来了内心自由。

酒店前飘扬着五颜六色的旗帜。这是一栋新建筑，铝制外墙明净闪亮。“我们到了。”出租车司机说，他从后视镜里看着她，当她递给他一张纸币，并请他等上一会儿时，他点了点头。一眨眼的功夫，他的眼睛放佛变成了那个令人感到熟悉的棕色眼睛。他打了个响指，把狗赶了出去。狗跟着她跑了几步，随后把注意力转向了路灯上的气味。房间在七楼。这是一个双人间，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套房，当她从书本和检查结果中翻找到琴弦时，她又感到一阵晕眩。她打开桌上的水瓶，喝了一口，抬头看着天空中那片相互追逐的云。对面是一栋花巨资修缮过的老建筑，阳台铺上了马赛克瓷砖，屋顶的平台上摆满了观赏用的芦苇丛。和几天前在瑞士看到的高大植物一样，它们有着近似蕨类植物的尖端，在风中摇摆。

司机眼中的善意似乎有一种奇怪的严厉，几乎可以说是冷酷，但它毕竟是一种善意。现在该如何是好呢？鸟儿在植物周围嗡嗡作响，啄着芦苇花，灰尘像烟雾一样从芦苇花里升起来。我们不应该用“突然”或“突然下定了决心”这些词，因为心跳和心跳之间的时间间隔已不再关键，决定就像乐曲的变调一样，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不过到目的地了。

她打开窗户，深深地吸了口气。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酒店后院总有一股奇怪的味道，或者说是一股霉味，烧锅炉的人总是灰头土脸地从地下室里出来。与那时相比，柏林现在的空气，至少在这个星期天的清晨，已经是好得出奇了，几乎和苏黎世湖上的空气一样新鲜；人们可以想象夜晚的星空。她踩着一把椅子，爬到窗台上。她想起了大卫，他现在应该正不安地坐在教堂长椅上，眼睛盯着他的手机，或用袖口擦拭着他的表盘。亲爱的哥哥呀。

她还从来没有在演出时迟到过。一条狗在酒店大门口叫着，也许是那条带黄褐斑点的狗。她想知道，那超越一切的一步来得能有多轻盈。她看到自己的影子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墙上坠落，她的大衣在她的头顶发了疯似地飘动，从大衣里掉出来的硬币，现在还在那片芦苇丛中。



拉尔夫·罗特曼

德国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1953 年生于德国北部小城石勒苏益格，在鲁尔工业区长大。拉尔夫·罗特曼的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青春之光》(2004)、《死于春天》(2015)、短篇小说集《失眠者大酒店》等。他的小说和诗歌曾获许多德语文学奖，如 2006 年马克斯·弗里施奖，2008 年汉斯·法拉达奖、2013 年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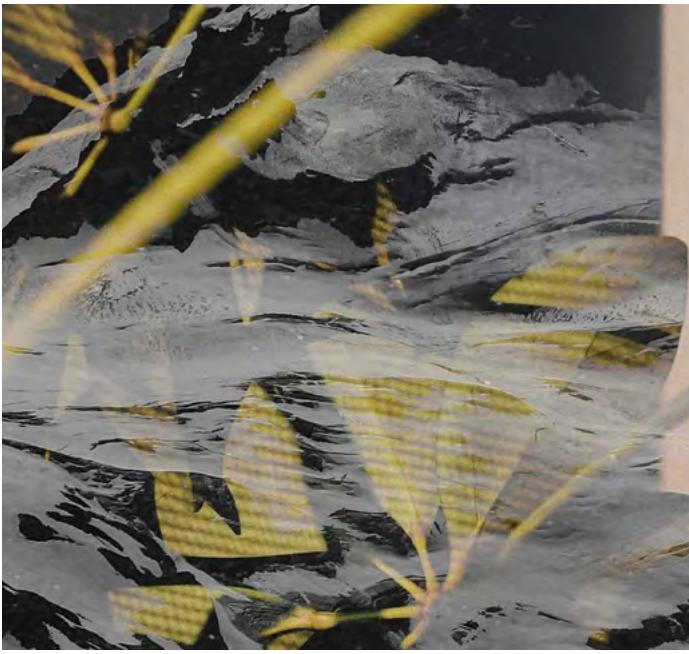
译者：卢盛舟

任教于南京大学德语系，从事德国浪漫派和当代德语文学研究，译有西格弗里德·温塞德著《作家和出版人》，在《书城》杂志发表多篇文章。

《我们在芦苇丛中》(Wir im Schilf) 选自拉尔夫·罗特曼短篇小说集《失眠者大酒店》。
Copyright © Suhrkamp Verlag Berlin 2020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Suhrkamp
Verlag Berlin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Alexandrine Roy](#) on Unsplash

小说

虚无 1994

戴内斯·马查多·本托 | 故事群岛

她无法吐出胆汁，但是她吐出了诗歌：
“回忆是一种永恒的苦难。”

她知道母亲想告诉她一个坏消息，但到底是什么坏消息，这次她没有一点头绪。她当时十六岁，已经积累了一些悲伤的体验，但与其说这些体验是来自青春期的心碎，不如说是来自她父亲的疏远和外祖父的离世。这些事情再普通不过了。但她的母亲仍然把她当作一个手无寸铁、无力面对世界的小女孩。

那天上午，她好几次试图挑起话头。吃早餐的时候，她向母亲提起外祖父，看是否能通过唤起这个女人的悲痛回忆来引出新的坏消息。这一招没有奏效。午餐时分，她装作微笑，同时又提起了弗瑞，那只吃鸡骨头的时候被噎死的狗。依然没有奏效。洗碗的时候，她终于下定决心直接向正在厨房扫地的母亲问这件事。

“妈，出什么事了？”

“宝贝，没出什么事啊。”女人回答道。

她明白了，只有等到晚上临睡之前，她才能知道这个噩耗到底是什么，因为母亲曾经对她说：“我想睡觉之前再告诉你。”而且，她从小就被教育说“睡觉的时候，悲伤会被吓跑的”。这样以来，一个无懈可击的组合就诞生了：她的母亲总是在睡觉之前告诉她坏消息，因为母亲觉得睡眠可以缓解悲伤。而她，只是假装这个方法有用。她曾经在睡前被告知家里的狗因为吃鸡骨头而噎死了，睡眠确实减轻了她的伤感。归根结底，那是因为她一点也不喜欢养宠物，更不要说是养一条像弗瑞那样整天惹麻烦的狗了：它活着的时候，不是狂吠，就是在她床上拉屎。然而，当她发现外祖父已经过世两天，但她的母亲因为想找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告知她噩耗而导致她迟迟未能得知外祖父的死讯时，她忽然意识到，有些痛苦是无法治愈的，它们能让人彻头彻尾地成熟起来。这件事也让她意识到，她母亲是一个对生活哲学充满了谬误认知的女人，事实上，是她，一直在教育这个女人。

这就是她为什么会如此思念外祖父。这也是为什么外祖父的离去会让她如此痛苦。谁还会在停电的时候陪在她身边，为她朗诵十行诗，让她在这个幻灭的国度里存有梦想呢？谁还会带着一双盈满笑意的绿色眼眸去学校接她？谁还会穿过二十几个街区去物资供应日渐不足的黑市偷偷给她买回牛奶，然后在牛奶里加一小撮盐给她喝？外祖父永远地离开了这个陷入危机的国家，她却自私地认为自己的处境更好。“上帝并不存在”，他曾告诉她，“最后迎接我们的，只有虚无。一种寂静而黑暗的虚无。”归于虚无之后，他再也不能陪在她身边，和她一起面对母亲直到夜晚才肯透露的坏消息。

她高声地朗诵诗歌，以熬过午后的时光。这是外祖父曾经教给她的办法。马丁，比列纳。在那些书页破裂的旧藏书中，没有多少可选择的读物。在那些年里，出版商们只选择出版那些政治类书籍，仿佛政治比诗歌更能缓解饥饿。有一天，外祖父穿越四十多个街区也没能买到牛奶，那天，他对她说：“大声朗诵那首诗。”她照做了，

诗歌的韵律使她忘记了胃囊里空洞的感觉。第二天，外祖父依然没有买到牛奶，他又对她说：“大声读这首诗。”

“每次听到这首诗，都觉得像第一次听到。”她回答外祖父。外祖父的脸上蜿蜒着泪水。他说，她已经做好面对生活的准备了。也许，正是如此，他才终于向疲倦屈服，任凭死亡将他带走，因为他知道，她已经长大了。否则，他不可能将她一个人撇下。哦，外祖父，我的外祖父。为了赶走回忆，她开始朗读更多的诗歌。比列纳，马丁，也许调换顺序效果会更好。

巴西电视剧的插曲打断了她的思绪。当时是晚上八点三十分。尽管她还没有丝毫困意，但两个小时后，她就会上床睡觉。她再也受不了了。她一整天都在痛苦地等待着那个坏消息的来临，这让她感觉很焦虑。幸运的是，她那晚不需要和家人同桌吃饭。晚饭只有面包和油，因此她的母亲和祖母允许她跳过必须坐在餐桌前吃饭的荒谬仪式。但这究竟是因为晚餐只有面包，还是因为她们提前得知了那个她一直在揣测的坏消息，所以对她感觉格外抱歉？

“我已经十六岁了，不管你要告诉我的是什么，我都完全有能力接受。”她本来应该风度翩翩地对母亲喊出这句话。但是，她的外祖父也曾经教导她，最好不要和某些天性对抗，因为它们只有在对方表面恭顺的情况下才会被打破。她的母亲，结过四次婚，又离了四次婚，只有一个女儿，对工作无比狂热，爱哭，没有勇气向她的办公室同事安娜坦白，她具有在诚实面前绝不服输的天性。就如古巴人常说的那样，她是一个虚伪的人。因此，她并没有浪费时间和精力与母亲对峙。当面包和油在她的胃囊里逐渐消化，她真的准备要上床睡觉了，因为睡梦虽然无法缓解悲痛，但却能使人忘却饥饿。

“外祖母，明天见。”她在自己的房间门口说道。这时，她感觉到客厅里的一张扶手椅忽然停止了摇动。“明天见，我的孩子。”外祖母回答道。外祖母是透明的，是褪色的。她先是被外祖父的那些十行诗遮蔽，然后又被隐藏在自己女儿的权威之下。当外祖母祝福她伴着小天使入梦的时候，母亲迈着匆匆的脚步走到房门口。她的手里拿着一本书。

“你看，我在汽车站的书店里买到了这本书。宝贝，我不知道这本书讲的是什么，但这是唯一在售的诗集，我就给你买了。”如果母亲需要买一本书来安抚她，那么这个坏消息应该比她想象得还要糟糕。“《负重的岛屿》。”女孩高声读出了诗集的名字，然后摇了摇头：“我不认识这位比希尼奥·皮涅拉，得先读一读。”“得先读一读”这句话暗含了她所有的愿望和痛苦：希望可以永远沉浸在书籍里，希望这位皮涅拉的诗是好诗，希望外祖父还活着，可以安抚今夜即将来临的哭泣，希望死去的是透明的外祖母而不是身为她唯一安慰的外祖父，而最后这个愿望令她十分痛苦。“我们谈谈好吗？”母亲问道。她想要大声吼叫，告诉母亲，自己在数小时以前就开始等待这场谈话，是她的固执让自己充满了痛苦。

然而，她只是点了点头。就在这时，彻底将面包消化殆尽的胃囊引起了她的一阵轻微眩晕。

她走向床边，躺了下来。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一个由诸多坏消息引发的条件反射的动作。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在她的记忆里，每当从母亲的口中得知噩耗的时候，她总是保持着这个姿势。也许，当她用被单蒙住身体的时候，她的母亲会忘记，自己女儿的乳房已经变得坚硬，胯部变得越来越宽，小腹也已经变得平坦而迷人。

用被单蒙住身体的女孩，只露出一张长满粉刺的脸。面对这样的脸庞，她的母亲再一次体会到自己作为母亲的身份。那本崭新的诗集，静静地躺在床头柜上。

“我的宝贝，你看我是多么地爱你。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母亲借助爱的名义对她造成的心灵折磨没有持续几分钟。“我不想成为像你一样的母亲。”她暗想。但她依然一言不发，想看母亲到底何时会下定决心。

“你知道吗？到今天为止，我和你的父亲已经整整分开三年了。”说真的，她已经记不清了。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三年前的今天她把他赶出了家门，还是他签下离婚协议书，还是三年前的今天，她不再爱他了，或是他不再爱她了。当然，前提是，如果他们真正爱过的话。面对不确定的事情，她依然保持沉默。

她已经学会了大声朗诵诗歌，也学会了平复自己的思绪。“我知道，你一直以为我之所以和你父亲离婚是因为我不爱他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谎言的味道让她在被单下挪动了一下身体，露出了她坚挺的乳房。她的母亲故作无意地帮她盖好被子，这个手势她已经演练过上千次。她知道，她需要隐藏女儿成年的迹象，才有勇气继续和她说话。

“宝贝，没什么。”这个女人终于下定决心。虽然她此刻就坐在女儿的床边，却觉得和女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我和你父亲离婚是因为当时他让我的侄女索菲亚怀孕了。我可以忍受他酗酒，可能忍受他整天胡作非为，但这件事，我无法容忍。我现在告诉你这一切是因为，有一个邻居知道了这件事，我确定她会把这桩丑事告诉你，但如果真的要我说的话……”母亲继续滔滔不绝地讲，而女孩开始装聋作哑。这样的消息，对于一个在几年前就靠自己发现人的性别是靠荷尔蒙决定的女孩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更不要说这个女孩从小就了解到，自己的父亲生性不忠。“他是个厚颜无耻的人，但他是你的父亲，你永远要谅解他。”外祖父曾经这么对她说。事实上，她母亲告诉她的这个消息到底有什么要紧的？它甚至都称不上是一个消息。然而，这又是一个被隐瞒的真相，这个真相对她来说，迟到了三年。她想象着，外祖父已经死了两天，他的嘴唇变得干枯，舌头失去了颜色，眼睛里凝固着痛苦的神色。这是她在别人口中了解到关于外祖父尸体的样子；那具尸体是如此冰冷，以至于她不敢拥抱它。母亲放任自己为那具尸体哀悼了两天，但却向她隐瞒了一切。

地震从被单下面传来，波及到床头柜，震裂了房间的墙壁，整座屋子都颤抖起来。那两张嵌着女孩十五岁照片的相框从墙壁上掉了下去，落到地上的瞬间，立刻摔得粉碎。房子里的灯闪烁了一下。连接水箱和脆弱的塑料淋浴头的管道爆裂了。“我知道，你爱安娜。”地震的全部力量聚集在母亲甩出的一记耳光上。“你真是个坏心眼的女人，为了保护你，我把这个消息整整瞒了三年，你那婊子养的父亲犯的错误，

到头来却算到了我头上。”也许，她并不是在责怪自己的母亲，而只是想试图借此机会让母亲把那些仍然隐瞒着她的真相最终和盘托出。事实上，她确实引起了母亲某些前所未有的反应：虽然这不是母亲第一次无比愤怒地扇她耳光，但确实是母亲第一次称她为“女人”，虽然她这么说，只是为了强调女孩的邪恶。“我就是一个女人。”女孩一边回答一边扯开被单，露出她那套着旧米奇睡衣的半裸身体。“你已经变得和你父亲一样疯了。”

“因为别人总是要为了你的错误买单。”如果在那一刻，有人能打断她们的争吵，那么她们俩将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她们突然之间意识到，她们对彼此的仇恨有那么深。但她们俩确实都意识到，这是一种无法和解的仇恨。事实上，不管是索菲亚，还是她三岁的儿子，还是那三岁男孩的父亲——同样也是她的父亲，都与这场争吵无关。

《负重的岛屿》落在了地上，那巨大的声响让世界上所有嘈杂都安静了下来。母女俩面面相觑，她们在断壁残垣中看清了这场地震的模样。母亲想起她为了养育这个忘恩负义的女儿所失去的那些狂欢的时间。女孩想起从未在夜晚出现过的妖怪库伊；她还想起了那一句“你不能再吃了，因为食物快要没有了”。母亲望着女儿那美丽而又高傲的样子，恨不得再给她一耳光。女孩再次感觉到，那抹着油的面包已经被她的胃囊消化殆尽了；她看到贫穷的家中那破裂的墙壁；她看到单纯的安娜——她对母亲的欲望一无所知。十六年来的糟糕记忆在她的脑海里闪过，她低头望向自己空空的双手。外祖父和诗歌只在她的回忆里开辟出了一小条道路。她推开了坐在床边的母亲：这一推，温柔而悲哀。

她穿上了鞋子。“这该死的水漫金山。”她听到地上的书籍发出这样的絮语。“这该死的陈词滥调。”她心想。于是她一脚把诗集踢到床头柜的下面。她从没听过比希尼奥·皮涅拉这号人物，因此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知道这句诗的。但是，更让她惊讶的是，当她只穿着米奇睡衣走上街的时候，她的母亲只是低头保持着沉默。她在外面走着。本该被霓虹灯照亮的街道，此时却被黑暗笼罩着。

哈瓦那是她记忆里的一块失落之地。1954年的某个下午，她的外祖父从比那尔德里奥出发，到哈瓦那来碰碰运气。但哈瓦那早就不是当年他到达时所见到的那座城市了。哈瓦那只是一条街道，她的外祖父和诗歌在这条街道上会合，最后都化为虚无。她继续走着。她感到饥饿如同癌症一样存在于她的身体。她感到青春无可挽救地化为一种死去的重量，挂在她的双膝上。谁是她的父亲呢？谁是那个坐在她的床边、爱说谎而又悲伤的女人呢？她也许永远都无法知晓答案，又或者，至少在她十六岁的这年，一切都陷入虚无的时候，她无法知道答案。

一阵带有咸味的微风将一簇头发吹进她的嘴巴里。她抬起从未低下过的头颅，更确切地说，她决定清醒过来。她发现自己已经走到马雷贡大道上了。她从来没有走过这么多路。她差不多走了横跨十多个街区的路程，但这远比不上多年来外祖父每天为了给她弄早餐而走过的路途。她眼前的无垠大海与城市的黑暗抗衡着。她朝海浪里吐了一口唾沫。在过去的那段时间里，她到底把如此汹涌的仇恨藏在了哪里？她的外祖父在哪里？只有在这个充满荒唐的岛屿上，一个处于崩溃边缘的女人，才会不断地问自己这么多愚蠢的问题。她无法吐出胆汁，但是她吐出了诗歌：“回忆是一种永恒的苦难。”

她爬上防波堤。她并没有朝下看。必须时刻保持目光向上。微风再一次把头发吹进她的嘴巴里。“美并不存在。”她暗想。她想象着自己披头散发地站在防波堤上，身上穿着一件从很久以前开始就不再合身的睡衣。她纵身一跃，跳向虚无，跳向大海的黑暗，跳向无限的荒谬。那不是海浪，而是她自身。她在海浪里呼吸着，直到海水胀破了她的双肺。

她感觉到自己的双乳在对抗着重力，一阵肾上腺激素在她的背部涌动。她没有看到过去的闪现，也没有看到在花园里为她摘花的外祖父。她唯一能感觉到的，是虚无的承诺。她的脚下没有坚硬的路面，因此她膝盖的疼痛消失了。她两只脚踝处坚硬的骨头撞击在了一起。她等待着八月温暖的海水能彻底地拥抱她，让她永远地失去呼吸。

然而，她感觉自己被摔在一块比犬齿还锋利的木板上，这带来的疼痛和虚无的寂静完全不同。她感到有数十道惊诧的目光透过她的睡衣落在了她的乳房上。当外祖父发现女孩已经无可避免地长大了的时候，为了让她日后不那么害怕，他曾这么告诫她：“男人们在看你的脸之前，会先看你的胸部。”她尝到嘴唇上的咸味。随着船桨有节奏的划动，她离海岸越来越远。没有人问她发生了什么，似乎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确，某种理由会将他们带向大海。她抱着膝盖坐在木筏上，一言不发。

从那以后，她就明白了，不是所有的死亡都是同一种模样。她想起外祖父，他站在教室门口，绿色的双眸里盈满了笑意，准备接她回家。那是1994年8月20日。



戴内斯·马查多·本托

古巴青年作家、记者，1986年生于哈瓦那。她的短篇小说发表于墨西哥、美国等国文学杂志和小说选，2019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九十个哈瓦那》，2021年入选《格兰塔》“最佳西班牙语青年作家”。目前在美国迈阿密大学攻读现代语言文学博士学位。

译者：周妤婕

西班牙语文学译者，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在读博士。主要译作有波多黎各作家路易斯·内格龙的短篇小说《花园》《为了瓜亚玛》等。

《虚无1994》(Nada 1994)，选自戴内斯·马查多短篇小说集《九十个哈瓦那》(Las noventa Habanas)，Copyright © Dainerys Machado Vento, 2019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c/o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电影《漩涡之外》(1947)剧照

小说

女疯子与犯罪故事

里卡多·皮格利亚 | 故事群岛

随后，他低下头，不假思索地写了起来，
仿佛有人在对他口述

一
膀大腰圆，肥硕无比，神情黯淡，一件青绿色的西装在他身上晃荡。阿尔马达走了出来，带着一股隐秘的亢奋，竭力掩盖内心的低落。
街道已是寂静一片。幽暗的，明亮的，条条街巷，缓缓下降。河边的风，拂过他的脸庞。他手扶帽檐，徐步前行。那个时候，陪酒女郎们正准备上第一班。其实，任何时间都有男人在物色女人。他们行走在苍白的阳光下，在城市里游荡，然后鬼鬼祟祟地走向那些歌舞厅。暮色中，歌舞厅甜蜜的音乐将城市覆盖。阿尔马达感到沮丧，恐慌，懊恼。伴着满心惆怅，关于莱瑞的记忆又涌入脑海：那个女人，遥不可及的柔软躯体，躺在皮椅上，双膝张开，“纽迪尔”浅蓝色的灯光，映衬着她那一袭红发。远远地，望着她，在大白天。粗糙的皮肤，黑眼圈。她沐浴在粉紫色的日光下，晃晃悠悠。她高傲冷漠，酒醉迷离。她目中无人，当他是一株植物，一只虫子。“得羞辱她一次。”他想，“把她掰成两半，让她呻吟，让她屈服。”
街角处，纽迪尔歌舞厅如同一块赭色污渍，老旧斑驳，在傍晚六点的阴霾中显得愈加魅惑诱人。阿尔马达在街对面停下脚步，站在那儿，矮墩墩的。他陷入沉思，点起一支烟，扬起脸，仿佛在空气中寻觅莱瑞身上邪魅的香水味。此时此刻，他感到自己变得无比强大，无所不能，甚至敢走进歌舞厅，一把拽住她，扇她巴掌直到她屈服。“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渴望能一飞冲天，”他突然想到，“能自己做点生意，在巴拿马，基多，厄瓜多尔。”他看到门廊一侧的地上躺着一个女人，全身裹着一堆破布，脏兮兮的一团。阿尔马达伸出一只脚，碰了碰她。

“喂，你！”他说。
女人颤颤巍巍地坐起身，抬起头，像个瞎子一般。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谁？”

“你啊。你是耳聋吗？”

“埃切瓦内·安赫莉卡·伊内丝。”她冷冷地答道，“埃切瓦内·安赫莉卡·伊内丝，大家都叫我阿娜依。”

“你在这儿干嘛？”

“不干嘛。”她说，“能给我点钱吗？”

“啊哈！你想要钱是吧？”

她攥紧一件破旧的男式大衣，像用袍子那样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行啊！”他说，“只要你跪下来舔我的脚，我就赏你一千比索。”

“啥？”

“瞧见了吧！”阿尔马达边说边用他那粗短的手指夹着一张钞票甩啊甩的，“你给我

跪下，我就给你钱。”

“我就是她，我就是阿娜依。有罪之人，吉普赛人。”

“你到底听没听见？”阿尔马达问，“你是喝醉了吗？”

“玛卡蕾娜，啊，玛卡蕾娜呀，身覆薄纱。”那女人一边唱，一边俯身跪下，匍匐在裹住她身体的那堆破布上，直到把脸没在阿尔马达的双腿之间。他低头看着她，威风凛凛，似猫眼般的眸子闪过一丝湿润的光芒。

“拿着！我是阿尔马达。”他边说边把钞票递给她，“拿去买香水吧！”

“有罪之人。女王啊，母亲啊。”她说，“在这个国家，找不出比胡安·巴蒂斯塔·巴伊罗雷托更英俊的人了，啊，那个骑士。”

透过歌舞厅的天窗，隐隐传来断断续续的琴声。阿尔马达双手插袋，径直朝音乐声走去，朝着门口那血色帘幕走去。

“玛卡蕾娜，啊，玛卡蕾娜呀，”女疯子唱着。“身覆薄纱与绢丝，啊，玛卡蕾娜呀，身覆薄纱。”女疯子唱道。

安图内斯走进昏黄的走廊，走向那间位于比亚蒙特街和雷孔基斯塔街交叉口的住所。他内心平静，安宁，对生活中那些微妙的组合心怀感激。对此，他总说那是命中注定。他和莱瑞住在一起已经一周了。在那之前，他们都是在纽迪尔歌舞厅见面。他在那里流连忘返，从未主动开口或是承认他其实都是为她而去。之后，就是在床上，冷冰冰地，高效地，他们相互利用，缓慢地，淫荡地。安图内斯总是睡至午后才醒，然后下楼，走到街上。那从百叶窗透进的冷涩刺眼的光芒，早已被他遗忘。直到有一天早上，在毫无任何预兆的情况下，莱瑞突然赤身裸体地站在房间中央，仿佛是在自言自语，求他不要离开。安图内斯大笑起来，问道：“为了什么呢？”他说：“让我留下来？这样一个枯燥无味的、日渐苍老的男人。”为了什么呢？他也曾对她说过，但那一刻，他下定决心，因为就在那一瞬间，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已陷入一场无法阻挡的沦陷，意识到那被他称之为命中注定的失败的迹象。自那之后，他就待在那个房间里，什么也不做，只是从狭小的铁质阳台探身遥望比亚蒙特街的下坡，等待着她的到来，望着她，从清晨的薄雾中蹒跚走来。他已经习惯了她进门的方式：带着应付完那些给她买酒的男人后的满身疲惫，伴着酒后的兴奋和眩晕，她把钱放在床头柜上。他也已经习惯了这个约定，习惯了从不谈钱。这是个充满爱意的、心照不宣的约定，他们都心知肚明：他保护她，让她免受那些突然产生的对死亡或发疯的恐惧感，而她则以这种方式支付他所提供的服务。

“这场游戏快结束了，于她于我，都快结束了。”他走到走廊拐角处时想。在打开房门前的那一刻，他知道她已经走了，一切都将不可挽回地失去。他未能预料到的是，在门的那头，他将遇到的是不幸与遗憾，他将看到种种死亡的迹象：抽屉全都敞开着，柜子里空空荡荡的，莱瑞的那些瓶瓶罐罐和香水脂粉洒落一地。衣柜的镜子上用口红写着离别或再见的话，像是她在离开前给他通风报信。

他来了阿尔马达来了他来找我要把我带走我们的事情他都知道了他到歌舞厅来了他就是一只臭虫就是垃圾哦上帝啊你快走吧我求求你了你快逃命吧胡安他下午来找我了他就像一只老鼠忘了我吧求求你忘了我吧就当我莱瑞从来没有在你的生命里出现过不管怎样你千万别找我因为他会杀了你的。

安图内斯读着那些字句，颤抖的字迹如同一张斑驳的网，覆在他映在镜中的脸上。

二

埃米利奥·伦西对语言学非常感兴趣，却只能在《世界报》靠写介绍图书的“豆腐块”讨生活。他在大学里花了五年时间主修特鲁别茨柯依的音位学，最后却落得这么一份差事：写关于惨淡的阿根廷文学现状的书评，每篇不过半页纸。怪不得他神情忧郁，寡言少语，常陷沉思，像极了罗伯特·阿尔特笔下的人物。

那天下午，报社接到莱瑞被害的消息时，负责报道犯罪新闻的家伙刚好病了，于是，老路纳决定派伦西前去核查情况。路纳心想，让伦西去掺和这个廉价妓女和皮条客的故事再合适不过了。那女人是在纽迪尔歌舞厅的拐角处被发现的，身中数刀而亡。唯一的目击者是一个半疯半傻的乞丐，自称安赫莉卡·埃切瓦内。她当时搂着尸体，像抱着娃娃般轻轻晃动，嘴里反复念叨着一个乱七八糟的故事。当天上午，警察就逮捕了胡安·安图内斯，就是和陪酒女同居的那家伙。案子看来已经结了。

“你看能不能再编点儿什么有用的东西。”老路纳对伦西说，“你快去吧，去分局，他们六点就能让记者进了。”

在警察分局，伦西只见到一位记者，一个叫什么里纳尔迪的家伙，《新闻报》负责犯罪新闻的。那家伙身材高大，皮肤犹如多孔的海绵，活脱脱刚从水里冒出来的样子。他们被领进一个涂成淡蓝色的小房间，看上去就像影厅：四盏灯用强光照着一个木台子。一个男人被带了进来，他用戴着手铐的双手挡脸，一副不服管教的样子。现场旋即挤满了摄影师，从各个角度对他抓拍。那家伙就像漂浮在云雾之中。他放下双手，看着伦西，目光柔和。

“不是我干的！”他说，“是‘胖子’阿尔马达干的，但上头有人护着他。”

伦西感到浑身不自在，因为他觉得那家伙是在冲着他说话，是在向他求助。

“肯定就是这家伙干的。”那人被带走时里纳尔迪说道，“我能在百米外就嗅到犯罪分子的味道。他们都长着同一副嘴脸，就像那些胡乱撒尿的猫。他们都说不是他干的，一派胡言像在做梦。”

“我觉得他说的是真话。”

“他们个个说得都像是真话。”

女疯子在那边。那老太婆走进来，盯着灯看，晃晃悠悠地走在木台子上，像是绑着脚走路。她一开口，伦西就按下录音机。

“我看过了我都看见了就像看见我身体里的一切那些神经节内脏心脏啊属于曾经属于将要属于胡安·巴蒂斯塔·巴伊罗雷托的心啊那个骑士啊那个男人我对他说走开从这里滚开坏人一肚子坏水看呐他想把我的皮肤一片片割下来做成里衬薄纱的花边衣服编起阿娜依的发丝呀吉普赛人玛卡蕾娜，啊玛卡蕾娜你个可怜鬼你个没心没肺的那手上亮闪闪的一块燧石我嗑药我发誓你再过来我就嗑药有罪之人啊疯女人啊嫉妒

发狂千罪万罪我都已经洗清我是一个圣女埃切瓦内·安赫莉卡·伊内丝大家都叫我阿娜依希特勒说要把恩特雷里奥斯人斩尽杀绝他说得很有道理我是女巫我是吉普赛人我是女王我编织着纱巾要盖住那手上亮闪闪的一块燧石，亮光一闪她死了你为什么取下面具小小的面具他看见我了或者没看见我他和那人说着什么钱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在门廊那儿阿娜依曾是吉普赛人是女王是埃薇塔·庇隆的朋友炼狱在哪里啊如果它不在拉努斯市那会在哪里呢他们给圣女带上面具装入那个机器带到那里去了他们用薄纱蝴蝶结遮住她的脸我用的是白纱因为纯洁无瑕。”

“就像在模仿《麦克白》。”里纳尔迪真是博学多才，他低声说道，“您有印象吧？就是那个疯子讲述的毫无意义的故事。”

“那是白痴讲述的，不是疯子。”伦西纠正道，“是一个白痴讲的故事，但谁说那毫无意义呢？”

那女人面朝灯光，接着说道：

“为什么说我背信弃义你知道为什么吗让我来告诉您是因为那个男人爱着我啊这世界上最英俊的男人胡安·巴蒂斯塔·巴伊罗雷托就是那个骑士他的披风鼓起就像一个气球一个胖乎乎的气球黄色的灯光下你别过来我求你了你别过来你别用剑碰我就是因为那灯光啊我看过了我全都看见了就像看见我身体里的一切那些神经节内脏心脏啊属于曾经属于将要属于。”

“她又开始了。”里纳尔迪说。

“应该是想努力让人听懂吧。”

“谁？她吗？您没瞧见她都疯成啥样了啊！”他边说边起身，“走吗？”

“不走，我再待会儿。”

“喂，老兄。从他们找到她开始，她就一直在重复说着同样的话。您没注意到吗？”

“这就是为什么，”伦西边说边检查录音机的磁带，“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听她说话，就因为她一直在重复同样的话。”

三小时后，埃米利奥·伦西将一份记录摊开在老路纳盛产惊喜的书桌上。那是一份关于女疯子独自的逐字逐句的记录，上面用不同颜色的铅笔划来划去，布满各种标记和数字。

“我有证据表明安图内斯没有杀人，是另一个人干的，就是他提到的一个家伙，叫什么阿尔马达，‘胖子’阿尔马达。”

“你说什么？”路纳不无讽刺地说道，“这么说来，安图内斯说是阿尔马达干的，你就信啊！”

“不是。是女疯子说的。那疯女人一直在重复相同的内容，已经念叨了十个钟头了。不过，正是她一直在重复相同的内容，所以才能听懂她想说什么。语言学里，有一系列规则可以用来分析精神疾病患者的语言。”

“小子，你告诉我，”路纳慢吞吞地说道，“你是在耍我吗？”

“请等一下，麻烦给我一分钟时间解释。在患谵妄症的情况下，疯子会重复，或者说，疯子会不受控制地去重复某些固定的语言结构，就像一个模具，您知道吧，就像一个可以用词语不断填充的模具。共有三十六种语言类别可以用来分析这种语言结构，它们被称为逻辑运算符号。就好比一幅地图，您把它们一个个置于所说的内容上，就能发现谵妄之言其实是有序的，其实是在重复那些公式。而与这一秩序格格不入的、无法被归类的、多出来的那部分，也就是所谓的废话，其实就是新的内容。也就是说，是疯子试图表达的内容，尽管他会不受控制地不停重复。我用这种方法分析了那女人的疯言疯语。您看一下，就能发现她一直在重复一些固定的内容，但与此同时，有一些句子和短语无法归类，游离于固定的语言结构之外。我都已经弄好了，我已经把那些短语都剥离出来了，那么，出来的是什么呢？”伦西扬起脸看着路纳，说：“您知道是什么吗？得到的是这样一个句子：男人在门廊那儿等她，他没看见我，他跟她谈钱，那手上亮光一闪就把她弄死了。这下您发现了吧？”伦西感到大功告成，激动地说道：“凶手就是‘胖子’阿尔马达。”

老路纳看着他，错愕不已，然后俯身看那份记录。

“瞧，”伦西接着说，“您注意看，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就是用红色标记出来的这部分，都是她在那些她不受控制地重复的那些内容的间隙中说的。她不停重复的内容就是巴伊罗雷托、圣母的故事，那些疯话。如果您看一下不同的版本，就会发现唯一改变位置的词语正是她试图讲述的内容，也就是她看到的一切。”

“行啊，这很棒啊！这玩意儿都是你在大学里学到的？”

“您别开我玩笑了。”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我是说正经的。那接下来你准备拿这些材料做什么？写论文吗？”

“什么叫接下准备做什么？我们准备发在报纸上啊。”

老路纳笑着说，仿佛带着一丝痛苦。

“冷静点儿，小子。难不成你觉得咱们报纸是专门研究语言学的吗？”

“必须要发啊！您不觉得吗？这样安图内斯的律师就可以拿这说事了。难道您看不出那家伙是无辜的吗？”

“你给我听好了，那家伙肯定完蛋了，他没有律师，他就是个皮条客，他杀了她，那些疯女人的下场不都是这样嘛。你这些语言游戏我觉得的确很棒，但咱就到此为止。你弄个五十来行的稿子，写写那小妞是如何身中数刀毙命的就行了。”

“路纳先生，”伦西说道，“那家伙可是余生都得在牢里度过啊！”

“这我当然知道。但我做这行已经三十年了，深知一个道理：绝对不能和警察对着干。如果他们告诉你你是圣母玛利亚杀了人，那你就老老实实写是圣母玛利亚杀了人。”

“行。”伦西一边收拾那些纸张一边说，“既然这样，那就我把材料交给法官吧。”

“你说，你是想自毁前程是吧？用一个女疯子当证人去拯救一个皮条客？你干嘛要插手这儿？”路纳的脸上闪耀着一丝甜蜜的安宁，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平静。“听着，你休一天假，去电影院，或者你想干嘛就干嘛，但你别去惹什么麻烦。你要是惹了警察，我就把你从报社轰走。”

伦西在打字机前坐下，放入一张白纸。他准备写辞职信，还准备给法官写一封信。

透过窗户，城市的灯光恍若茫茫暗夜中的裂缝。他点了一支烟，心境平和，想着阿尔马达，想着莱瑞，耳边是女疯子在念叨巴伊罗雷托。随后，他低下头，不假思索地写了起来，仿佛有人在对他口述：

膀大腰圆，肥硕无比，神情黯淡，一件青绿色的西装在他身上晃荡。——伦西写道——阿尔马达走了出来，带着一股神秘的亢奋，竭力想掩盖内心的低落。



里卡多·皮格利亚

阿根廷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学者，当代西班牙语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皮格利亚的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人工呼吸》《烈焰焚币》

《艾达之路》等，短篇小说集《入侵》，此外还有散文、评论、剧本等大量作品。他曾在阿根廷多家出版社工作，主编犯罪小说丛书。2017年1月，皮格利亚因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渐冻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

译者：楼宇

英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拉美文学和中拉人文交流史，译有里卡多·皮格利亚小说《人工呼吸》、出版专著《里卡多·皮格利亚侦探小说研究》等。

《女疯子与犯罪故事》(La loca y el relato del crimen)，Copyright ©Ricardo Piglia 1975,1994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Estate of Ricardo Piglia c/o Casanovas & Lynch Literary Agenc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Grayhawk Agency.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Wikimedia

小说

欲望之宴

艾谢·帕帕提亚·布贾克 | 故事群岛

蕴于她体内的是一处无限空间，
可以容纳万事万物，包括她所失去的

那是个自动机不断涌现的时代，已有人造出黄铜飞蝇、机械老虎、八足大象、吃下谷粒排出粪球的鸭子。还有舞女与吹小号的人。一座莫斯科微缩模型毁于大火又再度出现。

很久很久以前，虚实交织之际*，
在那个魔术神秘莫测、科学确凿无误的年代，
在那个上帝之手可以操控人类之傀儡，
人们相信所见奇迹、以为机关奥秘一览无余的年代，
那时下象棋的机械人，“奥斯曼土耳其人”现世。

1827 年，费城

土耳其人箱外是舞台、观众，以及观众中某位被主持人梅尔策尔花言巧语哄上台的对弈棋手。土耳其人的箱子里烛光昏暗，烛烟袅袅，其消散速度快不过燃烧速度，箱子里还有 S. 用来操纵自动机动作的磁铁与机关，以及让他得以掌控全局的小棋盘。外界种种谜团、惊叹与猜想甚嚣尘上，唯他一人免于纷扰，一个不必考虑机械如何下棋的人——因为有个男人藏身其中，就是他。他是土耳其人搏动的心脏，是土耳其人的大脑。土耳其人的棋艺源自他，行棋傀儡所下的第一步棋，与他人对弈时的反应，多次胜利与少数失利，都应当记在他头上。然而。

箱子之外，土耳其人是一位冠军。箱子之内，只有棋子的无数步，主持人梅尔策尔打开一扇扇箱门向观众证明其内无人时，S. 也前后左右滑动自己的机械座椅，移动棋子与之相比不见得复杂到哪里去。梅尔策尔堪称证伪之大师。

如此也止不住谣言纷纷。传说箱子里藏了个男孩，或侏儒，或没有腿的男人。有些人甚至猜到了真相，提及 S. 之名。但前来观看表演的人群还是一拨接一拨。人们不愿放弃感受惊奇的好机会。

她上台那天，他们一伙儿已在费城表演了一个月，而那是当晚最后一盘棋。“这台上从没来过女人，梅尔策尔向众人宣布；总算有位女士来挑战了。她能打败土耳其人吗？她能吗？”

在巴黎的咖啡馆，S. 有时会同女人对弈；偶尔她们同他调情，但这种情况不常有。他的外表不讨女人喜欢，举止亦然。这无关紧要：棋盘上他来者不拒。

扮演大师的日子已成过去。

“您怎么称呼，女士？”梅尔策尔问道，但 S. 没听见她的回答。

她惊讶地登上舞台。她本无意参赛。是孩子们撺掇她，她想。他俩一起，盼望着，

以那最初驱使她带孩子们前来观看演出的同一种力量，这是几人近期头一回出门社交，在她的丈夫、他们的父亲托马斯八个月前失踪（死亡，她对自己强调）之后。人们窃窃私语：他外头有人了，他背地里欠了钱，他突然发疯了。但她不相信他们。抛出一个谜团，众人，她发现，就会强行编造狗血离奇的故事安在最不可能的人身上。托马斯是个贵格会教徒，是名教师，一位改革者，一个出身名门之人；可现在大伙儿不怎么愿意相信他真正的为人。但她不在乎外人想要相信什么。她为信仰投入了那么多时间，为团结教众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她意识到这一点时震惊不已——如今她不在乎是否还会再见到他们中任何一人。她转而不遗余力接受那个最符合逻辑的真相：即她永远都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且托马斯再也不会回来了。每天她都必须如此说服自己，否则她便会虚掷光阴等待他归来。

她最初看向土耳其人时不过短短一瞥。待多看几眼后，她想笑——笑他的身高，他镶毛边的长袍，他可笑的头巾。要在台上与一个特大号玩具下象棋，这场景着实滑稽——但她发觉自己为他感到难过。他那双漆黑的下垂眼，当然，是画上去的，让她联想到一个被迫参加化妆舞会的正经人。他很难过，她想，这念头来得迅速，她来不及驱散。他令她想到一些场合里的托马斯，被迫与他人交际，而她是那个安慰托马斯、跟他说等下就能回家了的人。

她落座，理了理裙子，看着面前形状熟悉的象牙棋子。她朝观众席望去，试图找到自己的孩子们，但目之所及遍是黑暗与阴影。

小托马斯十四岁，玛格丽特十一岁，但这几个月来他们俩形影不离。用餐时两个孩子看着餐桌对面的彼此，拒绝再吃肉，假装——是的，假装，她确定——他们可以不通过言语进行交流。两人长时间在外漫步，迫使她在他们愿意开口作答之前忍受那漫长的沉默。母子三人现在都住在她父亲家里；她睡自己小时候的卧房，这让她感受到了一种古怪的慰藉，而孩子们住在两间相连的屋子里，中间隔着一扇门。夜里她能听见两人隔着门说话，尽管她努力分辨，还是无法听清两人对话内容。白天他们总将自己关在这间或那间屋里，尽管她常常就站在门外，因室内如此安静，她竟觉得自己不得入内，即使敲敲门也不行。

有时，她想过将小托马斯送去上学。

或许她是嫉妒了。孩子们拥有彼此的陪伴。

但她是他们的母亲；她会这样想也是出于对孩子的爱。

她自己已不再参加宗教聚会，不再拜访任何人，几乎也没人来看望她；她拒绝了所有布道活动的邀请，取消了所有定好的行程。或许孩子的异常不过反映了她本身的异常。她似乎既无法从过去的生活中抽身前行，也无法决定该如何开展新生活。

“第一步棋女士先走。”梅尔策尔道，虽她晓得这并非土耳其人的习惯。这是因为自己的性别，她猜，但她并未提出质疑。

教孩子们下象棋的是托马斯，在他失踪（死亡，她对自己强调）之后是她父亲教她下棋，那时她带着孩子搬到自己父亲家中，事态明了，托马斯不会回来了，她需要一个遮风挡雨之处、也需要一份工作，而她父亲，如此和蔼，为她提供了一切。如今他们一家四口征战于漫长的巡回赛间，唯有如此她才能将孩子带在身边。

过去，她以为自己是个好妈妈。

她研究棋子，想象眼前的棋局。她特别想赢。为了孩子们，她想，那样他们会为她感到骄傲。她应该发现这样并不正常，她明白，好比如此奢求，甚至站上这个舞台，但现在也很难相信这是受了上帝的感召。

她尴尬地发现自己从棋盘上抬手时颤抖了，不过谢天谢地，只有站得近的梅尔策尔可能注意到。她抬眼看了看梅尔策尔，后者微笑着。

“别担心，女士，他可从来不咬人。”他大声宣布，而观众哄堂大笑起来。

近来她总被旁人激怒。她一再希望自己能有风度一些，却发现连每天保持宽容都很难。只有父亲还对她很有耐心。

悲恸竟给她带来了这么大改变，她很是惊讶。

她深吸一口气。下了第一步棋。等待土耳其人移动他的棋子。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坐拥七山、三海、四百喷泉的奥斯曼城市，那座城市里又有一座欲望得到了满足的城市。而在那第二座城市之中有处被林生郁金香花园包围的风月场，花园地里埋着一排排飞跃围墙的箭矢，箭矢由一群为爱痴狂的男人张弓射出。东边有个河谷，从前曾是荒野，被他们的眼泪所淹没。

土耳其人知晓世上有种能令玫瑰绽放的欲望。

至少，从前世上曾有过。

每一晚，至此刻，S. 曲着身体，肩膀往前拢，腿向上折起。他手执棋子，眼睛追踪着磁铁与棋子动向，心思系于一点，注意力高度集中。

他想过外出旅行。但反之他却藏身于一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空间内，不得谈论自己的工作，同伴唯有梅尔策尔及行棋傀儡。拥有无限选择时，他只想下象棋，但如今当象棋成了唯一的选择，他渴望其余所有。失去选择的痛苦对他而言甚于一切。每晚他都觉得她自己会辞去这份工作。

是那种闷热，那烛烟，那无穷无尽的棋局；它们在他体内，就像他在土耳其人箱中，且它们如他一般困于方寸之间，想要自由。

他移动棋子，在他之上，土耳其人做出了反应。

有种叫“洛多斯”的风，从南边吹来，逆转了三片海域的洋流。城中一些居民痴迷于“洛多斯”，他们认为“洛多斯”令自己发了疯。以疯狂为借口，他们直白地对所爱倾诉所想，但正因他们是众人眼中的疯子，他们的话也无人相信。

土耳其人知道疯狂的语言与其他语言并无区别，包括爱的语言。

他知道从前奥斯曼人如此通晓爱，他们只用诗歌交流。

她是个快棋手。先前上课时她记住了整盘棋，速度之快令孩子们也感到兴奋不已。自托马斯失踪（死亡，她对自己强调）后，她不止一次发现自己先前未曾察觉的一面，

且并不全是糟糕的。她知道自己不该骄傲，不该把棋局看得那样重。但她也知道，如今，下棋是她仅有的享受，而她若不找点乐子，若没有找到办法同孩子们待在一起，她将一无所有。

她同土耳其人兑了一子又一子，过了一招又一招。她终于全神贯注，不再分心去想孩子、丈夫，或对面那个神奇的机器。

起初对弈有一定节奏，S. 明白自己能撑过这一晚，便松了一口气。他先前认为她会慢下来，而她的专注将致他分心。但随后她出棋很快，他发现自己回应的速度甚至更快，仿佛这是场赛跑，他追着她前进，越来越快，而她兴许也在对他步步紧逼，又或者还有其他压力，因为一段时间以后，他犯了个错误。

S. 是一位大师；他无法相信自己做了什么。是他下的棋吗？他抬起手，对着烛光检视。

他的呼吸暂停了一瞬，复又急促起来。
S. 之外是下一步棋，拿起磁铁，齿轮转动，将 S. 的动作传输至土耳其人手边；S. 体内则有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即他的自我之内寄居了另一重自我。S. 翻动手掌，掌心朝上，想象在他之上的土耳其人，也如自己一般翻动手掌，掌心朝上。S. 举着手，一动不动，他感受到了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催促着自己去动它。他感受到了土耳其人的渴望。我被控制了，他想。愿上帝助我，我被控制了。那种感觉在他体内不断生长，一个正在入侵的征服者，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土耳其人。

她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她不由自主地抬眼看着土耳其人彩绘的双眸，当然什么也看不出来。她扫视观众，可他们看不清，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连梅尔策尔——他时不时在台上踱步，一会儿站在她身后一会儿摆弄箱子一侧的曲轴，仿佛正在调试机器——似乎也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

她激动不已，难以自持。

我会打败他，她心想。

在她对面，土耳其人久坐不动，仿佛陷入沉思。最后梅尔策尔宣布比赛暂停，明晚继续。“机器得休息了。”他口吻夸张，引得观众一阵爆笑。没人问她明晚是否会回来完赛，但当然，她会的。

梅尔策尔几乎看也没看她一眼，护着她下了台，随后她同人群一道离开剧院。与众人走在一起时，大家纷纷祝贺她。有些人微笑着，有些人盯着她，有些人似乎没明白她便是今晚娱乐大众之人，反倒盯着那些恭喜她的人们。“谢谢。”她一遍又一遍道谢，但塞满脑袋的念头是，明天，明天我会打败他。

孩子们在剧院前等她，一见着她，他们也格外激动。

“我们看到爸爸了。”他们异口同声说道，而她本就处于兴头上，感觉自己浑身一震。

“在这儿？”她问。

“当然。”小托马斯道，“你看不见他吗？”

她先看了看小托马斯，又看了看他妹妹。街上行人车马纷纷，但两个孩子根本没注意到。他们正处于狂喜之中。“这是什么意思？”她问道。

“他站在你身后。在台上。你感觉不到吗？”

“台上没人。”她说，“除了那个男人，梅尔策尔。”

“爸爸就在那儿。”玛格丽特说道，“我们看见他了。”

“那是我们盼望了好久的。”小托马斯说，“我们努力了好久的。一次显灵。”

“过来。”她说着，伸手抱紧两个孩子，如此迅速，孩子们过于惊讶以致没能避开，“我们回家去。”

“到了家你们得挨点教训。”她边说边拉着孩子走在街上，“我们不该相信这些。”她说，即便在说话同时，她听到了托马斯的声音：“我们不能告诉他们应该思考什么。我们只能教他们如何去思考。”

仿佛孩子们终究用巫术召唤出了他。

“他害我要输棋了。”S. 坚持道，而梅尔策尔看着 S.，又是好笑又有些担心。

“或许我们应该取消明晚的表演。”梅尔策尔说，“你看起来不太对劲。”

“他控制了比赛。我没法按自己的思路下棋。”

“现在去休息。明早你就感觉不一样了。或者让乔治代替你下棋也行。”

S. 伸出颤抖的手指着梅尔策尔。“别把我换下去。”他怒吼道。

过了会儿，他冷静多了：“我不会因为她是个女人就让她赢的。不管她有多美。”

“她长得非常普通。”梅尔策尔直言，“而且没人暗示你故意让着她。下你的棋去！”他怒气冲冲道。

S. 视线低垂。

“她棋艺不错，不是吗？”梅尔策尔说，“这才是你这么烦躁的原因，不是吗？”

“他爱上她了。”S. 说着转身离开，可他动作不够快，依然听到了梅尔策尔尖刻的笑声。

“你可能开始分不清自己和机器了。”梅尔策尔大喊，但 S. 离开前扭头干脆利落应道，“我没有。”

“箱子里肯定有人。”她提及土耳其人的失误后，父亲说道。他们在楼下，壁炉边，孩子们在楼上。她思考该怎么做时把他们忘到了脑后。

“您的根据是？”她问。

“因为人才会犯错。人和神不一样，也不是机器。”

“机器也会犯错。”

“机器只会坏掉。它们不犯错。”

父亲是对的，她意识到。这是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她父亲同两个孩子经常绞尽脑汁研究自动机的奥秘，她父亲认为这就是机械的精妙，孩子们则认为这出自上帝之手。而她本人，每每被迫选择一方支持时，往往只说，“这是个未解之谜。”这已成为一个她愿意与之相伴的谜。

“您会觉得失望吗？”她问。

“可能有一些吧。”她父亲承认，“但就算如此，想想一个人竟然能发明出这种东西来……这太了不起了。”

“我该告诉孩子们吗？”她问，但父亲耸耸肩。

“或许他们没必要知道这个。”他说。

“他们觉得自己看到托马斯了。在剧院里。”

她父亲猛地一颤，接着立刻试图掩饰自己受了惊。

一度，她觉得自己不会结婚了：母亲走得早，而她父亲，她想，步入老年后需要有人照顾。但鼓励她嫁给托马斯的恰恰是父亲，托马斯是他书店的雇员；她出远门布道时，也正是父亲帮托马斯一起带孩子，她往往一走就是几周。翁婿二人想必拥有许多她根本不了解的共同回忆。但这几个月来，父亲以她为重，压抑了自己的悲伤。“或许他们看到了和托马斯长相相似的人？”她父亲说，“即使是我，有好几次，看到长得像的人也吓了一跳。”

“他们相信自己看到他在台上。孩子们管这叫显灵。他们觉得自己召唤了他。”

“我不能告诉他们应该相信什么。”她说，“但我不允许他们撒谎。”

“他们还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伤中。”

“我也是。”她恼火道。接着又悄声说：“您也是。”

她父亲身子前倾，似有话要说，随即又往后靠，默默无言。

“怎么？”她问。

“我不知该不该告诉你这个。本来决定不说了，但现在我觉得我错了。”

她等着他开口。

“他们找到一具尸体。好几个月前的事了。那尸体面目全非，我没法确定，所以没跟你提。”

“您真仁慈。”她说着，口吻不带一丝感动，“替我承受了那么多。”

“他戴着托马斯的怀表和戒指。”她父亲顿了顿，“但我不能就靠他的随身物品而不是长相来辨认他。”

“噢。”她说。她很惊讶地意识到这的确很重要。这么久以来一直有一具尸体。托马斯是真的死了。她努力止住泪痕，却办不到。“对不起。”她说，“您真仁慈。”

“我知道这很荒谬。”她父亲说道，“但我就一直想，如果他能说话就好了，那样我就能确定究竟是不是他了。”

“没事的，父亲。”她说，“我明白。”

“对不起，还有些事我没告诉你。”她父亲道，然后他待她平复了情绪后才开口，“他被发现时才死了没几天。”

一时间，她几乎无法理解父亲在说什么，接着她反应过来。“他去世前失踪了多久？”她问。

“至少有一个月。”

“噢。”她再度开口，这回她没掉眼泪。“噢。”她重复道。

她母亲因黄热病去世后，父亲从未再婚，虽他当然可以重组家庭。他如此疼爱她。看到那样的场景他得有多难过啊。

“那具尸体后来怎么样了？”她尽可能轻声问道。

“我把他葬在我的墓地里了。”她父亲说着，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她猛地伏倒在父亲脚边，脸颊贴着他的膝盖。

“我很感激您。”她一遍又一遍重复道，“我真的感激不尽。”她泪流满面，想到某天父亲也会离自己而去，而自己的前路似乎仅剩一程接一程的悲恸。

小时候他们总待在一起，她和托马斯。然后那一天来临，九岁的她沐浴于内在灵光之中，聆听了上帝的话语。（真的吗？至今她仍无法确定。）那次集会上的每个人，包括托马斯，都见证了此事，之后，她与母亲一道参加一个又一个布道活动，成了那个如此年幼便得到上帝注意的孩子，直至某日母亲过世，而她独自一人继续布道，彼时她年方十四。

她自己并不记得那一瞬——甚至不记得如何栽倒在地，被父亲抱起。她所能回想起最接近那一刻的记忆是次日上午她在父母床上醒来，此前她从未睡过这张床。她一个人，时间接近中午。平日里她负责的家务活儿，虽不多，但也都由他代劳。她做完了——餐盘已洗好，卧室已清扫。通常人们会如此体贴病患，于是她躺在父母床上，惴惴不安，直到许久后母亲来寻她，告诉她下次布道她将与自己同行。“你受到感召了，就像我一样，不过你受感召的年龄要比我小得多。”她母亲说道。这便是有且仅有的一关于她人生事业的讨论了，此后她奔走于贵格会集会之间，证明上帝的存在，但她更经常静静地坐在一旁，怀疑上帝是否真的在自己身上降临过，如果是真的，为何他不让自己记得那一切。

多年后，她与托马斯再度相遇，托马斯来她父亲的书店工作，他就在那儿开始执教，他告诉了她自己对那件事的记忆。“你涨红了脸，像块烧热的砖头，然后你倒在地上，颤抖着。还有你的表情，那真是……我没法形容。”他说，“你就是个活生生的天使。每个人都这么说。”

现在看来这一切对她而言多么陌生。长久以来她一直相信自己是特殊的，直到托马斯消失的那一刻，她才发现一切有多荒谬——多么没有意义。

她想念他。看来，她所依赖的是托马斯的信仰；托马斯不在了，她的信仰也就消失了。特殊的人是托马斯——她始终明白这点：她从他身上、从他对孩子们的教导中学到了那么多。他对上帝之言的渴求，对内在灵光的渴求，这些他从未得到，而那种渴求让他变得更强了，她明白。如果她还能向他学习，该有多好啊。

她温声告诉孩子们：他们父亲确实已经死了，明天他们将去拜访他的墓地。

玛格丽特率先反应。“但他本来就死了呀。”她说，“所以我们才能跟他说话。”

“你觉得他还活着吗？”小托马斯关切地问道，仿佛他还是八个月前那个小小绅士。

原来，孩子们一直在研究死亡、转世、灵魂方面的书籍，他们想方设法把书顺出书店，还在这间屋子里自己举办降神会。

她想把孩子们塞回床上，自己也上床休息，但当他们提出为她办一场降神会时，她并未制止。两人为她演示时开心极了，尤其是小托马斯。看来，能同她和平共处，他们也松了一口气。孩子们在地上清出一片区域，三人都坐下来。玛格丽特点燃一只蜡烛，小托马斯从口袋中抽出一条沾了墨迹的手帕，一支笔，以及一张对折、有父亲字迹的纸。

她觉得自己体内有股冲动，想一把夺过这些东西，藏起来，偷偷印上自己的双唇，但她其实拥有许多托马斯的遗物，没有任何一样真能让她感到安慰。

离开人世前那个月他去了哪里？她如何能将这关于他的全新想象——游荡、挨打、腐烂——从自己心中抹去？

小托马斯碰到她的那一刻，她吓了一跳，差点大喊出声，他说：“握着我的手，母亲。”“你不用害怕，”玛格丽特说着，牵起她另一只手，“我们只召喚友好的灵魂。”发现是玛格丽特主导降神会时，她再度感到惊讶，玛格丽特大喊：“到来世去。”

“玛格丽特更擅长导灵。”她望着小托马斯，后者悄声细语道。

玛格丽特再度开口说话时，声音不对劲起来，低沉而荒谬。

她意识到自己刚才希望听到托马斯的声音，顿感难堪。

“你是谁？”小托马斯问，接着玛格丽特回道，“我是死灵守护者。”

她认出这个称谓源自玛格丽特钟爱的某个故事。孩子在演戏，她心想。

“你见到父亲了吗？”小托马斯问，“他还好吗？”

“是的，”玛格丽特道，“非常好。看见你，他开心极了。看见你过得不错，他可高兴了。”

“你会告诉他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吗？”小托马斯问道，他的声音颤抖着。

“当然。”她妹妹以假声应道。

她瞪着玛格丽特，小姑娘看了看她，转而望向小托马斯，后者闭着眼睛，面上含着一抹幸福的微笑。女儿转头对着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至此，她明白了。玛格丽特不是在玩游戏，而是在用最有效的方式安慰自己的兄长。

一个成为同谋的好机会近在眼前，她意识到。然而她一把抽出手来。“别演了，”她说，“你在耍他。”她对玛格丽特说，后者盯着她，目瞪口呆。“而你由着她耍。”她对小托马斯说，男孩现在绷着脸。怒火重燃。

“她还没做好准备相信这一切，”玛格丽特对小托马斯说，“别听她的——她只是没做好准备。”

小托马斯点点头，两个孩子沉默地将地上的物件收好。仿佛他们可怜她。

她怎能这么做？

他们是很有同情心的孩子。他们为几年前死于孤儿院大火的孤儿感到心神不宁。近来被绑架、据信被卖到南方的有色人种男孩也叫他们担忧不已。她知道，他们身上有托马斯的影子。

“抱歉，”她说，“你说得对，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小托马斯正将有父亲字迹的那张纸叠好，她从他手上取了过来。

她看着那张纸，孩子们就站在一旁等着，脑袋低垂。

“这是你们从哪儿找来的？”

她看了看其中一个孩子，再转向另一个，但两人都不肯与她对视。

“这是你们父亲日记上的一页，不是吗？”

很久以前，托马斯曾请求她让自己保有一项隐私，即不要看任何他并未邀请她阅读的东西，而她发誓自己不会这样做。可他就那么失踪了，但两天前她去找过他的日记，却发现它们从书架上消失了。

“我们没看上面写了什么，”小托马斯说，“我们只是把最后一页撕下来了。那是他最后写下的东西。”然后他哭了起来，小玛格丽特随即将兄长搂在自己小小的怀中。

她无法忍受自己身处这个圈子之外，于是她一把抱紧两个孩子，那一页纸仍攥在她手上。

待三人全都冷静下来，孩子们拿出先前藏起的日记给她，而她牵起每个孩子的手亲了亲，接着让他们都躺上床去。

“你们都知道我很想念你们父亲，”她站在两张床之间的门口说道，“你们知道对我来说，失去他几乎是无法承受的。但失去你们要糟糕得多。”

“我们还能办降神会吗？”小托马斯问道，等待回答时，两个孩子齐刷刷看着她。

怎么做才对？她太想安抚孩子们了。她特地看着玛格丽特，小女孩正以一副毫不掩饰的好奇表情打量自己的母亲。

“可以。”她终于开了口，孩子们开心地从床上蹦了起来，直奔她的怀抱。

过了会儿，她带着日记找到父亲，请他帮忙做一些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S. 整晚都想着她。不论清醒或入睡，他没法停下来不想她。他相信她迷惑了土耳其人，而土耳其人迷惑了自己。他知道这不可能，甚至也了解行棋傀儡的机械工作原理，然而，即便与自己的意志相悖，他还是如此坚信。夜里，他从被窝中伸出手来，反复翻转，想象土耳其人在某处做着同样的动作。你现在由我指挥，他想。他伸手往前探，感觉自己张开了手指，但他看到的却是土耳其人伸出手，触及她的脸颊，轻轻抚摸着。

在那座拥七山、三海、四百喷泉的城市里，流传着一个土耳其人希望自己能讲述的故事，一个爱的故事。

蕾拉是平民人家的美丽女儿，小时候，蕾拉遇见马杰农，有权有势的族长之子，他们总玩在一处，两家父母并未察觉，直到某天蕾拉的母亲发现他们总待在一起，并为两人年纪轻轻就感情如此深厚而忧愁。她送走了马杰农，意在快刀斩乱麻，让离别成为一种考验，但不久马杰农便开始在奇怪的时辰徘徊于蕾拉家门外，他不敲门，却盯着窗户往里瞧，爬上蕾拉家花园围墙，只为四下打量。他二度被送走，归返，接着又被送走，终于，有人告诉他永远别再来了。

他逃到荒野里，四处游荡。

那期间，马杰农的父亲请求蕾拉的父母，让两人共结连理，可蕾拉父母不愿将女儿

嫁給一个疯子。于是马杰农之父带他离开荒野接受救治，但就在得主佑助之际，马杰农祈求真主加深他的情意，然后他又一次逃到荒野里。马杰农的父亲再度找到他，带他回家，而马杰农又逃回荒野，那唯一一个广阔到足以容纳他爱情的地方。

蕾拉同样忠贞不渝。她足不出户，待在花园围墙里，吟唱马杰农创作的诗歌。

在荒野中，马杰农遇見一只乌鸦，他托乌鸦给自己的情人捎去爱意，而在花园中，蕾拉听到乌鸦吟唱马杰农的情歌。

在荒野中，马杰农听见风声，他托风儿给自己的情人捎去爱意，而蕾拉，在花园中，听到了风儿捎来的深情。

在荒野中，马杰农遇見一位老妪，他请老妪用绳索捆住自己，好让两人假扮乞丐——成为乞丐——以便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靠近蕾拉家。但当老妪照他请求的去做，且两人扮作乞丐踏入蕾拉家，一见所爱之人，马杰农便立即挣脱绳索，奔向荒野，那庇护了他爱情的地方。

后来蕾拉另嫁他人，但除了看着她以外，她不允许丈夫对自己行使任何权利。

马杰农之父去世时，其坟墓洒满了马杰农的泪水。

马杰农之母去世时，其墓地长出了玫瑰。

蕾拉约马杰农在自家花园见面，但他拒绝让蕾拉看见自己，于是他们各自藏身，隔着一段小小的距离，马杰农为挚爱吟诵了一首他的情诗。

“马杰农。”蕾拉说。

但马杰农不唤她的名字。

“你的名字在我身体里，”他道，“就像果皮里的果实。它在这里被小心呵护着。”

蕾拉的丈夫去世了，守丧期满后，她又一次约马杰农见面。马杰农走进她屋里，头一次，两人拥抱了彼此，但马杰农再度逃往荒野，他冲身后大喊，说自己把她带在了身边。他对她的爱生长得如此庞大，只能寄寓于万事万物之中。

最终，蕾拉病重逝世，而马杰农死于蕾拉墓边。

但许多人都梦想着蕾拉与马杰农在天国相聚。

土耳其人知道人人心中都有一道黑暗的光与一份永无止境的爱。他多希望自己能将这些告诉她。

第二天晚上比赛继续，如今她深信对手藏在某处，鉴于此人肉眼不可见，她便盯着土耳其人。她直视他的下垂眼，想看得他抬起头来。她相信自己正以某种方式挑战那个操纵者。（他真在里面吗？）她相信这人可以透过土耳其人的眼睛往外看，但就在凝视着土耳其人时，她先是强烈感到不安，稍后又觉得熟悉。就是她待在一间屋子里，听见托马斯在另一间屋里时，那种感觉。

她浑身发颤，感到一阵气息由体内升腾而起，片刻的欲望。

托马斯，她心想，她看向两侧，只有梅尔策尔回看了她一眼。托马斯？然后，她仿佛感受到他从自己对面的行棋傀儡身上显现了出来。

我一直在和托马斯下棋吗？她想。

她怎么会幻想这种事？她可不是那种会这样想的人。可她的确这样想。

一定是因为孩子们。他们的故事影响了她。

夜晚才刚刚开始，S. 理当精力充沛，还没到乏力的时候，但他没能从前一晚那种感觉中缓过来。他浑身发热，再度感到异常兴奋；他的大脑飞速运转，几乎无法专注。他成了自己先前告诉学生不要成为的那种人：注意力不集中，行棋仓促草率，过于渴望胜利。

或许 S. 还能回到巴黎，过上之前未曾选择的生活。若他曝光梅尔策尔所做所为，那新闻会立刻轰动天下。他将闻名世界，作为一位技艺精湛的大师得到众人认可，一个击败了诸多棋才之人，然而，他也将被视为骗子，一个冒牌货。人们或许会提及金钱交易，但钱财从来不是他考虑的重点。如果他能对某个人说出这一切就好了。可他对人们的鄙视与日俱增，到了这般地步，他看不起他们被愚弄还如此安之若素的模样。

她会击败他；她希望她知晓自己击败了一位大师。他也要告诉她，土耳其人希望她赢。但他如何能将两件事一并告知——即他是一位大师，土耳其人也是？他如何能同时相信这一切？

她发觉自己想笑。人死后就是这么回事吗，如此荒谬？永远藏身于一台机器里同所有上台之人对弈？看起来绝无可能。或许她父亲，那位狂热的象棋手，会乐于化作这样一种永恒的存在，但托马斯？不可能。但或许他想同她建立联系——或者同孩子们——而这是唯一的办法。又或者——思及此她又想笑——她在一步步丧失理智。失眠已经影响了她的神志。

可能她爱托马斯多过上帝，她意识到。或许，这就是对她的惩罚。她会失去托马斯，也失去信仰。

但若她就这么相信了呢？就这么声称以下想法正是事实：托马斯来看她了，还有他们的孩子，他这样做是出于爱与一种渴望，渴望与他们再会，渴望知道他们过得很好、捱过了丧亲之痛。

为何不就此接受这份安慰？

她只读了托马斯日记上撕下来的那一页。“我知道我听到了什么，但我也知道我不该听到它，”他这样写道，“我知道自己神志清醒，可我觉得自己好像不可能是清醒的。上帝终于对我说话了，然而他说的那些话。那些我现在知晓的事情。我就是故事里那人，对芦苇低声说，‘迈达斯国王长着驴耳朵。’”

她父亲读完了剩余部分，只说：“我觉得托马斯可能病了。”

“他掩饰得真好。”她说，然后她父亲点了点头。

“看起来完全不像。”她说。

然而，那并非不可能。

S. 浑身发热，陷入极度兴奋之中。他的手在颤抖。他觉得浑身上下再也没有哪儿是属于自己的。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更别提行动了。或许体内有另一个人在操纵着他，而在那人体内又另有一人操纵着那人，以此类推。

“停下。”他大声喝道，他确信观众能听到自己说话，但回应他的是一片寂静。

坐在椅子上和土耳其人对弈，他心生好奇，那会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坐在他对面，看着他出手抓住棋子，移动棋子。

他渴望知晓。

台下观众认为土耳其人是身体，而观众视线以外的某处藏着灵魂；但是，S. 心知肚明，他如今成了身体，土耳其人才是灵魂。或许他与土耳其人合二为一时为完整一人——可一旦分开，他便不再是这样一个人了。他无法再将自己拼凑完整。

如果人们相信土耳其人真有那么神奇，他们会烧死他，溺死他，摧毁他。人们只愿意相信某些他们明知并不真实的东西。一种简单的信仰。他们有把握的那种。如今 S. 再也没有把握了。

他最后看了一眼那小小的棋盘。他赢不了，除非她犯错，而她在过去几小时对弈从未出错。他往后靠，后脑勺抵着箱子内壁。他伸出拇指与食指掐灭蜡烛的小小火焰。他不会走下一步，甚至不会退出。梅尔策尔得把他拽出来。

或许她会是那个拯救他的人，拉他出来，让他的脑袋枕着她的腿，他会深深埋首于她的衣裙中，闭上双眼就那么躺着，不肯抬头凝望她。

他不该掐灭蜡烛；相反，他该用蜡烛点把火烧了土耳其人，让他化为灰烬。他希望自己可以被拆解、折叠，装入货箱，一如土耳其人平日里那般。

在巴黎，S. 的对手会看着他出手，追随他的目光。他曾多次盼望，自己能做一个隐形人。如今，在黑暗中，一种平静笼罩了他。他觉得自己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水。他快窒息了。他能感觉到她朝自己这边走过来，他无比想要对她伸出手、执起她的手，如此，她的体温便能渡到自己身上来。

这么久以来，没有爱，他是怎么走过来的？

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她心中已有打算，却在出手移动棋子前陷入了挣扎。

她想要看到某种迹象。某种证明。她想知道托马斯已经解脱了。

或许余生她需要习惯的并非托马斯的缺席，而是这种全新的存在。她看着土耳其人修长的手指往前探，移动一个个棋子。她想象自己执起他的手，用自己的手指温暖他的手指。或许她父亲是对的。箱子里有没有人、有没有什么东西根本不重要。她只要单纯惊叹于人类的发明创造就好了。

想到托马斯，她最想念的是他对自己说话的方式。他总能激发自己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那么兴许，她和孩子们也能互相鼓舞，互相激励。

她下了最后一步棋，赢得了比赛。人群欢呼着，室内某处她的孩子们蹦了起来，连梅尔策尔也来祝贺她，而行棋傀儡依旧垂头盯着棋盘，仿佛正在研究输掉棋局的原因。

土耳其人希望她明白的是，她并非蕾拉，被撇下的那个。她是马杰农。

蕴于她体内的是一种超越爱而去爱的能力。

蕴于她体内的直至这一刻为止的全部经历。

蕴于她体内的是一处无限空间，可以容纳万事万物，包括她所失去的。

他希望自己能让她明白，世上没有“她”，有的只是她体内的一切。

他多希望自己能告诉她。

* 此句原文为 "And once there was, and once there wasn't"，乃土耳其人讲述民间故事的常见开场白，可类比中文里的“很久很久以前”，但完整开场白的篇幅要长得多，因音节数、押韵等原因，读起来朗朗上口，近似绕口令，也像一个小故事，往往与下文要带出的故事并无关联，且语义古怪，充斥着奇妙狂想，给人以虚实、古今交织之感。小说作者艾谢·帕帕提亚·布贾克之父为土耳其人，她创作的许多短篇故事隐约可见土耳其文化烙印。篇名《欲望之宴》或与奥斯曼抒情诗有关，后者常常以宴会 (the Mejlis) 上一支表达了向往与欲望的歌谣形式呈现；这种载歌载舞、吟唱故事与情诗、亲朋好友齐聚花园的春夜之宴，是奥斯曼抒情诗中频频出现的核心场景。



艾谢·帕帕提亚·布贾克

土耳其裔美国作家，生于伊斯坦布尔，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目前任教于佛罗里达亚特兰大大学创意写作项目。2019 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特洛亚战争博物馆》，其中两个短篇小说分别获得欧·亨利奖和小推车奖。

译者：卓雨

《欲望之宴》(The Gathering of Desire)
选自艾谢·帕帕提亚·布贾克短篇小说集《特洛亚战争博物馆》。

Copyright © Ayşe Papatya Bucak, 2019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c/
o The Book Group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Grayhawk Agency.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非虚构

杰西·库克，节奏不停

伊险峰 | 长乐路百业指南

未来几天会是人生奇异体验。
他们还不知道这奇异有多糟糕，要持续多久。

01 全域静止

我肩负着封闭期间能记录点什么就记录点什么的任务，还要照顾毛若望和几只总是从墙头一路沿着人家屋顶再跳进我们阳台的七八只野猫，所以，我留在蒲园的办公室“全域静止”。

我有一个睡袋。

在前四天结束之后，解封日期变成了一个不可知的玄学问题（后来发现“解封”这个词本身也成为了一门玄学）。从家里闪送来一个大同电锅。好了，心里踏实很多。

毛若望是白猫毛跑最新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听起来特别隆重。

对于记录什么，我没有任何计划。

很快，社区也就是居委会主导了我的生活，除了测核酸测抗原，他们还要发放抗疫物资，因为我住在办公室里，所以我也享受了所有发放的米、绿叶菜和来自 Blt 超市的社区大礼包。

我正式成了蒲园的一分子。

02 沈老师

4月11日下午四点多的时候，解封小区名单出来，蒲园属于防范区，解封了。我家在封控区还没有解封。所以我还是要在睡袋里。选择在办公室全域静止还真是一個明智选择啊。

想看看是不是能出去。

保安小胖说：没有的事，18号解封。

志愿者沈老师说：出门得有出门证。一户只能出一个人。

我说：哪来的政策啊。

他说：上海发布的。

我回来在群里跟沈老师说：麻烦您帮我找一下哪里说“每家只许出一个人”、“出门要有通行证”。

沈老师说：一会我找一下文件。具体我会咨询居委会的。

我说：“好。虽然居委会也喜欢层层加码自己的政策，但我们应该尽量不要每个环节上都不克制自己的哪怕一丁点的权力。张口就说一家只能出一个人，出门要通行证。随口就说这是上海发布上说的。保安师傅也是，随口就说到18号解封。”

后来沈老师说居委会回复了。明天可以出门。不要出门证。不控制人数。今天不能出门了。

虽然他出于职业精神要把我堵在大门里面，但晚上的时候他开始憧憬“明天我要去久

光……”在群里说了一遍，在小七家又说了一遍，但是有人提醒他说，沈老师，久光在静安寺街道，你出了街道界了！

我们南京西路街道只能去嘉里中心下面的 Ole 超市，还有上海商城的城市超市。而且久光好像也不开的。

沈老师不像我们这么容易沮丧容易剑拔弩张。他说：“反正明天就往静安寺方向走走看看，现在外面是一天一个样。”

他知道的社区和居委的信息多，比如 500 弄到 12 号才上阳性名单，他一个礼拜之前就知道了。他说有一个开家政公司的人在那里租了房子，可能有些保姆阿姨住在里面，然后就阳性了，一下子有六七个吧。500 弄在一妇婴的另一边，他说还好没有影响到一妇婴。一妇婴一直是阴性的。

原来他想去 516 弄做志愿者，混到了他们的群里。最后我们能买成桃李面包，那还是多亏他卧底在那个群，因为我们两个弄堂都凑不齐一个团购的单。

沈老师最后在家门口做了志愿者，他住在蒲园，每天晚上倒垃圾，每天晚上都要跟辉哥聊上一会儿。晚上我在弄堂里看到他，他说好啊，明天出门溜达溜达。

不知道沈老师是做什么工作。有一天，他突然在群里发一个图，总结了他的最新马斯洛需求——这是他这十几天从群里的各种团购中看出来的。他说以前学管理，觉得这些东西跟他没什么关系，没想到现在还用得上。

03 天山翁

结果第二天沈老师的静安寺梦落空了。

4月12日一早，我还犹豫着要不要现在出门的时候，他传来社区的话，今天果然说都不要出小区了。

几乎每个居委会都想着用自己的政策来限制出门。这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他们觉得一旦出了阳性，这个小区就会从防范区变成封控区，不但大家会对阳性居民侧目以待，对于居委会来说还意味着无休无止地测核酸，测抗原，所有物资要到门口（如果有的话），所有快递送到门口，看着所有人不要出门……而且很有可能这些活没有什么目标，没有人知道那个阳性是怎么染上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要运走，还不知道未来怎么算封控时间。对于社区的人，它也是一个玄学问题啊。

有人聪明地总结，全上海人现在在玩飞行棋，谁先出去是不重要的，中途不被吃回去才是关键。

沈老师把最新告示的照片贴在群里。

告知书

各位居民：大家好！

**** 虽被划分为防范区，但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和安全，请积极配合做到足不出小区。具体细则如下：

1

小区继续封闭管理，可以下楼倒垃圾，取快递，自由活动（保持人员不集聚），不能出小区。

2

有就医等特殊情况的请至居委开具就医外出单。

3

有配药需求的请带好医保卡来居委登记，安排志愿者代配。有复工复产要求的请带好工作证及单位证明来居委登记。

再次提醒：我们虽然是防范区，但周边都是封控区和管控区，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请大家一定要保持来之不易的成果，做到不出小区，保护好自身。积极配合全市疫情防控工作，人人参与，人人有责，合力共创：无疫”小区，守住家园的幸福。

如有新的防疫要求会及时调整，第一时间告知大家。感谢大家的配合和理解。

**** 居委

2022年4月12日

居委会比较懒或者比较匆忙，直接把一个模板贴了出来。连“****”这些都没有替换掉。我跟沈老师说应该让居委会严肃一点，盖个公章，说得清楚一点。

十点来钟的时候，每个楼门上都贴上了严肃一点正经一点的告示。沈老师在大门口跟保安在讲道理。因为按沈老师的说法，这个最新告示也作废了，最新的说法是每个人都可以出去，但回来的时候要测抗原。保安的说法是，他没听到这个指令，所以他现在只能按告示上的指令行事。

从道理上说，非必要不出小区本身是个 22 条军规。出去也没有什么要买的东西，也没有班可上，可选的超市又不多，超市需要核酸检测，而这些防范区的人大部分都没有 48 小时核酸报告，而且超市显然又聚集，如果是去医院之类的地方，离得远的没有交通工具，离得近的你原来差不多也可以申请去，所以，你现在想出去一定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你现在应该滚回房间里去。

居委会喜欢用吓唬的语气跟大家说话，当然第一是再返阳封控——这个从上海发布一体都是如此下来的，第二是外面全是封控区和管控区，太危险了。

群里的 ID 天山翁说：防范区就是防范区，难道市委区委都不知道防范区周边有封控区吗？下边的人何必做过多解读啊！〔呲牙〕

我不知道天山翁是谁，但他会很自然地说“市委区委”这样的词，看起来以前一定做大干部的。

那几天传《我爱我家》的一段视频。圆圆的同学，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一个小男生恭维傅明老子说：“一看您以前就是做大干部的。”傅明说：“啊，也不能这么说，都是为人民服务嘛哈！”

天山翁给人感觉就是这样。后来贴出来带公章的了，天山翁再说“不理解！无法理解！为什么不执行上级部门的方针！”

04 爱谁谁

我们的小区太小了。团购动辄五十份一百份起售。我们九个楼，五号楼整幢住着一户，有钱人，正在装修，所以是空着的。实际八个楼，群里我看人声鼎沸时也不过五十几个人。

所以团购在蒲园几乎是个完不成的任务。连鸡蛋这种被沈老师划在马斯洛最基本需求的东西也凑不齐。居委会听说这事了，觉得应该有作为，说你们可以跟隔壁 564 弄一起，第二天走街串巷见多识广认识所有门牌号的快递辉哥说，564 弄一共才十一个人。我们问，是十一户还是十一个人？十一个人。

幸好沈老师卧底的 516 弄团购也不顺畅，这样我们终于团购成功了桃李面包。至少到 4 月 12 号这是唯一一次成功记录。

幸好“爱谁谁”出现了，他解决了求生群的生存困惑。他是辉哥的朋友，开始很谦逊，说可以搞到蔬菜和水果，不限量。

很快，他宣布了一个价值 100 块钱的蔬菜包：有青菜，芹菜，洋葱，黄瓜，青椒，蒜苔，包菜，10 斤左右。还有水果：苹果 15，沃柑 15，香蕉 10。爱谁谁解释说，水果后面的数字是价格，单位是斤。良心。

爱谁谁在视频里出现，是个有一缕卷发的中年仔。

我感慨的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热量效率最高的香蕉，反倒是最便宜的。你看这世界的供应链多有趣。为什么偏偏有人要与这样的世界过不去呢？

蔬菜这一单做成了。

晚上计划中还要送水果和牛奶。但突然就说没办法运出来了。因为那天晚上徐汇区有新政策出来了。

就是贴封条，挨家挨户。这个政策执行了几个小时，又叫停了。有人质疑，徐汇你怎么不每人发一片安眠药呢。

难以想象他们能做到哪一步。每天都在刷新我们认知的底线。

中午我跟人聊天，说该囤粮还是要囤粮的。原因倒也很简单，已经有大量人说东北防疫封城封省的不能耽误了春耕。这提醒我觉得是很对的，但它的副作用可能是政府觉得这事确实重要，所以我得未雨绸缪，把粮食得管起来（香蕉的全球供应可不是政府管起来的）。我们以前有把粮食管起来的经验，叫统购统销，这可是一个大到难以制服的怪兽。只要他们管起来，以现在物流恐慌，春耕恐慌这劲头，不那么乐观。

下午看有新闻说全国一盘棋，统一大市场，唔？

这倒是寄希望于社区发解困物资的集体食堂没搞起来，统购统销的大魔鬼倒是迅速释放出来。过几天还会抓若干个投机倒把的，反贪污反浪费之类的概率也会走上一波。

网上传各种段子。这个时候才会深刻体会到，为什么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犬儒主义在英文里为什么都是一个词。

当然，还有骂京东吃人血馒头的，还有骂快递小哥几天赚了万八千块钱的，未来蒲园也一定也会有骂“爱谁谁”的 100 块钱蔬菜包的，回想起来这价格难免肉痛。

但这事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05 徐雷

说刘强东这一次是心甘情愿地要退休了。把 CEO 的位置交给了徐雷。他还没来得及展雄才伟略，有一段对话在网上传播起来。

正好有北京的一位朋友来关心我。

- 友：你们都好吧？

- 我：都好都好。还没轮到你们呢？

- 友：我们主要靠固步自封！主动不出门，主动自封。

- 我：该抢购的都抢购了？

- 友：诶呀妈呀，你们上海这么吓人，全国人都免死狐悲式囤货了。

- 我：一盘棋。

- 友：妥妥滴。

- 我：徐雷的最新讲话学习没？

- 友：今早罗振宇他们的聊天记录一传播，所有人就都开始囤了。

- 我：罗老师的讲话学得还挺及时。

- 友：还没看到。

我把对话发给朋友。

- 友：这，看完已经压死要囤不囤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 我：掌握精神挺快。真抓实干。反复抓，抓反复，重要的是行动起来！

- 友：一个月的底线思维！

徐雷那段没有证实的群聊对话说了京东在北京疫情下的难处，还对上海不能发挥作用的跃跃欲试的心情。

当天，他们的京东商城就开始恢复，晚上还搞起了直播。感觉解民于倒悬，救人于水火。热闹了一个晚上，标注多长时间开始供货。后来，拖了一天，再后来，拖了两天，再后来，拖十天了。

那个群聊对话的结尾，群里有一个人问：所以，真的要开始囤货了吗？徐雷回答：所以，你现在还没有囤货吗？

我觉得是这里出了问题。

06 阿木灵

在桃李面包之前，有一次不成功的面包团购，那一次是静安面包房。

蒲园的群里什么人都有。我这种喜欢讲权利的，比较烦人，还属于不安定因素，好在我知趣，并不总来表示我的存在感；还有一种在气质风格上与我相近，但立场完全相反的，比如有位律师，有人发来历不明的传言，她就会说传谣这事不可容忍，全民监督，好像手已经在伸向举报按钮的途中了，其实她只是立场鲜明罢了，众所周知，这世界上有两种话，一种是真话，另一种是假话，所谓谣言，在好时代里它通常是假话的子集，在另外一些时代它是真话的子集，就这扯远了；沈老师偶尔会说些经不起推敲的昏话，比如他会说政府保障供应这套组合拳很漂亮的，这是从何说起！

阿木灵是这个群里的知识分子。坊间（这是我第一次把这个词用对地方）偶尔评价说他比较孤僻，不怎么与人打交道，他住在我的楼上，而且据我听到的动静，他是成天在家的，但我几乎没有遇到过他。至今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测核酸的时候我知道他肯定在我前后的什么地方，但戴着口罩，我觉得每个宽额头大颗的老头都有可能是他，这有点像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处女作，Duel，服务区里的每个卡车司机都有可能是要制他于死地的人，我看谁都像阿木灵。阿木灵之所以是我们群里的知识分子，是因为他总是扮演批评居委会的角色，永远的反对派，任何问题都要追溯到居委会的责任上去。我觉得他的这种思路非常正确，心下佩服。

而且他的品味不凡。团购静安面包房的时候，他再也抑制不住他的热情，强烈要求购买两份。

“提高免疫力就是要吃好的。且价公道！”

“大家买呀！再不吃味道也忘记了！”

“上海人就是要吃静安面包房的！平时还排队呢！”

“套餐里面有面包！”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点心吃也蛮好的！”

07



4 月 7 日那天，好像消息又多又丧。

什么事都悬在那里，你感觉每个关口，看到事情都向着不好的那个方向滑动。就像一场被追杀的噩梦，你跑不动，你拔不出来枪，你勾不动扳机，你子弹射不出去……关键是你知道这是梦，天一亮就好了，但它也不亮啊。

传的一个视频里，上海现在某电话亭里住了一个女孩，在楼上拍视频的人说，这女孩跳舞，进电话亭要脱鞋，每天都换衣服，电话亭边上有一个晾衣架。心酸又美丽，像个绘本故事，谁知道它是真的呢。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不知道。

还有一个视频 *。“从瑞金医院回家正好赶上邻居们排队做核酸，于是我在梧桐树下跳起了舞 # 上海人民封锁日常 # 霍乱时期的舞蹈”。

那姑娘有茂盛的营养充分的头发结成的两条粗辫子，健康有力的腿，合着杰西·库克同样有力的节奏，跳得真好。下午，阳光从正西方灌满整条路。一分三十三秒时间内，有两个人从马路对面的 G-Shock 走过，开始有一辆黑车从东向西过去，一分钟以后一辆白车从西向东开过。1'33"，Matisse the Cat，这是四月七日下午的淮海中路。即使世界变成了这副样子，还有这么美好的东西在。

08 哑巴

哑巴只有一个土豆了。Emma 给了他们一点菜。我说我那里也有菜，你帮我给他们家吧。Emma 说不用急，你要给他东西，他会觉得你对他好，然后一直缠着你。大约是说好心要克制一些。

他太太也是一个哑巴，湖南人，嫁给本地的哑巴。哑巴当然不会讲上海话，所以也没有办法证明他是上海坐地户。你细想，这事也很有趣。

哑巴家参与团购了一袋桃李面包。33 块钱。哑巴太太掏出智能手机，扫了 Emma 的付款码，33 块钱。很简单。哑巴没看到，拿出钞票，给 Emma。Emma 说他们两个人可有意思了，钱是分着花的。

1 号早上，我第一次在蒲园是被哑巴吵醒的。

刚到蒲园的时候，总听到有点瘆人的哼哼哟哟的声音从窗子外面经过，后来保安小王告诉我们说他是哑巴。开始的时候闹不清楚为什么哑巴会出很大的声音，咔咔着从弄堂里走过来走过去。有一天想明白了，他也不知道他发出了声音啊。

所以总是会听到他叹息的声音，喘气的声音，高兴的声音，不高兴的声音，舒服的声音，难受的声音，见到小七的声音，买到雪碧高兴的声音。他最爱喝雪碧。

过完年，好些天没有看到哑巴。问小胖保安哑巴哪里去了，他说哑巴腿摔折了，在床上躺着呢。

果然，又过了十几天，看他又咔咔地从弄堂里揣着一瓶雪碧回来。只是现在多拄了个拐棍。

09 保安小胖

对他一位阿姨说，他们都觉得我凶。

阿姨说，就是要凶一点，现在这种时候，就是要严格，要凶。

小胖其实就要这点肯定。

小胖有的时候是权力欲，有的时候是我为你好的善良心。我宁可他的是权力欲。这样他不过是一个小官僚而已，你跟他要政策，他拿不出来，他还是会讲一点规矩的。毕竟是在上海做了二十几年的保安。怕就是这个时候摆出一副我要变本加厉地为你好的劲头来。

因为小区一直锁着门，他的存在感不如从前。偶尔他是那几个穿着大白的人之一，这个时候他特别欢喜，这是对他工作的肯定。

他好多天没有回家了，住在居委会。他家在曹家渡那边，中间要经过静安寺街道或者江宁路街道，我吓唬他，解封了你也不能回去的！现在我们都对街道边界有了理解，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我和他始终处不好。因为他总是给政策加码。

比如，扫个场所码访客就可以进来的时候，他说要看人家的核酸证明；11号本来可以出去了，他说要到18号；明明防范区开封大家只是想随便出去走走，但他说要给派出所打电话。

但是，你能把他怎么样。你跟他摆脸色，他就真的跟别主诉苦为了大家好。然后实质上你就被他制服住，你回去越想越气，好像无能为力。

你看，我们就是这么冬烘。我觉得很惭愧。

10 保姆和老头儿

老头走路声音也比较大，蹭在地上。冬天春天和秋天，他都会戴着帽子。拄着棍，脚蹭在地上向前挪，走得还挺快。在他身侧，是一个短发圆脸的老妪。一边走路，一边舞着手，上上下下，伸展自己，笑容灿烂，看到他们走在弄堂里，觉得挺好。有一次跟Emma聊天，说那对老人家看着倒是很可爱的。Emma说，他们不是夫妻，女的是保姆，老头儿94岁了。

现在每天早上，天刚刚亮，他们俩就已经在弄堂里来回走动起来了。一天的时间大概是从他们早上欢快地走步开始的。

再接下来，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是一位喜欢清嗓子的爷叔。传统资深男人，吸气，清嗓，从肺深处抽出痰来，相隔0.5秒到2秒不等，噗地吐出。这时差不多已经六点半了。又过一会儿零星会有人打招呼，但不多，各家忙于吃饭或者吃过饭看天气是不是洗衣服。1号那天，第一天，天气不错，弄堂里几乎没有晾晒，第二天，我看大家就把持不住了，不辜负好时光。所以九点来钟的时候，会有人悄咪咪地出来把衣服晾出去。见到人，当然也要打招呼。

真正有了人气要等十点来钟小七吃好了饭，出来玩耍社交。辉哥家有洗衣机助动车和一些家什在雨棚下面，弄堂相当于他家的阳台，所以小七跑起来，大家也就都放松下来，倒垃圾的晾晒衣物的走过小七家，都会与小七打招呼，与Emma和辉哥聊上几句，这时就有了正常院子的味道。

这局面要到下午。有的时候是要去做核酸，有的时候是做抗原，几个志愿者按大白装扮起来，你得凑近了或者听他们说话才知道他是谁，这时气氛就严肃一些，人虽然多，但是安静，连小七都戴上了口罩。

傍晚，照例是最热闹的时候。这个弄堂里一共才几十个人，我不认为会有任何聚集的事情发生，大家得体地保持着距离，聊天，抽烟的人在另外一处，不招人烦，他们把口罩脱到下巴处。吃两支烟，交换一些各自听到的消息，研判一下接着还会多久，然后各自散去。

小七家门口一定是最晚散的一个场子。沈老师住在七号楼，他也很爱讲话。

再晚一点，我会偷偷出来跑步，弄堂很小，到底的一幢楼有独立的院子，以前住过钱锺书，据说《围城》是在这里写的。从弄堂大门跑到钱锺书家门口，再跑回来，120米到140米之间，我要跑50个来回。跑的过程中，七号楼的一个黑色贵宾会跑出来，八号楼有一位先生会出来锻炼身体，还有一位女士会走上几圈，她并不是每天都出来。有点拘谨，但到4月11日晚上的时候，我犹豫着是第二天出门去享受自由，还是在院子里继续跑下去，然后，我做了一个我自己都觉得诧异的决定，我觉得在院子里这种折返跑也不错。天哪！为什么？

那天晚上我还发现，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封闭在这个60米长的弄堂里快12天了。这也是一件让我吃惊的事。乐观地说，你能忍受的东西比你想象的要多。但它隐约地让我想起前几天在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里最后的那句话，他引用了威廉·库珀的诗，那诗说：

自由有千种风采可以展示，

奴隶们，无论多么满足，却从来无从知晓。

我隐约感到的是，我正在经历着一个反向的过程。

11 另一个保安和Milos

我的同事为我讲她的故事。在她家小区容列上海官宣的防范区（也就是可以在街道

所在范围内活动）之后，居委会也是出了自己的加码政策——不得出小区。她在门口等闪送师傅的时候，看到小区保安正和Milos交涉。

事实上她不认识Milos。小区业主群里有个成天维权的外国人，看得懂大家发的中文甚至方言，但声称不会说也不会发中文。因此一直在用英文交流。整个群竟然行之无果。Milos之所以引人注目，因为他声称瓶装饮用水是人权的一部分，而不是奢侈品。因此一个骑着小助动车停在保安的大栏杆前，声称要出去买水的人，必然是Milos了。她替Milos做翻译。事情据她讲述是这样的：

Milos对保安比划一个方框：文件，show me文件，otherwise I will go。

保安慌张。“他说啥？有没有翻译？”

“他说他要出去，没有任何文件说他不能出去。”

“我们也没有办法，居委会规定任何人不能出小区。他要出去干啥？”

到这里我还在本份翻译。Milos要出去买水。保安旁边的一个女士说，外面啥也没有，你出去也白去。保安说，水，有水，说着就从屋子里搬出来一箱子矿泉水。

Milos很烦躁：“不是有没有水的问题，你们的政府说我们小区可以出去，我要出去，任何人都拿不出证据说我不能出去。”

保安还抱着水，我说，别抱着了，他要的不是水，是权利。

保安在空中比划，隔壁，居委会，找居委会。

在我们交涉的过程中不断有人进来出去。Milos每次都要停下来：“他是谁！他为什么可以出去！他们又是谁，他们为什么可以进来！”

“配药！他代配药！他就是居委会的！”

“物资！他们是居委会送物资的！”

我放弃了翻译，和Milos说，你出去的话保安会承担责任。

“这是他的事。”

“但我们都希望他有这个责任，否则他会丢工作，他也有一家老小要养。”

“这也是他的事情。他选择了这份工作。并且我为所有人感到悲哀。没有任何说明我们不能出门，但是每个人都默认这个居委会说的话就是规定。我从2005年到中国来，这里的工作棒极了，生活棒极了，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不安全。我和我的朋友决定马上就走了。”

“你可以走，这里有很多人想走也走不了。”

“太悲哀了，我的国家经历过战争，还有很多很糟的事情，都没有像这里现在这样。这完全是不理性的。我要的根本不是水，虽然我也不多了，但是这就是疯狂，疯狂，疯狂！”

“你是2005年至今第一次感受到吗？我们感受到很多次了。”

“我就在这里记录，看多少人想要出去，看多少人可以随便进来，没有制服，没有出示任何文件，就可以进来！为什么？谁规定的？规定在哪里？”

我觉得我在发抖。不是因为生气，是因为试图把过往的疯狂告诉Milos，“你知道抗议这种疯狂的代价吗？”

“我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要走了！可悲的是你们知道吗！我是在帮你们的忙，这可能都不是最坏的时候。你们保持沉默，你们对毫无来由的命令言听计从，这是最可悲的！”

“许多人抗争过，他们都死了！”

“是的，我知道，但是接下来还会有很多人死去！你知道我觉得什么最可悲吗，都不是跟我吵架的人，是沉默的人，沉默的人最可悲！”

保安旁边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另一个保安，他抱着胳膊，笑着说，居委会规定呀。

我挣扎着换成中文：“他不是要水，他要人权！”

保安一起笑了：“哎呀，这不是有国情吗。国情不一样，你在你们国家是那样的，我们这里没办法！没办法！”

我想起我的闪送还没确认。得走了。Milos还在记录，有多少人进来，有多少人像他一样想出去。

隔了几个小时，我下去取快递，保安看到有人接近就会露出一半警惕一半询问的眼神。我问他老外后来怎么说。

“走了。他到底要啥？”

“人权。”

“哈哈哈哈。来中国不被打死他还要人权！他们美国，随便街上打死人！”

我想了一下决定说最简单的事实，他不是美国人。

保安没想到除了美国还有其他白皮外国人，愣住：“不是？那是哪里人？”

“塞尔维亚人。”

“哈维亚？”他马上放弃了。“管他什么维亚，他妈的都是外国种！”

大年夜

上海人管那天叫大年夜。3月30日的晚上自然叫小年夜。小年夜的下午，富民路上全是人，丹尼斯说他的所有在上海的朋友好像都聚在富民路上。那天风和日丽，大家享受好辰光。未来几天会是人生奇异地体验。他们还不知道这奇异地有多糟糕，要持续多久。

31号那天，没有了前一天的好天气，下午起了风，降了温。三点钟从蒲园出来，长乐路一妇婴到陕西南路那里的路边已经围上了铁栏杆。两个个子不高的汉子扛着铁栏杆迎面走来。陕西南路上没有多少人了，一家奢侈品皮具店门口贴着告示——“我要回家囤菜！！！4/5之后营业”。现在很多人对日月的简写方式不太在意，我猜她的“4/5”想表达的是4月5日，但这种写法实际上是5月4日的意思。也许，她还真的说对了……

过延安路天桥，美新点心店已经关了。转回头去威海路，一家小吃店在卖剩下的一

点青菜。上海展览中心对面的南京西路派出所，门口摆着很多物资，看起来有上百箱的防护服，方便面，脉动之类。特别壮观。转到富民路，今天萧瑟，人不多。沿长乐路再向西，转到安福路，到话剧中心，原来马里昂巴那里人气旺起来。在这里转一大圈，发现两种人最多：跑步的人，闲逛拍各种西洋景的人。武康路安福路口有一个路边菜摊，有三四个人拿着单反在那里狠狠地拍。乌鲁木齐中路上，黎巴嫩菜对面的小区门口，成了一个天然的菜市场，一侧人在挑菜，另一侧大家排队付款。

十天以后，传出一个帖子要求说法。这个帖子来自于乌鲁木齐中路 261 弄 1 号楼，因为有阳性，他们楼被锁上了，贴上了封条。投诉者说如果着火发生紧急情况可怎么办？他们的代表打电话给徐汇区的一个要害部门。接投诉电话的人倒是很大无畏：“哪来这么多如果……”“他怎么不锁别人楼门呢？”感觉像是个中学老师出身的公务员。我去地图上看了一下，噢，这就是我看到的热情洋溢的卖菜的地方。谁知道十天工夫他们就会变成投诉无门的弱势群体呢？

去年夏天的时候，有一次在黎巴嫩菜餐厅吃饭，对着窗外，正对着的就是这个小区的大门。一个紫头发小个子女生夸张地从这个小区里踩着滑板冲出来。她神采飞扬的样子让人嫉妒。“唔，这么做作的事都可以让人嫉妒，还真是有过人之处呢！”

乌鲁木齐中路的街边人们还很开心。

五点钟之后吧，下起雨来了。富民路总是藏着人的房檐下，不多的几个外国人躲在暗处喝酒。他们也没想到大年夜就是这么凄风苦雨的吧。

网上有各种消息。声嘶力竭。各色人等出来表态。新华社也发文。其中有一个叫吴尊友的人的访谈，总结下来，大意是说外国是外国的事，病毒到底怎么传的不知道，为什么无症状这么多不知道。但一定要清零。它让我想起乔布斯嘲笑过的那个洞。

那年春天，甲骨文的拉里·埃利森在一次聚会上见到阿梅里奥，把他介绍给了科技记者吉娜·史密斯（Gina Smith）。她问苹果情况如何。“你知道，吉娜，苹果就像一条船，”阿梅里奥回答，“那条船满载着宝藏，但是船上有个洞。我的工作就是让所有人都朝同一个方向划船。”史密斯看起来很迷惑地问，“是的，但是，那个洞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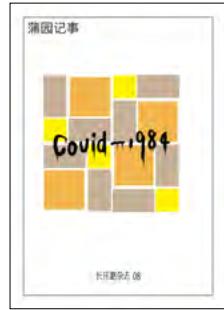
没有有人说那个洞的事，只要决心向着一个方向划就是了。

差不多五个小时之后，雨停了，街上人也都不见了。富民路、胶州路、延平路、安福路、武康路、五原路、乌鲁木齐中路、永康路、巨鹿路、陕北路，所有曾经热闹的地方都悄无声息。

咔地一声就停下来了。在停下来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这一声意味着什么。你不知道它要停多久。停下来的是什么。是大年夜，是一段个人的好辰光，是健康，是自信，是荣耀，是爱，是神话，还是所有？

* 详见视频号玫瑰与黄金 (id: rose_and_gold)

题图由本文作者拍摄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沈阳铁路局职员，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长乐路百业指南

我们打算用文字记录一个街区的即时生活状态，它像亚马逊森林一样，高密度兼容形态各异的人物。每天都像不可预知的探险，唯有时间不可阻挡。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非虚构 血痕 安孟竹 | 田野中国

“我的孩子以后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01 纠纷

“你听说了么？机构里出了打孩子的事，家长微信群昨天晚上‘炸了’！”一大早，和我关系最好的小段老师就跑来传递“情报”。我听得瞠目结舌，还没从田野倦怠期里重新振奋起来的自己，一时不知如何应对这桩突如其来的大新闻。2017年9月，我从香港中文大学来到位于珠三角的彭城，开始进行关于自闭症家庭养育实践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这家我称为“向阳干预中心”的民办特殊儿童康复机构是我田野的起点。向阳干预中心成立于2000年初，坐落于城市北部一栋旧式公寓楼的二层，低矮的教室一间挨一间，挤在走廊两侧，昏暗的灯光下，墙上动物图案的漆色已经有些剥落，乍看之下，这里像是一间硬件条件不怎么好的幼儿园。但这并不是一间普通的“幼儿园”，这个空间所服务的，是一群被诊断为自闭症、唐氏综合征、脑瘫、智力障碍、多动症、发育迟缓的“特殊儿童”，其中自闭症占了绝大多数；为他们提供康复训练的则是像小段老师这样的“特殊教育老师”，简称特教老师。小段老师是河南人，严格来说还不算一位真正的特教老师。她在贵州一所师专读特殊教育专业，比我早两个月来到向阳干预中心进行毕业实习。我则是在这间康复机构里“做研究”的常驻志愿者。在这个空间里，我和小段老师都被叫做“老师”。我每天穿一件印有“义工”字样的红色马甲，和那些拿到了康复教育上岗证书的“真”老师们一起，在教室里辅助孩子们上课，课下带他们去厕所，午餐时给孩子们喂水喂饭，忙里偷闲时一起聊八卦、吃零食；在稍显平淡枯燥的日常中体验着老师的工作，时日渐长，自己也对“老师”这个群体有了归属感。当小段老师告诉我康复机构里发生了“老师打孩子”的事，我的第一反应是错愕、震惊——这群相识已久、已经成了朋友的人，怎么会对孩子施加暴力？！

中心的气氛明显不同于往日，窸窸窣窣的议论之声在教室内外流窜。已经在这间机构工作了两年的李老师掏出手机，为前一天请了假的我补充这场“伤害事件”的背景。她滑动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翻出几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里，一道暗红色的血痕划过手掌，肉嘟嘟的手心里，破了皮的地方还在微微渗血。另一张照片里，白皙的手臂上印着一块暗紫色的淤青。

受伤的孩子名叫丁晓珍，再过几个月就满18岁的她，严格来讲并不算是个“孩子”了。事情爆发在前一晚。晓珍妈妈突然在中心的家长微信群里贴出几张“伤痕照”，指控大龄班的陈老师打了晓珍。这位在孩子身上发现不止一处伤口的母亲恼怒不已，她隔空质问中心的老师们“是不是在长期虐打晓珍”，声言如果机构给不出满意的处理，就要把这件事在网上“曝光”。

面对家长言之凿凿的控诉，晓珍的班主任蓝老师赶忙出来解释，说晓珍胳膊上的淤青是上周末秋游时摔的，并不是“长期遭受虐打”的结果。晓珍妈妈却并不买账，她言辞激烈地回应道：“没那个资质就别碰我女儿！以后谁再打我女儿我就打他！”伤痕照似是铁证如山，晓珍妈妈的语气也信誓旦旦、不容置疑。群里其他家长开始纷纷站出来声援，帮这位母亲向机构“讨说法”。终于，干预中心的负责人、正在外地接受培训的杨主任发话了：“晓珍妈妈说的是怎么回事？大龄班班主任请好好调查这件事，给家长一个交代！”

家长责难，领导施压。蓝老师不得不再次道歉，承认自己看护的失职。她向晓珍妈妈保证，一定会把晓珍受伤的原因调查清楚。群里一位家长跟着附和：“一定要好好调查，让我们家长放心！”

今天的中国城市里，面向特殊需求儿童的康复和教育机构已经不像十几年前那样稀缺。在彭城这样资本不断涌入的淘金之地，康复市场的急剧扩张反倒伴随着另一重隐忧。进入田野之前，我曾在网看到过许多关于特殊需求儿童在康复机构遭遇暴力伤害的新闻。这类报道大多将暴力事件发生的康复机构描述为利欲熏心、缺乏行业监管、乃至非法经营的存在。然而向阳干预中心是一间经过彭城残联认证的康复机构，这里的老师们经过了数次职业培训，谙熟主流的干预方法。在这样的机构遭遇如此严重的伤害纠纷，的确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面对我这个“外人”，谨慎的李老师并未就晓珍妈妈的指控发表看法。同为班主任的她只是对蓝老师的处境颇感同情。李老师一面收起手机一面叹息，“闹大了，蓝老师可惨了”，我却难以压抑心中的一连串疑问：晓珍到底有没有被打？晓珍妈妈为什么如此笃定女儿身上的伤来自陈老师？如果说，晓珍胳膊上的淤青确实是秋游时摔的，那道掌心的血痕又是怎么回事？

02 晓珍

被怀疑遭受虐打的丁晓珍，是整间干预中心年龄最大的自闭症学员。在干预中心，晓珍被老师们戏称为“老丁”。中文里，老丁的“老”字不仅代表年纪和资历，也是一种亲密的揶揄。“老丁”被老师们叫惯了也不生气，总是笑眯眯地和每一个在走廊里相遇的成年人打招呼：“老师好！”。

“老”字用在晓珍身上或许并不过分。从向阳干预中心成立之初，年幼的晓珍就成了在这里接受康复训练的一员。因为在这间机构的年份超过了许多年轻老师，晓珍有时也会被调侃为“干预中心的元老”。

干预中心负责人杨主任曾对我回忆，晓珍七、八岁的时候，老师们都认为这孩子康复效果不错，那时候的她可以与人进行简单的沟通，基本的自理技能也没问题，是绝对可以上学的。在杨主任的建议下，家里把晓珍送进了当时彭城唯一一家特殊教育学校，爱知特校。然而晓珍的校园生活并不顺利。进入特校没多久，她就因屡屡“抓人”“咬人”而被强制休学。经过几番返学的尝试、数次徒劳的矫正，家人渐渐放弃了让晓珍继续留在特校的打算。曾被老师们认定为最有希望上学的晓珍，最终又被送回了她熟悉的干预中心。

晓珍的经历在同龄自闭症孩子中间并不鲜见。在中国，尽管从90年代初推出的《残疾人保障法》到2008年签署的《残疾人权利公约》都试图强调残障者“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机构资源配置不足，这种权利的重申就像一张空头支票。最近几年，重新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条例》试图推广“融合教育”理念，晓珍所在的广东省更是提出了普通学校对残障生招收“零拒绝”的口号，然而在大多数校园，支持特殊需求学生空间（资源教室）和师资（资源老师）依然匮乏，再加上不同学校设置的“入学能力筛查”门槛，像晓珍这样的自闭症学生要么仍被普校排除在外，要么就是在入学后因难以融入主流环境而遭遇清退。在我田野中遇到的学龄自闭症孩子中间，有的“高功能”学生选择在普校里“隐藏身份”（自闭症圈里称为“潜伏”），另一些则是在家长的“陪读”下艰难地渡过普校时光；大部分孩子早早被分流到了另一条人生轨道，进入特殊学校。鲜为人知的是，在特殊教育资源紧俏的地方，特校的学位竞争并不比普校缓和，有的甚至也会像晓珍入读的那间特校一样“挑学生”，在残障生中再进行一轮筛选淘汰。

只要不被学校“赶出来”，让自闭儿提早接受职业教育是许多家长为孩子做出的选择。可即便完成了职业教育，获得了各种技能资格证书，就业市场也并不会轻易对他们敞开大门。与其他残障类型不同，被归于“精神障碍”的自闭症青年找工作也面临着窘境：“出了事情谁负责？”这是他们被招聘方拒绝时常听到的理由。在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列的彭城，为残障者提供岗位的庇护型就业工厂却屈指可数。这种环境下，即便晓珍当年在特校的生活一帆风顺，毕业后也可能面临“无处转衔”的命运。一个无需讳言的事实是，那些写在纸面上的“残疾人就业率”，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残障者的“人事关系挂靠”实现的。

回到向阳干预中心的晓珍被安排进了中心的“大龄班”。这个班的学员从14岁到17岁不等，与中心大多数不满学龄的幼童相比，这群身型接近成人的青少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然而在干预中心，他们也和小龄班的学员们一样被叫作“孩子”，一样把身体挤进低矮的儿童椅，一样看着小猪佩奇的动画片，一样在简单的认知训练课上辨识着什么是桌子、什么是手机……

在大龄班的9名青少年中间，晓珍被老师们公认为能力最好的。团体课上，整间教室里几乎只有晓珍能够回答老师提出的简单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丁晓珍。”

“这是什么颜色？”

“红色！”

晓珍乐于听到老师的表扬，面对老师抛出的问题，只有她愿意喜笑颜开地“捧场”。其他几个少年最多只会摆出口型、不发出声音，要么就干脆沉默，或是像什么也没

听到似的自顾自地望向别处。刚从小龄班转到大龄班轮岗时，这样的观察也让我感到讶异：单就课堂表现而论，这些青少年似乎还比不上小龄班的幼童。在自闭症康复领域，年龄是一把残酷的标尺。许多医生和治疗师都在各种场合呼吁自闭儿家长们把握孩子的“黄金干预期”。言下之意，随着自闭儿年龄的增长，功能改善的瓶颈也会随之而来。富有康复经验的杨主任认为，晓珍这样的孩子一旦进入“大龄”，行为能力的发展就会趋缓、甚至遭遇停滞。继续给他们上康复训练课的目的至多在于“防止退化”。行为科学的理念强调，习得的功能长久得不到练习就有“退化”的风险。然而退化的风险并不是单靠重复的训练就能遏止，一场癫痫的发作同样会让一个能够自我表达的孩子彻底失去语言。杨主任的态度是，尽管康复训练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大龄阶段的“退化”危机，可不上康复训练课，这些青少年又能在干预中心做什么呢？

在向阳干预中心刚刚成立的年代，不少民办康复机构还具有托管、照护的性质，在当时，大多数机构的创办人就是自闭儿家长，“办机构”的朴素设想之一就是让孩子“有个去处”。随着卫生部对自闭症“早期干预”原则的强调和康复行业的市场化扩张，越来越多新成立的康复机构会把招收学员的年龄限制在12岁以下，有的甚至明确只招学龄前（7岁以下）儿童。政府针对自闭症人士的财政投入始终瞄准“康复治疗”，围绕教育、就业、日常生活的其他公共服务配给则远远不足。不少和晓珍一样早已渡过“早期干预”阶段、又遭遇退学的青少年，只能留在家中，生活在家长寸步不离的监护之下。

干预中心的老师们会把大龄班学员描述为被家长“放”在机构。在他们眼中，与那些可塑性更强的幼童相比，晓珍这样的“大龄孩子”几乎不会再有什么能力上的突飞猛进。老师们承认，给大龄班上课更像是“走过场、混日子”，在这样的课堂上，不必怀抱任何期待，连调动情感、投入能量都是无用之功。对自己的工作属性，大龄班的老师们有着无奈的觉察，班主任蓝老师就曾对我感慨：“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不就是帮家长‘托养’一下嘛！”

与自闭症家庭打了多年交道的蓝老师很清楚，晓珍这样的青少年如果不被放进机构，就可能把整个家庭拴住、套牢。对于年岁渐长的自闭儿父母而言，照顾“大龄孩子”的饮食起居会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伴随孩子成长而涌现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也日复一日地消耗着他们。持久的紧张、疲惫与牺牲是一个普通家庭的难以承受之重，对于家长的难处，与大龄孩子朝夕相处的特教老师们也有切身的体会。大多数时候，老师们对把孩子“放在机构”的家长们怀着无限的体谅与共情，然而对于晓珍妈妈，老师们的感受却更为复杂。

03 母亲

早在指控特教老师施暴以前，晓珍妈妈就是干预中心的话题人物之一。

谈到晓珍能力好却上不了学，杨主任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教育制度和文化环境对自闭症学生的排斥，而是晓珍恶劣的家庭关系，尤其是晓珍妈妈的“坏脾气”。杨主任近几年开始研习心理学，也会利用周末时间为养育特殊儿童的家庭提供咨询服务。按照他的理解，晓珍之所以当年在特校表现如此激烈，屡屡抓人、咬人，与母亲王卿粗暴的管教方式不无关联。

王卿算是中心的“老家长”了。杨主任曾从这位老相识口中了解到更多晓珍退学的内情。当年离开康复机构的晓珍，进入特殊学校的新环境后并不适应，有段时间，晓珍每天回到家都哭闹着“不要再去上学了”。学校老师向王卿投诉，说晓珍在学校出现了抓人、咬人的行为，警告她，如果这样得行为再持续下去，就不能让晓珍来学校了。或许是校方的威胁加深了这位母亲的焦虑，彼时的王卿并没有深究晓珍“厌学”的原因，而是严厉斥责了攻击同学的女儿。她曾向杨主任表达懊悔之意，坦言晓珍的屡教不改让当年的她常常忍不住对女儿动粗。然而打骂并没有让晓珍变得更加驯服乖巧，她对学校的抵触情绪越来越严重，连走出家门都要连拉带拽，有时甚至可以赖在床上一整天。

杨主任事后分析，当时的晓珍可能已经出现了抑郁情绪。他痛惜又愤怒地评论道：“孩子在学校不适应，有情绪，她不是打、就是骂，只会强迫孩子，那能有用吗？问题肯定会越来越严重啊！”

来到干预中心做田野后，不止一位特教老师这样提示我：“在我们这里，你可以从一个孩子身上看到整个家庭的故事”。这项观察原则似乎在晓珍身上尤为典型。在机构里，尽管不是所有老师都了解晓珍退学的始末，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女孩来自一个单亲家庭。父母离异的情况在自闭症家庭中并不鲜见。特殊儿童的养育不但考验着家庭的资源能力，也迫使许多夫妻重新审视亲密关系，许多段婚姻正是在孩子诊断、康复、照顾的旅途中走向了破裂，晓珍的父母也是其中之一。中心的年轻老师们大都对晓珍妈妈脾气差、打孩子的劣迹有所耳闻，认为这位母亲对家庭失和必然有难以推卸的责任。班主任蓝老师则对这位大龄班的“老家长”抱有一丝同情：

“听说没生晓珍以前，她妈妈在外企工作，收入很好的，生了孩子之后就得了产后抑郁症。很严重，搞了好多年。你想，后来发现孩子又发现了‘这样的’嘛，对她来说，肯定天一下子就塌了……”

在蓝老师看来，无论是家庭的分崩离析，还是晓珍后来的退学遭遇，都与这位母亲承受的多重打击不无关联。然而大多数老师并不认同这位可怜的母亲“将自己的消极情绪往孩子身上发泄”的做法。还没结婚的小段老师和我一样，也是第一次听到晓珍妈妈的故事，她不留情面的评论道：“再怎么难也不能放弃孩子啊。哪个女人不是这样过来的呢？”

在干预中心里，晓珍妈妈待人粗暴、脾气恶劣的形象似乎已经变成了某种难以修正的定见，晓珍自己的反应似乎就是这种形象的印证。父母离婚后，晓珍每周有一半时间与母亲同住，另一半时间在父亲家。大龄班的老师们偶尔会这样逗问晓珍：“晓珍，今天是让爸爸来接还是妈妈来接？”面对老师的提问，晓珍会毫不犹豫的回答：

“爸爸接！”对晓珍来说，妈妈似乎是个令人惧怕的家庭权威，老师们也偶尔会利用这一点作为规训的策略：“晓珍，再不听话今天就让妈妈来接你咯！”。曾经有几次，晓珍坐在地上哭喊着不愿回妈妈家，硬是让几个老师一起拖着、扛着才下了楼。目睹过晓珍对母亲的抗拒，老师们甚至开始猜测晓珍妈妈“根本不怎么管孩子”。

当晓珍妈妈在微信群晒出女儿身上的伤痕，指控特教老师“虐打”孩子时，这位母亲过往的名声和形象再次浮现在众人面前。午饭时，老师们围坐在一起，小龄班主任李老师抱怨不平来：“这些家长自己平时都忍不住要打孩子，有什么资格说我们老师啊？！”

珍手心的“小伤口”之所以变大变深，或许是因为她在当天下午的音乐课上打了非洲鼓的缘故。然而这样的推测并不足以向家长和领导交差。那道被蔡老师处理过的小伤口，真的是被床边的木刺扎伤的吗？晓珍妈妈为何言之凿凿地声称这伤口来自陈老师？

被指控打人的老师名叫陈曦，是位二十出头、胖乎乎的男老师。面对蓝老师的追问，陈老师显得有些紧张。他脸色泛白，矢口否认自己动手打了晓珍，只承认曾让晓珍“自己拿着小棍子惩罚自己”。

为什么要让晓珍“惩罚自己”？根据陈老师的说法，当天上午，他来到教室，发现晓珍“又在抱着班里一个男生亲脸”。他立即冲上去制止陶醉的晓珍，气愤中，他抄起一根音乐课上用的鼓槌递到这个女孩手里，让她“记住教训、不再犯错”。陈老师辩白道，自己并没有打算让晓珍真的动手，只是想“吓唬她一下”，晓珍后来也只是拿着鼓槌比划了两下，根本算不上是“打”，更何况造成什么“伤口”了。

事发时，教室里只有陈老师、晓珍，和几个难以“作证”的大龄班学员。这让陈老师的供词有些牵强，甚至并不比晓珍的话更靠得住。但蓝老师认为，陈老师所说的并非完全不可信。除了作为同事的偏私之外，她对陈老师的“气急败坏”也有所共鸣。毕竟最近一年多以来，晓珍的这桩“老毛病”已经让大龄班的所有老师们伤透了脑筋。

05

青春期麻烦

就快 18 岁的晓珍被认为正处在“青春期”。在我田野中遇到的医学专家、社工和家长们看来，青春期对自闭症谱系人士而言是个“危险”的阶段。除了情绪行为增多和共病发作的风险外，“性意识”的浮现是最让教育者和照顾者困扰的问题。

小段老师曾对我细数她在大龄班里遭遇的尴尬时刻。还在实习期的她低声羞愤道：“这里有些孩子，简直男女不分了！”有一次，她推门进入教室，发现一个男孩正双手抓着晓珍微微隆起的乳房好奇地打量，晓珍自己则前摇后晃，一副愉悦的表情。小段老师不知该怎么“教育”这两个懵懂的少男少女，只能赶忙把两人的椅子拉开。另一个让她感到难为情的场景是如厕。向阳干预中心只有一间男女共用的厕所，大龄班的男生通常不会去用仅有的三个封闭隔间，而是和小龄班的男孩子一样，在门口一排水池前站着小解。小段老师发现，有几个大龄班男生会一边尿尿，一边开心地拨弄自己的阴茎。每当撞见这一幕，她就尴尬地避开，或是拉来其他“胆子更大”的老师上前喝止这些男孩。

和小段老师一样，中心的大多数特教老师只有二十出头，有的还没谈过恋爱。看到班里的少男少女们开始对发育中的身体感兴趣，或是触碰乳房，或是把手伸进裤子，他们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只能强制性地制造身体距离。在音乐、手工等团体课上，大龄班的男生和女生被分隔开来，安排在桌子两边就座；下了课，男生和女生总是分批次被带进厕所，等女生进入隔间，老师们还要大声提示她们“关好门！”。

通常，老师们会对男生的举动更加留意，警惕着他们对自己身体的探索，以及对异性的主动靠近，女生则被视为在“性”这件事上更被动、更易受到侵害的一方。然而晓珍是个例外。正如陈老师在“辩词”中所说的那样，晓珍常常会用“亲吻”的方式来表达对某人的好感，尽管这样的行为在干预中心里并不会引发什么误会或冲突，但令人担忧的是，等她将来走出机构时怎么办？

有的文艺作品会将自闭症人士塑造为一群难以对身边人产生情感依恋的“怪胎”，而康复从业者们则强调，他们并不是“没有情感”，而是不懂情感表达的规则。在老师眼中，晓珍热衷于用亲吻表达好感的举动并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情感能力，而是严重的“行为问题”，老师们有时干脆称之为“乱亲人”。蓝老师几度试图给晓珍灌输关于亲吻的人际规则，希望她理解什么人“可以亲”，什么人“不能亲”：

“荆凯是你什么人啊？”

“是同学”，晓珍不假思索地答道。

“同学可不可以亲？”

“……”晓珍不语。

蓝老师要求晓珍跟着自己一字一顿地重复：“同学不可以亲！”

“什么人可以亲？”蓝老师又问，

“……”晓珍依然默不作声。

蓝老师有些无奈：“爸爸妈妈可以亲！”

“爸爸妈妈可以亲……”晓珍跟着说。

蓝老师似乎又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补充道：“除非人家同意，否则什么人都不能亲！”句子太复杂，晓珍只能重复最后几个字：“……都不能亲。”

类似的教导经历了许多回，晓珍“乱亲人”的问题依然没得到改善。她一边重复着老师的训诫，转过头又把嘴巴贴向班上的男生。亲吻并不是她表达情感的唯一方式，有时她会一遍遍念叨着身旁男孩的名字，脸上绽放出微笑：“阿健，阿健……”。老师们无从判断晓珍是不是真的对那个叫阿健的男孩有好感，只能严肃地警告她：“不要调戏阿健！”大家也不清楚，晓珍是不是真的理解“调戏”这个词的意思。

老师们把晓珍触碰、亲吻班上男生的行为形容为“招惹”，认为这样的“招惹”背后或许隐含着与异性交往的需求和欲望。在老师们看来，正因为晓珍比班上其他孩子“能力好、懂得多”，她的一举一动才没有那么简单；也正是因为她对“性”这件事似乎有了超越其他孩子的感知，甚至对身边的男孩产生了朦胧的爱恋之情，她那超越常规的情感表达才更加“危险”、更加需要防范。

在陈老师还没入职向阳干预中心的时候，中心有另一位张姓男老师。张老师身材笔挺，浓眉大眼，很受孩子们喜爱。老师们有目共睹，晓珍对张老师似乎有着超乎寻常的依恋——看不到张老师的时候，她会突然冒出一句：“张老师呢？”发脾气哭闹的时候，也只有张老师能劝好她。有的女老师还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晓珍可喜欢张老师了”。张老师总是尴尬地笑笑，不作回应。

张老师辞职离开后，接替他的是陈老师。对于这位身材壮硕，表情威严的男性老师，

晓珍和班上其他孩子一样，更多的是畏惧。

06

“施暴者”陈老师

陈老师身材微胖，但为人腼腆，少言寡语。在特教老师这个以女性为主的行业里，男性是稀缺品，也是康复机构努力争夺的资源。对于向阳干预中心的“大龄班”而言，“男老师”的角色更是不可或缺。

整间干预中心一共只有三位男性老师，一位是作为总负责人、早已退出一线教学的杨主任，一位是负责给每个孩子做发育评估、制定训练计划的课程主任孙老师，另一位就是上岗刚满一年、被安排在大龄班的陈老师。授课之外，陈老师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大龄班的“纪律”，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在大龄班学员们发脾气、或是出现激烈的行为表现时将他们“控制”住。相比于瘦弱的女老师，强健有力的身型是陈老师承担这项工作的优势，可即便如此，与这些特殊少年的正面交锋也常常让他负伤。他曾像展示军功章一样对我展示手臂上的各种伤痕，一一讲述每道伤痕的始作俑者：“这是某某掐的，那是某某打的”。或许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工作体验，在与我聊起社会对大龄自闭症人士的恐惧与排斥时，陈老师竟也展现出“理解”的态度：

“我们干这一行的见到这些孩子发脾气，有时候还心惊胆战，何况是缺少背景知识的普通人？”他指着班里个子最高的男孩阿健问我：“这么壮的孩子站在你面前，挥手踩脚的，你害不害怕？”

刚刚从小龄班转到大龄班做志愿者时，我也难免心中忐忑。杨主任一早提醒我，在大龄班工作，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注意自己的“安全”，仿佛这群少年是需要时刻提防的“危险分子”。事实上，在大龄班工作期间，目睹这些青少年“发脾气”的确是常有的事，但我自己从未被他们伤害过。陈老师则不同，身体对抗就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有一次，小龄班一个男孩突然在餐厅里尖叫起来，对声音极度敏感的阿健大发脾气，重重打了男孩一巴掌，又紧张地捂住耳朵缩回餐厅一角。面对这个喘着粗气、大汗淋漓的高个子男生，女老师们都不敢靠近，只能把陈老师推到前面，抱住全身颤抖的阿健，带回教室安抚。

陈老师最近一次受伤是因为大龄班一个叫庄朝阳的男孩。某天团体课上，这个 15 岁的干瘦男孩突然兴奋起来，他从座位上弹起，一面原地转圈，一面吸吮着拇指，嘴里不时发出“嘎嘎”的声音。陈老师试图把庄朝阳“摁”回座位，拉扯中，肩膀反被奋力反抗的庄朝阳狠狠咬了一口。

这种在大龄班里司空见惯的画面其实常常让我感到不安。就像被老师们定义为“自我刺激”的庄朝阳，大多数时候，大龄班的孩子之所以受到斥责与控制，并不是因为他们造成了伤害，而是因为扰动了秩序。在不那么危急的情况下，身体的规训是否总是必要？可另一方面，在这间康复训练几乎失去意义的教室里，这些难以规训的身体又显得格外扎眼。

陈老师把自己的工作视为一种“高危职业”，让他感到不平的是，孩子受了伤，家长就要不依不饶地追究老师的责任，而当老师自己被孩子们抓伤咬伤，却鲜有家长作出什么歉疚的表示。有的家长甚至认为，处理孩子的情绪问题原本就是特教老师作为“专业人士”的职责所在。

“缺少专业资质”也是晓珍妈妈对干预中心老师的指控之一。在关于康复机构虐童事件的相关报道中，媒体将这一点归结为特殊儿童遭遇暴力对待的重要原因。为了提升“专业性”，许多新兴的康复机构开始聘请医生、行为治疗师、和在海外接受训练的教育专家作为“督导”，以迎合家长们挑选机构的标准。然而在大多数机构里，实际承担一线教育干预工作的仍然是像陈老师、蓝老师这样的“特教老师”。

特殊教育这个行业需求量大，但待遇低、流动性极高。缺少财政支持的民办康复机构不得不大量招收小段老师这样的实习生来填补人手的不足。向阳干预中心的特教老师们大多来自师专院校的特殊教育、幼教或康复学专业，在进入干预中心前，他们实地操作的机会并不多。大多数人是在上岗后持续不断的短期培训和跟着行业前辈“做中学”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特教老师。向阳干预中心是彭城残联指定的自闭症康复机构之一，根据规定，这里所有特教老师需要通过中残联组织的“孤独症康复教育上岗培训考试”。可即便通过了培训考试，也无法解决他们工作中面对的所有困惑，比如晓珍的亲吻行为，比如庄朝阳的“自我刺激”。

有一次带大龄班学员上厕所时，陈老师指着几个没洗手就匆忙冲出来的男孩对我感叹：“如果专门拿出时间来教这些孩子上厕所，可能比天天给他们做桌面认知训练有意义得多”。然而最难办的是人手调配问题。中心所有老师们几乎每个时间段都被安排了各自的授课任务，如果派一位老师专门帮大龄班孩子做一对一的如厕规则练习，同一时间里，班里的其他学员就有可能无人照看。

让陈老师尤其不满的是干预中心在大龄班和小龄班之间不平等的资源分配：“中心把大部分的教学骨干力量都投入在小龄班，因为小龄班更容易出成果啊！”他对大龄班在干预中心的边缘位置有着清醒的洞察，甚至认为，从晓珍难以矫正的行为问题，到班里几个男孩子频繁的情绪爆发，都与大龄班潦草敷衍的课程设计有着脱不开的关系。但疲于应付指标化授课任务的老师们却几乎没有精力对这些问题制定针对性的引导方案，对他们来说，在训练课之余，光是看护好这些身型高大、自理能力却依旧不足的少年，已是十分繁重的工作。陈老师完全能预见，一旦热衷于用亲吻表达好感的晓珍走出中心大门，可能会招致怎样的麻烦，可面对她的“故技重施”，自己胸中却只有无法克制的恼怒。

尾声：和解与摄像头

在外地学习学习的杨主任匆匆赶回了干预中心。一进机构，他就把蓝老师、陈老师、和重要“证人”蔡老师陆续地叫进了办公室。几天以来，晓珍“被打”事件让中心上下酝酿着一阵紧张的气息，关于晓珍、晓珍的家庭，以及陈老师的种种议论已然蔓延

开来，可真相却依然晦暗不明：

陈老师的供词是否属实？晓珍到底是在“鹦鹉学舌”还是在陈述遭遇？她手上的伤口，到底来自陈老师的鼓槌，还是床边的木刺？伤口裂开是不是真的与音乐课上的非洲鼓有关？……这一切都由于缺少目击者而变得难以查证。这场伤害纠纷也因而成了一桩难以揭开事实迷案。

经营干预中心十几年的杨主任对处理这类冲突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一面批评了陈老师的工作方法和蓝老师的失察，另一面则竭力安抚晓珍妈妈，并私下提醒她：“年轻老师处理问题缺乏经验，可你是老家长了，你的态度非常影响我们老师的工作热情。大龄班的工作不容易，老师们也是人，你骂的这么难听，要晓珍以后在大龄班怎么办？”

根据此前干预中心与大龄班家长们的协议，孩子在这里“最多待到 18 岁”。众所周知，晓珍是整间机构里年纪最大的学员，或许再过几个月就要把她的“去留”问题拿到台面上来讨论。大龄班的家长们清楚，如果孩子离开了向阳干预中心，就可能面临无处可去的境地；上学的希望已经落空，整个彭城倒是还有几家心智障碍者照护机构，不是远在郊区，就是收费偏高，还不知道有没有招收门槛、孩子能不能适应。对晓珍这样的孩子来说，干预中心就是他们从小到大最熟悉、最安全的去处。

在干预中心之外，家长们不是没有为孩子寻觅过其他容身之处，但“安全责任”之类的借口却让他们屡屡碰壁。人手原本就十分紧张的干预中心，其实也有同样的担忧。几个月前，大龄班的荆凯差点从二楼窗户跳出去，当时杨主任就打算劝退这个管不住”的男孩。在荆凯母亲再三恳求之下，杨主任才松了口。这一次，如果晓珍妈妈硬是要对机构追究到底，即将满 18 岁的晓珍是否也会被提前“劝退”？即便干预中心没有“劝退”晓珍，与女儿朝夕相处的特教老师结了这么大的梁子，晓珍未来在班里的处境又会如何？

不知道是不是杨主任的策略起了效果，晓珍妈妈似乎冷静了下来。她在微信群里的态度 180 度大转变，反而为中心辩解起来。她承认，自己和孩子爸爸确认过，女儿胳膊上确实是上周末的旧伤。对于年轻的陈老师，晓珍妈妈也表示了谅解，希望他“放下包袱好好工作”，同时也委婉地表示，自己不满意的是陈老师的惩戒方式：“晓珍现在已经对很多事情有记忆了，受到惩罚她会记很久，提醒她、让她自己承认错误比体罚效果好”。

晓珍“被打”的风波渐渐平息下来，陈老师没有被开除，蓝老师也没有被降职，晓珍依然在课堂上独自回答着“今天星期几”“你叫什么名字”之类的问题，在走廊里笑眯眯地和所有老师打招呼。干预中心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家长群里却余波未散。老师们发现，自从晓珍妈妈在微信群里对干预中心进行了一番激烈控诉，小龄班的几位家长也变得“疑神疑鬼”起来。几位以往不怎么发言的家长突然开始提要求，希望老师们多在群里分享一些孩子训练的视频；下了班的老师们也接连不断地收到家长发来的信息，询问孩子在中心的训练情况。在授课之外，应付家长的工作陡然增多，老师们在组会上纷纷抱怨起来。

面对家长的要求和老师的抱怨，杨主任吸取晓珍事件的教训，他作出决定，要在整间机构的角角落落安装摄像头，实现“教室全覆盖”。这样，家长们对孩子在机构的遭遇有任何疑虑，就可以直接去看监控视频。

老师们对装监控这个决定反应不一。在干预中心里，他们并没有专门的休息和办公空间。有的老师过去会将自己上个别化训练课的小教室当作私人空间，在里面午休，课间也可以在里面偷偷吃点零食。一旦安了监控，一言一行都在家长们的注视之下，这让他们觉得很不自在。疲于应付家长的小龄班班主任李老师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装了摄像头也好！也让那些家长们看看，我们老师到底有多辛苦！”

打孔、拉线、连网、调适，几乎一天不到的时间里，整间机构的监控设备就已安装完成。微信群里，几位家长为干预中心的效率竖起大拇指。

然而几个星期后，几位小龄班孩子的家长专程来到办公室，恳求杨主任撤下大龄班的摄像头。透过“全覆盖”的监控视频，他们不但能看到自己孩子的训练情况，也能看到那间挤着九个少男少女的逼仄教室，眼见这群青少年“年龄这么大，却只能呆在干预中心里”，几位刚刚踏上康复之旅的新家长感到难以抵挡的恐慌与绝望。一位母亲指着监控画面不安地问：

“我的孩子以后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本文中出现的城市、康复机构、校名、人名均为化名。



安孟竹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毕业，结绳志编辑，关注现代人的道德生活和一切边缘的生命形态。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非虚构

菜市场人生

钟淑如 | 田野中国

这些普通人的普通情感，在菜市场共治一炉

“我现在这么辛苦，就是不想让我孩子继续干一行。”田野调查期间，我记录了 113 个海南菜市场摊贩的人生故事，最常听见这句话。因为深知当中的苦累，摊贩们才有如此希望。如果每个摊贩都愿望成真，那这个行业大概会后继无人。事实是，菜市场里纷纷扰扰，人来人往，里面的人停不下，甚至外面的人想进来。多数摊贩认为在菜市场讨生活是无奈的选择，直到年岁长了，那些酸甜苦辣，才翻涌出来，成为他们菜市场人生的注脚。

01 生意经

慧姐 [1] 觉得她的海鱼生意是整个椰风市场最好的。她所在市场每隔两年需要摊主重新抓阄分配摊位，她自信地说，即使她的海鱼摊挪到旮旯，熟客都会找她买鱼。

慧姐八五年生，海南本岛人。她老家是著名的渔港，因此从小跟着妈妈和家里亲戚沾上卖海鱼的活计。慧姐个头不高，能量十足，每天能从早上五点折腾到晚上八点收摊，中间不停地招徕客人，仿佛每个进市场的人她都认识，还要寒暄：“为什么不来我这里买鱼！”，极具穿透力的声音让被叫住的人无法躲藏。

慧姐小时候家里穷，性格跟读书八字不合，二年级便辍学了。慧姐并非孤例，调研个案中，只有 17% 的摊贩有高中或以上学历。但慧姐丝毫不因学历而影响自信，反而经常把“学历不如经历”挂在嘴边。现在，慧姐在市场经营着三个相连的摊位，和丈夫一起打理，年收益廿万不成问题。

慧姐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归结为两点，一是拼劲足，二是诚信。慧姐十三岁开始跟着妈妈挑着箩筐在村里游走卖海鱼，十五岁开始单干，但是没几个月就把辛苦存起来的两千元全部亏光。后来到海口打工存钱，但是终究耐不住想当老板的性子，回来继续摆摊卖鱼。第一次的失败经验让她更加沉着冷静，她学会谨慎判断，观察每天的销量，分析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口味，确定畅销的鱼种之后再加大进货量。

“骗人一两，短寿一年”，慧姐认真笃定地说。她绝对不做缺斤少两的一次性生意，而是奔着建立买卖双方的信任关系去的。因此，慧姐积累了一批忠实客户。市场上依靠家庭顾客利润有限，很多摊贩的大部头收益实际上来源于餐厅、学校、工地等机构性客户。慧姐最大的客户之一是附近的部队，有时候给部队供应的鱼要价比较贵，她不赚钱也要继续供，目的在于留住客源，牺牲短暂的利益换取长久的合作关系。我目睹慧姐跟顾客讲价，有个负责工地采购的老板娘，也是老主顾了，到慧姐摊跟前。她看上了扒皮鱼，慧姐要价十八元，老板娘还价十五元，慧姐同意了。老板娘前后要了七八种鱼，加起来超过一百斤，其中巴浪鱼慧姐按低于进货价的五毛钱卖给她。慧姐说这叫抓大放小，不要因为局部而影响全局，只要整体能赚钱就可以。但是，嘴巴上慧姐依然卖乖：“今天都亏给你了，亏死了亏死了”，一边继续跟老板娘唠嗑，

手上飞快地处理起鱼来。因为业务过于熟练，她甚至不低头也可以刮鱼鳞，去内脏一连串动作一气呵成。

慧姐的丈夫成哥之前是船工，后来因为跑船危险且收入不高，索性跟慧姐一起卖鱼。在海南的海鲜产业分工图景里，海上捕鱼的事情由男性垄断，但是分销、零售等下游链条由女性主导。海南的菜市场里，女性也占多数，是无法忽视的存在，就连猪肉牛肉这类刻板印象中充满男性气概的摊位，也有不少女士豪杰在操持。估计成哥也会同意“还是海南女人会讲价”的说法，他本人沉默寡言，在慧姐跟客人舌灿莲花的时候，成哥在一旁麻利地杀鱼，面无表情，沉稳得像把市场的嘈杂纷扰都隔绝了，伫立在我自己结界里。

成哥其实也很体谅慧姐的辛劳，承担了许多幕后工作。早年到码头进货都是慧姐跟妈妈完成，后来成哥接替。2017 年开始，原先位于市中心的码头要让位置给房地产开发，搬迁到五十公里外，来回交通就要花费两个小时。为了赶上早场六点多的第一波菜市场顾客，成哥和父母娘凌晨三四点就要出发到码头寻货。

海南的海鲜码头，不熟悉行情的新玩家要磕得头破血流，交许多学费。在遇到供应紧俏的鱼类时，血气方刚的年轻商贩喜欢飚价以取得货源，结果要得越多，亏得越多。好在成哥有经验丰富的丈母娘带着。码头的船老大、代销、收购商、市场鱼贩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没有亲戚从事相关行业，陌生人很难入行。有不少市场鱼贩家里人就有开船的，从源头保证了比较稳定的供应。慧姐舅舅也还在经营者一艘小船，有时候也能供应一部分。成哥之前在商业捕捞船上的经验也派上用场，能准确判断鱼的捕捞方式和新鲜程度。

成哥每天需要寻找二十多种鱼类，货品组合依靠时令、价格、消费者需求来判断，比如节假日要进马鲛，因为马鲛是海南人的节庆餐桌上的必须。每年 11 月份开始，慧姐也会叮嘱他看着带鱼的行情，东北的候鸟老人要飞来岛上过冬了，他们最喜欢带鱼。做海鲜生意有说不完的学问，买进卖出，价高价低，瞬息万变，需要依靠关系，却不能只靠关系，需要常年累月的经验学习，以及灵活变通。

成哥在六点前把海货送到市场摊位后，短暂回家休息几个小时，有时候还做好中饭带到摊位和慧姐一起吃，下午一起卖鱼。忙的时候顾不上饭，等客流少了才想起来要吃饭，拿几条小鱼，再从旁边蔬菜摊捞点青菜，到市场后面的快餐店加工一锅熟，边吃边看摊。一年到头，每天如此循环往复，只有过年关张，休息三天。

慧姐家的生意好，同行都看在眼里。慧姐说菜市场里最常见的病是红眼病，她这么些年也听了不少酸溜溜的闲言碎语。对于有的鱼贩而言，世界小到只容纳了他们周边的几个摊位，平时沟通并不多，反而弥漫着竞争气息。在有些市场，因为抢客人吵架和打架的事情也不鲜见。但是，竞合关系也可灵活切换，比如同是卖鱿鱼的本是竞争对手，有一段时间鱿鱼行情很高，几个摊主就联合起来，组成买家俱乐部，均摊成本，避免恶性竞争。

慧姐表示她喜欢跟“高端”的人做朋友，这样自己才能进步。她不想把自己的眼界禁锢在菜市场，不断地钻研市场外的营生。经朋友介绍，慧姐接触了某品牌减肥内衣的生意。该品牌是直销模式，通过发展下线，“经营团队”获益。有段时间慧姐把鱼摊交给妈妈打理，只留下了大客户的送货生意，一心扑在美体内衣事业上。



补网



卖马鲛鱼

起初，各种培训会、品鉴会上那些赋能女性、关爱自己、自信无敌之类的话语确实冲昏头脑，让慧姐沉浸在飞黄腾发的梦里。但是，不到一年时间，慧姐发现卖给亲戚朋友内衣赚的钱都搭在去全国各地参加该公司举办的培训班、庆功会上。有个好朋友堆了从慧姐处买的价值两三万的几十件内衣卖不出去，要找她麻烦。慧姐渐渐想通了，又重新出现在鱼摊，也不逢人就推销美体内衣了，继续大声叫卖她的靓海货。现在，慧姐最操心的是一双儿女的学习，大娃快初中毕业，生意之余，照料他上各种培训班。慧姐希望给到孩子力所能及的最好，让他们长大以后不用在菜市场上混。

02 老爸茶

标叔是有代表性的海南中年男人，年近五十，大腹便便，常年汗衫拖鞋，说着口音浓重的海普，遇事嘴笨，不会说漂亮话，但大部分时候待人和善，喜欢笑眯眯地说，“走，吃茶去”。标叔这辈子还没离开过海南，对岛外的世界不感兴趣，最喜欢每天下午在老爸茶馆消磨时光，摊在椅子上放松放松上午杀猪卸肉紧绷的手脚。

标叔在南国市场卖了二十多年的猪肉，当年是被一个同村的表叔带土道的。海南菜市场的猪肉零售同乡同业现象明显，在海南菜市场的猪肉区喊一声“谁是万宁人”，可能会有一半摊主回头。在缺乏特殊自然资源的区域，流出人口往往依靠乡土社会网络从事非正式经济活动，所以来自从同一区域的人倾向于从事相同行业或者同一产业链。在海南菜市场里，猪肉行当离不开万宁老乡，海鲜行业有很多临高人的身影。问标叔有没有想过转行，标叔直摇头，“转什么行，卖猪肉好，不用成本，不用想，好做”。

如果想要在菜市场开一个猪肉摊，启动资金可能只有摊位费，跟屠宰场关系好的话，还能先赊一头猪，卖完再给钱。但是，启动了不能保证赚钱，如果市场已经饱和了，新人很难抢客。因为肉类的食品安全问题多，海南人倾向于长期在同一个摊位买肉。再者，新人要学会猪肉分割技术，比如让猪肋部的肉多切成排骨，但是粘连的肉不至于厚到被消费者嫌弃，就是实打实的技术活。假如排骨上的肉分割得太干净，那就只能当五花肉来卖，价钱相差大。标叔回忆当年，说自己只看了表叔舞了一口烟时间的杀猪刀，就自己动手了，展现了割肉天赋。

标叔的盈利随着猪周期而波动，猪老板笑时他要哭，因为猪贵时，进货贵不好卖，一头猪只能赚两三百，最差的时候甚至要亏。猪进货价便宜时，消费需求比较旺盛，才能多赚点。一头猪赚超过千元的好光景标叔也经历过。大多数摊贩一天卖一头猪，晚上收摊，除去成本，立马就知道当天收益，赚的是安稳钱。标叔说自己没怎么读书，也不会攻心计，这种直接敞亮的营生最适合他。

标叔年轻时很拼，一天卖两三头猪。现在对生意很佛，一天一头，卖完收摊。他随时可以退休，只是习惯了干活，整天呆在家里还不如出来杀猪卖肉活动身体。他还是保持每天五点前到达摊位，等着熟识的小哥把生猪送来。

有些谨慎的肉贩自己到屠宰场挑猪，标叔跟屠户合作很多年，放心让屠户帮忙挑。市场有个生意很好的肉贩，自己到乡下收黑土猪再送去宰杀，据说猪肉风味更佳，因此档口前经常大排长龙。标叔也不羡慕，继续倒腾自己的白皮猪。那些买个黑猪皮脸放在摊位前迷惑消费者的事情，他也没干过。



卖猪肉的夫妻档

等两三百斤的猪送到，标叔开始忙活，手握磨得铮亮的刀，辗转腾挪，整猪很快变成各种精细部分，打开红灯照着，让猪肉看起来鲜亮诱人，偶尔还抹上一小把盐保鲜，再开火枪把猪腿毛烧干净。同时，标嫂按昨天客户下的订单，进行绞肉碎、切细块等操作，再用红色大胶袋把肉分装好，改单、下单、催货的电话不断打来，让标嫂也忙得团团转。

六点开始，追求新鲜的早鸟到达菜市场，标叔边料理猪肉边招呼客人，遇到熟客还多聊几句。到八点，早高峰过去，同为切肉好手的标嫂接管摊位，标叔开着小电驴去送货。十点左右，忙碌暂告一段落，标叔溜进早餐店，点上一碗加料喷香的海南粉，有时候搭配一碟白灼粉肠，二两店家酿的烧酒，慢慢呷，享受自己的贤者时间。

早餐店里都是熟人，一圈招呼过后，结账时请几份早餐是常有的事，所谓有来有往，常吃常有。早餐过后，标叔回到市场，帮忙兜售所剩无几的猪肉。临到中午，打折卖，若还有剩下，就便宜卖给附近的小饭馆。标叔的摊只做半天生意，下午是他的专属休闲时光。标嫂也不遑多让，在收摊前已经约好了几个朋友下午唱卡拉OK。

午后，标叔照例溜达到二妹老爸茶。“老爸茶”是海南特有的茶文化，类似成都的茶馆。因为主要消费群体是有闲暇的中老年男性，在海南南部尤甚，老爸茶因此得名。老爸茶馆开设在老街巷中，装修简陋，十几张边角磨得乌黑的矮木桌撑开，摆上大排档的塑料靠背椅，每人十块钱一壶茶，可以续开水一整天。茶是普通的茶叶泡的，有的老爸茶馆提供海南本土的兴隆咖啡，是当年南洋华侨带回来的风尚。

海南北部如海口琼海，吃茶实际上吃得的是琳琅满目的点心，斑斓糕、鸡屎藤糖水、清补凉、猪血煲、煎堆等等。南部如三亚的老爸茶，比较纯粹，零嘴只有水煮花生、炒瓜子之类。卖零食的姑娘举着托盘来回逡巡，一般人会耐不住嘴馋要上两盘。二妹老爸茶馆难觅女性踪迹，烟雾缭绕，海南叔们咪一口茶，凑齐一桌开始推牌九，标叔也加入战场。

不打牌的时候，标叔曲腿上凳，吃茶发呆，有时候和朋友一起“研究”厚厚的私彩预测材料。五颜六色的奖表上印着过去的开奖号码，每一本“秘籍”都有独家的运算方法，推演下一期的开奖号码。争论的声音很大，也有上期某某梦到的号码中了大奖的传说漂浮在空气中。标叔经常买私彩，但只是娱乐的小钱，“打奖来玩的”。

标叔也确实不需要靠赌钱发财，早年的勤奋让他在市中心攒了一套房子，前阵子被征收了，可赔偿四五百万元。标叔完全没有野心去赚更多的钱，现在的生活很闲适。他说，钱多了也麻烦，因为老家的兄弟姐妹会来借，他会仗义相助，每年各种红白喜事也花销很大。



在老爸茶馆做访谈

标叔倒是会劝儿子存点钱娶老婆。他动用关系，央求市场经理给他儿子弄了一个摊位。小伙与他发小合伙，卖三文鱼。三文鱼是从广州的经销商定的，来自挪威。旅游旺季的时候，游客喜欢到市场来买海鲜，再到在市场外面的海鲜街加工吃饭。小伙的三文鱼生意火爆，过年那几天，一天能赚超过一万元，平日最差也有近千元可赚。但是，年轻人爱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赚钱少的时节不愿开摊。赚到钱后呼朋唤友，流连酒吧、饭店、夜总会，也很快把钱挥霍完。标叔骂了几次，无果，索性也不管。标叔笃信再过些年，儿子就会懂事了，毕竟再发愁，老爸茶也是要继续喝的。

03

革命菜

叶姐就像她卖的“革命菜”，被割了一茬儿，再长一茬儿，柔中带刚，任何困难都打不倒。革命菜也叫树仔菜，天绿香，本是一种热带灌木，只吃嫩梢，这吃法据说还是海南的红军游击队发明的，因此叫革命菜。革命菜的主产区是海南五指山运来，和另一种叫四角豆的当地特色蔬菜，组成叶姐菜摊的主打菜品。

叶姐和丈夫都是福建人，1988年，叶姐结婚。婚后不久，海南建省和经济特区的新闻铺天盖地，叶姐丈夫的朋友说海南有许多发展机会，鼓噪他们来海南淘金。叶姐想着反正乡下也只是耕田种菜，还不如拼一把，于是夫妻俩奔波到海南。经过长途大巴渡海轮船，折腾几天才到达，一落地就傻眼，幻想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没看见，像样的马路都没几条，“简直比我们老家还要穷”。但是，临行前已经告知诸位亲友，就这么打道回府挂不住面子，他们决定先留下观望一阵。这一扎根，就是三十多年。创业之初，叶姐丈夫跑三轮帮人拉货，后来跑摩的。叶姐在近郊租了几亩地，自己种菜来卖，海南夏天日头热毒，很难种出叶菜，叶姐就向本地的农民请教适合本地水土的菜品。最开始那几年，叶姐没有在市场租固定摊位，直接在路边摆摊。第二年儿子出生，叶姐边卖菜边带娃，孩子醒了拿蔬菜逗一下，哭了就哄着放到垫着棉布的菜篮子睡觉。叶姐回忆，那些年每天累到眼睛发直，但是不敢停下来。

叶姐的经历印证了一个人的命运，既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也要靠自我奋斗。1992年，南国市场开业。在“菜篮子工程”的政策刺激下，全国各大城市掀起了菜市场建设高潮，同期无数个菜市场拔地而起。同时，私有制改革逐步深入，菜市场产权复杂化，南国市场是市政府保留产权的四个菜市场之一。

经过几年奋斗，叶姐有小额积蓄，她在南国市场租了两个摊位，成为市场的原住民。新市场开业，需要时间聚拢人气。好在市场位于市中心，又干净敞亮，楼上就是服装城，改革开放的旺盛消费需求让市场的各类生意很快走上正轨。进入市场的第二年，叶姐的二儿子出生，他跟哥哥一样，都是在菜篮子里长大，但又比哥哥幸福，不用风吹日晒，而是有瓦遮头。叶姐还打趣说，两个孩子是她的福星，因为很多顾客看到她带着小孩卖菜可怜，会照顾她的生意。

2000年前后，海南旅游起飞，小岛打着“东方夏威夷”的名号，吸引各地游客蜂拥而至。南国市场里做游客海鲜生意的摊位也逐渐多了起来，多数游客们也并不知道诸如龙虾鲍鱼等海产实际上由广东运来。在南国市场买海鲜，再到市场外的加工店烹制，成为游客体验地方原真性饮食的保留节目。



革命菜和四角豆

机敏的叶姐嗅到了商机，游客买了海鲜之余，经常也逛到她的菜摊，问有什么当地特色菜。叶姐尝试进了一些在外地不常见的革命菜，还有四角豆，结果很快被一抢而光。尽管市场上的其他菜贩也很快学到了这招，叶姐还有别的办法。游客通常是被跟海鲜加工店有利益关系的女性“向导”拉到市场的，她们负责给游客介绍各类海鲜，推荐做法。

叶姐和向导“合作”，带客人到她摊上买菜的向导，在当天收摊的时候，可以免费拿些蔬菜回家，作为报偿。革命菜给叶姐的生意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叶姐的摊位从两个扩展到六个，占据了蔬菜区一个方形矩阵的一整面。叶姐和丈夫忙不过来，又把家里的亲戚叫来两人，另外雇佣了两个帮工。

勤奋也不足以描述叶姐做生意的狠劲儿，最忙的时候，她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晚上市场里虽然快没人了，她不舍得走，边等补菜做夜宵的那几个小炒店老板，边整理韭菜，一根根地把最外层的老叶撕掉，码好，回到家，往往已经是十一点。

叶姐也发展了许多大客户，她的菜摊几乎是整个市场品类最丰富的，每天有超过五十种供应。除了到本地批发市场进货，她有部分货源直接来源于广州，包括芦笋、新鲜莲子、冰菜等“高端菜”，这些是她在广州的江南果蔬批发市场联系到的批发渠道。

危机悄然而至。2012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往后几年，铺张浪费的公款消费得到遏制。对小商贩而言，却是巨大冲击。海南岛上的许多饭店一下子冷清，不少老板关店跑路。叶姐有很多饭店客户是月结，关系好的甚至三月一结。这一波饭店倒闭潮让叶姐超过一百万的菜款打水漂，简直是生意的至暗时刻。

直到现在，叶姐想起来都后怕，只允许信用最好的几个客户月结，其余送货的顶多

赊账一周。2016年，传来另一个噩耗，叶姐丈夫被确诊胃癌。叶姐刚知道消息时，整日以泪洗脸，硬净^[2]的她很快调整情绪，叫小儿子学习照看生意，自己陪着丈夫到广州求医问药，好在丈夫经过几次化疗后病情逐步稳定。

2017年，老码头搬迁，叶姐的生意再受打击，许多渔船的蔬菜订单中断了。叶姐忍痛辞退跟了自己很多年的帮工。经历了种种，丈夫萌生了回家养老的念头，叶姐考虑再三拒绝了，打算再干几年。叶姐觉得，眼前再难也没有当年摆摊卖菜苦，卖菜成就了她在海南的人生，她还要像革命菜一样，迎难而上，再发新芽。

04

独立梦

小阳和女朋友小雅眼下最渴望的事情，就是把冻品摊经营好，早日过上经济独立的生活。小阳廿岁出头，女朋友小雅是大专电子工程专业的同学，也是河南老乡。快毕业时，小阳的工作还没着落，在家里闲了几个月后，小阳爸妈叫他来海南谋生。俩人感情稳定，不想分开，于是小雅也一起南下。

小阳爸妈在海边的小吃街经营烧烤摊，这是日夜颠倒、竞争激烈的行当。一家人在小吃街附近租了房子，白天小阳和小雅帮忙准备各种串儿，晚上出摊，跟着爸爸学烧烤手艺。小阳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他本来的梦想是当一个职业的游戏玩家，再不济也是游戏主播，眼下烟熏火燎的生活着实让他煎熬。小雅平日喜欢化妆美甲，也不太适应整天洗菜穿串儿，毕竟再多护肤品也难挽救泡肿的手。

俩人商量后决定单干。考虑到爸妈的烧烤摊需要冻鸡翅、鸡胗、丸子、羊肉串等产品，所以他们计划开冻品摊，从供应端帮爸妈节省成本，也能给附近的烧烤摊供货。得到爸妈的支持后，小阳更加对这个绝妙点子感到兴奋，他畅想赚到大钱，衣锦还乡的美好未来。



冻品摊

没料想到，光寻找合适的摊位就遇到困难。有空余摊位的市场在比较偏僻的郊区，不靠近客源，而市区的老市场早就饱和。在小阳不知所措时，爸爸的一位朋友告知市区的光明市场在招租的消息。光明市场原来是市区数一数二的大市场，初建于1995年，有357个摊位，一直由光明社区控制管理。但是近年来，市场的设施设备逐步老化落后，卫生状况堪忧，与文明卫生的城市形象大相径庭。于是，光明市场成为第一批被改造的市场之一。

又因光明市场所占地块商业潜力巨大，当地的一家商业地产公司提出，由他们出资把市场改造成商业综合体，收益与社区共享，老摊主亦积极响应这一提案。殊不知，改造将近完成，老摊主才得知，市场要被放置在二楼，一楼要留给珠宝化妆品等高租金客户。老摊主们顿时怒不可遏，高呼被骗。因为二楼上下货极为不便，且老年人不愿爬楼梯买菜，会流向市场外的路边摊或者周边市场，给老摊主的生意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老摊主进行过罢市、投诉等集体努力，但是商业公司声明，老摊主若不按时搬迁至新市场，摊位资格作废，还宣称有四百余人在等待入驻新市场。老摊主联盟顿时人心涣散，以保住自己的摊位为先，抗议行动流产，新市场如期开业。进场后，老摊主剩下的半截心也凉了，租金涨成原来的三倍。事实证明，老摊主的判断没错，因为菜价要上涨来抵消租金压力，且二楼的确交通不便，开业之后生意大不如前，新老摊主都有陆续退出，空出了不少摊位。

小阳对光明市场管理方的苛刻条件有所耳闻。旁边卖蔬菜的阿姨就告诉他，商场其他楼层的招租也不太顺利，管理方想方设法回笼资金。光明市场摊位费比市里的其他市场贵一倍，一次性还要交两万押金，签一年合约。若合约未满退出，要扣掉五千元违约费，剩余押金还可能一直拖着，很难要回来。但是小阳志在必得，最后还是请父母资助了五六万元，把摊位租了下来，购置了二手冰柜，进了一批货，准备大展拳脚。

但是，现实残酷。小阳很快发现经济独立梦愈来愈远。冻品生意门槛低，竞争大，利润率很低，盈利必须靠大量出货，但是父母的烧烤摊用货量有限，他必须开拓新的客源。他只能厚着脸皮，逐一上门拜访周边的餐厅和烧烤摊，推销生意，但他的价格没有竞争力，多数餐厅已经有品牌直销的渠道。他只挖掘到了一些特殊品类的小单。小雅守着市场的摊位，招徕零售顾客。海南人对冻品有天然的反感，所以也不好卖，很多时候一整天下来，零售额不足两百元。手机也许没那么好玩，只是生意实在冷清，开摊时小雅除了玩手机也无事可做。

小阳算了一笔账，开业三月以来，每个月都在亏，且没有收窄的趋势。因为有些丸子许久卖不出去，小两口自我消耗，天天吃干锅，吃到上火。小阳想念河南的玩伴，也想念北方干爽的天气，海南的酷热掺得人愈加烦躁。但是，他们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撑完这一年的合同。他们把剩余的希望寄托在冬天，冬天一到，候鸟老人和游客会涌入小岛，海南菜市场的旺季也会如期而至。

05

候鸟情

梅姨年近七十岁，和老伴儿从2010年开始，每年十月底到海南，次年四月份再回吉林长春老家，像候鸟一样迁徙。每年像梅姨一样到海南过冬的候鸟预计超过一百五十万人，而整个海南省，仅有三个城市的人数超过百万。候鸟多为老年人，以东北人居多，被海南冬天温暖宜人的气候和优质的空气吸引而来。有不少老人身患疾病，觉得在海南过冬有助于康复。

海南的房地产市场为候鸟提供了多样选择，有的人选择住进为候鸟量身定做的小区，康养设施齐备，还包一日三餐，预算较少的人选择在郊区租自建房。梅姨嫌租房麻烦，她第一年来过冬就喜欢上了海南，旋即用积蓄买了一套二居室的房子，也算在异乡有个安稳的小窝。后来海南房价跟着国际旅游岛、自贸区等政策热度，猛涨了几波，继而全岛限购。

梅姨很庆幸自己当年的决定。季节性激增的候鸟给城市公共服务带来巨大压力。有的本土居民颇有微词，说冬天上班的公交车都不挤上去，也不能海边夜跑。因为海边是候鸟广场舞的坚实阵地。从早上开始直到半夜，新疆舞、交谊舞、鬼畜混搭风轮番上演，好不热闹。候鸟的到来却是菜市场摊主的福音，很多菜摊营业额在旺季可翻倍。

菜市场是候鸟接入当地的一扇窗口，透过一个个菜市场，他们得以慢慢摸清陌生城市的脉络。梅姨跟大多数候鸟一样，平日最重要的休闲活动就是逛菜市场。梅姨和老伴儿身体硬朗，每天都出门闲逛。周边的市场有什么特点，有什么菜品又好又便宜，她如数家珍。有时候也不买东西，就喜欢看个热闹和生机。梅姨说，看见市场里那么多人忙着，那么多新鲜的食物，感到自己年轻了。

每隔两三天，梅姨要起个大早，五点左右赶去东河边的早市。这个早市只运行候鸟老人集聚的这半年，以东西平价著名。梅姨虽然经济条件不算差，在集体主义时期生活过，节俭是刻印在骨子里的性格。早市四点开始，七点前结束，打战一样的节奏。原来，早市的摊贩是在当天批发市场交易的尾声迅速转移过来的，他们专门卖当天的“捡漏”蔬菜，也就是批发商错误判断商机，不得不贱卖的品种。所以，在早市上可以买到一块钱一斤的白菜。在菜价高企的海南，这真的是白菜价。梅姨喜欢早市的另一点，是可以讲价。讲价是一种乐趣，有从别人处占便宜的快感。花钱的数目不太重要，心里实际计算着“赚”了多少钱。最好的讲价时机就是早市要撤走，让道给公共交通的时候。如果跟摊贩说剩下的包圆，常能买到“骨折价”的好货。

在其他菜市场，梅姨的讲价能力没处发挥。她发现，很多海南摊主不喜欢讲价，他们一般给出来的是实价，一般顾客甚至不问价，直接买了结账。梅姨一开始还感受到语言障碍，她在市场跟摊贩沟通，大家都觉得自己说的是普通话，但实际上鸡同鸭讲，讲完互相干瞪眼。后来她明白诀窍，要问得简单，说得很慢。不过，在海南生活多年，她的海普听力已经进步很大，现在能和熟悉的摊贩愉快地聊天了。

梅姨和老伴儿注重养生，肉类吃得少。最开始那几年，她们每次从东北飞过来，会带上十几斤冻好的猪肉，吃上几个月。相比于海南猪肉，她觉得东北的猪肉味道较好，还便宜。后来也在当地买猪肉了，不过是在超市里头挑双汇、雨润这样的品牌。梅姨不能理解当地人追捧的黑土猪好在哪里。她也发现，海南本地人很少在超市买菜，但是她也喜欢逛超市。梅姨的信条是，甭管超市菜市，新鲜便宜就是好市。

海南的菜市场也的确改变了梅姨的食谱。她之前很少吃海鱼，菜市场逛多了，色彩斑斓的海鱼摊激发了她的好奇心。摊贩教她，马鲛鱼干煎，配稀饭好吃。她尝试了一回，觉得鱼肉太柴。她某天突发奇想，把马鲛鱼剁碎，加点猪肉沫包饺子，结果鲜得掉牙，老伴儿也赞不绝口。



老码头与远处的五星级酒店

梅姨从此打开了海鱼烹饪试验的大门，变换各种方法来做海鱼。除了菜市场，梅姨跟老伴儿还在清晨散步到市区的水产码头买鱼。后来码头搬迁，梅姨落寞了许久。原来不止她一个人失望，她跳广场舞的时候，认识几个也爱吃海鱼的老乡，他们商议好，每周合伙打出租车，到五十公里外的新码头买鱼吃。

除了海鱼，追求好食材梅姨不含糊。梅姨最富余的就是时间，她能花半天，坐十六路公交，从首站坐到尾站，穿过大半个城市，到郊区的“自由市场”买上几根黄瓜一袋芒果，再返回市区家中。自由市场是郊区菜农设置的临时露天市场，梅姨亲眼看到农民把田里的黄瓜豆角运来，芒果、菠萝蜜等应季水果也是自产自销，既符合当地当季的可持续原则，又实惠新鲜。最近梅姨听说在海南中部住的一个候鸟朋友租了一片地，打算自己种菜吃。梅姨很羡慕，寻思着接下来要逛一下附近哪里有地可租。

慧姐的精明、标叔的闲适、叶姐的奋斗、小阳的梦想、梅姨的寄托，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构成了海南这座城市的缩影。

的普通情感，在菜市场共冶一炉，融合成悲喜交杂、活色生鲜的人生。尽管菜市场在超市、社区菜店、网络团购等业态的夹击下，生存空间逐渐缩小，但只要还有买菜的热爱和卖菜的热望，菜市场未来还在，当中的人生故事未完待续。

[1]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所有名字均为假名。所有故事发生在海南，但具体菜市场名称也是虚构。

[2] 粤语，坚固，形容人的性格坚强、坚毅。

题图及文内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钟淑如

中山大学特聘副研究员，美国德州农工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菜市场文化、可持续饮食。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非虚构

核与非核，记忆的继承

吉井忍 | 吉井忍的二次会

有的记忆有人坚决不谈，
有的真实说了也难以让人相信

七十七年，对一个人、国家或者一个记忆来说，是足够经历兴衰和变迁的时间。1945年的两次原子弹投放，从一方面来看促使日本民众推进形式多样的“和平主义”运动。但如今经历过战争的年代越来越少，战后出生的年代占比近九成，“（日本是）唯一在战争中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过去人们在和平运动中提出的这个口号也似乎成了口头禅。日本有个词语“八月份的集纳主义”，指的是大媒体每年到“原爆纪念日（八月六、九日）”或“终战纪念日（八月十五日）”才集中讨论和平这一事，说此指彼，也在讽刺平时他们对这个主题的沉默寡言。

位于埼玉县东松山市的原爆图丸木美术馆（以下简称丸木美术馆），刚好与这个“主义”相反。这家民营小美术馆每天展出名为《原爆图》的一组画，是由一对画家夫妻丸木位里（Maruki Iri, 1901–1995）和丸木俊（Maruki Toshi, 1912–2000）共同制作，历时三十二年完成的十五部作品。这家美术馆也是丸木夫妻为了展示这一系列的大幅作品，1967年在东松山市购买土地建成的。在日本，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中高年都看到过《原爆图》，因为过去有不少地区的[1]小学教科书介绍过该作品。但近年以“内容太残酷、过于刺激”等为理由，刊登《原爆图》图片资料的教科书出版社也少了许多。

在谷歌地图上搜索丸木美术馆，从距离来看离东京并不远。从池袋站（东京都丰岛区）到东松山站有一条直达的电车路线，不用花一个小时。问题在于车站和美术馆之间，公交车班次极少、周日没有运营，走路至少要半个小时。一般观众选择开车或打车过去，但这个季节适合采用步行，闯过乡镇小路，举目望去一片绿色，很让人欣慰又能养眼。后来得知，丸木夫妻选择此地也是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丰富多样，而且这里的河水景色让丸木位里想起自己的故乡广岛县饭室村。

丸木位里是一位“日本画”[2]画家，生于明治时代末期，父母在饭室村经营一家旅馆。饭室村可谓是当时的水上交通中心，村子里有一条河流太田川通往广岛湾，他们的旅馆主要租给运输木材的货船船员。作为一个大家庭第一胎生的男孩，丸木位里从小被宠，小学期间不爱学习，没考上初中。他去广岛市当电影看板画师，其间认识了当地年轻艺术家们，后来师从日本画家田中赖璋，也成为了历程美术协会[3]、美术文化协会[4]等前卫美术团体的成员。他的日本画作品采取抽象的超现实主义，从战前开始颇受观众的好评。

赤松俊子，即后来的丸木俊，她的出生背景与其丈夫有些不同。她生于北海道秩别村，在是十九世纪末期从日本西南部香川县来的人开拓的村庄。经过北海道当地的女校，她升入位于东京的女子美术专业学校师范课西油画部[5]，毕业之后成为千叶县一家小学校的代课老师。但这个职业没法让她集中精力去创作，四年之后以家庭教师的身份随同外务省一等翻译官到莫斯科，她在那里呆了三年，其间从本国

传来战争相关的各种信息。身在国外的她，照顾五个小朋友的间隙能够坚持每天一个小时的素描。1941年她二十九岁时回国，在一场展览中与丸木位里结识，不久就结了婚。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掷下原子弹，丸木夫妻从东京赶赴到广岛进行救援，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亲眼目睹原子弹灾害，根据当时的情景与面向当地人的采访，两人在1950年完成了七米超大幅作品《幽灵》（当时的名为《八月六日》），这后来成为了《原爆图》的第一部。当时日本被以美国为首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占领，虽然从广岛·长崎原子弹事件已经过去了五年，但在严格的舆论控制之下一般庶民对这两地的被害程度的了解非常有限。《幽灵》引起了轰动，夫妻接着完成第二部《火》和第三部《水》，带着作品巡礼全国，在学生与和平组织的协助之下进行多次展览，来场总人次超过百万。

1952年日本和战胜国签订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生效，日本恢复主权[6]。市面上一下子出现许多关于广岛和长崎的书、访谈集或摄影集，这股反战反核武器的热潮中，丸木夫妻更加积极地去各地办展。1953年《原爆图》前五部作品获得世界和平文化奖，以此为契机，这对夫妻展开丹麦、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中国的巡展。在1956年的《原爆图》十部世界巡回展途中，丸木夫妻来到中国、苏联、德国等十多个国家，七十年代进行了两次美国巡礼。1995年丸木夫妻被提名诺贝尔奖和平奖[7]，夫妻去世之后《原爆图》还继续展出，2005年参加北京的国际艺术作品展，2015年又去美国展开三座城市的巡展。

据丸木美术馆的策展人冈村幸宣（Okamura Yukinori）的回忆，2005年在北京参加的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展览，至于中国观众的回馈，他说并不太清楚。“当时被邀请参加开幕会，我透过翻译接触到的都是会场里的嘉宾。记得还有当地儿童来参观，不过感觉也都是有良好家庭背景的小朋友们，非常有礼貌。那时候网络也没有现在发达，所以没办法知道当年老百姓的真实反应如何”，说完加了一句，虽然大家对他非常客气也很友善，但因为展览的主题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他始终感到有些“过意不去”。

冈村幸宣1974年生于东京，属于在教科书上看到过《原爆图》的年代人。在美术大学本科期间他来这里做过实习生，因为当时的丸木美术馆并没有策展人，他们邀请冈村幸宣毕业之后直接过来工作。而冈村幸宣担心“自己会在这里像个守墓人看岁月老去”，婉拒了这个邀请就去欧洲游学，用半年的时间边骑车边巡礼各地美术馆。谁料，他回国之后的2001年自愿到这里开始工作。



丸木美术馆招牌



一楼部分在1967年建成，1983年扩建二楼，总面积共1200平米。



丸木位里（左）与丸木俊。
摄于原爆图丸木美术馆。



《幽灵》（当时的名为《八月六日》）。描写在爆心地区附近从事劳役的五十三名女性与一只猫。
摄于原爆图丸木美术馆。



《原爆图》第二部《火》，摄于原爆图丸木美术馆。



《原爆图》第三部《水》，摄于原爆图丸木美术馆。



2005年国际艺术作品展（北京市）的纪念画册，
摄于原爆图丸木美术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丸木
夫妻与中国著名女画家周思聪结下深厚友谊。
图右是她的代表作《矿工图》的画册。

他在丸木美术馆的二十多年，人们对该美术馆和《原爆图》的心态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和趋势。当亲历者和见证者都不在了的时候，还能有什么方式把一个记忆继承下去。记忆被继承下去时，它的形式僵化是否无可避免的。听完我提出的这些问题，冈村幸宣苦笑说“确实难以回答”，但他并不回避问题的核心，便开始娓娓道来。

01

谁是亲历者

“关于记忆的继承这个主题，大家开始讨论已经很长时间了，不管其方法是否有效，我们社会里有不少人真挚地对待这个问题。以后亲历者人数会更少，我们即将迎接一个时代，那就是记忆的继承者和被继承者都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我们这家美术馆的核心是《原爆图》，而丸木夫妻他们本身就没有经验过八月六日的广岛。他们是被投下原子弹之后过了一周后去广岛，故此受到辐射，当时他们看到的风景也应该可以说是犹如地狱般的。但是，丸木夫妻画的是（他们没有亲历过的）八月六日、超过画家体验本身的对象，也可以说是他者的记忆。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其实是蛮重要的。”

如何把记忆传给别人，其实这行为当中少不了一个编辑的过程。哪怕是亲历者的口述，也是从一个人的记忆中经过选择、整理、判断以及内心中探索的结果，这样它才被附有一种感染力。经过这个过程，有的个人记忆能够超越时间、不分地区成为共有的记忆，就像遍布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人们自古以来就用这种方式试图把记忆传给后代。

“是的，很多民间故事诞生于一个具体的体验，经过一种虚构化的同时获得强烈的感染力。哪怕是广岛被原子弹袭击的当天，或者亲历者人数比现在更多的时代，把一件事情传于后世的行为与一种虚构性只有毫厘之差，也可以说比较暧昧。所以关于记忆我们需要两种形式，一个是根据个人视角的表现行为，另一个是证言、资料等存档材料。而我认为，包括绘画在内的艺术表现行为，它的好处在于能够触动人心。一个人被艺术表现行为感到共鸣、能够认为某件事绝非于己无关的事，至少那瞬间他 / 她能够成为一个当事者。到底谁是当事者，原子弹投下中心半径几公里以内与以外，或者是否经历过战争，以这种标准划清界线至少在艺术范围内是没意思的，因为当事者意识产生于被触动的人心中。绘画、电影、文学、漫画或话剧，透过这些形式传达记忆，哪怕制作者和接受者都属于非亲历者，他们还是能够成为当事者，这是艺术表现本来拥有的可能性。”

但表现形式的可能性含有一种危险性。我在小学期间，等于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接触过不少反战文学作品，在二年级国语课本上的《可怜的大象》是关于战中时期在上野动物园的两只大象的故事，官方要求动物园对猛兽进行处理，以免东京遭遇空袭时这些动物们逃跑并伤害市民，而大象因为体型过大并拒绝吃加有毒药的饲料，它们被活活饿死。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看的是《愤怒的地藏》（山口勇于原著），讲述了广岛市一条街上有个面带微笑的地藏尊被称为“笑地藏”，原子弹袭击发生后，烧伤的女孩子来到它身旁喊想要喝水，此刻它变成愤怒相并流眼泪，眼泪掉进了女孩子的嘴里，她断气的同时地藏尊也变成了石碴。这都是在日本脍炙人口的作品，类似的故事我在电视上也接触了许多，确实有助于让人理解战争的残酷性，但我心中留下的更是“厌战”情绪，而不能说是附带积极性和具体行动的反战思想。更重要的是，这些都强调了受害者视角下的日本，虽然历史教科书上提及包括南京大屠杀等侵略行为，但我成年之后、尤其是开始与外国人当面交流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日本人与世界接触时这些历史意味着什么。

对这点冈村幸宣点头表示同意：“表现行为本身含有的危险性和责任，我也感受深切。被大众所接受的故事，难免要让人感到一种舒适感。因为这个原因，某些故事虽然在传达战争的悲惨性，但同时它又会动摇民心，甚至会反转为推动战争的力量。再也不想经历那么悲惨的事，这种决心有时候会逼迫或驱使人们参加战争，也是有可能的。”

02

后代描写过去有何意义

冈村幸宣也承认，丸木夫妻在制作《原爆图》的初期，他们的加害者意识应该比较淡薄，发表作品的第一个目标是把同胞的受害程度传达给外界。但在全国巡礼以及海外展览的过程中，他们也接触到批判，知道了另一类的事实，这又影响到这对夫妻的下一步。

“丸木夫妻的展览方式比较特殊，他们不仅仅是展出作品，也非常积极地与观众进行对话。从《原爆图》的第一部开始他们受了不少批评，比如‘画得太好看’或‘现实中的广岛可不是那样’，也有人说他们的作品过于情绪化。丸木夫妻一个个地认真面对这些反馈、再画一幅，《原爆图》最后成为一系列共十五部作品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原爆图》制作到第三部，发表作品的舞台就扩张到海外，这对夫妻受到更不一样的反应或摩擦，比如在七十年代的美国巡展中遇到一些民众，他们对投掷原子弹的决定持有正面看法，并认为原子弹的投下是（日军的）珍珠港袭击和南京大屠杀所引起的结果。反越战派的一位美国教授问过丸木夫妻，这次他们邀请《原爆图》来美国参展，等于是你们（日本人）邀请中国人展出以南京为主题的作品，你们到底敢不敢。丸木夫妻后来制作《南京大屠杀图》（1976）、《奥斯维辛图》（1977）、《水俣图》（1980）[8]、《冲绳战图》（1984）等作品，虽然表面上与原子弹本身没有关系，但我认为是从《原爆图》派生出来的结果，和这对夫妻心中的广岛有关联。”自我或自己国家的加害性，若忽略这点、只画出受害的一面，相当于自己的作品也没有表现出战争的真相，更没法描画出内在的暴力以及各种歧视形态[9]。透过展览，丸木夫妻所获得的这个认知是属于个人的，但发觉到这点时，他们的作品和以后的走向又开始与日本的战后史联系起来。



冈村先生是丸木美术馆唯一的策展人，工作内容包括该馆的公关、特别展的计划以及与海外参展的安排等。换灯泡、擦玻璃或每年夏季的除草和冬季的扫雪工作也全部由他负责。



美术馆二楼留有丸木夫妻的工作室。



丸木夫妻的部分藏书。《黑雨》（井伏鱒二著）是以广岛原子弹爆炸为背景的日记体小说。



《可怜的大象》（土家由岐雄著，金之星社，1970年）部分内容



《愤怒的地藏》（山口勇于原著，金之星社，1979年）封面



《南京大屠杀图》，摄于原爆图丸木美术馆。



《原爆图》第九部《烧津》（右）与第十部《署名》，摄于原爆图丸木美术馆。



《原爆图》第十三部《乌鸦》，摄于原爆图丸木美术馆。《乌鸦》局部



“丸木夫妻发表《原爆图》第一部是 1950 年，也就是在朝鲜半岛爆发军事冲突的那一年。随后他们带《原爆图》前三部作品进行巡礼展，一共去了全国一百多个地方，其中包括美军驻日基地所在的城市。美国与苏联的分歧引起整个亚洲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进行《原爆图》巡礼展的动机，除了传达受害的经验，应该还有另一个，就是对正在进行中的暴力行为敲响警钟。1954 年发生比基尼岛核弹爆炸，丸木夫妻就把第五福龙丸（该事件中受了高能辐射的远洋鲔鱼船）画进去（原爆图第九部《烧津》，1955 年），东京都杉并区的主妇们搞起反核署名运动，他们又把这个情景也画出来（原爆图第十部《署名》，1956 年），所以《原爆图》这组画的内容也并不停留在原子弹爆炸的 1945 年。”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半的反越战运动中，日本社会“发现”侵略亚洲的战争责任[10]，到了七十年代关于二战期间的更多事实被披露，比如在广岛的美军战俘，他们在原子弹袭击之后惨遭日本一般民众施暴而丧命，又比如广岛和长崎有不少被强制征召来的朝鲜人[11]，日本民众对他们的歧视在原子弹爆炸后的混乱中也持续着。作家石牟礼道子[12]的一篇文章《菊花与长崎——被爆朝鲜人的遗骨保持沉默》[13]中介绍了在日朝鲜人的证言：“原子弹被投下之后，留到最后的尸体就是朝鲜人的。（略）乌鸦从空中飞过来，来了好多。留到最后的朝鲜人尸体，乌鸦来吃。乌鸦吃的是他们的眼睛”。

“1971 年丸木夫妻发表《美军俘虏之死》，这是《原爆图》的第十三部，次年发表的第十四部名叫《乌鸦》，是他们读到石牟礼道子的文章之后画出来的。这对夫妻并不是所谓的思想家，他们更加重视生活和时代潮流中的实际感受，作品的主题经

常以对话为启，开放式的对话给予他们新的视角。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再次展开《原爆图》的全国巡礼，但这次的展览和五十年代的巡回展不一样的一点是展览背后的意识形态，被展出得最多的作品是《乌鸦》，这是一副提醒日本人自己加害性的作品。”

作为日本七〇后，我和冈村幸宣除了教科书上的《原爆图》之外，另有一个共同话题。漫画作品《赤脚阿元》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漫画杂志《周刊少年 JUMP》上开始连载的作品，作者中泽启治（1939–2012）生于广岛，六岁时在原子弹爆炸中失去了父亲、姐姐和弟弟。八十年代该作品被汇集成漫画书，我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教室小书架上就有班主任准备的《赤脚阿元》全十卷，因为角色设计很鲜明、故事跌宕起伏，有一段时间同学们纷纷争着看。暑假期间的“和平学习教育课”，很多学校让学生观赏《赤脚阿元》，其中有一个画面，原爆投下时老年人和小孩们在热线和暴风中瞬间蒸发，给部分学生留下了心理阴影，这也是后来这部作品从和平教育课或教室的书架上渐渐消失的原因之一。

“其实这部漫画作品，除了那些带有刺激性的画面之外，包括很多战争相关、而且带有争议性的话题内容，包括天皇的战争责任、在日朝鲜人、女性与战争等，都是七十年代才能画出来的漫画。中泽启治是原子弹事件的亲历者，但他能够画出这样的作品是因为经过足够长时间的考察（注：作者 33 岁时开始了《赤脚阿元》的创作），就像丸木夫妻经过与周围的对话摄入了新的因素和视角，中泽启治也在战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感受到日本社会和世界对二战的态度和理解的变化，并在作品中把它描写了出来。若他在战后不久就画出原子弹主题的漫画，肯定是要和《赤脚阿元》完全不一样的内容。所以我想说的是，由后代描写过去的某一件事情，其实也有意义的，因为经过时间我们能够构建俯瞰视角，虽然这个视角会和肉体的实感有一定的距离，但从一个历史的关联中可以重新理解某一个事情和记忆。作为一个策展人，我以后更想看的也是这种表现方式。”

03

去美术馆挖冬笋

冈村幸宣回忆，自己认识到丸木美术馆的存在是在 1996 年左右，在东京造型大学本科期间。为了考取国家资格“学艺员（curator）”[14]，他在毕业前必须找一个地方做实习，而当时选择了丸木美术馆，其实是来自一种叛逆精神。

“说实话，当时对原子弹或核能并没有特别的看法和意见。我成长的年代日本社会比较稳定，景气水平也比现在好很多，至少到大学期间我没有面临过非常深刻的社会矛盾。九十年代的大学教育也有点泡沫经济时代的色彩，我在本科研究现代美术，学的都是海外最新、最时尚的现代美术作品和美术馆的案例，像丸木美术馆这种看起来没赶上时代的小美术馆，在教授们的视角里是根本不存在的。我就想知道这些小美术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自己打电话给丸木美术馆，说想过来实习一下。”

他来到丸木美术馆，作为实习生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到美术馆后面的竹林挖冬笋。在清晨的大雾中拿着铁锹使劲戳地，看见有一位穿得鼓鼓囊囊的老太太经过，顺便向她打个招呼，对方回一句“您辛苦了”。他抬头一看，那就是丸木俊。到五月五日的开馆纪念日，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聚集在一个老房子里，酒席上的话题有文学、美术、历史以及社会问题，一起喝到天亮。

“那有点像是大家族或一个生活共同体，感觉就很新鲜，和其他的美术馆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可以说是非常人性化的地方。所以实习期间结束之后也偶尔来打个招呼，快要毕业的时候当时的事务局长问我不要来工作，但我拒绝了。毕业之后用半年的时间骑车环游欧洲，我就发现，在欧洲的小地方有很多小美术馆，看起来比丸木美术馆还要穷，而他们也并没有特意逞强，就在自己能够承担的范围内守住并传承着当地的文化财产。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文化就产生在这种地方，而大城市的大型美术馆只是把它的最上面薄薄一层挪过来展示一下而已。所谓文化，并不只指最领先的某一块，文化结构本来就很复杂，而且它的根源就在一种非常老旧的事物里面。这就是我在欧洲学到的一件事。我决定回到丸木美术馆，是因为我相信在这里能够创造出别的美术馆做不到的、一个根源性的价值。”

从美术馆的经营层面来看，冈村幸宣来工作的 2001 年属于低谷期。丸木美术馆是一家民营美术馆，没有任何官方或企业的赞助，单纯依靠门票收入和捐款，这种经营模式在日本并不多见。丸木位里在 1995 年因病去世，丸木俊也在 2000 年过世，两位创办者都不在了的美术馆正在摸索以后的方向。

冈村幸宣介绍，从开业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子还算过得去，因为来参观的学校组织比较多。这和交通发展有关：1975 年山阳新干线全线开通，从东京到广岛比过去方便许多，只要在大阪换乘一次即可。以前在首都圈的学校计划修学旅游（以文化教育交流为目的的旅游），多半去京都、奈良，而山阳新干线开通之后选择去广岛的学校也多了起来，邀请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在学生们面前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前在广岛和长崎比较多见的这种和平教育活动，其实是从这个时候发起的。让学生去广岛之前，不少学校安排来丸木美术馆进行预习，当时丸木夫妻都健在，可以为学生亲自介绍《原爆图》的来历。但到了九十年代，战争亲历者的年纪大了，加上公立高中的飞机使用被开放[15]，更多的学校倾向于选择去冲绳、北海道或韩国。丸木美术馆的参观人次在八十年代末已经开始下滑。

“但我不属于那种热血青年，来工作的时候也并没有为这家小美术馆再立新功的想法。这里的交通很不方便，所谓‘常客’也一年顶多来一次，并且在东京已经有那么多美术馆，让我们争夺他们的客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全球气候变暖也影响到了我们，每年六月到八月是客人来的最多的时间、占比四成，而且这段时间来访的客人一般都是拥有战争记忆的老年人，这些客人受不了路上的炎热。还有，现在很多美术馆设计艺术礼品，增加自己的收入渠道，但我们的收藏品风格又不太适合做成礼品或文具，这也是（经营困难的）原因之一。”

04

“不可侵犯”的记忆

冈村幸宣回忆，来丸木美术馆工作的头十年是在一种“凝固的和谐”中度过的。战后的和平教育等因素让原子弹主题成为一种“不可侵犯”的领域，至少在谈及这个主题时，只能说些非常正确的话。大部分参观者也是对丸木美术馆有所理解的人，为了附和这些观众，美术馆计划的特展内容也呈现出内卷化现象。而打破这个状态的是外来因素，是艺术家团队 Chim↑Pom 小组。

Chim↑Pom 由日本七〇后与八〇后的六名成员组成，从 2005 年的第一部作品《呕吐的艾丽（ERIGERO）》开始惊世骇俗，2008 年的《让广岛上空炸一下》又让 Chim↑Pom 走进大众的视野，他们用飞机云在广岛原爆圆顶馆上空写下“ビカッ（闪！）”字样，引起市民团体和原爆受害者协会的不满。三天之后 Chim↑Pom 队长卯城龙太当面向原爆受害者代表团体致歉，广岛市现代美术馆的 Chim↑Pom 特别展也故此被取消。有人说他们是沽名钓誉之辈，这个日本最具有争议性的团体向冈村幸宣表示出展意向，是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没多久的 2011 年初夏。

“若你问我 Chim↑Pom 的表现方式怎么样，我只能说比较微妙，不是全部作品都能接受，部分作品含有一种危险性。他们找到我们，是因为那次他们想办的展览和核能有关，说实话我当时还有点担心被他们利用。让 Chim↑Pom 到这里办展，这有点像你去涩谷街头找个年轻人跟他讨论核武器问题，但我又想，这有什么不对的呢。在日本讨论原子弹或核能时经常有一个框架，有一种看不见的压力让你只能从正面面对它，而且答案必须是一致的。我觉得这样的态度也是不对的，意识形态上的这种障碍必须去掉，否则以后的记忆继承会越来越衰微。这是一个对话的机会，你得最大限度地尊重对方，接受因此产生的风险和摩擦。”

Chim↑Pom 成员们跟他解释，这次办展的目标在于 311 大地震之后的现实反映，重新回顾广岛的历史，让观众成为社会问题的当事人。经过激烈讨论，丸木美术馆理事会给它们安排了半年后的八天时间，《Chim↑Pom LEVEL 7 feat. 広島！！！！》在 2011 年 12 月正式开展。

“冬天的客人本来就很冷，有时候一整天不见人影。但那次的 Chim↑Pom 展从一开始就来了很多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这是我没想到的。开幕式那天一共来了两百个人吧，是丸木美术馆有史以来最多的来馆人数，还有很多客人进不去。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我们的主要客人是老年人，所以计划一个特别展，也只会选择适合他们看的内容。而那次的 Chim↑Pom 展简直令我大开眼界，只要有适当的展览内容，原来年轻人也愿意来这里。透过年轻艺术家和与时代同步的艺术表现，《原爆图》和美术馆也重新获得新时代的意义。”

05

第三代人的轻盈

今年（2022 年）四月在丸木美术馆进行的展览《李晶玉 SIMULATED WINDOW》，也呈现了“记忆的继承”的新方向。艺术家李晶玉 1991 年生于东京，2018 年毕业于朝鲜大学校研究院综合研究科（东京都小平市），从在日朝鲜人第



《赤脚阿元》封面



《赤脚阿元》部分内容



丸木美术馆一楼门口，这里可以买到关于丸木夫妻与该美术馆的书。但礼品方面比其他美术馆的少很多。



森美术馆 (东京都) 正在举办《Chim↑Pom 展: HAPPY SPRING》。



Chim↑Pom 展，《千纸鹤实物》（左）与《和平之日》。图片由原爆图丸木美术馆团提供。



李晶玉展，图片由原爆图丸木美术馆提供。
(Photo by Ali Uchida)



李晶玉展，图片由原爆图丸木美术馆提供。
(Photo by Ali Uchida)



冈村幸宣正在忙于新的特展《东北画是可能吗？》，东北艺术工科大学（山形县山形市）的艺术项目，根据日本东北地区的民间故事、信仰或地震的记忆，不同艺术家共同进行创作。



在原子弹爆炸死难者慰灵碑前祈祷的中学生们。2022年4月摄于广岛。

三代的视角展开平面作品的制作。冈村幸宣在其他展场看到她的作品之后，邀请她来丸木美术馆发表新作品。

“我们经常说战争的记忆逐渐淡薄，但在日朝鲜人的情况不太一样，他们仍然生活在战争带来的矛盾当中。在日朝鲜人的年轻一代对战争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记忆’，这点我比较感兴趣，但我并没有向她提出关于展览的具体方向。”

然而，李晶玉还是选择了原子弹。之前没有去过广岛的她，这次特意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就着手新作品的制作。在丸木美术馆里展出的十部作品描写了投放原子弹的轰炸机“艾诺拉·盖伊”号驾驶舱、原爆圆顶馆的穹顶、首都圈上方的原子弹闪光等，近未来漫画风格并不太会让人感觉到事情的悲剧性，反而带有轻盈感。

“有意思的是，她选择原子弹这个主题的时候并没有去描绘被爆朝鲜人。丸木夫妻就画过这个主题的，我以为她去描绘被爆朝鲜人也很自然的一件事。但她从广岛回来之后跟我说，在那里并没能找到和自己相关的视角，加害者也罢、受害者也罢，她觉得这些视角都不属于自己。后来我想这也可以理解，她的成长环境和其他日本民众是一样的，透过日本社会，她也受到过美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人和美国人看广岛的视角，这两者她可能都有，并且是同等的。同时她从小生活于在日朝鲜人的生活圈，上朝鲜人学校，学习朝鲜语和朝鲜的历史。这都是为了继承朝鲜文化的尝试，但到了第三代或第四代，他们其实都很明白，这只是一个 fiction（虚构）。这次展览的观点是她的这种漂浮感和内在的不同视角。”

皇居所在的东京上方配置一个原子弹，又是在日朝鲜人的作品，听起来是很容易引起日本某些组织反抗行为的因素。而这个时候丸木美术馆的缺点，如规模之小、地理条件带来的不利、以及经济上的独立性，都成为了一种优势。冈村幸宣点头说道“这次展览办得很顺，若是一家公立美术馆，不可能办这样的展览。但我也不是特意去找这些因素计划展览的。充分地去理解一家美术馆的存在意义，努力去开拓它的潜在价值，这就是一个策展人该做的工作。”

06

在反转的世界里

采访冈村幸宣之后，我去了一趟广岛，拜访和平纪念资料馆。刚好碰上当地中学的参观日，跟着一批中学生上去二楼的展览中心，这里的陈列内容是三年前更新过的，现在以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留下的物品为主，还有市民笔下原子弹爆炸题材的绘画以及关于后遗症的图片和文字资料。解说文比过去简短许多，官方的解释是为了让来访者用自己的心去想象，这样才能把当时的悲惨性看成自己的事。

该资料馆一楼有几位讲解人，其中一位年逾六旬的妇人在自我介绍中说是“被爆第二代”，母亲在广岛市中心遇到过原子弹爆炸，但除了这点，关于其他相关的记忆闭口不谈。母亲已经去世了，这位妇人后来当了讲解人，首先是因为想了解母亲当时到底经历过什么。离开广岛前，我在一家小餐馆与八十五岁的女主人聊起白天的讲解人和她的母亲，女主人说：“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他们是不愿意说的。大家知道了原子弹爆炸会导致后遗症，被爆者总受歧视，他们怕连累家人孩子，能不谈就不谈。”

回家的路上，我在手机里翻到俄军拿下马里乌波尔的信息，微信朋友圈被上海疫情的视频和截图占满。现实的世界不停地变成从未想象过的样子，有的记忆有人坚决不谈，有的真实说了也难以让人相信。现实和虚构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在这个容易反转的世界里，《原爆图》的本质含有的虚构性，反而成为通往原先记忆和真实的通道。

受访者简介

冈村幸宣 (Okamura Yukinori)：1974 年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造型大学造型学部比较造型专业。2001 年就职于原爆之图丸木美术馆，现为该馆负责人暨策展人。2016 年获得第 22 届和平协同记者基金奖励奖。著有《拥有“原爆之图”的美术馆》(2017 年，岩波书店)、《非核艺术指南——“核”是如何被描写的》(2013 年，岩波书店)、《面向未来：原爆之图丸木美术馆学艺员作业日志 2011–2016》(2020 年 3 月，新宿书房) 等。

原爆之图丸木美术馆 (Marukigallery for the Hiroshima Panels)

所在地：埼玉县东松山市下塘子 1401

官网：<https://marukigallery.jp>

开馆时间：9-17 点 (夏季)、9-16 点半 (冬季)、周一休息

本文图片如无标注，均由作者拍摄

[1] 日本义务教育中的教科书内容并不统一。公立学校的教科书采用“广域采择制”，先把全国分成五百多个地区，每一个地区的教育委员会为每一个科目从不同教科书出版社选择一家，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地区内的公立学校都在使用统一内容的教科书，但不一定与其他地区一样。而国立以及私立学校的教科书选择权在各校校长手里。

[2] 日本画 (Nihonga) 的技法种类多，也有各种流派，而一般指的是使用纸 (或绢)、笔、墨和矿物质或植物颜料的作品。

[3] 历程美术协会：1938 年 (昭和 13 年) 设立的革新派日本画团体。

[4] 美术文化协会：1939 年设立的前卫艺术家团体。

[5] 以美术交易市场的成长为背景，在昭和时代初期出现不少私立美术教育机构。1900 年创立的女子美术专业学校 (东京都文京区) 也是其中之一，是当时唯一为女性提供美术专业教育的学校。

[6] 根据该条约第三条，北纬 29 度以南的奄美·冲绳群岛留在美国的统治之下。

[7] 1995 年获诺贝尔奖和平奖的是科学家罗特布拉特 (Joseph Rotblat) 与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 (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

[8] “水俣 (Minamata)” 指的是日本熊本县最南端的城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这里产生多次有机汞中毒，因食用被有机汞污染河水中鱼类引发。石牟礼道子也写过诉说水俣病真相的小说《苦海净土——我的水俣病》(讲谈社，1969 年)。

[9] 这个观点，在日本作家小田实 1966 年写的《战争的伦理与理论》中也有所提及。(出处：《小田实评论集 1 六十年代“难死的思想”》第 37-38 页，筑摩书房，2000 年)

[10] 越南战争的爆发，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规模较大的反战运动，小田实是反战市民运动组织“越南和平市民联盟”(1965 年组织，1974 年解散) 的中心人物之一。该组织的立场是（一）防止日本被卷入到越南战争又再次成为受害者、（二）反对日本通过美军基地参与越南战争并再度成为加害者。此外，小田实小时候经历过美军空袭，因此关于二战他的“受害意识”比较强，但他通过和台湾留学生的交流，“在错误中”发觉到日本的加害性。(出处《甜美的借口》、收录于《小田实全集 7 评论 1 从这里出发…》第 264 页，河出书房，1970 年)

[11] 据日本中国地区 (本州西南部) 的地方媒体《中国新闻》2012 年 3 月 30 日报道，朝鲜人被爆人数尚未不清楚，但依据“韩国原爆被害者援助协会”(现为原爆被害者协会) 1972 年公布的数据一共有约四万人，在广岛有 25000-28000 人，在长崎有 11500-12000 人。

[12] 石牟礼道子 (Ishimura Michiko, 1927-2018) 是熊本县出身的作家暨环境运动家，以关于水俣病真相的小说《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1969) 而闻名。

[13] 该文章发表于《朝日朝日周刊》(朝日ジャーナル，1968 年 8 月 11 号)。

[14] “学艺员”是由文部科学省认定的国家资格，等同欧美国家 curator 的概念。根据日本博物馆法规定，在博物馆 (包括美术馆、天文台、科学馆、动物园、水族馆、植物园等) 从事专门职位的工作需要持有学艺员资格。

[15] 公立学校的修学旅游以前不被允许选择飞机。到九十年代，东京、大阪等地方政府陆续开放公立高中使用飞机。据 2019 年全国调查，公立高中的修学旅游目的地以冲绳县为首，第二位是大阪府，第三位是京都府，广岛县并不在前十位中。



吉井忍 (Yoshii Shinobu)

日籍华文作家。著有《四季便当》、《四季便当 II》、《东京本屋》等。作品获 2016 诚品书店阅读职人大奖。

吉井忍的二次会

二次会是上班族大家一起去喝酒、喝完第一家后自由参加的第二轮聚会，大家谈得更加舒坦的场合。这个系列采访的是接地气、尘满面的日本普通民众。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非虚构

20世纪上半叶 中国农村的真实写照

熊景明 | 小鸟文摘

勤劳致富的土地拥有者，应当受到尊重。

董时进 1900 年出生于重庆垫江，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班留学美国，1926 年获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学位。不同于跳龙门的学子，少年董时进离开故乡出外求学时，便立定改良中国农业的志向。他曾到欧洲考察当地农业和土地制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校教授农业经济，出任过江西省农业院院长，并曾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职。

董时进始终忠于自己的理想，他后来干脆辞掉公职，回乡办农业。董先生 1938 年在成都创办《现代农民》，组织农业协进会，推广农业技术，从农民的角度评论时事。月刊和协会一直坚持到 1949 年。那是个风起云涌的年代，留学归来者，纷纷卷入政治。1945 年 10 月，董时进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但他因为不认同民盟“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的纲领而退出。他认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同时，西方求学的生涯，令他树立了颇为坚定的民主理念。

1947 年 5 月 12 日，董时进在上海成立中国农民党。成立宣言道：“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中国国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谋求乡村与城市平衡发展，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剥削制度，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一方面要求实行法制，惩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进行改良，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1949 年 12 月，董时进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他“迂腐”的观点不关政治，只是一个农业经济学家对中国土地问题的建言：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势必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也会导致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董时进六十年前的见解，经过历史的考验，读《两户人家》令我们理解他对中国农业和农村政策先知一般的远见从何而来。上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而致力于社会改革或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几乎没有像董时进一样生长在农村，到西方研习农业经济，再回国事农，兼备理论和实践，对农村有深入了解的人。

他在开篇表明，“本故事上的人名和地名，一概是虚构或借用”。故事发生在四川垫江县，那是董先生的故乡。笔者再三向董先生后人求证，本书所有人物，无一杜撰，记载之年份以及情节，都基于真实。主人翁三个弟弟及子女的经历，均有据可查。董先生是书中的“可生”，他的经历与董时进完全吻合：“可法”乃弟弟董时光。韩战爆发，他在美国因亲共被驱逐出境，回到中国，后成右派，死在劳改营。有理由相信，本书为董先生的家族史，亦是他的自传。

董时进在后来的著作中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地主不是一个阶级，“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

拥有土地不是犯罪，绝不等同少数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的罪人。勤劳致富的土地拥有者，应当受到尊重。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犯，富裕农民不应当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中国历代优秀人才，大多来自地富家庭。地主中有为富不仁的，但只是少数，地主耕作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失去这一目标，农民缺乏动力。

他的观点在《两户人家》中都有生动的故事佐证。这“两户人家”，即董的父辈两弟兄家的兴衰史，在风雨飘摇的动荡时代，代表了勤劳致富的朴素真理，告诉我们一个不能以阶级论是非的农村。

叙事始于 19 世纪中叶，作者的祖母，带着三个孩子的寡妇章氏，克勤克俭，善于经营，置田买地，渐自将日子过出来了。书中描绘的细节，将概念演绎为历史的真实。“细娃望过年，大人望买田”，那时还是细娃的董时进的父亲，睁大眼睛看着母亲买田的“仪式”，“当契约写好，念过，大家签押之后，照例说句，恭喜你们子子孙孙永远管业。三个孩子都感动得眼泪长流”。

庄稼人的梦想不限于土地，尤其年轻人，志向在读书。董的父亲进了当地秀才设的私馆念书。在亲人眼中，他由一个乡童逐渐蜕变成一个儒生模样”。正当他踌躇满志时，年过四十的母亲将他召回料理家务和田土。未曾多读书，他终身引以为恨，寄望下一代补救。书开篇的伏笔，延伸到他后来为儿子求学，在村里策划奔走，促成私塾，到不惜代价送儿子进省城，后远赴上海求学，到他倾家产送儿子留学美国，感人地刻画出一个农民对教育的追求，推进这个民族走向现代。

乡村人际关系的描写，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富农和佃农的关系，常常出乎我们的想象。儿子满周岁，抓周抓到笔杆，让主人家为高兴，他跑出门，看见在翻晒谷子的长工，大声喊道：“老陈，我的儿子将来要做官，那时候你不必在大太阳下晒谷子，也无须在寒冬天气犁水田。你可以在衙门里面做一个跟班”，老陈不买他的账。他“懒洋洋地答道，‘等他做了官的时候，我早已经埋了烂了。’又告诫他的东家‘不要把锅盖太揭开早了，当心敞了气’。”

忠心、智慧的老陈，饥荒将到未到时，见女主人在米饭中掺红苕。他面有不怿之色，道：“老板娘，你的谷子不是可以吃到下年收割时候吗？何必这般节省呢？”书中写到一位佃农对外出挑烟土挣钱，“地主”好生寂寞，终于盼到他归来。“邱大汉滔滔不绝，正绪听得津津有味。他们一边谈，一边吃，一边喝，直到半夜之后，没有一人显得疲倦”。该书展现了跨越一个世纪的农村社会图景。在勤劳致富、农而商的主线索外，对天灾人祸、土匪来袭、赌博败家、民国革命等的记载，均都从农民的切身体验来描绘，令人耳目一新。对各种民俗，例如分家、击鼓伸冤等生动的记录，仿佛将读者带入时光隧道。百年前，四川乡村里，孝道既是给人看，也是儿女的真性情。董的父亲正绪丧母后，在墓边搭了一个篾棚，守墓七七四十九天。道场做完，两弟兄要在阳世为母亲留纪念，扬声名，立节孝碑。

“这桩事情，必须向县衙门申请，转成都总督衙门，向北京请皇帝圣旨，方能举办，需要时间至少数年”，事情数年后终于办妥，书中详尽的描写，为中国民间文化留下重要的注释。例如垫江初通邮政，“写信的人很少，邮件运输一概是人挑步行，两个轻细的包裹担在肩上跑步走，行人遇到都得让路”。全书都是普通农人的故事，也触及官场的污糟、无能，官匪勾结。

回忆录的成败，作者对细节的记忆至关重要。《两户人家》对四川农村各种节庆，婚嫁丧葬仪式的记载，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记录。书中记载了许多民间歌谣，例如送财神，“一进财门大打开，四福天官送财来；一送千年宝，二送万年财，三送三吉利，四送四发财，五送五子登科，六送状元题金榜，七送天上七姐妹，八送神仙过海来，九送状元打红伞，十送状元转回来，十一送摇钱树，十二送聚宝盆。日落金，夜落银，初一起来捡四两，初二起来捡板金，初三初四不去捡，秤称银子斗量金。滚进不滚出，滚一大堂屋。”作书时董先生已年过 70，去国数十载，想必对童年往事一念再念，才会记得如此清楚。有两章对村民自办私塾描写，温馨有趣，好笑之极。

董时进笔触谦和，在书中隐姓埋名，读者不难猜到是谁在为董家做传。他自出世便充满灵性，儿时就表现出对人情世故的感悟，对生灵万物崇敬。作者青少年时代最密切的朋友，是替他家一生劳作的一头牛。对此，他另外一本小书《阿宝护牛记》，有更为详尽地描写。他在大学时代就对学习美国先进农业，农业机械有所保留，其精辟见解，今天读来字字珠玑：“中国农业乃是中国环境的产物，是整个社会和经济解构的一部分，是历代经验演变出来的成绩。要使农业方法和农业用具发生重大改变，必须市场、运输、工商业，以及土地与人口的比率等，都有改变，才能办到。”他后来反对实施土改，以至于对其他政党的农村政策失望，自创中国农民党，都基于他对农村与其它知识分子不同的见解。

作者在描写旧的风俗习惯时，并无站在道德至高点的鞭笞、批判态度。他记述了以生命来反叛包办婚姻的年轻人惨烈的故事，也写出他自己在内的同辈“为父母娶媳妇”乐天安命的心理。作者带着深深的敬意，由衷的佩服，描写了多位农村妇女，尤其祖母章氏，母亲熊氏。本书所有人都用化名，只有作者的母亲保留了真姓氏。

董先生的文字简洁、传神，“节令甫入仲秋，包家寨已呈冬意。寨墙上立着三个小娃，他们消瘦的身体，被棉袄衬托成肥胖，他们苍白的面庞，被寒风染成紫红”，“饿死的人好似一阵烈风袭来，树叶纷纷坠地，路边，街上，庙门口，到处是死尸”。书中

佳句处处，风格独特，不落窠臼。

钱穆先生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被看成是对中国乡土文化精髓的最佳阐释。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对 20 世纪初农村社会的描述，被中外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视为经典，一再引用。《两户人家》，无论对同时期中国农民的生计、社会关系、民风民俗、官民冲突和地方管治，社会动乱，农民的生老病死，婚姻和妇女地位等等，都有详尽的、从农民自身视角的描绘，堪与迄今看到的名著比美，是了解 19 世纪中后期到 20 世纪中的中国农村必读之书。八十年代初在台湾出版后，曾获甚高评价。三十年后，这部书终于被学林出版社的编辑慧眼见到，得以在大陆出版。

董时进出版了多本专著，如《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以及《食料与人口》《农村合作》等书，还出过两本英文著作。他于 1950 年离开大陆，辗转香港、台湾，后赴美定居，常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挂职研究。1984 年在美辞世。他留下遗嘱，将政府发还的农场及房作价款全数捐给西南农业大学，设立“董氏奖”，鼓励年轻人从事农业科学的研究。

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富民之道忧心忡忡，不少理想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靠某种主义得救。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读几本小册子，听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很容易迷上某种主义，将之奉为真理；而研究问题则须具备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还需要付诸社会实践。遍地哀鸿的年代，知识分子没有那个耐心。

在当年的农业大国中，董时进是极少有学识和经验，了解农村，兼备中国文化和国际潮流视野，又恪守理性常识的人才。可惜他的真知灼见，淹没在高昂的革命口号声中。看到土改横祸不能制止，董痛心疾首，却并不气馁。“民主自由本是难得而可贵的宝贝，不是俯拾即是的芥末。为它而奋斗，是很值得的。一生追求不到，还有下一代，最后总是可以获得的”。



熊景明

1943 年出生于昆明，1979 年移民香港。1988—2007 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其间参与多项中国大陆的农村扶贫项目，并编撰数本中国研究论文集。近年从事民间历史写作、推广、资料收集。

小鸟文摘

这是一个免费频道。我们希望更多读者可以以此了解更多。



图片来自 [Benjamin Disinger @ flickr](#)

非虚构 快乐与正义 贝卡·罗斯菲尔德 | 小鸟文摘

是我们渴望的身体掩饰了我们含蓄的心灵呢，
还是相反？

面对性，一个女人所能做的最无趣的事之一就是同意了。可近来，我们看起来更喜欢谈论男性的侵害而非女性的情欲。

一方面，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谈论性伦理的时候，人们会最先想到有无同意。在一个性犯罪如此常见（可悲地，在美国，每六个女人中就有一个是强奸或强奸未遂的受害者，并且 81% 的女人都遭受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的文化中，人们难免要关注强奸和性侵。

不过，至少和性强迫一样常见的，还有空洞的同意。仅仅是经过同意的性不会带来内心的痛苦，但这样的性就和仅仅是可以下咽的食物一样让人提不起兴趣，就和没有糖霜的蛋糕一样乏味。甚至在我们表面上“解放”的时代，女人也面临着各种外部强加的、她们自己不安地内化了的情感和社会压力，被逼着以牺牲自己的享受为代价取悦男人。

异性恋的女人一直在许可激不起她们兴趣的关系——这也许是是因为她们已经绝望了，觉得不可能有像令人兴奋的男人那样的东西存在；或者是因为她们甚至不再坚持这件事情必须随兴；又或是因为整个社会都在预期她们向让人提不起兴趣的男人低头，而通行的关于浪漫的描述也总在美化这样的迁就。

就像出色的牛津大学哲学家阿米娅·斯里尼瓦桑在她的处女作论文集《性的权利》中写到的那样，她的女学生经常跟她说，她们认为自己的情欲生活“既不可避免又不够”。简而言之，斯里尼瓦桑课上的年轻女性向她们同意，但索然无味的性屈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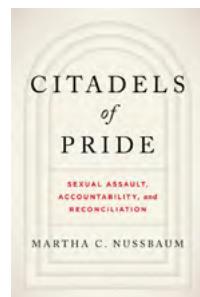
谁又能怪她们呢？当代几乎没有会教、或者鼓励女人要有性趣，要主动地去要。在公众的想象中，她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被动地同意、接受或拒绝男性的提议；在最坏的情况下，还会沦为色狼的不幸的受害者。在这幅图景中，性的能动性主要被留给了玩弄、捕猎女人的男人。

#MeToo 运动把注意力集中在是否同意性要求的女人，而非主动提出性要求的女人上，这点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难怪运动的支持者几乎从来不问这个问题（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对女人来说，什么样的性才是“好的”（我的意思不是“道德的”，而是“可口的”）？在什么条件下才会有好的性？

今年连续出版的几本书提出了这些遭到忽视的问题，敦促我们审视我们的欲望和不满的政治和社会根源。2021 年 3 月，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创意写作教授凯瑟琳·安吉尔出版令人激动人心的《明天性又会好的》。5 月，芝加哥大学著名哲学与法学教授玛莎·纳斯鲍姆出版了《骄傲的大本营：性侵害、问责与和解》。9 月，斯里尼瓦桑也出版了她的《性的权利》。

这三本书超越了标准的同意模型，对我们在性方面的偏好和实践的起源发起追问。它们从“我们和谁发生性关系以及怎样发生性关系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斯里尼瓦桑的说法）出发，想象了一种不只要求同意的情欲文化。

重要的问题不只是女人是否同意，还在于她同意的语境是否有利于快乐和正义。事实证明，快乐和正义可能是相互依赖的，老一辈对性持正面看法的女性主义者，如卡洛尔·S. 凡斯 (Carole S. Vance)、艾伦·威利斯 (Ellen Willis) 深知这点。正如安吉尔敏锐地指出，在这样一种文化中，女性的快乐，往好处说是陌生的，往坏处说是被憎恶，“糟糕的性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反对厌女既有了伦理上的理由，也有了情欲上的理由：在父权制下，女人不但被压迫还被压抑，而男人不但可怕，也不幸地，他们在床上也很糟糕。



《骄傲的大本营》

乍看起来，纳斯鲍姆不像安吉尔或斯里尼瓦桑那样，对性侵害中性的维度感兴趣。在《骄傲的大本营》中，她坚称 #MeToo 提出的“根本问题”，“不是性，而是权力”，特别是有头有脸的男人行使的权力。相应地，她用更多篇幅来谈论强奸者和骚扰者的心理和社会化，而非性暴力的受害者。不过，她也感觉到（并且有时也指出了）这点——她对男性侵犯的分析，对女人来说也有重要意义。在父权制下，她们被迫把不能给她们带来快乐的东西，当作快乐来追求。

这本书由三个庞杂的部分构成，纳斯鲍姆在书中想做的事情很多，也许有些太多了。第一部分提出一个理论，论证了性骚扰和性侵在道德上令人反感之处；第二部分感觉像是出自于另一本书，它全面概述了美国关于不当性行为的法律（虽有信息量过大的问题）；第三部分本身就是一部专著，它集中分析了书名中提到的“骄傲的大本营”——司法界、艺术界和大学体育界，它们都是性犯罪的温床，并且事实证明，这些地方尤其抗拒变革。

纳斯鲍姆是哲学家，不是历史学家或记者，她更擅长理论思考，而非经验或应用调查。她在第一部分提出最抽象的反思，既是这本书的重要寓意，又是它最有说服力的贡献。纳斯鲍姆的核心论点是，男人之所以行为不当，是因为他们物化了女人——而父权制社会在男人身上培养“骄傲的恶习”，反过来又构成了这种物化倾向的基础。

纳斯鲍姆在其他地方也大量（且出色地）论述过物化，但就她在这里的目的而言，物化现象涉及对女人的自主性和主体性的否定。所谓自主性，指的是她们“为自己做出某些定义人生的选择，而非任由他人决定自己的生活”的能力和权利。而主体性，则指她们作为“对她们来说，很重要的内心深处经验的中心”，而存在的能力和权利。性侵和性骚扰否定了女人的自主性，因为它们“往往无视或践踏女人同意的能力，或通过威胁取得虚假同意，把女人当作方便使用的物，认为她们的决定对男性的满足来说毫不重要。”性骚扰者和性侵者也不尊重女人的主体性，他们认为受害者的“想法和感受无关紧要，就好像只有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的欲望才是真正重要的”。

为什么男人如此倾向物化女人？纳斯鲍姆的回答虽然老套，却也有些道理：至少在我们的社会中，男人骄傲。和但丁一样，她认为骄傲使人的欲望变得畸形。与向外看到美好事物，从而追求它们相反，骄傲的人向内看，只对自己个人的扩张感兴趣。用但丁的话来说，骄傲者“像箍一样弯成一个圈，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和他人”。

虽然人们常说人为身外之物感到“骄傲”，但对纳斯鲍姆来说，人为某物感到骄傲，一定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你）爱你的房子，不是因为它漂亮或舒服，而是因为你认为它提高了你的社会地位”。这种骄傲永远是比较，绝不是内在。因为“重点在于……把自己抬高到他人之上”。

正常来说，在不断定自己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好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完全可能，但按纳斯鲍姆的说法，骄傲总会蒙蔽人：它会引起物化，因为它涉及一种强烈到让我们看不到他人现实的“孤芳自赏”。美国式的男性气概，它执着于通过财富和性征服来确保“高人一等的地位”，就充满了这样的骄傲。结果就是，女人经常被看作“金钱和地位的象征”，而非一个完整的人。

批评者可能会抗议说，纳斯鲍姆的叙述把政治困境个体化了。但她并不认为骄傲是个人的问题。相反，骄傲是扭曲的制度（尤其是书名所说的“大本营”）在男人身上养成的毛病。从纳斯鲍姆的角度来看，“性暴力不只是孤立的‘病态’个体的问题”，毋宁说是“美国的等级结构”和“长久的传统”作用的结果。

纳斯鲍姆的诊断没有问题，虽然“骄傲”的说法不一定比常见的“特权” (“entitlement” and “privilege”) 更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她提出的解决方案，其中的许多看起来太过于法律主义 (legalist)，以至于无法消除骄傲的祸根（她自己也承认是这个祸根是由文化造成的）。

如果男性的骄傲的确是普遍风俗作用的结果，那么，在缺乏更加全面改造的情况下，纳斯鲍姆推荐的制度干预能不能根除它就不好说了。比如说，纳斯鲍姆建议我们在性骚扰法规中引入更加清晰的语言，这种法律层面上的干预很难起到移风易俗的效果。

不过，我们能做的，可能也只是稍微撬动我们的制度，希望法律的变化能在规范上引发下游转变。适度而有针对性的改革（比如鼓励女人站出来指认大学校园里的性侵），哪怕没法从根本上改变法律之外塑造男性性格的结构，至少可以在短期内对骄傲的男人形成威慑。

这个相当“紧缩的”结论置女性于何处呢？女性是男性骄傲的对象。事实证明，在女性那里，也有一种和男性骄傲相应的病态。虽然女性主义者有时不太强调这点。纳斯鲍姆最敏锐的洞见在于，父权制的压迫通过扭曲女人的性情和欲望，对她们造成巨大侮辱。

虽然“女性主义者倾向于相信受害者永远是纯洁正确的”，但事实上，纳斯鲍姆写道（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也观察到这点）：“在不平等之下，女人的人格和志向也变糟了。”的确，正如纳斯鲍姆指出，要是我们能够毫发无损地躲过整个“教我们屈从，剥夺我们自主勇气”的社会，那才叫怪呢！要严肃对待父权制的危害，就要认识到这点——它不但危害，也腐化它的受害者。

父权制通过激起报复性愤怒——不同于鼓励人追求正义的愤怒，这种怨毒的愤怒会摧残人格——腐化女人。女性主义者原本对刑事司法系统残酷的惩罚方式持批判态度，但报复性愤怒使她们在谈论性侵时，抛开应有程序，通过推特审判，诉诸暴民而非法官。

甚至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在父权制下生活的女人，还经常会展出社会科学家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所说的“适应性偏好”（adaptive preferences），或者说形成一种所谓“酸葡萄”心理。于是，女人开始“表演她们的支配者给她们提供的负面形象”，学着想要自己够得着的东西。在她们实际上什么也没法指望的情况下，她们不但学会以酸葡萄为生，还忘记自己曾经有能力渴望更丰富的食物。

枯萎果实扎根的葡萄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斯里尼瓦桑《性的权利》的主题。在最初（2018年）发表于《伦敦书评》上那篇令人激动的同名论文中，斯里尼瓦桑坚称，人与人之间的性吸引（attraction）以政治为媒介。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在罗曼蒂克的领域表现出如此显著的“种族主义、体能歧视、跨性别恐惧，和其他一切压迫系统的痕迹”呢？不然，为什么所谓的“非自愿独身者”（incels, involuntary celibates）——那些到网络论坛哀叹自己在性上遭到疏远，痛斥拒绝和他们睡觉的女人的愤怒男人——会只喜欢在电影和广告中被吹捧为“美”，在色情片中被描绘为“顺从”的瘦小金发女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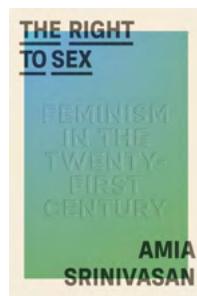
《性的权利》的论题既大胆又有说服力，斯里尼瓦桑也没有回避它凸显的棘手张力。一方面，一旦我们接受欲望是由社会、政治建构出来，那么，欲望就不再是除接受之外，我们别无选择的自然、不变的东西。现在，我们可以批判那些令人不快、排除性的，即反映和强化种族主义、体能歧视、性别主义等压迫系统的性偏好了。

另一方面，一旦我们趟入审查欲望这摊浑水，我们又会助长“性权话语”的危险，而这种性权话语，又会起到鼓励非自愿独身者和潜在强奸犯的作用：如果欲望是可争论的，如果否认对另一个人在性方面的兴趣可能是错误的，那么，最终我们就可能在无意间验证那个想法——有时“不要”，真的应该是“要”的意思。

斯里尼瓦桑正确提出一个无定论的结论：“不存在性权，每个人都有权想要自己想要的东西，但个人的偏好……很少只涉及个人。”就像她在最后一段话中表述的那样，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性权（实际上没有），而在于我们有没有义务，尽我们所能把自己的欲望变得好一些。”

那么，有这样的义务吗？我们中的很多人想知道答案，但斯里尼瓦桑没有告诉我们，她更喜欢“停留在那个矛盾的立场，一方面，承认没人有义务‘想要’别人，也没人有权被‘想要’；另一方面，也承认谁被‘想要’、谁不被‘想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人们经常通过更加普遍的支配和排除模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用一篇甚至是两三篇论文的篇幅来论述这点可能发人深省，斯里尼瓦桑对此立场的想象之巧妙，描述之漂亮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但随着论述拉长，原本令人兴奋的论证也开始变得让人受不了了。虽然这本由论文拓展而成的书增加了一个新的结尾，但新的材料没有尝试解决原论文指出的两难，只是在漫无目标地回应斯里尼瓦桑的批评者。它没有为不那么矛盾的结论铺垫。它还充满了因为没有得到回答，显得像是反问的问题——“不好看的人是一个被压迫的阶级吗？矮子呢？害羞成性的人呢？”斯里尼瓦桑的论文讨论了像色情片的伦理和教师引诱学生在道德上有没有问题那样的主题，它们的形式大同小异，大体上都是从识别冲突的压力开始，以提出能不能协调我们相互冲突的评论的问题告终，这既令读者翘首以待，又让人大为恼火。



《性的权利》

也许，《性的权利》最正面、最明确的地方在于，它强调我们要注意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而支撑这点的想法是，有价值的女性主义不能以所有女人的共性为荣，这样的行动策略造成的后果是，女性主义将因此专注于为那些“最不受压迫的”女人服务，而不去保护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女人。

这个指导性的命令引出了对 #MeToo 各方面的重要批判。它也让人想起约翰·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不平等只有在有利于最弱势的社会成员时才是正当的。比如说，号召人们要相信女人，是在和那种不把女人的证言当回事的有害倾向做斗争，但它也会有说“说自己被强奸的白种女人”的话，来打“坚称自己儿子遭人陷害的黑种

或黄种女人”的话的危险。当然，和解总是复杂的，但我们有不大胆提出临时决议的奢侈吗？

《性的权利》敏锐地勾勒出我们在性问题上面临的道德困境，但说到底，在我们实际上该怎样应对这些困境上，它并没有提供多少指导。文集中的最后一篇、也是最长的一篇论文，有力驳斥“监狱女性主义（carceral feminism）”，即“一种想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权力——警察、刑事法庭和监狱——来实现性别公正的政治”。

和纳斯鲍姆一样，斯里尼瓦桑也对过度惩罚性暴力持怀疑态度，但和纳斯鲍姆不一样，她认为，#MeToo 之所以会有报复性色彩，是因为它过度依赖法律措施。《骄傲的大本营》认为，“#MeToo 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而非法律这个事实造成一个问题”——“在惩罚不是由中立的法律机构进行，而是通过羞辱和污名化来完成的情况下，怎样保障正义和保护平等的尊严呢？”斯里尼瓦桑则相信。“总的来说，#MeToo 的女性主义者看起来很相信强制性的国家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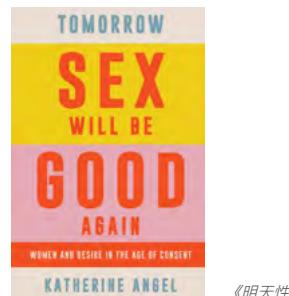
孰是孰非？监狱的解决方案和法律之外的解决方案都有其危险之处。纳斯鲍姆觉得法律和‘法治’体现了一种平等尊严和平等的正当程序愿景”，考虑到实际存在的刑事司法系统中掺杂的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这种感觉太过于乐观。但纳斯鲍姆花很大功夫归纳的那段历史——人们怎样征用法律来保护女人——也强调这点：有时，向国家求助是有益的，虽然因此获得的好处是脆弱的。

我们有理由认为，法律对“性骚扰”范畴（由活动人士在 1970 年代引入）的承认开启了一场范式转移：就像一位著名女性主义者回忆的那样，在这个术语出现之前，职场虐待“只是生活而已”。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有时，法律框架的缺乏也可能给斯里尼瓦桑告诫我们要重视被边缘化的社群带来危险。校园法庭就是一个例子，它不一定会给被告提供免费律师。

鉴于所有这些复杂情况，斯里尼瓦桑明智地坚持，“把惩罚坏男人视为主要目的的女性主义政治，永远不会是解放所有女人的女性主义，因为它遮蔽了使大多数女人不自由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经济不义和随之而来的物质剥削。

但这个说法并没有把这点说清楚：我们生活在令人遗憾的严重不平等之下。有鉴于此，在不远的未来，具体来说，除监狱女性主义外，我们还应该追求什么？难道女性主义者应该在争取更加全面正面的时候，放弃加强对性侵或性骚扰受害者的保护的努力？难道我们应该拒绝指控强奸我们的男人？

这些药苦口，但我很可能还是可以说服自己把它们吞下去，甚至还会觉得它们比酸葡萄更好。问题在于，斯里尼瓦桑没有解释我应该选哪盘菜，以及，为什么我有义务，或者说，我到底有没有义务克制我更加放肆的渴望？渴望性支配或力图与父权制的美丽规范保持一致的女人，应该纠正或无视自己的欲望吗？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欲望是从沙文主义者那里继承下来的。她们是不是应该放弃满足起源不义的色欲，而去选择长久的不满？在我们永远没法驯服我们难以控制的胃口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



《明天性又会好的》

也许我们不需要驯服它们。最终拯救我们的，正是我们不受控制的胃口——安吉尔在她透彻而优雅的专著《明天性又会好的》（也是迄今为止这方面最令人振奋、最具原创性的一本书）中这样论证道。在四篇深挖细究的论文（它们依次讨论了同意、欲望、唤起和脆弱）中，安吉尔没有拒绝法律和物质的补救措施，而是超越它们，到我们情欲关系的间隙那里，到欲望本身纯粹的力量和事实那里去寻找帮助。

她从“同意和自知”开始探究。一般认为，同意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是好的性需要满足的“两大要求”。“在性的领域，同意（至少是同意的理想）最重要”，她写道，在这里，“女人必须说话——她们必须说出自己想要什么。因此，她们也就必须知道她们想要的是什么。”

但女人应该怎样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呢？在一个笛卡尔主义重新抬头的年代，我们太过于仓促地忘记了，所有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都看不穿自己，尤其是女人，她们一直在被各种关于我们要不要相信自己的本能或放纵自己的倾向的矛盾信息轰炸。PUA 高手一直在告诉我们，在我们说“不要”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要”，并且我们更广泛地“因为我们被要求培养的自信、坚定的姿态和行为而遭到惩罚和批评（说我们刻薄、专横、凶）”。希望破除“女人没有男人好色”神话的好心的科学家，甚至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他们论证说，女人甚至在表示没有欲望的时候，也会展示出唤起的生理表征。

是我们渴望的身体掩饰了我们含蓄的心灵呢，还是相反？我们的抵抗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压迫性规范（根据这样的规范，女性以纯洁为特征）的内化？我们的渴望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于厌女的命令（根据这样的命令，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满足男人）？我们可以从性别歧视教导的泥水中提取出纯粹的欲望吗？除此之外，如果真有这样的东西存在，稀释了的欲望就不如纯粹的欲望正当、有力吗？我们就不能给自己我们想要的东西吗，哪怕我们只是因为被虐待了才想要那个东西？

如果说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没有答案，那么，在实践中，私密的直接性又让它们甚至更难回答。评论者从他们遥远的扶手椅中建议要爬出那个“矛盾的地方”，但床上的女人只能躺在那里。最终，同意的拜物化把“好的性的互动负担”放到女人身上，而后者已经被巨大认知负担压得步履蹒跚。

“为确保性对双方来说都是快乐和非强制性”的女人，“必须表现出自信的性自我”，但一切又都在合谋阻止女人培养出那样的自我。安吉尔的结论是，“如果我们想要好的性（令人激动、欢乐、非强制），那么，我们需要不被要求像我们总是知道的那样行为和说话。”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要搞不经过同意的性行为。同意是“基本的”，是“最低要求”（虽然我们不太清楚在安吉尔看来，在不可能存在同意，看起来要求的那种确定性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确保这个条件得到满足）。要好的性意味着，经过同意的性还不够好，因为“很多经过同意，甚至明确得到同意的性并不好：它难受、不愉快、羞辱人，单方面和痛苦。”

当前盛行的在快乐上的性别差异“很重要，哪怕它严格来说算不上侵犯。”使如此之多的性如此之糟糕的原因，除人与人之间化学反应失败（这方面因人而异）外，还有性别规范，在这样的规范中，女人不可能是和男人平等追求性的能动主体，而男人则有不惜一切代价得到满足的特权。

换言之，同意范式把一个事实上要求政治回应的问题，要求一场改变我们为女人提供的，用来探索她们饥渴资源的革命，给私人化了。

甚至革命也不能挽救当前模型，这个模型假设，先有静态、稳定的偏好，然后，人们借助同意表达这些偏好。在关于欲望的章节中，安吉尔解释说，一些性学家区分据说是男人特有预期性的(anticipatory)欲望，和据说是女人特有回应性的(responsive)欲望。前者自由流动、自成一类，后者由特定的人激起，并附着于促成它的那个人。根据流行想法（在这么长时间里，这种想法一直占主流），男人有会让他们扑向碰巧在他们身边任何一具身体的生物欲望，而女人则会被特定刺激吸引。那些认为这样的两分是性别歧视的人会说，女性的欲望和男性的欲望一样极具生物性：所有的欲望都是预期性的。

安吉尔创造性地提出相反论证，她认为，是男性的欲望像女性的欲望：所有的欲望都是回应性的。我们不应该把男性的欲望当作基本的生物学事实，而应该把它看作社会赋能、许可和强加的行为”。

说到底，平等也有一个度；男人事先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女人也一样，因为欲望不会先于引起欲望的语境。在发现自己处在想要一个东西的火热、粘稠阵痛中之前，没人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快乐包含风险，而且这个风险永远没法被排除或避免……当我邀请某人进入——当我想让他们进入——的时候，我永远没法确定他们会以我想要的方式进入。我也永远不可能事先知道我想让他们以怎样的方式进入。”不可预知性不只是性生活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也是情欲的本质。就像安吉尔在她关于脆弱的极其欣悦的章节中写道的那样：

“确切来说，性的一部分乐趣就在于发现新的、不同的被触摸的方式：就在于对未知的东西脆弱……这就是为什么性的邀请吓人，为什么它如此动人。在一个人的欲望中被满足，在一个人的欲望中被惊讶，是在练习相互信任和克服恐惧。在成功时，那感觉就像是奇迹。”

好的性、可口的性就像有糖霜的蛋糕，在于发现自我以一种心怀欲望的个体，永远没法以独自想象或预期的方式被夺走、被改造。

这意味着，我们受制于不是我们选择，并可能反映和复制我们不认可的文化病态的欲望。这也意味着，欲望可以把我们从习惯性的狭隘中拉出来，打破意识形态硬壳，开启某种温柔超越。

在《菲德罗篇》中，柏拉图生动描述一个与美丽少年相遇，被欲望的混乱击垮的男人。这个男人的“整个灵魂都在悸动”，他脸红、流汗、头晕目眩，开始忽视他原本追求的东西，对家人和朋友也不那么感兴趣。他以不同的方式安排自己的时间，力图按少年的光辉形象重写自己的人生。最终，他变成一种新的造物，开始长出翅膀。

在《性的权利》少数充满希望的段落之一中，斯里尼瓦桑一定也有类似想法，她写道：“欲望会让我们惊讶，把我们引向某个我们不曾想象过自己会去的地方，或把我们引向某个我们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渴求、会爱的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许，这些情况也给了我们最好的希望——欲望会反对政治为我们选择的东西，并为自己做出选择。”

欲望经常不顾我们的抗议，通过我们来起作用，出于这个原因，它可以比我们更好。当然，它也可能更糟。无论内容是什么，至少在一个方面，就其结构而言，抓住我们的欲望是合乎道德的。指责的渴望，是骄傲的人怀抱渴望的反题，它起源于外部而非内部。

纳斯鲍姆的物化者把粗鲁的幻想强加于他们的对象，但被意料之外的欲求砸开的人，会被促成这欲求的人迷得神魂颠倒。好的性，就其坚持其对象的独一无二而言，会提升我们。欲望总会带来大规模重新创造的风险，因为在欲望行动本身中就隐藏着革命的潜能。只要我们还能“想要”，我们就还没输：“想要”经常伤害我们，却也会给我们翅膀。

这是一篇书评，评的是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骄傲的大本营：性侵害、问责与和解》（*Citadels of Pride: Sexual Abuse, Accountability, and Reconciliation*），W.W.Norton, \$27.95 (cloth)。

阿米娅·斯里尼瓦桑（Amia Srinivasan）：《性的权利：二十一世纪的女性主义》（*The Right to Sex: Femi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8 (cloth)。

凯瑟琳·安吉尔（Katherine Angel）：《明天性又会好的：同意时代的女人和欲望》（*Tomorrow Sex Will Be Good Again*），Verso, \$19.95 (cloth)。



贝卡·罗斯菲尔德

美国作家，《The Point》杂志特约编辑，哈佛大学哲学系博士候选人。

译者：王立秋

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原文来自 Becca Rothfeld, “Pleasure and Justice”, *Boston Review*, September 20, 2021。经作者许可翻译。

小鸟文摘

这是一个免费频道。我们希望更多读者可以以此了解更多。



图片来自 [Sara Groblechner on Unsplash](#)

非虚构

食嘢讲嘢，在地离散 天涯鸽女 | 生活亲历者

个体能为历史流向负责任么？

01

正系旧约难渝潮有信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北纬 52 度的南荷兰省小城淹没在灰云水雾里。一点半钟下课，我骑车回家，旧城区的砖石路把饭盒颠出“哐啷哐啷”声。缺少多巴胺的大脑分辨不出面包干酪和温带海洋气候的雨天哪个更致郁，偏手拐差了一条街。

我并不很熟悉这个城市，但一定是哪里出了点“错漏”才能解释，为什么热植物油烹香大豆蛋白和辣椒酱、再翻炒鸡蛋和白米饭的香味会突然袭来。毕竟，荷英双文的课本上也写着，清教信仰和“柱化”传统里的荷兰人大多不看重吃饭，甚至对中午吃热食有道德上的紧张感。我赶紧停靠路边，阅读窗玻璃上的红色字符。“Indonesische keukens”，“中華料理”，“叁巴”，“沙嗲”……印尼华人餐厅，好香。

熬过令人绝望的冬季（并接纳了自己和室友如何无法用华人超市唯一一种的酱油做出好吃的食物），我开始在华人餐厅打工。老板是个皮肤身材连同嗓音都甚为美丽的三十岁女性。“先讲好喔，你们的签证不可以打工的，如果警察来呢，你们就讲是我家里的妹妹。我 cover 你们，每小时工资扣掉 5 角。穿黑色上衣，周五和周六晚上上班。都 OK 的吧？”

“警察真的发现不了？”

“多出来他们会问一问，但是讲是家里的妹妹嘛，他们荷兰人辨不出华人面孔的。又是女生，不会细问。放心。”

好的，老板看着实在不像坏人，为了蛋炒饭也值得一试时薪 5 欧元的端盘子。

春夜湿凉，我皱着眉看荷兰人往白米饭上浇椰浆。不是甜品，是他们点来配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的主食。关门后我向老板吐槽，她一边安排我们的晚饭一边慢慢讲：

“荷兰人嘛，米饭，是不是，他们只知道印尼米饭咯。要么就是辣酱炒饭，那他们好多人又吃不了太辣。要么就是椰浆米饭。随他们了。”

我们围桌而坐，吃蛋炒饭、溏心蛋、煮毛豆、日本叉烧拉面和冬阴功汤。老板用天然加密的家乡话和厨房阿叔们交流，对我和酒水台的新移民阿姨讲普通话，和家里过来帮手的妹妹讲荷兰语。从五点钟就冷冻浓黑的二月初到过了十一点还能看见青紫色云彩的六月半，我习惯了荷兰人的饮食搭配和拿筷子手势，也在老板软绵绵的腔调里了解到这是一个四代华人移民家庭，战前从温州下南洋，在 1960 年代的印尼“排华”恐怖里持着马上过期的荷兰护照逃到欧洲。

“开餐厅嘛，一开始卖米钣炒菜，他们不知道吃的。没办法，我们就讲自己卖的是印尼炒饭，荷兰人总知道印尼的嘛。这样慢慢做下来。”

“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回去大陆？”

“喔，我不是很清楚哦。好像是，因为家里有点家当的。金子、首饰。别的也带不了嘛，带着金子就跑上飞机了。有金子就不能上去大陆嘛，外婆讲的。”

“为什么有金子就不能上去？”

“不要太较真这些，问到再深再细，我也不知道的。我只有清明扫墓回去，不懂喔。”

“嗯嗯，没事的，可能这个问题太大了。”

“是咯。那，你怎么样，要不要继续呆在荷兰？”

“你知道我是学生啦，怎么可能就留下来。课程结束，就回去。”

“以后呢？”

“荷兰太抑郁了。一年三百六十天下雨，不适应。”

“我老公也是大陆人，过来了也就适应了。”

“会觉得融入不了么？”

“怎么算融入？家里我们就是讲温州话，每年回去清明扫墓。但我们都是荷兰读书长大的了，荷兰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丹麦语、意大利语，拉丁文希腊文中学就学的，男孩女孩一样读大学。男孩子嘛，毕业了出去找工作，女孩子回来家里的餐厅生意。挺好的吧，还要怎么融入呢，不卖炒饭了？我们客人还蛮多的，不能不卖了喔。融不融入又怎么样呢？我每天关了店回家看电视到两点半，挺快乐的。不要想太多、不要太较真，做生意嘛。”

02

新愁深似海个无边

二零一六年三月，北纬 22 度的香港春雾弥散。一班同学搭巴士过新界做田野调查，一落车，我被大正红花砸到头，痛得当场跳开。另一位北来妹妹半惊吓半好奇地捧起落花。我边揉头边问本地伙伴：

“呢個係咩花嚟噶？”（这是什么花啊？）

“木棉花咯，煲湯一流！”

在这个咩咩都煲汤的粤语世界，我们周街乱走的研究课题是“饮食习惯与身份认同”。千禧年以来，新界居民的异质化逐渐加深，早已不再是华琛、华如碧夫妻笔下的“乡村生活”了（Village Life in Hong Kong: Politics, Gender, and Ritual in the New Territories）。课程老师几次叮嘱：“从食物里找找看‘他们是谁’的故事和答案。”

“咁……”我摸摸头顶，确定头发不再散乱，“我揀呢間鋪了喔。”（那……我选这间店了哦。）

“呢間有啲咩特別？咪就係賣嘢俾工人姐姐嘅鋪頭？”（这间有什么特别？不就是做佣工生意的小店么？）

“妳睇佢個名咯。‘唐人’喔，我估個老細一定有啲海外華人嘅故仔可以講。”（你看它店名哦，“唐人”，我猜他家老板一定有些海外华人的故事讲。）

“咁樣。咁你喺呢度啦，我哋去個邊搵其他鋪。”（哦这样。那你就在这里咯，我们去那边找其他店。）

同学无意听我絮说，转身跑开。我有点紧张地深吸了一口气，商铺楼里南洋香料和廉价染发膏的气味交混袭来。相似的味道，五年前在荷兰小城的华人店铺买酱油时也遇到过。兜兜转转，西西东东，离开阴郁的西北欧千万里，又在亚热带的山海间再相逢。

“唔該，呢兩包……”（劳驾，这两包……）

“一共十六块。这个辣的喔。”

“您讲普通话？”

“是呀，讲普通话的。”

“咁，唔不是，那，您是印尼归侨？”

“……？！”

“呃，我看到您家店牌，有‘唐人’的印尼店，我猜就是海外华人了。而且……而且您讲普通话，大概是回去大陆的归侨……抱歉我是不是猜错了？”

“你说得对，就是你说的，印尼归侨。你怎么知道我们？”

“我……呃……以前学过一点荷兰人在印尼的殖民史……先把钱给您。”

“你读历史系？”

“呃，我不是，只是……只是恰好学到。”

“好喔，我没有去过印尼，但是殖民史、海外华人这些，你说得没错……”她看我还没有想走的意思，好像也明白了我的来意：“你等一下。如果要听故事，我不会讲。等下我家人过来，他很会讲的。”

“会不会影响您家里生意？”

“不会不会。有同学对我们的事情感兴趣，我们很高兴喔。等一下哦，他就来……你有没有……问题，具体的问题？”

“有的有的，我在读人类学，想要了解下您家里的饮食习惯，我在做关于饮食习惯与身份认同的学习。”

“好喔，饮食蛮少讲的喔……你买这个辣的喔，没问题吗？”

“没问题，我可以吃辣的！”

“那就好，我们都不吃辣的，这是卖给他们印尼人的。你尝一下试试看。啊，他来了。”

细瘦的老阿伯拖着买菜车走过来。他们讲了两句我听不懂、大概只能从元音推知是南岛语系的语言，嗯，印尼语。然后阿伯转过来对我：

“所以、啊请问，”我有点被他的严肃惊到，一边紧张自己的语言刻板一边更不知道怎样表达：“可不可以讲一讲您家里一日三餐吃什么？”

“我以为你要问身份的事情？”阿伯皱眉：“这件事可以直接讲嘛，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是谁。”

“呃，是的。如果您想的话，可以先讲讲经历。我们的课程要问比较多食物的事情，不过我想您先讲您更看重的部分比较好！”

“你看到我们的店铺名字了，我们是唐人……”

“慢慢讲喔，”阿姨补充一句，侧身到店里清货。“不要吓坏小同学。”

“我们是唐人，这个词大家都接受。你说 China，那就要有麻烦，你看到现在街上小

孩子怎么骂人了是不是？骂“支那”……用唐/Tong，就不会骂了……我们哪，离唐山、下南洋，只是想要过一个好一点的生活。很多事情发生，我们都还没有准备……”

“啊，讲完啦？阿伯年纪大、比较容易累。没问完是不是，可以下次再来……”阿姨从铺子里出来，塞给我瓶装饮料和饼干：“拿着的。”

我有点受宠若惊，又想起来田野任务和研究伦理，指着他们桌子上的印尼米糕讲：“这个怎么卖？”

“六块钱。这个不好吃，我们做了卖给她们的。哦哦好吧，拿一个试试。饮料饼干也拿好啊，这个不算钱的。下次再来问吧。”

不知道是不是被日日煲汤的粤语区生活养娇了舌头，以前狼吞虎咽蛋炒饭的我怎么也欣赏不了手工印尼糕。蒸煮过的芭蕉叶没有清香，米团是一股热熟果脯的怪甜味。坐在木棉树下就着饮料吞咽，想起来五年前刚到荷兰时候，中午十二点半只有五分钟课间，我就着自动贩卖机的咖啡吞咽冷面包，然后仓皇冲向下一间教室、应对下一节提不起兴趣的课程。

能选的事情，确实不多。

03

睇我呢种情绪悲秋同宋玉

红棉落尽，紫薇盛开。田野调查结束，已经是炽晴和台风雨交织的五月半。期待多年的亚热带阳光没能抵御政治抑郁，我几次在整理阿伯和阿姨的采访笔记时候哭起来——不仅是食物的可吃与不可吃，连同个体与族群之命运喜忧、历史“公义”，到底都是权力绞缠的无奈结果。人天无据。

“印尼排华，哦这个你知道的，好的。他们真的杀人的。印尼人、荷兰人、日本人、印尼人，来来回回的，到最后就是要杀人了……有船来，从上面。他们说接我们回去，到广州住，小孩子还可以在广州读书，读华侨中学、华侨大学。荷兰人在的时候，大学只有荷兰语的。华人拼力建些私立的小学、中学，然后就是打仗啊，再到印尼独立，私立的学校也不许开了、公立的又歧视你去考，没有办法读书了……而且出人命了啊，只好回去。先是坐船，到岸上再坐卡车，卡车开啊开啊，天都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他们说大家下车休息一下。我们就下来，蹲在地上，一个灯也没有。有一个喇叭的声音，说我们到了农场了，这里是广西哪里哪里，以后就在这里生活。我们觉得这不对啊，不是这样和我们讲的啊。然后有人说，啊呀卡车已经开走了。哦，那就知道没办法了，哪里也不认识。就都坐在地上哭啊，哭啊。然后就那样了，就在农场生活。

“农场很苦的。爸爸妈妈以前不是农民，我们不会做农活。很辛苦。也没有书读。他们，当地人，很不尊重女性。我们不是的。他们的女人怀孕好几个月了，还要去挑水。男的就不做家事。我们会好一点，爸爸妈妈会分担。爸爸说我们受过教育，所以会这样。可是现在又没有书读了，那怎么办呢。没法讲的啊。

“很穷，很累，经常饿肚子。我们从印尼带了种子回来，牛油果啊、木薯啊。爸爸本来有一辆车，那完全不可能带的。随身能带的，就是一点种子。带着的时候，也不知道能不能再种下。木薯什么的，广西也有，但不是一样的，不好吃。只有我们的种子种出来的好吃。可是在农场上也种不好，不知道是土的问题还是什么的问题。木薯种出来，就捣成泥，贴到墙上，一小片一小片，晾干了拿下来吃。或者拿砂子炒。墙皮啊砂子啊，你就抖一抖嘛，多抖几下。像在印尼吃的虾片。农场不可能有虾片是不是，就只有这个。有这些吃很不容易了。看到农场外的人饿得更厉害，很吓人。“爸爸很爱煮饭。平时都是妈妈煮，但是节日一定是爸爸煮。他会花很久时间来煮一个肉，炸啊蒸啊的，很多步骤。但是很难买到肉，什么时候买到肉什么时候就是过节……然后……就‘文革’对不对……爸爸就被抓起来了，十年。他就讲了一句话，就是十年在里面。所以我很怕的，所有政治的事情。你不要问我这些，不要问我现在香港的事情啊，不要问，很怕的，我讲不了。

“差不多七十年代末，过来香港这边。当时是觉得香港会好过一点。北京也说，我们这样的人，可以出去。可是过来了，我们又不会讲英文、又不会讲粤语，农场里大家讲普通话嘛、也没有学英文、没有学技术，啊呀真的……怎么办，找不到工作……好不容易去工厂做，很难的。

“能够有一间小屋，很了不得了。几十年了，终于敢松一口气，哎呀……后面香港开始有印尼佣工嘛，我们就联系还在印尼的家人。以前在农场都不敢联系的，是不是，不能联系……就联系他们，大家一起来卖印尼的东西给这边的佣工。印尼话呢，我会讲，我老婆生在农场的，她的印尼话是过来香港才学的。现在我们一家就靠这样一个小店铺，守着它。

“当然我们也不是印尼人。做这些东西卖给他们，我们自己是吃不惯的。他们吃辣的、吃油炸的，身体也不会舒服。我们不行，这些是‘上火’的东西嘛……”

“前几年回去印尼一次，我阿姨还在。她说我们走了之后，我们的车子马上被他们拆掉了。轮胎拿走了，车架就放在那里。我们去看，啊呀，就是那些草啊树啊、野芭蕉什么的，把车缠在那里了……小时候爸爸妈妈有自己的农场，周末我们一家人开车到城里去卖农场的香蕉。有一张我们站在车前面、在城里的照片。找不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或者烧了吧。

“回去一次也就这样了。阿姨说你们不回去大陆才好啊，其实留下的印尼华人活下来，自己的农场也还可以有的。可是当时怎么会知道能不能活下来呢？而且那时候是想回去读书啊，想读大学，印尼人又不让我们读……讲不清的……我年纪大了，老婆又辛苦，两个小孩还在上学，店铺不开门不行的。尽量把小孩供完大学吧。让他们读书。那他们可以再出去，加拿大、澳大利亚，是不是，出去可能好一点，比这边好过一点。

“这么多年在香港，一直也不习惯。牛油果啊木薯啊，买不到好吃的。好像就是没有小时候那种了。香港人又太多，太逼了（太窄仄了）。我们不是香港人。我们很感

谢香港，真的，让我们小孩可以读书，但我们不是香港人。我们不喝汤，不像他们，什么都拿来煲汤。我们三餐就是一碟菜、一碟饭，一杯冷水在旁边。我们本来也不供老爷嘛，在农场里上中学我们学的是上面那一套，但是过来开店铺，大家都供，也就供了。我们小孩子不一样了，像香港人了，或者就是香港人吧，不知道他们。我们喜欢吃的东西，他们不喜欢。花生沙拉、煎小鱼这些，他们不吃了。以前他们小学里有活动，要每家做食物带去。我老婆做印尼蛋糕，啊呀到了学校大家很喜欢，觉得新鲜嘛。那小孩就喜欢这个东西，要妈妈再做。但是他们上了中学，没这样的活动了，我老婆也就不做了。印尼蛋糕很辛苦，手工很麻烦。就不做了，很久都不做了。“我还记得我们那个车，车架子那样破烂地倒在草里。想找回我们家的那张照片。找不到了……我们这些人很少的，年纪也大了。上次你过来问我们事情，你走了我问我小孩，想不想参与你这个……研究……是不是？他不想的，他很内向，也觉得没什么可讲。他们是香港小孩了。

“香港的事情我们真的不懂。现在有小孩子到街上去，用 China 骂人。这个我真的好生气。China 这个词，‘支那’啊，这是我小时候在印尼听到的，日本兵走到街上，这样骂人，打人，开枪。我说不要用 China/ 支那，要用 Tong/ 唐，不管是大陆、是哪里，总都是唐人的，但是这样的话又能讲到哪里去呢，没人听的……”

04

况且客途來抱恨吖

华人餐厅的老板和印尼食品店的阿姨都问我：为什么你感兴趣我们，为什么你来到这里？

冷饭盒的哐啷声该不该为遇到热油烹香辣椒酱负责，落下的木棉花又和选一间佣工食品店有什么关系呢？

在荷兰那年，我偶尔逃课去博物馆。Japan Museum Sieboldhuis（西伯尔德日本博物馆）有一次做和服纹样展，馆里只有我和一对本地夫妻。他们聊布料上的小女孩如何精致漂亮，我忍耐半天，终于上去解释：这不是女孩子，源义经、男孩、年轻武士、live fast and die young，他们说：啊，原来这样，你是不是日本人？又一次去 Museum Volkenkunde（民族学博物馆）看日本漆器，星期二下午场馆空无一人，馆员从电脑后探出头来：你是中国人？中国馆在对边喔，你走错方向啦。等到本科论文写大政奉还前荷兰人与德川幕府的贸易交流，所有人都只剩下一句话：这个课题和你有什么关系？毕竟你并不来自他们中的任何一方。

初学粤语，老师是一位北嫁多年的香港师奶。几次口语课之后，她问我为什么发音好像五六十年代逃港的乡下婆婆。我茫然不知察。她又问我有没有看剧或者影片做练习。“我日日聽大戲，《帝女花》、《紫釵記》。”（我天天听粤剧……）“大戲？！我屋企得阿嬤婆婆先聽，怪唔之得你嘅發音咁樣……睇下啲後生仔嘅嘢啦！”（粤剧？我家里只有奶奶外婆才听，怪不得你的发音这样……看点年轻人的东西啦！）到香港之后，我在讨论课上用《帝女花》做分析材料。本地同学指着影片里的“戏迷情人”任剑辉问我：“佢係邊個？點解佢識講廣東話？”

为什么华人餐厅老板和印尼店铺的夫妻会有如此不同的生活？为什么我和本地同学认知到的香港高度不重合？个体选择差异的结果么？个体能为历史流向负责任么？

也许问出的问题越多，能有的答案就越少。

我没问过，也不忍得问。

05

你话叫我对乜谁言

东西往复、南北颠连里，我时有不知何处归去的困惑和孤单，又似乎借着食物和语言与一些人彼此辨识、寻得微小的亲切与安慰。也正是在这些转瞬之间的相逢里，体认到那些有权决定我们在这里是谁“我们是否可以留低此处的人的冷漠与傲慢——他们似乎缺乏认知我们“究竟是谁”的能力，也实在不必在乎我们“希望自己是谁、想要过怎样的生活”（也因此，他们未必应该为这种被感知到的冷漠和傲慢承担责任）。而在安慰与冷漠之外，在这一个又那一个时间、空间反复出现，因而似乎成为了我生命中一种持恒的搅扰则是：

流离和波折里的“我们”，真的回答得了自己是谁、分辨得清对方是哪个么？或者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我们”，值得这一个人、那一个人，乃至每一个人在一浪又一浪的历史交缠里信赖、奉献、求问正义？

没法讲的吧。

二零一七年，抵不过“家人”压力，我回到北纬 40 度。又过一年，抑郁再袭，我回来翻看田野笔记，最后把阿伯关于“Tong”和“China”的观点分享到社媒，试图安抚自己对整个亚热带生活的极度思念。我的本科老师，一个区域史博士，直接留言说：“这种错误的言论你怎么可以信？如此反智的信息，你是不是读书太多脑子坏掉了？”

想问她谁不让谁上大学、谁反智，没有发出去，只屏蔽了她的账号。十年来我一直觉得虽然大家观点相异，未必不可交流。但原来无论如何也还是没有一个空间拥抱不同，那就算是吧。

二零一九年，重新申请了当年的那间欧洲学校。录取通知和办理签证的材料清单同时寄来。乱世如风，左右周圆无果后只好拨电话到荷兰，解释香港的大专院校已经暂停一切教务、无法出具证明。挂上电话，半下意识地打开谷歌地图，搜索当年打工的华人餐厅。印象里出了中心火车站直行十分钟的简单路程，在手机上试验几条路线都没有成功。荷兰不是一个习惯性高频拆建城市的社会，我的记忆错了。

二零二零年，落翻亚热带。结束隔离的第三天过新界，在印度香料和廉价染发膏的味道里重新遇到阿姨。大家都戴着口罩，我胖了很多，她的头发明显花白，但我们还是一眼认出对方。没讲两分钟，阿伯也出现了。生意难做，从他的佝偻体态和紧

锁眉头上一览无余。我买了好几包花生，阿姨又拆开纸箱和塑料袋、拿出饼干和饮料塞给我。

“香港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啦，我们不懂啦，你要多小心哦。不知道他们对学生怎么样唉。”这次用了这么多语尾助词的人是阿伯。“我们的故事，未必家家如此。但我们都讲的都是真的，是我们经历的、生活的。落到今天，语言不是问题，遇到谁、就讲谁的语言。我们是谁，是唐人，用汉字。但是‘我们是谁’是我们说了算吗，不是啊。三代人四代人，代代生不同地死不同地。我们有张身份证，是香港人，可人家认可我们是香港人吗？孩子要再移出去，去吧，他们会讲粤语，到了加拿大、到了澳大利亚，也容易点，去吧，外面好活，我们移不动啦。”

注：章节题目出自地水南音《客途秋恨》



天涯鵠女

小岛上的离散践行者，人类经验的学习者。
日常恐惧，日常恐惧自己无法战胜恐惧。

生活亲历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
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
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
里折射的往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档案

灾难报道是“吃人血馒头”吗?

方可成 | Newsletter

这是小鸟 newsletter 的第九期。

东航 MU5735 空难发生第二天，《人物》杂志迅速推出的报道《MU5735 航班上的人们》获得了很多关注，不少人说被这些人物故事深深触动，对这场灾难有了更加真切的感受。但是，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批评者大多以“新闻伦理”为旗号，指责《人物》违反伦理、侵犯隐私、给家属带来“二次伤害”、“吃人血馒头”等。这里想先说一句，鲁迅先生小说《药》里面的“人血馒头”真不是“利用他人的不幸获利”的意思，而是愚昧、无知和麻木的象征。读一遍《药》并不是难事，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暂且认为，“人血馒头”的定义已经成功被当代网友改变了，它不再指代愚昧和麻木，而是等同于“嗜血”，是从他人的不幸中攫取利益。那么，媒体做灾难报道真的是“吃人血馒头”吗？或者更具体说，《人物》的这篇报道是不是“吃人血馒头”呢？灾难报道究竟应该遵循怎样的伦理守则呢？

灾难报道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先讨论宏观层面的问题，那就是：灾难发生之后，媒体是否应当跟进报道？媒体做灾难报道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灾难发生后，人们的信息需求是比平时更加强烈的，不仅是被灾难影响的人，也包括并没有直接被卷入灾难的人，因为我们会关心同类的命运，我们也担心自己今后会遇到同样的厄运。而这时为我们提供信息的，媒体是一支最主要的力量。我们不能仅仅“等官方通报”，因为信息量不够，且可能隐藏甚至扭曲部分信息。

如果你认为媒体就应该乖乖等着转发官方发布的信息，如果你认为媒体去现场采访就是添乱、采访遇难者家属就是伤害、发出追问就是不安好心、记录悲伤就是赚取流量，那么也就不必再读下去了，因为我们对媒体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接下来的讨论需要建立于一组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媒体做灾难报道是必要的；现场采访和家属采访要非常小心注意，但都是可以做的；我们应该探讨的是怎样做更好的报道，而不是该不该做报道。

国际记者中心 (ICFJ) 出品的《灾难和危机报道手册》中提出，在灾难和危机中，新闻媒体扮演了四种关键的角色：

第一，提供关键的信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谁受到了影响、事情在如何发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

第二，提供一条沟通的生命线，传递关键信息，把受影响的相关方的信息传出来，也将关键信息传递给他们；

第三，成为一座警告的灯塔，为避免下一次的灾难传递及时、可靠的信息；
第四，成为一个社区的论坛，让公民们可以走到一起来，分享自己共同的担忧，在困难的时刻彼此提供支持。

这四种角色，显然不是一篇报道能够同时承担的，甚至不是一家媒体能够同时承担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媒体的参与，需要更多样的声音和多元的角度，有的记者去前线采访救灾现场，有的记者挖掘调查背后的深层原因，有的媒体传递共情、抚慰心灵，让人们可以更紧密、更坚强地站在一起。在理想状态下，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场面同时上演。

这里顺便再说一句媒体的“流量诉求”。大多数媒体都是按照商业规则运行的，追求注意力，不管是发行量、收视率还是点击率，都是正常的市场逻辑。纸媒年代，如果一张报纸能做到一纸风行、洛阳纸贵，那是很骄傲的事情。哪怕是非商业的公共媒体（比如 BBC），也很强调报道内容是否覆盖到了更广泛的受众。所以，“追求流量”并不是原罪，关键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追求，能否做到流量和公共价值的更好平衡，乃至双赢。一些人在媒体做了什么报道之后就骂“人血馒头”，下一次媒体没报道的时候又喊“媒体已死”，那是自相矛盾的。

还原失联 / 遇难者人生的报道有何意义？

上面提到，灾难报道有几种不同的意义。可以理解的是，在灾难刚刚发生的时候，人们最关心的还是信息层面的意义，尤其是灾难发生的原因。

但是，很多时候，这样的原因不是马上能够调查出来的。更何况是空难这样高度专业和复杂的领域，对“为什么会发生这起空难”这个问题，注定不可能在短期内提供回答。而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下，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就更为困难了。

一些对《人物》的报道不满的人，提出的批评是：有这个时间精力，怎么不去调查一下空难发生的原因？这样的批评有些求全责备了，因为那需要时间，还不一定被允许发表，而且，还原失联 / 遇难者的人生，这样的报道本身就是有其意义的。

其实，这个角度的报道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灾难报道中的常见操作。它将抽象的数字还原为具体的人，让悲伤更为可知可感，由此也将灾难的记忆更深刻地刻进我们的社会，让人们更难遗忘这样的经历，也间接地促使人们不断去追问和反思灾难发生的原因。《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从玉华曾经说，“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小人物具体的悲伤。”还原他们的故事，可以激发人们的共情。这符合上文所说的灾难报道意义第四点，那就是将人们联结起来。这次不少人提起的《回家》和《永不抵达的列车》都有这样的效果。

曾经担任《焦点访谈》主编，现在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任教的庄永志曾经回忆，美国“911”事件一周年的时候，他看了将近十部美国各大电视台播出的非虚构节目，其中印象很深的是 ABC 的著名记者戴安娜·索耶讲述了几十个不幸失去父亲的宝宝的故事。“几十位妈妈（有的还是未婚妈妈）痛失亲人的绝望、苦苦寻亲的痴情、茫然无助的惶恐和为爱而生的勇气以及宝宝们懵懂无忧的笑脸，在镜头前毫无遮掩。反复观看，每次都热泪盈眶，既慨叹命运无常，更感动于生命的坚强。”

我在这里再举一个国外的例子。埃博拉病毒一度在多个国家肆虐，西方媒体的关注焦点是感染遇难的美国人，它们呈现了不少死者的故事。但是，实际上无论从死者数量还是从疫情本身的重要性来看，非洲才是埃博拉病毒的中心。这时，如果有更多对非洲埃博拉死者的人情味报道，将能够有效激发受众对非洲的关注和同情，也能更好地影响资源的调配和投入。

采取这种较为软性的方式做报道，在中国的语境下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它是狭小空间中一个尚且能做出报道的领域。资深传媒人朱学东就总结说：“灾难中遇难者的报道，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对消逝的生命的追怀，也已经成为媒体人突破阻力，尽可能向读者呈现灾难局部真相、铭刻记忆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颇有些‘曲线救国’式的苍凉。”

当然，肯定了这类报道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就不可以对这类报道提出具体的批评意见了。

有一种常见的批评意见是，这样的报道过于“煽情”，笔法过于文学化，读起来让人不太舒服。我觉得，对风格的偏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有人读了很感动、很喜欢，有人读了不舒服、不喜欢，这都很正常。

而且，“情绪”并不一定就是坏东西。在新闻学界，这两年讨论很多的一个概念叫做“the emotional turn of journalism”，也就是新闻学中的“情感转向”。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其实新闻从来不是冰冷的、纯理性的，即便是所谓的硬新闻，在它的采访、写作、阅读、传播的过程中，也一直伴随着情感的因素。优秀的新闻作品，往往既能传递重要信息，又能调动受众情感。所以，你可以说一篇报道在情感方面把握得不好，可能过度了，或者走偏了，但不要因为一篇报道有情感在其中就认为它是不好的。我在和朋友的交流过程中，还听到了另一种批评意见，我觉得是更值得参考的。这位朋友说：这类报道“是否也陷入同质化问题，千篇一律，满篇都是‘人’，但又让我感觉不到‘人’的真实复杂的存在，这一视角不限于对这一篇的观感。”

我觉得这个批评意见相当一针见血。我们需要看到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我们期待呈现充沛而复杂的情感，但是《人物》杂志的这篇文章因为操作时间有限，其实呈现出来的整体面貌是比较单一和浅层的，或者说是高度可预测的，有经验的读者还没点开就能猜出里面大概会写什么。

所以，还原人生是重要的，但如何更好地还原，可以思考和改进。

能不能采访亲属和朋友？

接下来谈谈能不能采访失联 / 遇难者亲属和朋友的事情。

这依然是一个“怎样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而不是一个绝对的禁区。家属的心情当然是焦虑、伤心乃至绝望的，但是采访他们并不一定就是伤害他们。相反，正如不少有过灾难报道经验的记者指出的，很多时候家属是希望对媒体说话的，他们中的一些人需要倾诉，一些人希望自己亲友的故事被记录下来，他们也需要通过媒体的

关注来更好地表达诉求，获得更好的解决方案。

正如资深媒体人李思磐说的，“在市场化报纸兴盛的年代（距离今天也不过十年），很多媒体都有讣闻栏目。许多逝者的亲属打电话给报社，希望写一写自己天人永隔的亲人，即便她们并不是公众人物。这是新闻的社会服务，也是媒体与社区连结的方式。”她还举例说，可以了解一下天津爆炸案当中，“记者们如何迅速推动问责，如何帮助编外消防员家属得到同样的抚恤，如何让殃及的住宅业主得以维权”。所以，采访家属不仅是必要的，在一些情况下还是必要的。当然，如果有家属明确拒绝采访，那记者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

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人物」报道笔下的侵扰悲痛问题》当中声称，记者不能做“死亡敲门（death knock）”。作者说，《人物》杂志采访了一位乘客的老师和学弟，而他们本来还不知道这位乘客就在飞机上的事情，作者认为这是违反伦理的做法。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死亡敲门”确实需要谨慎，但是，正如英国行业媒体 Press Gazette 的文章所说：“死亡敲门”是记者工作当中艰难但是必要的部分。它很难，因为确实可能给家人带来情绪上的巨大冲击；但另一方面，让报道中呈现家人的声音，这其实也是一种尊重。

而且，“死亡敲门”的对象一般指的是直系亲属，老师和学弟显然不包括在内。这里我们应该想一想，为什么在西方的一些伦理规范里面会对“死亡敲门”特别谨慎？因为那确实对于父母、家人来说是天打雷劈般的消息，但我不认为这对老师和学弟来说是什么天打雷劈的消息。因此，把“死亡敲门”的概念用在这里，纯粹是一种生搬硬套。

那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侵扰悲痛”。这个概念听起来很玄乎，其实可以落实到一些具体的细节。我在开头提到的国际记者中心（ICFJ）出品的《灾难和危机报道手册》中给出了采访灾难幸存者和家属的一些注意事项，可以作为一种参考（以下是我的翻译）：

- 在开口问问题或拍摄之前，平静、清晰地介绍你自己。被访者需要知道你是谁，需要知道采访材料可能会被发表或播出。
 - 带着尊严和尊重对待他们。记者们需要保持平衡：既要敏感，又不能胆怯。
 - 永远不要问“你感觉如何？”永远不要说“我理解你的感受。”最好是告诉他们，“我对你的损失 / 你经历的一切感到非常抱歉 / 难过。”
 - 用开放式的问题开始采访，小心地引导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你目前已经和谁聊过了？”如果一个母亲在一场比赛中失去了儿子，那么你可以这样问：“可以跟我说一说他的一生吗？”问他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这些问题不带任何判断，并且给他们一个机会可以讲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 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人会回避，但有人会从倾诉中找到安。如果有人拒绝受访，或者对于采访表现出情绪化的反应，那么就不去打扰他们，友善地感谢他们，然后走开。有的记者会给他们留下一张名片，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之后想聊的话，可以找我。”
 - 给他们一种掌控感。问他们是站着还是坐着更舒服，问他们想不想去其他地方聊，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聊。一种友善的姿态是问他们：“你想不想有谁陪着你一起？”
- 可以看出来，这里的关键词是：尊重，倾听，理解。记者当然要对家属的情绪保持高度的敏感，但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采访都是打扰和伤害。

能不能使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

在和一些记者的交流中，我们形成的一个共识是：《人物》的报道里面如果说有什么比较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对机上乘客的社交媒体内容的使用。

这个问题在几年前就曾引发过一轮讨论。那是在 2014 年跨年夜上海外滩发生的踩踏事件当中，一名遇难的复旦学生吸引了相当多的关注。一些媒体在报道中引用了遇难者生前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信息和照片，引发了大量质疑。复旦大学的官方微博呼吁“媒体尊重她、保护她，不要再挖掘她的隐私，不要再刊登她的照片，让逝者安宁”。

觉得媒体可以使用社交媒体内容的人，给出的理由是：如果说朋友圈里的内容不能随便使用的话，那么发布在微博和微信公号上的内容，本来就是公开可见的，所以媒体使用也就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著名的互联网研究者 Danah Boyd 曾经论述，公开可见（publicly available）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公开推介（publicized）。一个普通人在微博和公号上写东西的时候，心里的预期是，可能就几百个人看见，大多数还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现在，媒体突然让百万千万人发现了这些账号，这其实是他们在发布内容的时候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因此，不能假定他们默认了媒体可以使用这些内容。

在英国一项关于《星期日泰晤士报》是否可以引用一名自杀身亡的学生在 Myspace 发布的言论和照片的裁决中，新闻投诉委员会指出：“报纸在报道遇难者时，有权使用来自社交媒体的公开信息。不过，在将这些信息从原来的语境中抽离，用于报道个人悲剧时，编辑需要考虑它们对遇难者亲属的影响。”

在《人物》的文章中，写到了一位机上乘客记录自己爱情故事的微信公号，这个公号很快就被大家找出来了。虽然很多人看了之后是觉得感动和惋惜，但严格来说，披露这样的信息，最好应该征得他妻子的同意。

使用社交媒体内容做报道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呈现出的人物形象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失真的。

在读到《人物》杂志的报道（以及此前灾难中类似的一些报道）之后，一些人心里不免会犯嘀咕：如果自己不幸遭遇了这样的灾难，记者会根据我的社交媒体账号拼凑出一个怎样的我？那样的我是真实的我吗？是我希望留给世界的印象吗？甚至有人在想到这些之后，吓得把自己的微博和朋友圈都删光了。

但我们同样很难说：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一概不能使用。原因很简单：它们的确呈现了人物的一个侧面，提供了一些宝贵的信息。所以，我们能做的，可能只是尽量保持一种平衡：不要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内容，不要故意拼凑和引发联想，要清晰地向

读者说明这些内容的局限性，要征求其他相关方的意见，要通过其他渠道的采访来验证或补充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当然，这些都是比较理想化的原则，在实际操作中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需要考虑。

总结：理解报道的艰难，鼓励媒体做到更好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新闻伦理”的讨论绝不是挥舞道德大棒，拿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帽子往媒体和记者身上扣。实际上，伦理问题是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的，它所回应的具体实践问题更是找不到标准答案。我们当然可以有一些原则性的指引，但是要认识到，即便有原则指引，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依然是充满了张力、矛盾，充满了困难的抉择，绝对不是 1+1=2 那么简单。

所以，新闻伦理问题是最容易离地高谈阔论，但又最应该贴地具体分析的。

在新闻业的空间日益逼仄的当下，对新闻伦理的讨论更应该怀着同情的理解，出发点应该是怎样鼓励和鞭策媒体做到更好，而不是捂住媒体的嘴巴。

最近几年，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在一些大 V 和机构账号的引导下，骂媒体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成了一种本能反应，“媒体是坏人”成了一些人脑中的基本预设。此次针对《人物》杂志报道的批评当中，我们同样能看到这种声音的大量存在。他们打着关怀家属的旗号，其实心里毫不关心具体的人（他们可以对不同的声音随意地攻击、挂人），他们实际上想要推动的是反媒体的、倡导舆论一元的叙事。

说到最后，如果要我总结一下对《人物》杂志报道的看法，那就是：它当然算不上佳作，操作上也有瑕疵，但这样的报道有其意义，绝不是什么“吃人血馒头”。如果能有更多的时间操作，质量应该会更好，但也可能失去发表的机会。

虽然这次的相关讨论当中有很多噪音，但如果大家能从这篇报道引发的讨论当中，更多思考灾难报道的意义、思考媒体的角色，乃至思考如何鞭策和支持媒体做更好的报道，那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今天重重挑战之下的新闻媒体，真的非常需要公众的支持。

我最近读了……

1、漫长的凛冬：乌克兰左翼讲述“反法西斯”的陷阱

在俄方对战争的叙事中，乌克兰的“新纳粹”是重要的恶人，是俄“不得不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但事实核查已经再三确认：新纳粹在乌克兰这个由犹太人当总统的国家是极为边缘的势力。

实际上，普京口中的“纳粹”和我们通常理解的纳粹并不是一回事。对他而言，反对俄罗斯、反对他的人就是“纳粹”。正如这篇文章揭示的，他认为“反对俄罗斯人就意味着成为法西斯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是连接旧的君主制帝国、布尔什维克超级大国和‘新俄罗斯’的关键思想：即便敌人阴谋不断，但一个世界大国仍会越来越强盛。”

文章说，我们忙于反纳粹和法西斯，却没有好好讨论究竟什么才是法西斯。如今在社交媒体上的标签战，又继续遮蔽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2、一场激烈的争论：俄乌冲突，怪北约吗？

这篇文章对围绕米尔斯海默观点引发的讨论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另外，康奈尔大学教授 Tom Pepinsky 也写了文章批评米尔斯海默的观点。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摘自新闻实验室免费版 newsletter。



方可成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兴趣包括新闻学、政治传播和数字媒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政见 CNPolitics”、“新闻实验室”和放晴公园发起人。在加入学界之前，他曾经在《南方周末》担任时政记者。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Niv Singer on Unsplash

档案

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 让信息的手穿墙而过

张依依 | Newsletter

全球新近发生的 20 条科技、环境和文化消息。

01

科技 / 技术

信息的手穿墙而过

高度封锁之下，什么信息绝对不会被审查？彩票号码。彩票每天都会开奖，电视、广播、报纸等国有媒体则会“帮忙”把中奖号码传递给居民。非营利组织无国界记者创造性地利用了这一点。

他们意识到，审查需要时间。在一些国家，政府可以强制要求平台封锁一个人的账号。虽然可以注册新号，却往往会被原本的读者失联，极大地阻碍了信息传播。因此他们决定，将彩票号码作为暗号。利用平台的搜索功能，只要在发布内容里加入当日的彩票号码，不论换了多少次账号，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被搜索到。

如今，这个名为 [The Truth Wins \(真相必胜\)](#) 的项目，在俄罗斯、土耳其和巴西都已上线。无国界记者在上面为一些被屏蔽的媒体网站做了镜像备份，也鼓励自由媒体人参与进来，让人们能够借由这个方法，保持对独立新闻内容的获取。

信息传播与获取的途径已然巨变，全世界的新闻机构都在适应。除了利用社交媒体绕过审查，他们发现，有时能带来重大突破，求之不得的线索就毫不加掩饰地散落在网络上。

在[如何利用开源工具调查战争中的犯罪？](#)一文中，BBC 调查记者 Manisha Ganguly 以此次的俄乌战争作为背景，分享了开源调查技术如何让战争中的调查报道变得比过去更容易。她提到，社交媒体是丰富的图像来源，尤其是特定国家的社交平台，比如，在 VK (俄罗斯社交媒体平台) 上，有大量来自俄罗斯士兵的上传的资料。“大多数时候，参战的士兵没有意识到他们犯了战争罪，或者不担心其后果，所以不屑于隐藏它们。”一系列核查工具中，她着重介绍了几家面部搜索引擎。顾名思义，面部搜索就是用人脸信息取代关键词，在广袤的互联网上寻找一张脸。这通常会链接到人们在自己社交账号上的照片，求职网站的头像，公共活动中的影像等等。

尽管这项技术自出现以来一直饱受争议，但从这场战争中能看出，它已然进入广泛应用的层面。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已经将 Clearview AI 投入使用](#)，以辨认死者身份，打击错误信息。这家面部搜索引擎曾对外表示，拥有来自 VK 的超 20 亿张图片，其数据库总量超 100 亿张。媒体也学会使用它们求证和核实当事人或涉事者的身份。Ganguly 推荐了相对主流的 Pimeyes，以及专门针对 VK 搜索，“准确度令人吃惊”的 [FindClone](#)。

开源信息前所未有的帮助人们穿透信息的迷雾。更近的一个例子是在 4 月初，俄罗斯军队撤出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的布查镇之后，返回的民众和士兵在街头发现大量尸体，尸体状态显示许多在生前遭受过酷刑和虐待。

相关影像流出后，俄罗斯国防部声称这些尸体是伪造和摆拍的。很快，[《纽约时报》就通过一系列卫星影像驳斥了这个说法](#)。卫星图显示，早在 3 月 11 日，至少有 11 具尸体就已经出现在布查的一条街道上，此后数周都被遗弃在街头，期间还有新的尸体出现，直到乌克兰军队收复布查。随后 BBC 也对此进行了核证。

更聪明的城市？

[城市正在利用物联网 \(IoT\) 控制鼠患](#)。大都市地区，老鼠跟人类处于共生状态，大流行改变了人类的行动轨迹，这种啮齿类动物也变得愈发活跃。英国的数据显示，老鼠数量在 2020 年增长了 25%，给城市电缆和食品安全带来极大风险。

因此，越来越多城市开始采纳一种智能捕鼠方案。相比于传统的捕鼠器、毒鼠强，智能捕鼠设备利用电击心脏或穿刺的方法杀死老鼠。减少鼠药对城市生态的污染同时，这些电子设备 24 小时不间断收集信息，分析周边地区是否存隐患。它们会及时建议店家进行卫生检查，封锁可能滋生鼠患的场域。这构成了一张巨大的城市老鼠活动网络，只不过，精密监测是为更好更快地将它们杀死。

[机器狗穿梭于庞贝古城](#)。2009 年，波士顿动力的机器狗第一次被全球观众所认识，自此，这个无头却很灵活的四足生物，不知在多少人的噩梦中出现过。十年间，机器狗代代演化，掌握了[后空翻、带球过人](#)等精彩技艺，但人们仍不很习惯它参与现实生活。最近的例子是本轮上海疫情中广泛流传的一个视频，[一只机器狗绑着大喇叭，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来回“巡视”，反复播报：戴口罩、勤洗手、测体温、勤消毒……可谓有一种“微妙的恐怖感”](#)。

与此同理，[4 月 5 日，一位上海博主发布的视频中](#)，一台无人机在漆黑的夜空中闪烁着飞行，发出机械的声音：九亭家园的居民朋友们，在疫情封控期间，请严格遵守市政府相关防疫规定，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不要开窗唱歌。视频评论区的一条热评表示，居民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喊没有物资。

在本就了无生息的庞贝古城，机器狗却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天职”。公元 79 年，一场火山爆发，将这座古罗马城市覆于火山灰之下，成为当代人回看历史的惊人一瞥。但由于资金缺乏、官僚体制迂腐等原因，这个著名遗迹年久失修，甚至曾在[2015 年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警告](#)，要撤销其世界遗产地位。引进机器狗是其维修行动的一部分。这只名为 Spot 的机器狗穿行于风化的赤陶色街道。灵巧的身躯让它能通过狭窄的通道，在不平整的台面上行动，探测四通八达又神秘的盗墓路线，与此同时，无人机将在一旁，绘制 3D 激光扫描图。

[能耗夹缝的数据中心，不再受地方政府欢迎](#)。《经济观察网》报道，作为“新基建”之一的数据中心，如今对很多地方政府失去了吸引力。即便在以大数据为战略的贵州省，自去年年底，原则上也不再引进新的数据中心项目。

一方面，逐年降低的能耗指标给地方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一轮火热建设之后](#)，政府也逐渐意识到，“数据”并不等同于高科技及其连带的产业发展。数据中心对本地就业和产业带动的作用非常有限，并不能真正帮助一个城市实现经济转型，而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

In The News

[不受信任的加密市场](#)。全球最主要的 NFT 买卖市场 OpenSea 正面临棘手的情况。最为中国网民熟知的事件，是愚人节当天，歌手周杰伦[曝出自己持有的一枚无聊猿 NFT 被盗](#)。平台数据显示，被盗的无聊猿转手以约合 39 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除此之外，OpenSea 至少还面临[三起关于“无聊猿”被盗的诉讼](#)。这就是这个市场正在发生的事，很多人并不理解 NFT 究竟是什么，但名人效应推动公众认识和认可 NFT 的价值。过去几个月，OpenSea 已经数次出现安全问题，也受到监管机构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与此同时，在今年年初，其在获得新一轮 3 亿美元的融资后，[估值达到 133 亿美元](#)。

[为蹭邻国的网络，人们涌入边境小镇](#)。根据非营利组织“平价互联网联盟”，相对于平均收入，津巴布韦是整个非洲互联网访问成本最高的地方。高昂的网费驱使人们来到位于东部边境的奇马尼马尼。由于山野地形，邻国莫桑比克的网络信号会覆盖到这里。因此，来自莫桑比克的廉价 SIM 卡变得“像面包一样畅销”。

高速和低廉的网络接入让这个偏远的乡村变得炙手可热对于从事远程工作的人来说，奇马尼马尼尤其具备吸引力。如今，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互联网创业者聚集在这里，也有一些企业家将公司搬过来，只是为了利用这里低廉的上网成本。

[VR 角色扮演或许可以帮助人们克服广场恐惧症](#)。这是一种现实存在的焦虑症，一些人会因为感到环境不安全产生恐慌，而难以走出家门。这些环境包含一些现代公共空间，比如广场、公交车、购物中心。科学家最新的研究希望使用 VR (虚拟现实) 系统帮助这类人群建立信心。体验通常从一个虚拟的心理治疗室开始，让参与者逐渐进入不同难度的场景，完成一些任务，比如买一本咖啡，跟别的角色进行眼神交流。研究者表示，因为参与者知道眼前并不是真实的环境，因此会更敢于尝试一些新的应对方式。

[Twitter 正在尝试一种让你跳出对话泥潭的功能](#)。原理很简单，就是“取消 @”。很多网络讨论的走向都是如此，第一个发文的人在原帖中 @ 当事人，事情发酵起来时，旁观者会大量地涌入被 @ 者的主页发表言论。如果话题走向冲突，当事人还会被充满恶意的私信给淹没，就算没有，也会不断收到原贴评论的通知。Twitter 新功能的本质就是在对抗网络骚扰，让你能够跳出这个状况，优雅地离开一场已经离题、充满敌意，或者可能一开始就不愿被牵涉其中的讨论。

中国的碳中和野心。3月23日，《自然》杂志推出一期副刊聚焦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数据上看，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2020年占全球排放量31%，且能源结构仍相当程度上（80%）依赖化石燃料，这个过程必然将充满挑战。文章指出，“去煤炭化”的努力会一定程度上造成未来5至15年的经济增长放缓，也必然会带来化石燃料行业的损失和人员失业。而中国的优势在于，政策激励下，大量资金被投入绿色经济相关的可再生能源项目。[SCLmago的数据显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域的科学研究产出遥遥领先，2020年与能源相关的论文数量几乎是美国的三倍。

极地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50至90华氏度（约10到32摄氏度）。3月下旬，全世界的科学家纷纷观测到这一现象，并为此感到震惊。南极气候学家Stefano Di Battista在推特上表示，“南极气候学已被改写。”

南北极处于相反的季节。此时，南极已经开始入秋，本身日照就已经减少了一些。因此，同时出现高温就显得更为异常。异常高温被视为另一个警示信号。去年是地球有记录以来第六热的年份，在整体变暖的趋势中，研究报告显示，北极的变暖速度[是全球其他地区的两倍](#)。

人类血液中首次发现微塑料。科学家分析了来自22名匿名捐献者的血液样本，捐献者均为健康的成年人，17人的样本被发现包含塑料颗粒。其中，一半的样本含有饮料瓶常用的PET塑料，三分之一含有常见于食品包装的聚苯乙烯，四分之一含有塑料袋的成分聚乙烯。塑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尚不明确，但这项研究证实了这些微颗粒在人体中的流动，并提出了它们滞留在器官内，造成严重健康问题的可能性。

为地球上的所有人建立极端天气预警系统。这是来自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一项呼吁，他表示如今地球一半的人类已经处于危险地带，但有三分之一的人仍尚未被预警系统覆盖，之中主要为一些不发达地区和小岛屿国家。在几大洲中，非洲最为脆弱，60%的人口仍未受到保护。在自然灾害面前，预警具有无可忽视的重要作用，2019年全球适应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称，提前24小时发布风暴警报可以帮助人们减少约30%的损失。



图片来自 [Alexei Scutari on Unsplash](#)

去年，没有一个国家达到WHO的空气质量标准。在去年的更新后，世卫组织要求PM 2.5的年平均读数不应超过每立方米5微克，对全球6475个城市污染数据的调查显示，没有一个城市符合标准。印度的污染水平一直在恶化。如今，新德里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首都。孟加拉国是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中国则略有提升，排名则从一年前的第14位下降到第22位。

星巴克杯子会从街头消失么？每家消费品公司都希望自己的外包装能成为可以外带的广告，星巴克在这点上无疑是极其成功的。但标志性的杯子及其绿色印花，也牢固地将它的成功与一次性消费绑定在一起，如今，这家公司希望能把这个印象给打碎。到2025年，星巴克希望每位顾客都能更自如地使用自带的马克杯消费。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星巴克正在考虑一项杯子租借计划。计划中，顾客支付定金购买一个耐用的杯子，不想用了就可以选择退还。在去年于西雅图实施的测试版中，客户需要支付1美元作为押金，使用后，将杯子退回店内的垃圾箱就能取回这个钱，并获得一些积分奖励。跟机场的行李车租借原理差不多。现在试点已经扩大到日本、新加坡和英国等地。

英国噪音最洪亮的鸟回来了。这种名为Bittern（麻鳽）的小鸟，由于狩猎和栖息地的丧失，自18世纪70年代在英国灭绝。近年来逐渐回归。去年，英国记录到破纪录的228只雄性麻鳽，较2019年又多了19只。《卫报》写道，这种鸟类的叫声有点像人类往水壶口吹气，只是声音大得三英里外都能听到。虽然数量极少，但这种标志性的叫声让科学家能寻找并统计它们的数量。

冰岛将食鲸者转变为观鲸者。冰岛是世界上为数不多仍允许商业捕鲸的国家之一。与很多游客的印象不同，只有2%的冰岛人自认为经常吃鲸肉。但很多游客误以为这是冰岛的习俗和特产，来游玩的时候常常会问：我在哪里能吃到鲸鱼？自2006年捕鲸恢复以来，非营利组织一直在努力扭转人们的印象，并使用“见见我们，不要吃掉我们”的标语进行宣传。自2011年来，有60多家餐厅贴上了“鲸鱼友好型”的标签，游客的鲸鱼消费量也减少了四分之三。

[为乌克兰的难民女孩拍摄一幅巨型肖像](#)。法国艺术家JR曾与瓦尔达共同执导了纪录片

《脸庞，村庄》，片中他们四处走访法国的乡村，以人们的面孔为灵感，制作巨幅的肖像壁画。如今，JR再次使用这个他最为熟悉的媒介，为俄乌战争中受苦的难民发声。他从巴黎前往乌克兰，招募了100名当地的志愿者，将一幅45米的照片在乌克兰城市利沃夫的歌剧院外徐徐展开。在这里，数百名志愿者为逃离的人们准备成袋的食品、衣物和洗漱用品。照片中是一名叫Valeria的五岁女孩，几天前，她和母亲从家乡逃往波兰。路途中遇到乌克兰摄影师Artem Iurchenko，后者拍下了这张照片。

“这个小女孩就是未来，在这场战争中，她提醒我们乌克兰人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什么。”JR在[用无人机俯拍下这张照片之后说道](#)。之后这张照片被《时代》杂志作为4月刊的封面。

佳士得预计将以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射击玛丽莲·梦露》。这是安迪·沃霍尔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原本的系列由四幅颜色不同的丝网印刷画组成。此次出售的为鼠尾草蓝背景的一幅。之所以命名为《射击玛丽莲》，是因为在作品完成之初，表演艺术家Dorothy Podber在参观沃霍尔工作室时，突然向作品开枪，导致叠放在一起的四张画被射穿。

“安迪·沃霍尔的玛丽莲是一代人在拍卖中能见到的最重要的绘画作品，是美国波普艺术与所谓美国梦的巅峰融合，同时囊括了乐观主义、脆弱性、名流和偶像效应。”佳士得在公告中说道。佳士得的估价让这张肖像可能成为20世纪最昂贵的艺术品。在此之前，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拍卖记录是1.05亿美元。

Stan the T. Rex的新主人。在2020年佳士得的另一场拍卖中，著名的霸王龙Stan the T. Rex以318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这副于1987年在美国南达科他州发现的霸王龙骨架，以其完整度而出名，尤其是它的头骨，几乎保存完好。而佳士得的拍卖则让它成为有史以来售出的最昂贵的恐龙标本。

自那时起，Stan买家的身份就一直非常神秘。直到三月底，这个谜底终于揭晓，Stan成为了阿联酋阿布扎比新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新展品。这个消息最早由《国家地理》的记者发现。他们一直在通过美国贸易记录追踪动物化石的踪迹，他们发现，早在去年5月，就有一批5.6吨的货物从纽约出口到阿联酋，记录价值和当时拍卖的价格一致。根据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部，这个博物馆将于2025年向公众开放，通过稀有标本讲述地球上的生命故事。

所以恐龙可以拍卖，月球的尘土是不是也可以？追本溯源，这包尘土是阿姆斯特朗带回来的。他在阿波罗11号上执行任务时，用一个防尘袋来收集月球的岩石标本。随后，这个袋子作为文物被NASA外借给了宇宙空间博物馆。

后来，当时的馆长被发现非法拍卖而定罪，法警在对他的资产进行司法拍卖时，无意中把这个袋子也拍了出去，完全没有意识到，里面还携带了来自月球的灰尘。仅卖了995美元。

过去几年，NASA一直在试图重获这些月球灰尘的所有权，均以失败告终。4月13日，原本的买家将通过拍卖行将它们拍卖，估值预计将在80万至120万美元之间。

二十年后，达尔文的笔记被神秘归还。二十年前，19世纪博物学家达尔文的两册小笔记本从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档案库中消失了。其中一本甚至包含了那张著名的“生命之树”的素描。达尔文早年间跟随小猎犬号进行的五年航行，奠定了他一生的研究基础，回到英国后，他就写下了自己关于动物寿命和演变的想法，并勾勒出了这棵著名的“生命之树”，展示了单一进化树的谱系分支。

上个月，它们突然被匿名归还，笔记本仍装在属于档案馆的盒子里，由一个亮粉色的礼品袋装着。还额外附赠了一句话：图书管理员，复活节快乐。为庆祝回归，笔记本将在7月9日开幕的展览“对话中的达尔文”中展出。

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邀请警卫策划他们的最新展览。一场展览期间，也许没有人比安保人员花更多的时间待在场馆里。而这一次，他们将可以决定挂在墙上的什么。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BMA)的最新展览，邀请保安人员承担了策展的职责。

为了选择展览作品，安保们从去年开始，就与博物馆策展团队成员进行视频聊天。从搜寻藏品，缩小范围，到写条目，设计照明方案，策展的全部流程都参与进来。

最终，这场名为“守护艺术”的展览展出了BMA收藏的25件作品——包括Louise Bourgeois、Grace Hartigan和Mickalene Thomas的作品，全权由该机构安保团队的17名成员挑选而出。“很多人的出发点和我一样，是想找出藏品中从未展示过的作品。”一位策展人说，“但到最后，它变得更多是在谈论我们自己的具体经验。鉴于我们在画廊度过的集体时间，我们会作出怎样的选择？”

张依依

新闻从业者，关心人类、科技与生活，“所有的鱼”主理人之一。平行世界里是个畅想在艺术幻想里的好青年。爱具体的人和别人的猫。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电影《以火书写》(2021) 剧照

档案

里程碑式的胜利, 印度尼西亚通过性暴力法案

Snufkin | Newsletter

这里是更小众群体近期发生的 13 条新闻。

经过六年的审议，4 月 12 日，[印度尼西亚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首次宣布强迫婚姻和性骚扰为非法。

九种形式的性暴力被定为犯罪行为，其中包括身体和言语攻击、骚扰、强制绝育和性剥削。其中，性剥削将被判处最高 15 年有期徒刑，强迫婚姻（包括童婚）判处最高 9 年有期徒刑，传播未经双方同意的性内容判处最高 4 年有期徒刑。此外，无论是婚内还是婚外的身体虐待罪最高可判处 12 年有期徒刑——印尼现行的刑法不承认婚内强奸。且法院规定被定罪的施虐者必须支付赔偿，当局必须向受害者提供咨询。

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这项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妇女权益组织和总统佐科维多多 Joko Widodo 在遭到宗教保守派多年反对后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它由[全国妇女权利委员会 \(Komnas Perempuan\)](#) 和民间团体在十年前提出，直到四年前才由众议院首次审议。今年 1 月，总统 Joko Widodo 要求政府加快立法的步伐，旨在让立案和定罪变得更容易。多年来，以穆斯林为基础的保守的繁荣正义党 (PKS) 一直对此持反对意见，因为他们希望该法案禁止婚外性行为和同性恋。

上周二，议员们纷纷站起来为这项期待已久的法案获得通过而鼓掌，众议院议长 Puan Maharani 说，这项立法是“给所有印尼女性的一份礼物”。近年来，该国针对女性的暴力案件一直在增加。根据[妇女权利委员会 \(Komnas Perempuan\) 汇编的数据](#)，2021 年案件达到 338496 起，远高于 2020 年的 22 万起。

就在今年，印度尼西亚高等法院[判处一名伊斯兰寄宿学校校长死刑](#)，罪名是在五年内强奸了至少 13 名学生，并致使一部分女孩怀孕。这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愤怒和抗议——为什么他没有早点被抓住？

在印尼，性侵经常被视为私人事务。由于缺乏专门的法律框架，性犯罪的起诉较为复杂，且受害者担心在审问过程中会遭受伤害、产生羞耻感，因此很多人往往害怕或不愿去报警。印尼妇女正义协会 (Indonesian Women's Association for Justice) 成员 Siti Mazumah 对[《卫报》](#)说，性暴力的幸存者经常受到社区的指责，当他们报案时，还会面临来自当局的歧视。

新法将规定印尼警方不得拒绝有关性虐待的报案，并有责任地进行调查，也不再允许通过经济和解来阻止案件上法庭。还有一个根本变化是如何提交证据。根据印度尼西亚法律，刑事案件通常必须提交至少两项证据，但新法案允许受害者在证词外只提交一项证据。可使用的证据类型方面也有所扩展，比如心理报告。

该法案于 12 日通过后立即生效。它受到了活动人士的广泛欢迎，尽管一些人反对

其范围有限，比如关于强奸的具体条款被忽略了。不过政府表示，目前正在起草的刑法修正案中将包括强奸。

Also in the news

索马里成立首个全女性新闻编辑室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开设了第一个全女性媒体机构，为该国的女记者们提供了研究和发表她们想要讲述的故事的难得机会。它被命名为 [Bilan Media](#)，在索马里语中，“Bilan”的意思即为“明亮、清晰”。创办团队表示，她们将坚持“Bilan”的真正含义，阐明一些与女性权益有关的重要问题，在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中，提升女性的话语权。除了制作新闻，Bilan Media 还将为记者提供培训和指导，以及为优秀的新闻系女学生提供 6 个月的实习机会。

Bilan Media 是一个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的为期一年的试点项目，但驻地代表 Jocelyn Mason 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机构，并改变索马里当下的媒体格局。在索马里，从事媒体工作的女性和其他女性一样，面临着多重挑战，包括刻板印象、性骚扰、来自家庭的压力以及同工不同酬。此外，她们还面临文化及宗教的影响。

教皇向加拿大原住民作出历史性道歉

4 月 1 日，天主教现任教皇 [方济各 \(Pope Francis\)](#) 就加拿大原住民在天主教开办的寄宿学校遭受的虐待向他们作出了历史性的道歉，并表示希望在 7 月底访问加拿大，亲自请求幸存者的宽恕。

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 90 年代，加拿大一半以上的寄宿学校由天主教会进行管理。期间，超过 15 万名土著儿童被迫进入公立基督教学校，以使他们远离家庭和本土文化的影响，其目的是将他们同化到主流社会。但在这些学校里，身体虐待和性虐待非常普遍，土著儿童会因为表达原住民语言及文化而受到惩罚。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在其 2015 年的一份报告中称其为“文化灭绝”。该组织确认了有数千名儿童因疾病、营养不良、自杀或试图逃跑而死亡。有些人被埋在无名的坟墓里。

本次的道歉由一个由梅蒂斯人、因纽特人和第一民族组成的代表团促成，他们去到罗马要求教皇表态并修补错误，包括要求天主教会归还原住民的土地，支付赔款，并帮助挖掘更多无名坟墓。在接受[加拿大原住民电视台的采访](#)时，曼尼托巴大学原住民研究助理教授 Niigan Sinclair 说：“如果不采取更多行动，教皇的道歉只是一个‘空洞的姿态’。”

斯里兰卡的民众正试图推翻他们的总统

四月上旬，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在斯里兰卡总统 Gotabaya Rajapaksa 位于首都科伦坡东南方向的私人住宅外，要求总统下台，并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警方逮捕了部分抗议人士，并试图用催泪弹和高压水枪驱散人群。数日后，又有数万人参加了在科伦坡港口附近进行的示威活动，人们高呼，“我们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把偷来的钱还给我们”等口号。

这一切源于斯里兰卡日益紧张的经济和债务危机。政府因物价飞涨、燃料及其它必需品短缺以及每天数小时的停电而受到谴责。批评人士称，相对于该国刚刚起步的经济，这位总统更专注于保护自己家族的政治王朝。据[《纽约时报》](#)，自新冠疫情以来，极度依赖旅游业的斯里兰卡的经济陷入停摆，在一系列政策失误之后，该国的资金几近枯竭。

与此同时，现年 72 岁的总统 Gotabaya Rajapaksa 陷入腐败丑闻。自上任以来，Gotabaya 削弱了刑事司法系统，监禁了持不同政见的人，并镇压了反对派。他大幅扩张自己的总统权力，并任命自己家庭成员为国防部长、财务部长及总理等。随着抗议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愈演愈烈，近两周，总统的许多亲属集体辞去政府职位，但是示威者仍在聚集。

佛罗里达通过“Don't Say Gay”法案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 Ron DeSantis 签署了该州备受争议的“Parental Rights in Education”法案。它将禁止学校人员或第三方在课堂上向从幼儿园到三年级的学生讲授有关性取向及性别认同的内容。该法案意在让性别认同的讨论回归家庭，但它在美国各地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从 LGBTQ+ 人群到民主党人再到白宫，甚至还有迪士尼，反对者称其为“Don't Say Gay”法案。

在签署法案之前，州长 Ron DeSantis 说：“我们将确保父母送孩子上学是为了接受教育，而不是接受灌输。”作为对该法案的回应，[美国总统拜登在推特上写道](#)：“我们的 LGBTQ+ 青年应该得到接受和肯定。本届政府将继续为佛罗里达州及全国各地的每个学生、家庭争取尊严和机会。”

但自该法案被提出并通过后，许多州都提出了类似于佛罗里达州的法案。根据非营利组织 [PEN America](#) 2 月份的一份报告，自 2021 年 1 月以来，美国 39 个州提出或重新提交了超过 156 项针对身份问题的言论禁令法案。比如堪萨斯州试图将在课堂材料中描写同性恋列入犯罪；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共和党州代表上个月提出了一项法案，试图禁止在某些公立学校的课堂上讨论性别认同和性取向；印第安纳州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学校在进行有关人类性行为的教学之前，必须事先获得未满 18 岁学生父母的知情书面同意。

脱衣舞俱乐部在爱丁堡被正式禁止

四月初，爱丁堡的议员们以五票对四票的结果通过一项禁令——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将对这座城市的性娱乐场所进行限制，脱衣舞俱乐部的数量将被限制为零。苏格兰政府认为，脱衣舞是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之一。

有部分从业者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及反对。[《每日纪事报》](#)采访了一名舞者 Vivi

Sterling, 她提到, 这项规定将迫使舞者们在不被监管的暴力环境中工作。一些俱乐部会因此“转入地下”, 而女孩们将被置于一个更危险的位置。而在《爱丁堡晚报》的报道中, 活动人士 Sasha Rakoff 则认为, “监管是无济于事的。监管这个行业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它消失。”

自禁令发布后, 英国活动组织 United Sex Workers 强调, 他们将继续维护性工作者的权利, 并推动司法审查推翻这一决定。

东京取消了有关头发和内衣颜色的着装规定

一直以来, 日本公立高中对学生的着装有着严格的规定, 包括必须保持黑发、禁止烫发、禁止男生留“两侧短、中间长”的发型, 以及必须穿不易透色的黑白灰色内衣等。但自 4 月 1 日开始, 这些规定已经被废除。东京都政府教育委员会对该市 240 所学校进行了调查, 询问家长和学生对这些政策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 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些规定已经过时。批评人士说, 对黑头发的痴迷是基于过去对日本形象的幻想。乌黑的头发让人联想到一种理想化的日本女性, 等同于顺从、干净和整洁。在一份新闻声明中, 东京都政府教育委员会成员山口香表示, 她希望校服的变化能鼓励公众质疑日本其他过时的传统。她说:“日本人一直被教育遵守规则是一种美德。”“我希望这将成为一个讨论我们该怎么做的契机, 从而创造一个人都能信服地遵守规则的社会。”

厄瓜多尔监狱暴动, 至少 20 名囚犯丧生

厄瓜多尔再度发生监狱暴乱。国家警察部队指挥官 Carlos Cabrera 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 南部的昆卡市的一所监狱里, 19 名受害者死于“暴力行为”, 1 人死于摄入化学物质, 起因是囚犯之间的帮派纠纷。

暴力事件在该国的监狱系统中屡见不鲜。根据厄瓜多尔监狱服务机构 SNAI 的数据, 2021 年有 300 多名囚犯在监狱暴力中丧生。这一切首先源于外部的动乱。厄瓜多尔是将可卡因从南美运往美国和欧洲的重要中转站, 这为黑帮冲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监狱也是其中的战场之一, 长期人满为患。此外, 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在 2022 年 2 月的一份报告中警告称, 厄瓜多尔监狱内的腐败程度空前, 这是该国多年前放弃监狱系统造成的。

前往墨西哥海滩度假的游客需签署法律文件

前往墨西哥海滩胜地图卢姆 (Tulum) 和坎昆 (Cancun) 度春假的游客将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 确认他们了解当地有关消费和运输毒品的法律。这项新规定是州政府禁毒运动的新举措之一, 旨在解决近期在这些热门海滩地区与毒品有关的谋杀案件激增的问题。

最近几个月, 图鲁姆和坎昆所在的金塔纳罗奥州 (Quintana Roo) 暴力事件激增。当地执法部门认为, 这与街头的毒品交易有关, 而这些蓬勃发展的市场由有钱的游客提供。“不要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海滩和夜总会的毒贩会给你带来麻烦。他们不是你的朋友。他们是罪犯”。金塔纳罗奥州的每家酒店都发布了这样的警告, 确保游客知道在这个国家消费毒品将会受到处罚。

土著团体成功阻止了亚马逊总部的建造

亚马逊的全球扩张计划遇到了障碍, 南非开普敦的一家法院下令停止该公司在当地的新总部建设计划, 直到开发商与当地土著团体进行“适当且有意义的”协商。

这项裁决代表着南非活动人士的暂时胜利, 他们一直在试图阻止这家电商巨头的开发计划。这是一个投资约 3.2 亿美元的多功能房地产开发项目, 包括住宅单元、公共绿地和占地 7 万平方米的亚马逊非洲总部, 位于开普敦的 Observatory 地区, 于去年 4 月得到市政府官员批准后开工建设。然而这块土地对南非最早的居民科伊桑人具有重大精神意义。自去年 8 月开始, 当地社区组织及原住民传统委员会便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停止该项目。

阿拉巴马州的新法律将影响跨性别青少年

美国阿拉巴马州近期通过了一项法案, 禁止医生为 19 岁以下的跨性别青少年提供医疗服务, 包括激素疗法和手术等, 违者最高可判处 10 年监禁。该法律将于 5 月 8 日生效。立法者们认为, 为了保护儿童, 这些法案是必要的, 有关性别确认的决定应该等到成年后再做。但批评人士表示, 这些政客正在干扰属于家庭和医生的医疗决定。目前, 已经有两个有跨性别青少年的家庭和两名医生起诉该州, 要求推翻这项法律。

伦敦大学生罢课, 抗议新的校园安全检查措施

三月下旬, 伦敦多达 200 名学生从城市·伊斯灵顿学院 (City and Islington College) 走出, 抗议新的安全检查措施。社交媒体上分享的视频显示, 示威者挤满了学院外的街道, 举着敦促当局“停止搜查未成年人”的标语牌。

几周前, 学生们像往常一样来到学校, 却遇到了带着金属探测器的安检人员。据伦敦广播公司报道, 学生们在进入大楼前被要求排队, 部分学生被选中接受工作人员的身体检查, 多名学生因拒绝合作而被停课。而在此之前, 学校管理层从未向学生和家长发表任何声明。针对学生们的示威, 学院以伦敦近期持刀犯罪率上升作为回应, 并承诺与学生共同探讨如何改进安全程序, 但并不会为“尽可能保证教职员员工和学生的安全”而“道歉”。

俄罗斯名流们被奢侈品牌激怒了

2022 年 3 月 11 日, 欧盟委员会宣布禁止直接或间接向俄罗斯境内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实体或机构出售、供应、转让或出口奢侈品, 包括服装、手表、配饰和家用产品等。该禁令于 3 月 15 日生效, 奢侈品巨头 LVMH 集团及开云集团旗下的

大多数品牌都关闭了在俄罗斯的门店。

但俄罗斯时尚人士们没想到的是, 即使在其它国家, 他们也会被限制购物。四月上旬, 在 Instagram 上拥有 240 万粉丝的俄罗斯歌手兼演员 Anna Kalashnikova 发布了自己被高级时装品牌 Chanel 拒绝的经历。当她走进迪拜的一家 Chanel 商店, 却被品牌禁止购买, 因为她会将商品带回俄罗斯。另一名俄罗斯网红 Liza Litvin 也有类似的遭遇, 在阿联酋购物中心, 工作人员要求她签署一项不会将产品带回俄罗斯的协议。

众多俄罗斯名人对此表示了抗议。Anna Kalashnikova 称 Chanel 是“支持法西斯主义”, DJ Katya Guseva、电视节目主持人 Marina Ermoshkina 和 模特 Victoria Bonya 等人发布了毁坏自己原有的 Chanel 产品的视频。



Snufkin

撰稿人, 做杂志也做新媒体, 关心年轻人和他们的新实践, 喜欢阅读、观察, 然后分享。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 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 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4月14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首批322名患者解除隔离医学观察，离开方舱。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档案

防疫的代价

曾梦龙 | Newsletter

这是知识和思想界新近发生的11条动态。

据上海市卫健委，2022年2月26日至4月23日，上海累计确诊近40万例，治愈出院14.6万例，在院治疗的重症179例，死亡87例。

这座人口达2500万的国内最大城市，已经“静态管理”近一个月，但何时解封，无人知晓。而且，从社交媒体等处的信息看，因防疫带来的次生灾害可能要比疫情本身严重得多，“封城”在中国也有扩大的趋势。

据财新统计，3月中下旬至今，上海、长春、邯郸、泉州、宿迁等多地曾“封城”，波及6000余万人；目前仍至少有22个城市或地区“在封”，涉及近3000万人。最新的安徽芜湖在发现1例初检阳性感染者后，宣布自4月17日起对主城区实施静态管理。

什么样的防疫举措对当前和未来的中国民众是更优选择，成为人们争议的焦点。新冠疫情两年多来，反复暴露出中国社会的某些痼疾，也因这轮的奥密克戎，让不少人更加切肤之痛地感知，印象不可谓不深刻。

本轮疫情在知识界中，饶毅（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生物学家）、杜骏飞（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梁建章（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三人的争论比较突出，具有代表性，值得梳理一番。

3月29日，饶毅发表了一篇文章《当前我国疫情防控的四个选项》，比较了“延续现行方法，按照国外放开，推广国外RNA疫苗后放开，普及国产灭活疫苗后放开”四种方案，认为“普及国产灭活疫苗后放开”是更好选择。

“简而言之，香港数据比较了国产和国外疫苗作用，证明第三针后国产疫苗与国外疫苗有同等减轻症状和降低死亡率的作用，展现了我国走出疫情的一线曙光。在全国所有年龄段推广国产疫苗的同时，对部分人群进行接种后抗体检测，确定抗体与疫苗的关系、抗体与疗效的关系，再加强知识普及，改变我国民众轻症去医院的文化习俗、缓解可能对医疗体系的冲击，有望改变我国疫情防控的措施。”饶毅写道。

杜骏飞读完饶毅的文章后，认为其只有科学理性，缺少人文或道德关怀。他称：“我相信，假如今天有一个人拿饶毅的观点到上海去，去为那里的封控政策作辩护，大概每一个普通的上海人都会悲痛地质问他：‘我此刻就已经断粮、断药、挣扎在死亡线上了，你还跟我谈轻症重症后遗症、谈奥密克戎科学的可能性？’”

4月8日，财新刊出梁建章的文章《生命损失最小化的防疫策略》。他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和比较不同防疫策略针对不同病毒对人均寿命的影响，认为对Alpha和Delta的最佳策略是防感染，但对Omicron，由于死亡率低、传播率强，采用防死亡策略的生命代价更低。但是，采取防死亡策略，前提是必须提高老人的疫苗接种率。“防死亡策略并非完全不管的‘躺平’政策，而是要让有感冒症状的人自我隔离和测试，把宝贵的医疗资源省出来，用于重症和老年人的救助和观测，从而把死亡率降到最低。”梁建章写道。

另据国家卫健委，中国60岁以上有2.64亿人口，其中有5200万没有完成全程接种（两针），其中占比最大的是8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一半没有完成全程接种，而在完成全程接种的80岁以上老人中，完成加强免疫（三针）的也只有19.7%。至于上海，60岁以上人群的疫苗全程接种率为62%，低于全国的80%，加强免疫接种率为38%，低于全国的68%。

四天后，饶毅写了篇回应文章《评梁建章的抗疫策略：除了统计，不宜忽视分子生物学》，指出梁忽视了分子生物学的道理——“病毒突变，不是为了让人患病，而是其自身物理、化学和生物特征。不存在每一种病原体都是‘越流行，致病力越下降、病人症状越减轻’的规律。……有些是逐渐变弱，有些不是，有些会时好时坏。所以，如果立即开放，那么不仅几个地区全部感染，而且等于准备我国全民感染。感染这么多人以后，新冠病毒将获得大量机会继续突变。……大量突变的机遇，就难以排除出现更加恶性的病毒。如果出现，那样的后果就远超过现在。”

所以，饶毅认为，采用“防死亡策略”的前提是，“几个大城市感染大大下降、全国疫苗接种率接近百分之百”。

随后，梁建章回应了饶毅的批评。饶毅也在新的一篇文章中回应了梁建章和杜骏飞，再次提及：“尽快推广第三针疫苗，老年人和婴幼儿接近（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接种，然后开放。具体而言，因为几个地方有大规模疫情，所以这几个地方疫情控制下，才可能做到。也就是说，它们疫情期间，其他地方应该赶紧第三针，而这几个地方疫情控制后，也赶紧第三针。”

“具体第三针是用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有争议。……国家可以确切知道：香港数据是否造假。如果没有造假，那么就可以用国产疫苗，如果造假、或其他原因的不可靠，就不用国产的，而用进口的。”

回看这场争论，饶毅和梁建章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分歧，都是支持在提高疫苗接种率的前提下，开放或者说共存，诉诸的理据都是科学，价值立场本质上是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追求所谓“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

这种计算我们在经济学者对疫情的意见中也可明显看出，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宋铮，测算了封城的经济成本，以及“动态清零”的经济绩效。在和学者香帅的对谈中，他还说：“上海疫情恶化之前，按照当时精准防控，对全年GDP影响不大可能会超过1%。但现在问题是，任何城市感染人数增加一倍，卡车流量下降是11%甚至更多，防疫措施在成倍加强，影响当然成倍增加。……以这样的速度往下滑，如果不搞强有力措施，不管是改变防疫政策或者强有力刺激，那出现一定规模的经济滑坡其实是毫无疑问的。”

相比之下，杜骏飞代表的是人文主义立场，但可惜的是，他语焉不详，没有给出任何有力的批判，甚至坦承自己的懦弱，不像鲁迅那样清澈、锐利、勇敢和坚定，感到万箭穿心。既然杜老师不愿或者不好说，那我们不妨从人文角度补充一些观点。像我在2020年疫情爆发期间就访谈过不少有勇气和担当的学者，他们的看法对今天仍有启发，现在的问题也像是历史的重复。

不过，在呈现他们的观点之前，得明晰一点，防疫绝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这也是饶毅忽视或者不好多说的），而是牵扯到经济、政治、社会、伦理等多个维度。

比如，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余新忠说：“从晚清一直到现在，我们在防疫过程中，有太多不是跟防疫直接相关的因素影响举措，总是不能从一种很专业和科学角度对待瘟疫。……不要把防疫当政治事件来抓，不然很容易出现所谓的过度或者不及的情形。我们经常会说我们要众志成城，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但是防疫不能不惜一切代价。疫病本身是一种危害，如果说为了防疫而导致的危害更大，那你防疫干吗？”人类学者刘绍华讨论了公卫防疫与个人自由的争议，她说：“隔离的目的是为了防疫，而不是为了让他们自生自灭。患者配合国家在公共卫生上的要求而被隔离，但国家也应该尊重个人福祉和基本人权，实施医疗和生活等方面的照顾。这就是个人自由跟公共卫生防疫需求之间的妥协。”



4月9日，上海一临时方舱医院，户外平台上跳操和休息的人们。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社会学者周雪光指出了“运动式治理”的复杂性，“如果以为严格执行指令的刚性政府和运动式治理就是成功样板，那就大错特错了。它们可能正是导致危机的渊源。运动式治理的力度越大，导致的灾难就会越大”，也强调了民间社会和民间组织的重要性，称“当政府把什么都管起来，变得越来越刚性的时候，一旦失误，就会导致巨大震荡和损失”。

限于篇幅，不再引述，概括起来，关于法治、市场、民间社会、专业人士、人的权利与尊严，等等，都是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不足，是值得人们继续追求的理想。事实上，这也是近代以来，许多国人一直为之努力的方向，或者说是文明的进程。甚至有时，我们不必需要那么多概念，靠着常识，相信“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基本价值，就能做出道德判断，进而行动。

还有什么值得想想……

01

俄乌战争仍在继续，布查屠杀震惊世界。据[联合国](#)，战争已造成至少 1982 名乌克兰平民死亡、2651 人受伤，超过 479 万难民逃离乌克兰，四分之一的乌克兰人亟需人道主义援助。

在文化界，声援不断，比如英国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时隔 28 年发新歌 [Hey, Hey, Rise Up!](#) 支持乌克兰；英国水石书店和一些出版商、作家合作，以出售书籍的形式（如乌克兰作家[安德烈·库尔科夫](#)的《企鹅的忧郁》），筹集善款。

除了行动，关于这场战争的分析也层出不穷，像全球化终结，粮食、能源、金融、经济危机的担忧就不绝于耳。[上期](#)，《小鸟文学》展现了国外知识分子的分析；这期，我们推荐中国学者秦晖的系列评论，希望从另一个角度帮你理解这场战争。这个系列现已发布七篇，总共近五万字，分别是《[西方的“双重标准”和普京的“一重标准”——从克里米亚危机到普京“2·21”宣言](#)》、《[侵略和绥靖：克里米亚与苏台德的比较](#)》、《[“趋纳粹”还是“去纳粹”？](#)》、《[乌俄战争与苏芬“冬战”](#)》、《[布查惨案能否终结绥靖主义](#)》、《[绥靖主义与集体安全](#)》、《[二战之后的绥靖主义：索尔仁尼琴之问](#)》，看起来连载远未结束。

比如秦晖在文章中认为，“侵略有罪，绥靖有错。平心而论，俄乌事态闹成这样，乌克兰人与西方也是有责任的。但这责任绝不是如有些人瞎喷的那样。关于乌克兰我们以后再说（其实以前已说过不少），而西方的责任，当然不是什么‘老谋深算’，‘把俄罗斯逼到墙角’。”

“恰恰相反，是他们畏俄如虎，一味绥靖，纵容姑息，就像张伯伦、达拉第之流当年那样，结果被‘普大帝’一步步地被逼到墙角。而乌克兰更是被逼到了绝境，面临类似 1938 年捷克那样的亡国厄运。所幸的是，乌克兰人在他们的民族危机至暗时刻比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更勇敢，无论他们过去曾有多少失误，现在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我仍然担心，乌克兰人在已经证明自己不是 1938 年的捷克和 1939 年的波兰之后，最终仍难免成为 1940 年的芬兰。”

“布查惨案的残酷震惊世界，引起的谴责声浪和援乌压力终于使西方绥靖主义者反思。默克尔、施泰因迈尔等都在为当年对普京的软弱而检讨。……看来像历史上屡见的那样，侵略者的暴虐和把人逼到墙脚，才有可能使民主国家放弃绥靖。”

02

俄乌激战，法国大选受到的关注少了很多，但它对欧洲的影响不可小觑。外界认为，如果勒庞胜出，影响类似于英国脱欧或者美国人选出特朗普。4 月 25 日，[选举结果](#)出炉，自由派暂时松了一口气，马克龙（58.8%）战胜了勒庞（41.2%）。

但是，从早前的第一轮和今天的第二轮投票结果看，法国社会确实出现了深深的裂痕。无论是极左翼的梅朗雄，还是极右翼的勒庞，都获得不少支持。一些评论认为，即使马克龙连任，法国向右转的气氛已经不可阻挡。这将对欧洲乃至世界带来更多不确定的变化。不过，也有观点指出，马克龙和勒庞最明显的区分不是左翼与右翼，而是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美英也有类似打破左右之分的现象。

03

由于俄乌局势的变化，许多知识人担忧，在不久的将来，台湾问题可能引发中美冲突。被看作“中国通”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也是其中之一，他说：“我每天都做梦，不是美国梦、澳洲梦，是全世界的梦。这个梦的内容是什么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避免中美两个大国的战争。”为此，他写了一本新书《[可避免的战争](#)》（The Avoidable War），希望让当事人了解现在可以做些什么。

[陆克文](#)认为，2020 年代这危险的十年，中美之间应该采用管理战略竞争的框架来争取时间。它包括四项原则，第一，认识战略红线并在处理红线问题（如台湾问题）的原则上达成一致；第二，接受其他事务中可能存在非致命的竞争；第三，为持续的战略校准创造政治空间，界定既承认又鼓励持续战略合作的领域（如气候变化、金融稳定、疾病大流行）；第四，委派双方的高级外交官作为框架的“战略警察”，降低发生危机和冲突的风险。

04

4 月，中国科学院因为订购费用太高（2021 年达到千万级别），暂停与知网的合作。[此前](#)，北京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多家机构曾公开抵制知网，但最终只能接受加价行为并与之合作。

另一边，知网的论文[收录价格](#)却很低，多年未涨，比如博士论文作者只能获得 100 元现金稿酬和面值 400 元的“CNKI 网络数据库通用检索阅读卡”，硕士论文作者则获得 60 元现金稿酬和面值 300 元的“CNKI 网络数据库通用检索阅读卡”。

除了价格，知网面临的[争议](#)还不少。去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起诉知网未经许可擅自收录其百余篇论文，胜诉获赔 70 余万元。赵德馨当时对媒体说：“中国知网必须要改革，不能输了官司就下架我的文章。对我个人来说是维权，但是对于整个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层面来说，它是个大事。”

继赵德馨之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苏少之、湖北作家陈应松、湖南作家蔡建文等，均与知网打起官司。最新一起诉讼，原告是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郭兵，他称，知网提供的论文查重服务不对个人用户开放，机构用户的使用也有限制，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05

4 月，新浪微博 @ 共青团中央发了一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为话题的帖子，并配发了长征、新冠疫情等相关图片。但是，有网友在评论中指出，图片中没有一个女性，她们的贡献被忽略了。

面对批评，@ 共青团中央称，“极端女权已成网络毒瘤”，《北京晚报》的评论员文章也称，“岂任‘女拳’兴风作浪肆意播毒”。两家官媒的言论引发争议，比如有网友称，“2021 年全球性别差异报告，156 个国家中国排 107，女婴出生率全球倒数第一，真是好笑了，这样的国家居然有极端女权？”。

有意思的是，当女权主义相关词汇被污名化为“女拳”、“拳师”、“打拳”时，一些女权主义者以此自嘲，甚至不把它们看作污名，反而是称赞或赋权。这种语义翻转，像极了美国新闻史上的“扒粪者”——总统罗斯福用来批评揭丑记者的词（“扒粪者”源自小说《天路历程》中的一个反派人物），却被记者当作夸奖的话。

06

土耳其将[卡舒吉案](#)审判移交给沙特阿拉伯。卡舒吉是沙特的异见记者，2018 年在伊斯坦布尔的沙特大使馆内遇害。人权倡导者批评这项决定，认为总统埃尔多安是借此改善与沙特的关系，审判不可能公正；俄罗斯的[《新报》休刊](#)。它被看作俄罗斯最后一家敢于批评克里姆林宫的主要媒体。这意味着俄乌战争之际，俄罗斯几乎没有主要媒体发出异议。《新报》的总编穆拉托夫曾获 2021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称，无法确定何时才能恢复出版，但新闻编辑室将继续存在，并考虑策划新产品回归受众。

07

美国埃默里大学灵长类动物行为学教授弗朗斯·德瓦尔，继从猩猩看人类的权力、暴力、爱与性后，将关注点扩展到了性别——[《不同》\(Different: Gender Through the Eyes of a Primatologist\)](#)。他在书中挑战了人们普遍持有的关于男性和女性气质不同的争论。

比如德瓦尔发现，黑猩猩以男性为主且暴力，倭黑猩猩以女性为主且和平，在这两个物种中，需要将政治权力与身体优势区分开来。权力不限于男性，两性都表现出真正的领导力。他在接受采访时还说：“在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我没有发现我们有的那种不宽容。”

08

除了《不同》，还有几本英文新书可以留意，包括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新作[《平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Equality\)](#)，被看作是他之前总共 3000 页的著作（《20 世纪法国的最高收入》《21 世纪资本论》《资本与意识形态》）的浓缩版（250 页）；76 岁的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出了新小说[《伊丽莎白·芬奇》\(Elizabeth Finch\)](#)；曾获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珍妮弗·伊根](#)出了新小说[《糖果屋》\(The Candy House\)](#)；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写了讨论杰出前辈（T·S·艾略特、F.R. 利维斯、艾·阿·瑞恰慈、威廉·燕卜荪、雷蒙·威廉斯）的新书[《批判性革命者：改变我们阅读方式的五位评论家》\(Critical Revolutionaries: Five Critics Who Changed the Way We Read\)](#)。

09

4 月 6 日，俄裔美籍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逝世 30 周年，《小鸟文学》刊发了他的短篇小说[《最后的问题》\(The Last Question\)](#)以表纪念；4 月 11 日，意大利犹太作家普里莫·莱维逝世 35 周年，我们刊发了《休战》的书摘[《最黑暗的时候，也要把自己和同伴视为人，而不是物品》](#)；4 月 15 日，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逝世 80 周年，他未完成的遗作《没有个性的人》被看作现代文学经典；4 月 16 日，日本作家[川端康成](#)逝世 50 周年，他的作品影响了余华、莫言等一批中国作家；4 月 19 日，生物学家达尔文逝世 140 周年，他不仅改变了科学，也改变了[中国历史](#)；4 月 25 日，现代城市思想家简·雅各布斯逝世 16 周年，我们刊发了[《守卫生活：简·雅各布斯传》的书摘](#)。

10

3 月 31 日，美国诗人、批评家、翻译家[理查德·霍华德](#) (Richard Howard, 1929—2022) 去世，他曾是[《巴黎评论》](#)长期的诗歌编辑；4 月 7 日，日本漫画家[藤子不二雄 A](#) (1934—2022) 去世，他曾与藤子·F·不二雄 (1933—1996, 《哆啦 A 梦》作者) 长期共用笔名“藤子不二雄”发表作品。两人参与和见证了日本漫画的黄金时代，他还写过回忆著作[《追梦漫画六十年》](#)；4 月 21 日，法国影人[雅克·贝汉](#) (1941—2022) 去世，他出演过《天堂电影院》，导演了《迁徙的鸟》，还制作过《放牛班的春天》，等等。

4 月 12 日，[罗征启](#) (1934—2022) 去世，他 17 岁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师从梁思成，后担任深圳大学校长，探索高校改革。1989 年后，他不再担任深大校长，后离开体制，创办清华苑建筑设计公司；4 月 20 日，历史学者[张灏](#) (1937—2022) 去世，他深受殷海光、史华慈两位老师影响，对幽暗意识、转型时代、乌托邦等的讨论颇具启发，著有《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1890—1907)》等；4 月 21 日，[黄蜀芹](#) (1939—2022) 去世，她是中国第四代影人，执导的《人·鬼·情》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女性电影”。

曾梦龙

1993 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 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并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The Monthly](#)

档案

最黑暗的时候， 也要把自己和同伴视为人， 而不是物品

普里莫·莱维 | 发现经典

纪念普里莫·莱维。

很久以前，有人写道，书籍和人一样，有着它们的命运：不可预料，与人们的期望和预期背道而驰。这两本书^[1]的第一本也有着一个奇怪的命运。它的出生证明是遥远的：它写于“我写下我永远不敢告诉任何人的事情”^[2]的地方。在集中营里，我是那么强烈地希望讲述这些故事，从而在那里开始描述我的经历，当场记录，在那个充满刺骨的寒冷、战争和警惕的眼睛的德军实验室中。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无法保存这些随意而潦草写就的笔记，而且我必须立刻扔掉它们，因为如果它们被发现，会被当作一种间谍活动，让我送命。

尽管如此，那些记忆如此强烈地烙印在我的心上，让我一回到意大利就迫切地感到要把它们写下来，而在几个月内，我完成了《这是不是个人》。很多重要的出版商都拒绝出版我的手稿。1947年，一个小出版商终于答应将本书付梓，但只印刷了2500册就停止了。于是我的第一本书在多年中一直被人们遗忘。也许，这也是因为那些年对所有的欧洲人来说都是悲恸和重建的艰难时光，而公众们不想回到刚刚结束的战争那令人痛苦的回忆之中。直到1958年，它才焕发了新生，被埃诺迪出版社(Einaudi)出版。而从那时起，公众们对它的兴趣再也没有衰退。在意大利，这本书卖出了超过50万本，并被翻译成8种语言，搬上了电台和舞台。这迟到的成功鼓励我撰写了《休战》，它的兄长的自然续篇。但与前者不同的是，它马上受到了读者和文学评论家们的热烈欢迎。

在这些年中，人们上百次请求我对这两本书做出评价，在各种各样的观众面前：少年或成年人、大老粗或知识分子、在意大利的或在国外的。在这些场合，我不得不回答许多问题：天真的、尖锐的、富于情感的、肤浅的，有时甚至是带有挑衅意味的。我很快发现其中的一些问题反复出现。事实上，一直被人们追问。因此，它们一定来自经过缜密思考的求知欲，而在一定程度上，本书正文并没有对这些问题给出满意的回答。因此，我提议在这里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1. 在这些书里，没有表现出你对德国人的仇恨，没有对复仇的渴望。你已经原谅他们了吗？

我本人的性格并不倾向于仇恨。我认为仇恨是野蛮而粗鲁的，而恰恰相反的是，我情愿我的行为和想法，应该尽可能地是理性的产物。因此，我从未在我的思想中孕育仇恨，无论是对复仇的渴望，还是对我真实或假想的敌人施加痛苦的意愿，或者个人的深仇大恨。

我更不能接受将仇恨指向整个民族群体，比如，所有的德国人。如果我这样做，我会感到我在遵循着纳粹主义的教条。而纳粹主义正是建立于国家和民族仇恨的基础之上的。

我必须承认，要是让我直接面对那些岁月中的某个迫害者，面对一张熟悉的面孔，面对一些古老的谎言，我会受到仇恨和暴力的诱惑。但正因为我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或纳粹党徒，所以我会抵制这样的诱惑。我相信理性和讨论是最重要的进步手段，而因此我甚至约束自身的仇恨：我更拥护法律制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描述奥斯维辛的悲惨世界时，我有意运用见证者那冷静和清醒的语言，而不是受害者那悲恸的语气或寻求报复者那激动的口吻。我认为，我的讲述越客观、越冷静、越清醒，就会越可信、越有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一个见证者才能在司法程序中履行他的职责，从而为公正的判决打下基础。而法官正是我的读者们。

无论如何，我并不愿意将我避免轻率判决的做法与不加区别的原谅混为一谈。不，我没有原谅这些罪犯，我也不愿意原谅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除非他证明（通过事实，而不是言辞，而且不要太迟）他发自真心地意识到意大利及其他国家法西斯主义的罪恶与错误，并决定谴责它们，把它们彻底消灭。只有这样，我，一个非天主教徒，才准备依从犹太教和天主教原谅敌人的教义，因为一个发现自身错误的敌人不再是敌人。

2. 德国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在欧洲的中心地带，灭绝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而不让任何人知道，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西方人所生活的世界有着巨大的弱点和风险，但是与那些压制民主思想的国家相比，或者与那些压制民主思想的时代相比，我们的世界有着巨大的优势：每个人都能够知道关于每件事情的一切细节。当今的信息产业是“第四权”：至少在理论上，记者、新闻报道人和摄像记者能够自由出入任何地方，没有人有权力阻止他们或把他们赶走。一切事情都很简单：要是你愿意，你可以收听或收看自己国家或其他国家的电台或电视台的广播节目。你可以去报摊选择你喜欢的报纸，本国的或外国的，任何政治倾向的报纸——哪怕这个国家与你的国家不睦。你可以购买和阅读你想阅读的任何书籍，一般不会招致“反国家犯罪活动”的控告，或政治警察对你的房子的搜查。避免一切偏见当然不容易，但至少你可以选择你所喜欢的偏见。

在一个独裁国家并非如此。在独裁国家中，只有由上层所宣示的唯一真理。所有报纸都差不多，它们都重申着相同的唯一真理。电台也是一样。而你不能收听其他国家的广播节目。首先，这是一种罪行，你会冒着进监狱的风险。其次，你的国家的无线电台会在适当的波段发送干扰信号，将他们自己的信号叠加在国外信号之上，从而阻止你收听它们。至于书籍，仅有国家喜欢的书可以得到出版和翻译。你必须在国外找到其他书籍，并自己甘冒风险把它们引进国内，因为它们被视为比毒品或炸药还要可怕的危险品。而如果警察发现你拥有这些书籍，它们会被没收而你则会受到惩罚。国家不喜欢的书籍，或者不再喜欢的书籍，会在城市广场当众焚毁。1924年至1945年间，意大利就是这样的独裁国家。而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统治之下的德国。当今，仍然有许多国家奉行独裁主义，其中我们不得不悲哀地算上某个曾经英勇地抗击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在一个独裁国家中，政府可以更改真理、编造历史、扭曲新闻、掩盖真相、宣扬虚假。宣传取代了信息。事实上，在这样的国家里，你不再是一位公民，一位权利的拥有者，而只能做一名顺民。而作为一名顺民，你必须狂热地忠诚并消极地服从于国家（以及代表它的独裁者）。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可能（尽管并不总是轻而易举，深切地侵犯人类的天性永远不会是轻而易举的）掩盖大量的事实真相。在法西斯意大利，对社会主义政治家马泰奥蒂^[3]的暗杀是相当成功的。几个月后，这个案件就被封锁在一片沉默之中。而希特勒和他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控制和掩盖真相时又比墨索里尼技高一筹。

然而，向德国人民隐瞒巨大的集中营设施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而且，从纳粹的角度来看，这也不是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在他们的国土之上营造并维持一种模糊的恐怖氛围构成了纳粹主义的部分目标。这也让人民知道反对希特勒是极为危险的。事实上，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在实行纳粹主义最初的几个月中就被投入集中营：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犹太人、持不同政见者、天主教徒。整个国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并知道集中营里的人们遭受着折磨且濒于死亡。

尽管如此，大批德国人的确并不了解集中营后来所发生的最凶残暴行的相关细节——以百万计的规模，成系统的工业化的灭绝，毒气室，焚尸炉，对尸体卑鄙的掠夺。这些并不为人所知。事实上，直到战争结束，很少有人了解这些事情。为了保守这些秘密，纳粹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比如，在官方用语中仅仅使用小心翼翼而玩世不恭的委婉辞藻：人们不写“灭绝”，而写“最终解决方案”；不写“流放”，而写“转运”；不写“毒气杀害”，而写“特殊处理”，等等。不无理由，希特勒害怕这个骇人的新闻，如果它得以泄露，将会损害这个国家对他盲目的信仰，也会损害战斗部队的士气。此外，如果盟军知道这件事，也会把它作为宣传材料。这种情况的确出现过，盟军电台多次描述了集中营内的恐怖现实，但由于这些罪行过于罪大恶极，大多数人反而不敢相信。

我能找到的，对当时德国形势最具有说服力的概括莫过于尤金·科根(Eugene Kogon)的著作《地狱的理论与实践》(DER SS-STAAAT)。尤金·科根曾被纳粹投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来成为慕尼黑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

德国人对集中营有哪些了解？除了它们存在这个具体的事之外，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在今天，他们也所知不多。严格保守这个恐怖系统的秘密细节的手段，被证明极为有效。这些手段，让那些痛苦变得含义不明，因而更为复杂深刻。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的，甚至很多盖世太保都不知道他们将犯人投入其中的集中营里发生着什么。绝大多数犯人对关押他们的集中营的功能及所采用的手段也缺乏准确的

了解。而德国人民又怎么能知道呢？任何走进集中营的人都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一个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这是对保密工作的力量和效能的最好证明。

但是……但是，甚至没有一个德国人不知道集中营的存在，或相信它们是一些疗养胜地。很少有德国人没有某个亲属或熟人被投入集中营，或者说，很少有德国人不知道有这个人或那个人被送进了集中营。所有的德国人都目睹了各种各样的排犹暴行。在犹太教堂遭到纵火焚烧，犹太男人和女人们被迫跪在街上的泥浆里，遭受羞辱时，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就在现场，带着冷漠、好奇、轻蔑或完全幸灾乐祸的快乐。很多德国人通过收听国外电台知道了集中营的情况，还有很多人接触到在集中营之外工作的犯人。很多德国人都曾经在街上或火车站里遇到过集中营囚犯那悲惨的队列。在 1941 年 11 月 9 日德国警察和安全部队司令部发给所有……警官和集中营指挥官的一则通告中称：“尤其是，必须注意到，在徒步转移的过程中，比如从车站到集中营，相当多的囚犯会在途中崩溃，因衰竭而昏倒或濒于死亡……不可能向民众隐瞒这些事情。”

没有一个德国人不知道事实上监狱中已经人满为患，而全国各地都在不断执行死刑。数以千计的地方法官、警务人员、律师、神父和社会工作者普遍知道事态非常严重。许多商人作为供应商与党卫军打着交道。一些企业老板请求党卫军的行政和经济部门把集中营里的囚犯拨给他们做奴工。这些商人、企业主，还有那些办公室里的职员，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许多大公司正在压榨奴工的劳动力。有不少工人在集中营附近或者就在集中营里工作。各个大学的教授在希姆莱设立的药品研究中心共同工作着，很多公立医院的医师以及私人研究机构的医生与这些专业的杀人者合作。很多空军成员被调任到党卫军所管辖的部门中，而他们一定知道那里发生着什么。许多高级军官知道在集中营里对苏军战俘的大规模屠杀。甚至很多士兵和宪兵一定也清楚地知道集中营、犹太人隔离区、被占领的东欧国家的城市和乡村中所发生的可怕内幕。而你能否认这些事实吗？

在我看来，以上这些事实都是不容否认的，但我们必须再补充一条，从而让整个场景趋于完整——尽管信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可能性，但大多数德国人不知道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因为，事实上，他们希望不去了解。当然，国家恐怖主义肯定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武器，非常难以抵抗的武器。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德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甚至没有尝试抵抗。一条特殊准则普遍存在于希特勒的德国：那些知道的人不说，那些不知道的人不问，那些问的人得不到答案。通过这种方式，典型的德国公民赢得并捍卫了他的无知。而他的无知，似乎让他对纳粹主义的支持有了充分的理由。闭紧自己的嘴巴、眼睛和耳朵，他为自己营造了一种“不知道”的错觉，并借此为发生在他们门口的罪行而洗刷了自己的同谋罪。

知道或让自己知道，是一个人远离纳粹主义的方法之一（基本上并不那么危险）。我认为德国人民在整体上，并没有求助于这种方法。我相信他们完全应该承担蓄意忽略的罪责。

3、有囚犯从集中营里越狱吗？怎么会没有大规模的反抗？

这些是年轻的读者们最经常向我提出的问题。因此，它们一定源自于某些特别迫切的好奇心或需要。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当今的年轻人感到自由是一个人无论如何不可或缺的特权之一。结果，对他们而言，监禁的观念立刻与逃跑或反抗联系在一起。此外，许多国家的军事条例都规定着，战俘应该尝试逃跑，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借此恢复他作为一名战士的地位。而《海牙公约》规定，不得惩罚试图逃走的战俘。浪漫主义文学（还记得基督山伯爵吗？）、流行文学和电影不断将逃跑的这一概念强化为一种道德责任。在这些艺术作品里，受到不公正（甚至公正的）监禁的英雄总是一个正面人物，总是试图逃跑，甚至在最不可能的环境中，而这些尝试无一例外地获得成功。

把囚犯那不自由的境遇视为某种不正常的、不适当的事情——就像一场疾病，只有通过逃跑或反抗才能治愈——这种看法也许是好的。然而，不幸的是，这种观念完全不符合集中营里的真实情况。

比如，只有几百名囚犯试图逃出奥斯维辛，而在这些人中只有二十多人成功越狱。逃跑是困难而极度危险的。饥饿和虐待让囚犯身体虚弱，而且意志消沉。他们被剃光了头发。人们可以立刻认出他们的条纹囚服。而他们的木鞋让他们不可能快速、安静地行走。他们没有钱，而且，一般都不会说当地的语言：波兰语。他们在当地没有关系，也不熟悉当地的地形地貌。最重要的是，纳粹对越狱事件会进行残酷的报复。任何试图越狱的人如果被抓住都会被当众绞死，在点名的大操场上，常常在死前遭受可怕的折磨。要是一场越狱被纳粹发现，逃跑者的朋友都会被当作同谋，关在禁闭室里饿死。其他所有囚犯则被迫站上 24 小时。有时，甚至会把“罪人”的父母抓起来，关进集中营。

党卫军哨兵如果杀死了一名试图越狱的囚犯，可以得到特别假期。结果，党卫军哨兵往往枪杀并非试图越狱的囚犯，只是为了获得假期。这一事实人为地夸大了试图越狱的囚犯人数的官方统计数字。正像我前面说过的，真实数字很小，几乎都是一些雅利安血统（用当时的术语来说，就是非犹太人）的波兰囚犯。他们的家乡离集中营不远，因此，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而且可以肯定群众会为他们提供保护。在其他集中营，情况也基本相似。

至于说集中营中缺乏反抗，这并不完全符合真实情况。首先，我们必须铭记那些发生在某些集中营中的起义：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索比布尔（Sobibor），甚至比尔克瑙，奥斯维辛的附属集中营之一。这些起义的规模不大，但正像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起义一样，证明了起义者杰出的道德力量。这些起义都是由具有某些特权的囚犯所计划和领导的。这些囚犯因此比普通犯人有着更好的身体和精神条件。这并不令人吃惊——只是从表面看，它似乎有悖于“受压迫最深的人奋起反抗”的观念。即使在集中营之外，斗争也很少由“下层无产阶级”发动。穿破衣服的人并不反抗。

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或政治犯占大多数的集中营，这些政治犯搞阴谋的经验被证明极为有用，而且常常导致相当有效的保护活动，而非公开的反抗。不同的集中营，不同的时间，他们的手段也不尽相同。比如，他们成功地敲诈或贿赂党卫军，控制他们那任意妄为的力量；或者暗中破坏德国军工业的生产；或者组织越狱；或者通过电台与盟军联络，向他们通报集中营里骇人听闻的情况；或者改善患病囚犯的治疗条件，用囚犯医生替代党卫军医生；或者“引导”筛选的进程，把那些间谍和叛徒送进毒气室，而拯救另一些囚犯的生命（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囚犯的性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随着战线逼近，准备——甚至以军事方式准备，抵抗纳粹对集中营的大清洗（事实上，纳粹往往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犹太人占大多数的集中营，像奥斯维辛地区的那些集中营，无论积极或消极的抵抗都特别困难。这些集中营里，大多数囚犯都缺乏最基本的组织或军事训练。他们来自欧洲各国，说着不同的语言，因此相互之间无法沟通。因为他们的生存条件更加残酷，也因为他们往往在犹太人隔离区经历了长期的饥饿、虐待和羞辱，所以他们比其他囚犯更饥饿、更虚弱、更疲劳。而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他们在集中营里那可悲的生存期非常短暂。总之，他们是流动的人口，一面不断大批死去，一面新的囚犯不断到来。在这样一种退化而流动的人类群体中，反抗的种子难以生根发芽是可以理解的。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那些刚刚下火车的囚犯不反抗，而是等几个钟头（有时甚至要几天！）后走进毒气室？除了我刚才已经介绍的，我必须在此补充一点，那就是德国人已经完美地创造出一套如恶魔般的狡诈而灵活的大规模屠杀系统。在大多数时候，新到达的囚犯并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纳粹以冰冷的效率接待他们，却并不凶残，邀请他们脱掉衣服“淋浴”。有时，他们会分发肥皂和毛巾，并答应在淋浴后提供热咖啡。事实上，毒气室伪装得就像一间淋浴室，有水管、龙头、换衣间、挂衣钩、长椅等等。要是囚犯们表现出哪怕一点点知道或怀疑他们即将来临的命运的迹象，党卫军和他们的爪牙就会运用奇袭战术，以极端的残暴进行干预。这些纳粹党徒叫喊着、威胁着、踢打着，甚至开枪、放狗。这些狗经过专门的训练，可以把囚犯撕成碎片。而这些囚犯则是困惑的、绝望的，因为五到十天在封闭车厢中的旅行而变得虚弱不堪。

事情就是这样，而有时被人们提起的说法——犹太人因为胆小懦弱而不反抗——却是荒唐而带有侮辱性的。没有人反抗。有一个例子足以证明这个事实，我们不能忘记，奥斯维辛的集中营经过 300 名苏联战俘的考验。这些战俘年富力强，经过军事训练和政治灌输，而且没有孩子或妇女拖累，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反抗。

还有最后一点，在今天深深地植根于西方文化之中的观点：人们在压迫面前不能屈服而应该反抗，在法西斯主义横行的欧洲，却并未得到广泛的接受，尤其是在意大利。它是政治活动家那狭小圈子里的产物，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立刻孤立、排挤、恐吓和摧毁了他们。你一定没有忘记德国集中营的第一批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事实上，他们正是反纳粹政治党派的骨干成员。缺少了他们的贡献，敢于反抗和敢于组织反抗这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理念要在很久之后才开始出现，而这主要归功于德国在 1941 年出人意料地撕毁了 1939 年 9 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之后，欧洲共产党人投身于反对纳粹主义的斗争中。总之，指责集中营里的囚犯不反抗，主要是一个历史视角的错误，要求这些囚犯具有当时仅仅属于精英阶层的政治意识，尽管它在今天几乎是人们的共识。

4、解放后你还回过奥斯维辛吗？

在 1965 年和 1982 年，我两次回到奥斯维辛。正如我在我的书中所指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帝国不仅是一座集中营，而是由大约 40 座集中营组成。奥斯维辛的主营坐落在同名城镇（波兰语 Oświęcim）的郊区，可以容纳 2 万名囚犯，可以说，是这些集中营的行政首都。而比尔克瑙集中营（准确地说，它是多个集中营组成的，在不同时期，从 3 个到 5 个不等），可以关押大约 6 万名囚犯，其中大约 4 万人为妇女。毒气室和焚尸炉都位于比尔克瑙集中营。此外，还有苦役营。在不同时期，它们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变化。一些苦役营距离“首都”远达几百公里。我的集中营，叫莫诺维茨，是其中最大的苦役营，最终关押了大约 1.2 万名囚犯。它位于奥斯维辛以东大约 7 公里的地方。整个地区现在都是波兰领土。

对主营的参观并没有让我产生任何强烈的情感。波兰政府已经把它变成了一种国家历史遗迹。营房干干净净，经过粉刷。营区里栽种着树木和花圃。有一个展览馆，展示着各种令人同情的遗物：成吨的女人头发，成千上万的眼镜、梳子、修面刷、玩偶、童鞋，但它仍然只是一个展览馆——某种静态的、经过重新整理的东西。在我看来，整个主营就像一个展览馆。至于我的集中营，已经不复存在。它所附属的橡胶工厂，现在由波兰人掌控，已经扩大了规模，并占据了整片地区。

然而，当我走进比尔克瑙集中营时，却的确体验到了一种强烈的痛苦感。在此之前，我从未以一名囚犯的视角去观察比尔克瑙。这里的一切都保持原状。过去这里是泥泞的，现在这里仍然泥泞不堪。还有夏日那令人窒息的灰尘依然如故。那些营房（那些没有在战火中烧毁的营房）仍然伫立在原来的地方，低矮、肮脏，木头制成的墙壁四面透风，地面是踩实的泥土地。营房里没有床铺，只有光秃秃的木板，一层层直到天花板。室内没有进行任何美化。一位女性朋友与我同行，朱莉安娜·特德斯奇，比尔克瑙的一位幸存者。她告诉我，每个一米八乘两米的木板上，睡着九名女犯。她让我从小小的窗户望出去。从那里可以望见焚尸炉的废墟。在那些日子里，你能看见从烟囱冒出的火光。她曾经问过更年长的女犯：“那火是什么？”而她们回答：“那是正在燃烧的犯人。”

直面这些地点那唤起悲伤的力量，我们每个幸存者都有着不同的反应，但大致可以分成两类。那些拒绝回去，甚至不愿意讨论那些事的人，属于第一种。他们想忘记过去，却无法忘记，而被噩梦所折磨。而第二种人恰恰相反，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从零开始新的人生。我注意到第一种人被投入集中营是因为运气不好，而不是政治原因。对他们而言，集中营所带来的痛苦是惨痛的，却毫无意义，就像一场不幸或

疾病。对他们而言，对集中营的回忆是外在的，是蛮横插入他们生活的痛苦对象。而他们曾经尝试（或仍在尝试）从脑中消除这些记忆。而第二种人则包括前政治犯，或者至少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基础、宗教信仰，以及有强烈的道德意识的人。对于这些幸存者，牢记过去是一种责任。他们不想遗忘，而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想让世界遗忘，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的经历并非毫无意义，集中营不是一种偶然，不是一种不可预见的历史巧合。

纳粹集中营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不断累积的顶峰，是法西斯主义畸形的表现。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前，法西斯主义就已经存在，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得以残存，无论是公开的，还是有着伪装的。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只要你开始否认人类的基本自由和人们之间的平等，你就开始向集中营体系迈进。而这一条难以止步的道路。我知道许多前政治犯非常深刻地意识到他们的经历中所包含的经验教训，而他们每年回到“他们的”集中营，引导着年轻人的朝圣之路。而如果时间允许，如果我不知道通过写书，以及与读者们的交流让我也实现了同样的目的，那么我也会乐于这样去做。

5. 为什么你只讨论德国集中营，而不谈及苏联集中营呢？

正像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更愿意充当一名见证人，而不是法官。我只能见证我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事情。我的书不是历史书籍。在撰写这些书籍时，我严格地将自己限制于只报道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而摒除我之后从书籍或报纸上读到的故事。比如，你会注意到我并不引用在奥斯维辛遭到屠杀的人数，也不描写毒气室和焚尸炉的细节。这是因为，我在集中营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些事情。我只是后来才了解它们，而在这时，全世界也同样知道了这些事情。

出于同样的原因，一般情况下，我并不提及苏联集中营。幸运的是，我从未被投入这些集中营。而我只能重述我所读到的东西，那些所有对这个命题感兴趣的人都会知道的东西。然而，显然，我不想，也不能，逃避人人都应承担的做出判断和形成观点的责任。除了二者明显的相似性，我想我能够找出一些实质性的不同。

苏联集中营与德国集中营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的最终目的。德国集中营构成了某种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尽管它如此嗜血。除了消灭或恐吓政治对手这个古老的目的之外，它们还承担着一个巨大而恐怖的现代目标，那就是把整个民族和文化从世界上抹去。大约从 1941 年起，它们变成了巨大的杀人机器。纳粹蓄意计划使用毒气室和焚尸炉以成百万的规模杀死并毁灭人类的躯体。最令人恐怖的记录属于奥斯维辛，在 1944 年 8 月的一天内杀死 2.4 万人。苏联集中营当然并不是乐土，但苏联集中营的目的并不是杀死其中的囚犯——即使在当时最黑暗的岁月中。苏联集中营里经常会有犯人死亡，以至于犯人的死亡被残忍地当作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这些死亡基本上不是蓄意造成的。死亡是寒冷、饥饿、传染病和苦役的副产品。在这两种地狱模式的悲惨对比中，我必须补充一个事实——要是一个人被投入德国集中营，在一般情况下，他就再也出不来了。死亡是唯一可以预见的出路。然而，在苏联集中营，总是存在着对监禁的一种可能的限制。在斯大林时代，法官有时会以可怕的漠视判处“罪人”极为漫长的刑期（长达 15 年或 20 年），但最终重获自由的希望（无论多么渺小）却是仍然存在的。

从这个最基本的不同，导致了另一个区别。在苏联集中营里，警卫与犯人之间更多一些人情味。他们都属于同一个国家，说着同一种语言，而不会像纳粹主义那样分别打上“优等民族”或“非人”的标签。病人得到治疗，尽管总是缺医少药。面对过于艰苦的劳动，个人或集体的抗议并非是不可想象的。很少有体罚，即使有，也不会过于残忍。犯人有可能收到信件或装有食物的邮包。总之，人性并没有泯灭或完全丧失。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两个集中营体系的死亡率有着巨大的差异。在苏联，最残酷的时代，囚犯死亡率达到 30%。这当然是一个无法容忍的数字。但在德国集中营，死亡率高达 90% 到 98%。

我发现苏联最近发明了非常可怕的新手段，将某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一概称为疯子，把他们关进精神病院，迫使他们接受所谓的“治疗”。这些“疗法”不仅导致残忍的痛苦，还会扭曲和损害他们的精神机能。这表明苏联是多么害怕不同政见。持不同政见者不会再被关进大牢，而是用药物（或威胁使用药物）来摧毁他们。也许这个技术并没有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1985 年，这样的政治病人似乎不超过 100 人），但它令人憎恶，因为它构成了对科学可鄙的滥用。而且，这些如此奴颜婢膝地顺从于政府当局的医生也不可原谅地亵渎了医生的角色。它反映了对民主争鸣和公民自由的极端蔑视。

在另一方面，就准确的数量而言，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苏联集中营现象事实上正在趋于萎缩。在 1950 年前后，政治犯的数量达到几百万，而根据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数据，他们在今天的人数只有大约 1 万人。

综上所述，无论如何，苏联集中营都是违反法律和人性的可悲现象。它们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事实上，它们正代表着玷污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个污点。它们应该被视为沙皇专制主义的一份原始的遗产——而这却是苏联统治者无法或不想放弃的一份遗产。如果你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 [4] 在 1962 年所撰写的《死屋手记》（Memories of a Dead House），你会毫无困难地发现书中所描写的监狱与索尔仁尼琴 [5] 在 100 年后所描述的苏联集中营具有相同的“特征”。但人们能够，甚至轻松地，描绘没有集中营的社会主义。而缺少了集中营的纳粹主义却是不可想象的。

6. 解放之后，你又见过《这是不是个人》和《休战》这两本书中的哪些人物？

不幸的是，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是不是个人》中提到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死于集中营或死于书中最后一章所描述的大规模疏散的途中。还有一些人在集中营期间死于感染的疾病。我无法找到很多人后来的消息。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并且与我一直保持着联系，或后来重新建立了联系。

《尤利西斯》一章中的“皮科罗”，真名让（Jean），幸福地活着。他的家人在“二战”中全部罹难，但他在回国后再婚，现在有两个孩子，作为一名药剂师在法国的一个小镇上宁静地生活着。在他休假的时候，我们偶尔会在意大利聚会。有时我也去拜会他。奇怪的是，他已经记不清他在莫诺维茨度过的岁月。疏散行军那可怕的记忆却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途中，他目睹了他所有的朋友（包括阿尔贝托）一个个地死于过度疲劳。

我也经常见到我称之为皮耶罗·索尼诺（Piero Sonnino）的那个人。在《休战》中，我将他称为塞萨尔。他也经历了一个“重新融入社会”的困难时期，但已经找到了工作并建立了一个家庭。他住在罗马。他非常乐意而且极为生动地向我讲述他在集中营里、回家的路上的经历。但他的叙述往往变成一场夸张的独白。在他的叙述中，他愿意强调那些他在其中作为主角的冒险经历，而不是那些他只能消极承受的悲惨遭遇。

我还见过查尔斯（Charles）。1944 年 11 月，作为一名游击队员，他在家乡附近的孚日山脉（Vosges）被捕，而被投入集中营仅仅一个月就迎来了解放。但这一个月的痛苦经历，以及他目睹的可怕现实，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剥夺了他生活的乐趣和开创未来的愿望。他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旅程才回到国内，就像我在《休战》中所描述的旅程一样。回国后，他重新在一个村庄的小学校里当上了小学老师。在学校里，他也教孩子们怎样养蜂和怎样栽种冷杉和松树的树苗。他多年前已经退休，最近迎娶了一位不再年轻的同事。他们一起盖了一栋新房子，虽然小却舒适而温馨。我去看过他两次，在 1951 年和 1974 年。在最近一次拜访时，他告诉我关于亚瑟（Arthur）的近况。亚瑟住在一个离他不远的村子里，年迈多病，并不欢迎可能重新唤醒痛苦的古老回忆的客人。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重新找到了曼迪（Mendi），在《这是不是个人》中简短提及的那个“现代思想的拉比”。我们重逢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戏剧性而出人意料。他在 1965 年偶然读到了德译版的《这是不是个人》，想起了我，并给我写了一封长信，细心地把它寄给了都灵犹太社区。之后，我们一直相互通信，相互转告我们共同朋友们的境遇。1967 年，我去东德的多特蒙德（Dortmund）看望他。他在当时是那里的犹太拉比。他仍然像过去那样，“坚定、勇敢而敏锐”，此外也有着杰出的教养。他娶了一位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并有三个孩子。孩子们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全家人打算移民到以色列。

我再没有见过潘维茨博士（Dr. Pannwitz）。正是这位化学家让我得以参加那令人恐惧的“国家考试”。但我从穆勒博士（Dr. Müller）那里听到过他的消息。穆勒博士正是我的《元素周期表》（The Periodic Table, Schocken, 1984）中《钒》一章的主人公。当红军就要到达布纳工厂时，潘维茨博士表现得既盛气凌人，又胆小懦弱。他命令他的那些平民同事们反抗这苦涩的结局，禁止他们登上撤离这一地区驶向西方的列车。但他自己却在最后一刻趁乱跳上了火车。他在 1946 年死于脑瘤。



《元素周期表》封面



《死屋手记》封面

我几乎与《休战》中的所有人物都失去了联系，除了塞萨尔（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和列奥纳多·列奥纳多·德·贝内德蒂医生（Dr. Leonardo De Benedetti），像我一样，是都灵本地人，在奥斯维辛失去了他那亲爱的妻子。回到我们的城市后，他重新成为一名勇敢而尽职的医生。多年来，他一直是我珍贵的朋友，聪明而冷静。除了他的病人外，无数人请求他的帮助和建议，没有人失望而归。他在 1983 年毫无痛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 85 岁。

7、怎么解释纳粹对犹太人那疯狂的仇恨？

可以说反犹主义是人类偏狭的一种具体表现。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带有显著的宗教特征。在第三帝国，德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倾向，以及犹太人民的“与众不同”让它进一步趋于恶化。法西斯和纳粹宣传机构需要一个替罪羊来背负所有的罪行和污秽。而正是得力于法西斯和纳粹宣传机构的高效率，整个德国（以及大部分欧洲）都轻而易举地接受了反犹主义。最后，一位狂热的独裁者，希特勒，加剧了这一现象，使它最终突然爆发。

然而，我不得不承认，这些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并不能让我满意。这些理由过于简化，与纳粹所犯下的滔天罪恶并不相称。或者说，它们并不足以解释需要解释的事实。在重读纳粹党的编年史时，从它那阴郁的开始到它那痉挛般的终结，一种无法控制的疯狂氛围挥之不去。而在我看来，在人类历史长河之中，这种疯狂是独一无二的。这种集体性的疯狂，这种“脱轨”，往往被一些因素那仿佛理所当然的结合所解释，哪怕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不足以解释这个事实。在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是希特勒的个性本身，以及它与德国人民的广泛互动。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的执迷，他的仇恨，他对暴力的鼓吹，在德国人民的无意中激起了无限的回声，并出于这个原因给予他加倍的反馈，促使他狂热地坚信自己是尼采所预言的英雄，拯救德国的超人。很多文章讨论了他对犹太人仇恨的源头。据说，希特勒把他对整个人类的仇恨倾泻在犹太人身上。据说，他在犹太人的身上看到了自身的一些缺陷，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正是对他自身的仇恨。据说，他如此深深地憎恶犹太人，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血管中可能流淌着“犹太人的血液”的恐惧。

同样，这些解释在我眼中并不足以解释这个现象。我认为，不应该把一个历史现象统统归咎于一个人（那些执行可怕命令的人并不是无辜的！）。此外，解释一个人内心的动机总是困难的。这些提出的假设仅仅在一个点上解释了这些事实，解释了质，而不能解释量。我必须承认，我更青睐于一些更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谦逊，包括布洛克[6]、施拉姆[7]和布拉契[8]。他们都承认无法理解希特勒和他背后的德国那激烈的反犹主义。

也许人们无法一更有甚者，人们不可以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因为理解几乎代表着为所发生的事情找出正当的理由。让我们解释一下：“理解”一个建议或人类行为意味着要“包容”它，“包容”它的作者，把自己放在作者的位置，将自己等同于它的作者。而没有正常的人类能够将自己等同于希特勒、希姆莱（Himmler）、戈培尔（Goebbels）、艾希曼，以及其他无数人。这令我们沮丧，但同时也让我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的言辞（不幸的是，同样，他们的行为）不能被我们所理解也许正是合意的。它们不是人类的言辞和行为，事实上是反人类的、史无前例的，难以与生物为了生存那最残酷的斗争相比。战争可以与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但奥斯维辛与战争毫无关系。它既不是战争的一个方面，也不是它的一种极端形式。战争当然是一个可怕的现实，需要人类摒弃的现实，但它发生在人类中间，它有着它的合理性，我们“理解”它。

但在纳粹的仇恨中并没有理性。它是一种并不属于我们的仇恨，是人类之外的仇恨，是法西斯主义这棵死亡之树上长出的毒果。但它相异并超越于法西斯主义本身。我们无法理解这种仇恨，但我们必须理解它源自哪里，而且我们必须警惕。如果说理解是不可能的，认知却势在必行，因为发生过的事情可能再次发生。良知可能再次受到诱惑或蒙蔽，哪怕是我们的良知。

出于这个原因，每个人都有责任对这些历史事实进行反思。每个人必须认识到，并牢记，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当众演讲的时候，人们相信他们的话，为他们喝彩，钦佩他们，像神一样崇拜他们。他们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他们具有一种诱惑的秘密力量。这种力量并非是因为他们的演讲言之凿凿或无懈可击，而是因为他们的发言富于启发，他们的雄辩与口才，他们那装腔作势的态度，这也许是他们的本能，也许经过耐心的学习和练习。他们所鼓吹的理念并不总是同一个，而且常常是反常、愚蠢或残忍的。但人们用赞美上帝的溢美之词来赞美他们，成百万的信徒为了这些理念甘愿牺牲生命。我们不能忘记，在这些忠诚的追随者中，有着非人道命令的兢兢业业的执行者。但这些追随者并不是天生的折磨者，并不是（除了个别例外）怪物——他们只是一些普通人。怪物的确存在，但他们在数量上太少而无法构成真正的危险。更大的危险来自普通人，那些不提出问题，而直接相信和执行的公务员们，像艾希曼；像霍斯（Höss），奥斯维辛的指挥官；像斯坦格尔（Stangl），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指挥官；像 20 年后的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大肆屠杀；像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红色高棉，柬埔寨的屠杀者。

所以，我们必须对那些试图通过诡辩而不是道理来说服我们的人抱有怀疑之心，必须对那些所谓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抱有怀疑之心。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让别人的判断和意志充当了我们的判断和意志。因为难以分辨预言家的真假，所以我们也应对所有的预言者抱有怀疑之心。我们最好放弃那些昭示的“真理”，即使这“真理”光彩夺目，卓显着我们的荣光，即使这真理近在咫尺，得到不费吹灰之力。我们最好还是满足于那些更保守的、不那么激动人心的真理，那些人们通过痛苦所获得的真理，一点点地，没有捷径，通过研究、讨论和推理，那些能够经得起推敲和论证的真理。

显然，这个公式过于简单，并不足以适用于所有情况。一种新的法西斯主义，拖曳着它那偏狭、凌辱而奴役的足迹，可能诞生于我们国家之外，为自己改个新名字，踮起脚尖，偷偷溜进国门。它也有可能在国内，凭借击溃一切防御的暴力，逃出牢笼。这时候，明智的忠告不再适用，人们必须奋力反抗。即使在这个时刻，对不久前欧洲腹地所发生的悲剧的回忆，也足以让人们提出预警，促使人们去反抗法西斯主义的复辟。

8、如果你不曾成为集中营里的一名囚犯，那么你今天会是怎样的人呢？你对那个时期具有怎样的感觉和回忆？你将你的幸存归功于哪些因素？

如果没有被投入集中营，那么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严格来说，我现在不知道，

将来也无法得到答案。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未来。而这恰恰是去描述从未发生的未来。大胆猜测（极为粗糙地猜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行为还有一些意义。但预测一个人的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哪怕今天去预测明天的行为。这就像物理学家可以极为精确地预测一克镭的衰变所需要的时间，但完全无法预测同样这克镭中一个单独的原子何时会开始衰变。如果一个人走向一个丁字路口，而他不打算向左转，显然他将选择右侧的道路。但在真实的人生中，我们的选择几乎永远不会仅限于两个选项。而且，每次抉择之后，我们还要面对下一次抉择，而每次抉择都有众多选项，诸如此类，直至无穷。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未来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外在因素。而这些外在因素往往与我们的主观选择毫无关系。同时，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内在因素也会对我们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出于这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无法预知自己或身边其他人的未来。出于同样的原因，没人能在“如果”的前提下说出自己的过去会是什么样。然而，我可以提出某些特定的断言：如果我没有在奥斯维辛生活过，我很可能永远不会写出任何东西。我不会具有写作的动机和激励。我原本是意大利的一名平庸的学生，历史成绩很糟，最感兴趣的是物理和化学。我已经选择将化学家作为我的职业。这个职业与写作世界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正是集中营和漫长的回家之路的经历迫使我去写作。我并不需要和懒惰做斗争，写作风格的问题在我看来是荒唐的，不可思议的是，我甚至不用从我每天的职业工作中抽出一个小时，就已经找到了足够的写作时间。似乎这些书就在我的脑子里，我只要把它们倾倒在纸张之上。

现在，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最重要的是，这两本书，经历过许多机缘，像一种人为的记忆，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横亘在我极为正常的现在与富有戏剧性的过去之间，宛如一道防御性的壁垒。我这样说是不无犹豫的，因为我不想被当作玩世不恭——如今，当我回忆起集中营的时候，我不再感到任何强烈或悲伤的情绪。恰恰相反，在我作为一个被流放者那短暂而悲惨的经历之上，覆盖着我作为一个作家和见证者那漫长而复杂得多的经历。这种覆盖显然是正面的：总体来说，这个过去让我更充实、更坚定。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被关押于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的女犯。她说集中营是她的大学。我想我也能这样说，也就是说，通过经历以及之后书写和思考这些事情，我已经对人性、对这个世界有了很多新的认识。

但我必须立刻补充一点：这种积极的结果只是极少数人才能够得到的一种好运气。比如，在被投入集中营的意大利囚犯之中，只有大约百分之五的人能够回国，而其中很多幸存者失去了他们的亲人、朋友、财产、健康、心理平衡和青春。在我看来，我能够幸存并安然无恙地回来，主要是由于我的运气不坏。先前已经存在的因素也发挥了有限的作用：比如，我作为一名登山运动员而接受的训练，以及我作为一名化学家的职业，这些在我身处集中营的最后几个月中为我赢得了一些特权。也许，我那从未凋萎的对人类精神的兴趣，还有不仅活下来（很多人有着相同的意志），而且要向人们倾诉我们所见证和忍受的事实的意志，也有助于我的幸存。而最后，我的决心，即使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也坚定地保持着的决心，坚持把我的同伴和我自己视为人，而不是物品，从而避免了导致很多人精神崩溃的全然的羞辱和消沉。

本文为《休战》（杨晨光 / 译，三辉图书 | 中信出版社，2018 年 11 月版）后记，由三辉图书授权发布。

[1] 指作者最早的两本回忆录《这是不是个人》（又名“活在奥斯维辛”；英译版：If This Is a Man 或美译版：Survival in Auschwitz, 1947, 1958）和本书《休战》（又名《再度觉醒》，英译版：The Truce 或美译版：The Reawakening, 1963）。

[2] 原句“*I write what I would never dare tell anyone*”是《这是不是个人》英译版中的一句，此处指《这是不是个人》最早起源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3] 吉亚科莫·马泰奥蒂（Giacomo Matteotti, 1885—1924）：意大利社会主义政治家，是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主要政敌，被法西斯党人绑架并杀害。他的尸体在同年 8 月 16 日被发现。

[4]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 1821—1881）：俄国作家，其文学风格对 20 世纪的世界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 1918—2008）：苏联杰出作家，苏联时期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许多领域有较大成就。

[6] 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 1914—2004）：英国历史学家，撰写了传记《希特勒：对暴君的研究》（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

[7] 珀西·施拉姆（Percy Schramm, 1894—1970）：德国历史学家。

[8] 卡尔·布拉契（Karl Bracher, 1922—2016）：德国历史学家。

普里莫·莱维

意大利著名作家、化学家，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第 17451 号囚犯，也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代表作包括《这是不是个人》《元素周期表》《终战》《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等。1987 年 4 月 11 日，莱维从都灵寓所跳楼身亡，官方推断原因为自杀。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电影《乡愁》(1983)剧照

档案

小于一

约瑟夫·布罗茨基 | 发现经典

你不能用一页《真理报》遮盖废墟。

01

跟一般失败比较，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把握存在的意义。两者都使你感到像一个婴儿在抓篮球：手掌不断滑走。

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能记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如果不是这样，则它们无疑都已被别人更好地表达过了。一位作家的传记，是他的语言的转折。例如，我记得，在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想到马克思的名言“存在决定意识”，觉得只有在意识学习掌握疏离的艺术时，这个说法才是真的；之后，意识便独立自主，并可以决定和忽略存在。在那种年龄，这不啻是一个发现——却说不上值得记录，因为这肯定已被别人更好地阐述过了。“存在决定意识”是精神楔形文字的完美例子，至于谁首先破译它其实并不重要。

因此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纠正记录（根本没有这样的记录，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因而也是未被歪曲的），而主要是为了一个平常理由，也即作家为什么写作——刺激语言或被语言刺激，并且这一回是被一门外语。我所记得的那么一点点，又因为用英语来回忆而缩得更小了。

首先，我最好还是相信我的出生证，上面写明我 1940 年 5 月 24 日生于俄罗斯列宁格勒，尽管我厌恶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这座城市。很久以前，普通人都仅仅用彼得——来自彼得堡——这个诨号来称呼它。有两行旧谚：

老彼得摩擦

人民的两肋。

在民族经验中，这座城市肯定是列宁格勒无疑；在其内容的日益粗俗化中，它愈来愈成为列宁格勒。此外，作为一个词，“列宁格勒”对俄罗斯人的耳朵来说，听起来已经中立如“建筑”或“香肠”。然而我宁愿称它“彼得”，因为我尚能记得这座城市看上去还不像“列宁格勒”时的样子——就在战争刚结束之后。偏灰、暗绿色的建筑物表面留下一个个弹孔；空荡、没有尽头的街道，没几个过路人，车辆也少；一种因此而来的近乎饥饿的表情，有着更明确的，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更高贵的面貌。一张清瘦、坚硬的面孔，其河流那深奥莫测的闪烁反映在其空洞的窗口的眼睛里。既然是一个幸存者，就不应以列宁来命名。

在那些庄严的、布满痘疤的建筑物表面背后——在旧钢琴、破地毯、沉重铜框里蒙尘的油画、围城期间被铁炉消耗掉的家具残余（尤其是椅子）中间——一种微弱的生命正开始发出微光。我记得，当我上学途中经过这些建筑物正面时，我完全沉浸于想象在那些有鼓起的旧墙纸的房间里，到底正发生什么事情。我必须说，从这些建筑物正面和门廊——古典的、现代的、折中的，连同它们的廊柱、半露柱和涂上厚厚泥灰的神秘动物和人物的头像——从它们的装饰和支持阳台的女像柱，从它们入口处壁龛里的躯干雕像，我学到的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要比后来从任何

书本学到的都多。希腊、罗马、埃及——它们全都在那里，全都在轰炸期间吃了炮弹。从那条流向波罗的海的灰色、反光的河流和河流里偶尔一艘在急湍中挣扎的拖船，我学到的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要比后来从任何书本学到的都多。希腊、罗马、埃及——它们全都在那里，全都在轰炸期间吃了炮弹。从那条流向波罗的海的灰色、反光的河流和河流里偶尔一艘在急湍中挣扎的拖船，我学到的关于无限和禁欲的知识，要比从数学或芝诺那里学到的更多。

所有这一切，都与列宁无关，而我想，大概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对他不以为然了，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政治哲学或实践——我七岁的时候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不如说是因为他那无所不在的画像，这些画像充斥于几乎所有课本，所有教室墙壁、邮票、钞票等，描绘他一生不同年龄和阶段的形象。有男孩列宁，金黄色鬈发，看上去像一个小天使。然后是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的列宁，秃头、紧张，脸上那个毫无意义的表情可以被误解为任何东西，就是说是有目标吧。这张面孔在某种程度上萦绕在每一个俄罗斯人脑中，并暗示某种标准的人类面孔，因为它完全缺乏任何特征。（也许恰恰因为这张面孔没有任何特征，所以它暗示诸多可能性。）然后是稍老的列宁，头更秃，留楔形胡须，穿三件式暗色套装，有时候微笑，但大多数时候是站在某辆装甲车上或某次党代表大会讲台上向“群众”发表演说，一只伸向空中。

尚有一些变体：列宁戴工作帽，翻领上别着一朵康乃馨；穿马甲，坐在书房里写作或阅读；坐在湖边树墩上，草拟他的《四月提纲》；或其他荒谬的户外活动。最后是列宁穿着一件准军事夹克坐在花园长凳上，旁边是斯大林，后者是唯一将要在无所不在的印刷画像上超过列宁的人。不过，那时斯大林还活力充沛，而列宁已经死了，仅仅是因为这点，他便是好的，因为他属于过去——即是说，得到历史和自然的赞助。而斯大林则仅仅得到自然的赞助，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

我想，学会忽略这些画像使我切断电源的第一课，我尝试疏离的第一步。接着还有很多；事实上，我的余生都可以被视为不停地在回避生命中那些最纠缠不休的方面。我必须说，在这个方向上，我走得颇远；也许太远了。任何表示重复的东西，都变成一种损害，因而必须铲除。这包括文字措辞、树林、某些类型的人，有时候甚至包括肉体痛苦；这影响了我的很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我得感激列宁。只要是大量的，我便立即把它视为宣传。这个态度，我想，演变成了某种可怕的加速度，穿过各种事件的灌木丛，也连带伴随着某种肤浅。

我一刻也不相信性格的所有线索都可追溯至童年。约三代俄罗斯人都住在集体公寓和逼仄的房间里，我们父母做爱时，我们都假装在熟睡。然后是战争、饥饿，缺席或断手残脚的父亲，欲火中烧的母亲，学校的官方谎言和家中的非官方谎言。严酷的冬天，丑陋的衣服，在夏令营把我们尿湿的床单拿出来示众，以及在别人面前重提这类事情。然后红旗会在夏令营桅杆上招展。那又怎样？所有这些童年的军事化，所有这些胁迫性的愚蠢行为和性欲紧张（十岁时，我们全都对女教师想入非非）都没有对我们的伦理学或美学——或我们爱和受苦的能力产生太大影响。我回忆这些事情，不是因为我觉得它们对潜意识很重要，当然更不是出于对童年的怀旧。我回忆它们是因为我从未这样回忆过，是因为我想让这些事情多少能留存下来——至少在纸上。还因为回顾比其相反更有益。明天就是不如昨天有吸引力。基于某种理由，过去不像未来那样辐射如此巨大的单调。未来因为其大量，所以是宣传。杂草亦然。

意识的真正历史，开始于人们的第一个谎言。我碰巧记得我自己的。那是在一个学校图书馆，那时我必须填写借书证。第五个空栏当然是“民族”。我七岁，很清楚我是犹太人，但我对服务员说我不知道。她半信半疑地笑着说，你可以回家向父母问个清楚。我没有再回去那个图书馆，尽管我后来成为很多别的图书馆的会员，它们也都要求填写相同的申请表。我不羞于自己是犹太人，也不害怕承认是犹太人。在班级花名册上，我们的姓名、父母姓名、家庭地址和民族都有详尽记录，老师在课间休息时，总会时不时“忘记”教室书桌上那本花名册。于是，我们会像秃鹰一样，扑向那本簿子：我们班上所有人都知道我是犹太人。但是七岁男童们都做不好反犹者。此外，按我的年龄计，我算是颇为强壮的，而那时最重要的还是拳头大小。我羞于“犹太人”这个词本身——在俄语里念作“耶夫雷”——不管它的内涵是什么。

一个词的命运，取决于其不同的上下文，取决于其使用频率。在俄语印刷品中，“耶夫雷”出现的频率之少，如同美国英语中的“纵膈”或“狭巷”。事实上，它还拥有某种类似于四字粗口或性病名称的地位。七岁时，你的词汇量证明足以知道这个词的稀罕性，而把自己与它等同起来是绝对不愉快的；不管怎么着，它与你的音韵感背道而驰。我记得，我总是觉得“犹太佬”的俄语对等词——念作“zhyd”（发音与安德烈·纪德相近）——听起来顺耳多了：它显然是冒犯性的，因而是无意义的，没有充满各种影射。在俄语中，一个单音节词作用不大。一旦加上后缀或词尾或前缀，那些羽毛就会飞起来。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在那个幼嫩的年龄就因自己是犹太人而受苦；而只不过是说，我第一个谎言与我的身份有关。

这不是坏的开始。至于反犹本身，我并不在乎，因为它主要来自教师们：它似乎是他们在我们生活中扮演消极角色不可或缺的，必须像低分数一样对待它。如果我是罗马天主教徒，我就会希望他们大多数人下地狱。确实，有些老师比另一些老师好，但既然他们都是我们当前生活中的主人，我们才懒得去区分他们呢。他们也不想对他们的这些小奴隶作出区分，并且哪怕是最热烈的反犹言论也含有一种非个人的惯性。不知怎地，我永远无法认真对待任何针对我的口头攻击，尤其是来自年龄组别如此不同的老师。我猜，父母用来咒骂我的那些话很好地锻炼了我。此外，有些老师自己也是犹太人，而我害怕他们一点也不逊于我害怕那些纯种的俄国人。

这只是自我修剪的一个例子而已，这种自我修剪（再加上语言本身，在那里，动词和名词自由地更换位置，只要你有胆量这样做）在我们身上培养了一种如此强大的矛盾心理，以至于十年内我们的意志力就变得跟一根海草差不多。四年的军队生涯（男子十九岁就要应征入伍），完成向国家彻底投降的程序。顺从将同时变成第一和第二天性。

如果你有头脑，你肯定会设法智胜这个制度，包括发明各种绕道，安排与上司做隐蔽交易，堆积谎言，以及调动各种或明或暗的裙带关系。这将成为一份全职工作。然而你不断意识到你编织的网是一张谎言网，并且不管你有多大的成功或有多大的程度的幽默感，你都会鄙视自己。这正是该制度的终极胜利：无论你痛击它还是加入它，你都同样感到有罪。国家的信仰——如同谚语所说的——没有任何恶是不含一点儿善的，而且可能相反亦然。

我想，矛盾心理是我国的主要特征。没有任何一个俄罗斯刽子手不担心自己有一天也变成受害者，也没有任何最柔软的受害者不承认（哪怕仅仅是对自己承认）自己也有一种变成刽子手的精神能力。我们当下的历史为两者提供了足够的机会。此中有某种智慧，你甚至会觉得，这矛盾心理即是智慧，觉得生命本身既不是好也不是坏，而是任意的。也许我们的文学如此盲目地强调善，是因为善受到如此巨大的挑战。如果这种强调仅仅是双重思想，那就好办多了；但它使本能受不了。我想，这种矛盾心理，正是自己拿不出什么东西的东欧集团，准备强加给全世界的“福音”。而世界似乎已准备好接受它。

撇开世界的命运不谈，一个男孩与自己眼前的命运作斗争的唯一途径，将是偏离轨道。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你父母不允许，也因为你也很害怕那未知之数。最重要的是，因为它使你不同于大多数人，而你从吃母乳开始就知道大多数人是对的。一定程度的不在乎是必要的，而我就很不在乎。当我回想我十五岁辍学时，那与其说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本能反应。我只是受不了我们班里某些嘴脸而已——某些同学的嘴脸，但主要是老师的嘴脸。于是某个冬天早上，没有明显的理由，我在上到半堂课时站起来，作我这次肥皂剧式的退场，穿过学校大门，很清楚自己再也不会回来。至于那一刻我最强烈的情绪，我记得只不过是一种对自己的笼统厌恶感，厌恶自己太年轻，让那么多事物对我指手画脚。另外，还有那种模糊的快感，逃走的快感，望着满街没有尽头的阳光的快感。

最主要的方面，我想，是这种外部的改变。在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所有的房间看上去都一样：我们校长的办公室，完全是我约五年后开始出入的审讯室的翻版。同样是木嵌板、桌子、椅子——木匠们的乐园。同样是我们那些奠基者列宁、斯大林、政治局成员的肖像，还有马克西姆·高尔基（苏联文学的奠基人），如果是在学校；或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苏联秘密警察的创始人），如果是在审讯室。

不过，捷尔任斯基——“铁费利克斯”或宣传机器所称的“革命骑士”——也常常会装饰校长的墙，因为这个人已从克格勃的高处悄悄进入教育系统。还有我们教室那些拉毛粉饰墙，连同与眼睛齐平处的蓝色横纹，那蓝色横纹准确无误地贯穿全国，如同一条无穷的公分母线：在大堂、医院、工厂、监狱、集体公寓的走廊。我没有遇见它的唯一地方，是农民的木屋。

这种装饰不仅疯狂，而且无所不在，而我一生中不知有多少次发觉自己机械地盯着这道两英寸宽的蓝纹，有时候把它当作海平面，有时候当作虚无本身的体现。它太抽象了，谈不上有任何意义。一堵墙从地板到与你眼睛齐平处，涂着老鼠灰或绿漆，而这道蓝纹就在它上面，蓝纹上则是处女般纯洁的白灰泥粉刷。没有人问为什么它会在那里。也没有人能够回答。它只是在那里，一条边界线，灰与白、下与上之间的一道分隔线。它们本身不是颜色，而是颜色的暗示，也许唯一能够扰乱它们的，就只有一些替代性的棕色块：门。紧闭的，半掩的。透过那半掩的门，你可以看见另一个房间，同样被分配了灰与白，中间一道蓝纹。再加上一幅列宁画像和一张世界地图。

离开那个卡夫卡式的宇宙实在是件快事，尽管那个时候——或貌似如此——我就已经知道自己是在拿五十换半百。我知道我想进入的任何其他建筑物，看上去都将完全相同，因为，不管怎样，建筑物都是我们注定要继续活动的场所。不过，我仍感到我必须走。家里经济情况很严峻：我们几乎是靠母亲的工资生存的，因为父亲在遵照某项认为犹太人在军队中不应拥有重要军阶的纯洁规定而退伍之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当然，没有我的贡献，父母也能把生活勉强维持下去；他们宁愿我完成学业。我知道这点，然而我对自己说，我必须帮助家里。这几乎是一个谎言，但这看上去要好些，况且那时我已经学会了喜欢谎言，而喜欢谎言又恰恰是因为这个“几乎”——它锐化真理的轮廓：毕竟，真理结束于谎言开始之处。这就是一个男孩在学校里学到的，而事实证明它要比代数有用。

02

不管是什么——谎言、真理，或最有可能的，两者的混杂——导致我作出这个决定，我都对它无比感激，因为这似乎是我的第一个自由行动。这是一种本能行动，一次退席。它与理性没有什么关系。我知道这点，因为自此之后我就一直在退席，且愈来愈频密。不见得就是因为沉闷或感到有一个陷阱张开大口；我常常退出完美的配制，一点不少于我常常退出可怕的配制。不管你碰巧占据的是什么位置，只要它有一点儿正派的痕迹，你都可以肯定有一天某个人会走进来宣称那是他的，或更糟糕，要你跟他分享。这时你要么为这个位置而力争，要么离开它。碰巧我更喜欢后者。绝不是因为我不会力争，而纯粹是因为我对自己感到恶心：想办法夺取某样吸引其他人的东西，表明你这个选择本身含有某种粗俗。至于你是先得到那位置的，这一点并不重要。实际上先占得某个位置更糟，因为那些紧跟而来的人永远拥有比你那部分地满足的胃口更强大的胃口。

这之后，我常常后悔我那个举动，尤其是当我看到以前的同学们都在体制内活得那么好的时候。然而我知道某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事实上，我也在出人头地，只不过是朝着相反方向，走到某个更远的地方。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我竟然追上了真正处于无产阶段的“工人阶级”，那时它还未开始朝着50年代末期的中产阶级转化。我在工厂打交道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那时我十五岁，开始当一个铣床操作员。马克思一眼就认出他们。他们——或者应该说“我们”——全都住在集体公寓里，四个或不止四个人一个房间，常常是三代同堂，轮流睡觉，像鲨鱼喝水那样喝水，互相争吵或在公共厨房内或早上在公共厕所前排队时与邻居争吵，以垂死的决心打

他们的女人，在斯大林归西时或在看电影时当众痛哭流涕，而且满口粗话，其频率之高使得譬如“飞机”这种常用词会让一个过路人觉得是一种隐含深意的淫秽语——而在支持埃及或别的什么国家的公开集会上，则会变成灰色而冷漠的人头之海，或举手的森林。

工厂全是砖砌的，庞大，直接来自工业革命。它建于19世纪末，“彼得”的居民都把它称为“军械库”：它生产大炮。我开始在那里工作时，它还生产农用机械和空气压缩机。不过，根据覆盖几乎一切与俄罗斯重工业有关的事物的那七重秘密面纱，该工厂也有一个代号：“671邮箱”。然而我想，那秘密与其说是用来愚弄某个外国情报机构，不如说是用来维持某种准军事纪律，而这纪律是确保产量稳定性的唯一法门。不管是用于哪一面，失败都是明显的。

那些机器都是过时的；百分之九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赔偿而从德国运来的。我记得那整座充满异国情调的铸造动物园，那些动物都刻有辛辛那提、卡尔顿、弗里茨·维尔纳、西门子与舒克特等名字。计划都是可怕的：隔不久就会来一道要求生产某件东西的急令，这急令会使你好不容易试图建立某种工作节奏、某种程序的努力乱成一团。待每季（也即每三个月）结束，当计划就要告吹时，管理部门就会发出冲杀令，动员所有的人来做一项工作，该计划就需要来一场暴风骤雨的突击。一旦发生什么故障，都没有备用零件，于是就会召来一群通常是半醉的修补匠来施魔法。那件金属品送抵时，将充满一个个焊口。实际上每个人在星期一都会宿醉，更别说发薪日之后那天早晨。

市足球队或国家足球队输球之后那天，产量就会骤降。没人想干活，大家都在谈论细节和球员，因为俄罗斯固然有种种大国情结，但尚有巨大的小国情结。这主要是国民生活中央集权化的结果。因此也才有官方报纸和电台那些正面的、“肯定生命”的胡诌，哪怕是在描述一次地震时也不例外；它们从不告诉你有关受害者的任何消息，而只是一味歌颂其他城市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兄弟般的关心，歌颂他们向灾区提供帐篷和睡袋。或者，如果是一场霍乱流行病，你可能只会在读到有关新疫苗的发明见证我们最新伟大医学成就的报道时才碰巧知道。

整件事会显得非常怪诞，如果不是因为我必须非常早就起床，匆匆用乏味的茶水把早餐冲下肚，跑步去赶有轨电车，把我这颗浆果添加到悬在踏脚板上那一簇簇暗灰色的人类葡萄中去，驶过蓝中带粉红的水彩似的城市，直奔我们工厂入口那间狗窝似的木门房。那入口处有两个守卫检查我们的证章，入口的正面装饰着镶了胶合板的古典半露方柱。我注意到，监狱、精神病院和集中营的入口都是同样的风格：全都带着古典或巴洛克式柱廊的痕迹。算得上似模似样。在我的车间里，天花板下不同深浅程度的灰色交织着，压气软管在地板上，在积着一层重油、闪烁着所有彩虹颜色的坑坑洼洼中发出咝咝声。到十点的时候，这座金属丛林便全面运作起来，尖声吼叫着，未来的防空炮的炮管便像长颈鹿脱臼的脖子高昂在半空中。

我总是羡慕19世纪那些人物，他们总能够回顾并辨别他们生命中、成长中的地标。某个事件会成为一个转折点、一个不同阶段的标记。我说的是作家；但我想的是某些类型的人，他们有能力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生命，分开看待事物，如果不是清晰地。我也明白，这种现象应不仅局限于19世纪。然而我的生命一直都由文学来代表。要么是因为我的思想有某种基本缺陷，要么是因为生命本身那种流动、无定形的本质，总之，我一直都无法辨别任何地标，更别说浮标了。如果有任何像地标的東西，那也是我自己无法承认的东西——死亡。在某种意义上，从来没有童年这回事。这些归类——童年、成年、成熟——在我看来似乎非常怪异，而如果我在谈话中偶尔使用它们，我自己总是暗中把它们当成是借来的。

我猜，这个小小的、后来稍大的躯壳里，总有某个“我”，而在躯壳外的四周则正在发生“一切”。在躯壳里，那个被称作“我”的实体永远不变，也永远没有停止观察外边发生的事情。我不是试图暗示里面有珍珠。我想说的是，时间的流逝并不怎么影响那个实体。获得低分，操作一台铣床，在审讯时遭毒打，或在教室里大谈卡利马科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你长大成人，发现你正在应付被假设要由成年人处理的任务时，你不能不感到有点惊骇。一个孩子对父母控制他感到不满，与一个成年人面对责任时的恐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你不是这些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你也许是小于“一”个。

显然，这一部分是由你的专业造成的。如果你是在银行业，或如果你驾驶飞机，你会知道在你有了相当的专业知识之后，你多多少少可确保获利或安全着陆。而在写作这件事情上，你累积的并不是专业知识而是没有把握。它只不过是技艺的另一个名称。在这个领域，专业知识意味着末日、青春期和成熟之类的概念混杂不清，恐慌是最常见的心态。因此，如果我诉诸编年纪事或诉诸任何暗示线性程序的东西，那我就是在撒谎。一所学校是一家工厂是一首诗是一座监狱是学术是沉闷，时不时有恐慌掠过。

唯一不同之处是，那工厂隔壁是一家医院，那医院隔壁是全俄罗斯最著名的监狱，叫作十字。那家医院的停尸间正是我辞掉军械库工作之后干活的地方，因为我想当医生。在我改变主意并开始写起诗来之后不久，十字监狱便向我敞开它的牢房。当我在那家工厂干活时，我可以看到墙头外的医院。当我在医院切割和缝合尸体时，我可以看到十字监狱放风场里囚犯们在走动；有时候他们想办法把信扔到墙头外，于是我把信捡起来寄走。由于这种紧邻的地形学，也由于有那个躯壳包围着，因此这些地方、职位、罪犯、工人、看守和医生都彼此融为一体，于是我再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我想起某人在十字监狱那个熨斗形放风场里来回踱步，还是我本人在那里走动。此外，工厂和监狱都是大约同时兴建的，表面上它们难以区别；这家看上去就像那家的翼部。

因此，对我来说试图在这篇文章里保持连续性是没有意义的。生命对我来说绝不是一系列清晰标记的转折，而是滚雪球，愈滚，一个地方（或一个时候）就愈像另一个。

例如，我记得 1945 年母亲和我怎样在列宁格勒附近某个火车站等候一列火车。战争刚结束，两千万俄索人在大陆各地的临时坟墓里腐烂，其他被战争分散的人，则纷纷回家或回所剩无几的家。那火车站是一幅原始混乱的画面。人群像疯狂的蝗虫围攻运输牲畜的火车；他们爬上车厢顶，互相挤逼，如此等等。基于某种原因，我的眼睛看到一个秃头、跛脚的老人，拐着一条木腿，试图爬上这节或那节车厢，但每次都被已经悬在踏脚板上的人推下来。火车开始移动，那老人还在单脚跳着追火车。有一回他竟然抓住了一节车厢的门柄，接着，我看见走道里一个女人举起一个水壶，把滚水直接淋在那个老人的秃顶上。那老人倒下——千条腿的布朗运动吞噬了他，他就这样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这很残忍，没错，但这个残忍的例子接着便在我头脑里与二十年后的一个故事，一群曾与德国侵略军勾结的通敌者——所谓的“polizei”（警察）——被捕的故事融合在一起。报纸有报道。共有六七个老人。他们的首领的名字当然是古雷维茨或金茨堡——即是说，他是一个犹太人，不管一个犹太人与纳粹勾结是多么难以想象。他们全都获程度不同的刑期。那个犹太人当然是死刑。有人告诉我，在执行死刑的那天早上，他被带离牢房，押往行刑队在等待着的监狱放风场时，监狱看守主管问他：“对了，顺便问一下，古雷维茨（或金茨堡），你有什么遗愿？”“遗愿？”那人说，“我不知道……我想撒尿……”于是那主管回答：“没问题，你稍后可以撒尿。”对我来说，这两个故事是相同的；然而如果第二个故事是纯粹的民间传说，那就更恶劣，尽管我不认为那是民间传说。我知道数百个类似的故事，也许不止数百。然而它们融为一体。

使我的工厂与我的学校不同的，并不是我在工厂里或学校里干了些什么，也不是我在这两个不同时期内想了些什么，而是我上课或上班时从路上望见的学校和工厂的外表。说到底，外表就是一切。同样的白痴式命运降临在千百万人身上。这种本身已经是单调的存在，被中央集权化国家简化成划一的严厉。剩下可看的，就是面孔、天气、建筑物；还有，人们使用的语言。

我有一个舅舅，是共产党员。现在我才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工程师。在战争期间，他为共产党同志们建造防空洞；战前和战后他建造桥梁。那些防空洞和桥梁现在都还存在着。当父亲与母亲为钱的事情而争吵时，他总是嘲弄我那个舅舅，因为母亲总是把她这个工程师兄弟当作过可靠和稳定生活的榜样，而我则多多少少地自动鄙视他。不过，他有大量藏书。我想，他不怎么读书，但在当时——现在也仍然如此——苏联中产阶级都赶时髦，订购新版百科全书、经典著作等。他简直把我羡慕疯了。我记得，有一次我站在他座椅背后，盯着他的后脑勺，心想要是我把他杀了，这些书将全属于我，因为他当时还未结婚，没有子女。我常常拿他书架上的书，甚至做了一把钥匙，用来开一个很高的玻璃面书柜，柜里有四大卷革命前出版的《男人和女人》。

这是一部浩繁的插图本百科全书，现在我仍认为，我有关禁果是什么滋味的基本知识，都是拜它所赐。如果一般来说色情描写是一种能造成勃起的无生命物，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斯大林的俄罗斯那种禁忌的气氛中，你可以被那幅百分之百清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油画《加入共青团》刺激得欲火烧身，该油画广泛复制，装饰几乎每一间教室。油画的众多人物中，有一个年轻的金发女郎，坐在椅子上，双腿交叉得很开，以至有两三英寸的大腿暴露无遗。使我疯狂并在梦中纠缠我的，与其说是她那一点儿大腿，不如说是它与她一身暗褐色衣服构成的强烈对比。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不相信一切有关潜意识的噪音。我想，我从未以象征符号做过梦——我总是看到真实事物：乳房、臀部、女人内衣。关于后者，当时对我们男孩来说，它有一种奇怪的深意。我记得，在课堂上，有人会从一排桌子下一路爬到老师桌子前，带着唯一的目标——查看那天她衣服下穿着什么颜色的内裤。完成了他的考察后，他会用戏剧性的低语向其他同学宣布：“浅紫色。”

简言之，我们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幻想而太不安——我们有太多现实要应付。我在别处说过，俄索人——至少我那一代——从不求助于精神病医生。首先，精神病医生本来就不多。此外，精神病治疗是国家的财产。我们知道有精神病治疗记录并不是什么好事。它随时可能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但不管怎样，我们习惯于处理自己的问题，留意我们头脑内部发生了什么事，而不必求助于外部。极权主义有某种好处，就是向个人暗示他自己有一个垂直式的等级制，意识高居其上。因此我们监视我们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我们几乎向我们的意识报告我们的本能。然后我们惩罚自己。当我们弄明白这种惩罚与我们发现的内部那个下流还不相称时，我们便求助于酒精，喝得烂醉如泥。

我觉得这个制度是有效的，而且消耗的现金也较少。不是我觉得压抑比自由好；我只是相信压抑机制是人类心灵固有的，如同释放机制。此外，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下流坯也比把你想象成堕落天使更谦逊，最终也更准确。我有非常好的理由这样想，因为在我度过三十二年的那个国家，通奸和看电影是仅有的自由活动形式。再加上艺术。

尽管如此，我仍感到自己是爱国的。这是一个孩子的正常的爱国主义，一种具有强烈军事色彩的爱国主义。我崇拜飞机和战舰，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空军的黄蓝军旗更美丽的了，它看上去就像一个打开的降落伞伞体，螺旋桨就在中央。我爱飞机，直到不久之前还密切留意航空业的发展。随着火箭的来临，我便放弃了，我的爱好变成对涡轮螺旋桨式飞机的怀旧。（我知道并非只有我一个人怀旧：我那九岁的儿子曾说，长大后他要摧毁所有涡轮螺旋桨式飞机，恢复双翼飞机。）至于海军，我是父亲真正的儿子，十四岁便申请入读一所潜艇学院。我通过了所有的考试，但由于第五段——民族——我进不了，我对海军外套——两排金纽扣酷似灯光渐远的夜街——的非理性的爱，依然是单恋。

生活的视觉效果，对我来说恐怕永远比其内容重要。例如，早在我读萨缪尔·贝克特的任何文字之前，我就爱上了他的一张照片。至于军队，坐牢使我免除了应征入伍，因此我对军队制服的热恋也永远只能是精神上的。在我看来，监狱要比军队好多了。

首先，在监狱里，没有人会教你去恨那个遥远的“潜在”敌人。在监狱里，你的敌人不是抽象的；他是具体而可摸的。即是说，对你的敌人来说，你永远是可摸的。也许“敌人”一词太强烈。在监狱里，敌人这个概念已经被严重驯化，你要应付的事情都变得凡俗而实际。毕竟，我的看守和邻居与我的老师或那些我在工厂当学徒期间羞辱我的工人没有任何不同。

换句话说，我憎恨的重心，并没有被打发到某个乌有的外国资本主义之乡；它甚至不是憎恨。从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萌生的那点儿该死的谅解之苗，也就是宽恕所有之人之苗，在监狱里茁壮成长。我想我甚至不恨我的克格勃审问者：我甚至倾向于不把他们当回事（他们是无用之人，要养家活口，等等）。我一点也无法证明其合理性的，是那些管理国家的人，而这也许是因为我未曾接近过他们。说到敌人，在牢房里，你有一个最直接的敌人：空间的缺乏。监狱的公式，乃是空间的缺乏由时间的过剩来弥补。这才是真正使你心烦的，即是说，你根本没有胜算。监狱意味着缺乏选择，而在监狱里你的未来是可以像用望远镜那样精确预测的，这才是真正使你疯狂的。即便如此，监狱也要比军队庄严地要求你去对付地球另一边或近一些的人好得多。

在苏联军队里服役，一般是三到四年，而我从未遇见过一个其心灵未曾被军队那服从的约束衣摧残过的人。也许除了在军乐队演奏的音乐家和两个我交往不深的人，这两个人于 1956 年在匈牙利饮弹自杀，他们在匈牙利都是坦克指挥官。是军队最终使你成为一个公民；没有军队你仍然有机会继续做一个人类，不管这机会多么渺茫。如果我的过去有任何可以自豪的理由，那就是我变成了一个罪犯，而不是一个士兵。即使错过了讲军事行话的机会——这是最使我发愁的——我仍然获得了讲罪犯黑话的慷慨补偿。

不过，战舰和飞机依然美丽，并且每一年它们的数目不断增加。在 1945 年，街头充斥着“史蒂倍克”卡车和吉普车，车门和车盖都有一颗白星——我们通过租借形式从美国获得的硬件。在 1972 年，我们自己开始向世界各地出售这种东西了。如果说那个时期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话，武器生产则可以说提高了百分之数万。它还会继续上升，因为它几乎就是我们那个国家仅有的真家伙，唯一可感知的先进领域。还因为军队勒索——即是说，不断增加军备产量，而在那个极权国家这是绝对可容忍的——可以摧毁任何一个试图维持平衡的民主国家敌人的经济。增加军力并非愚蠢：这是现有的最佳工具，可用来限制你的对手的经济，而在克里姆林宫他们非常清楚这点。任何寻求世界统治权的人都会这样做。其他选择要么行不通（经济竞争），要么太可怕（实际使用军事装置）。

此外，军队是农民心目中的秩序。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再没有比看到他的同伴接受站在列宁陵墓顶的政治局常委检阅更令人感到安慰的了。我猜，他们肯定没想过站在一个神圣遗体的陵墓顶含有亵渎成分。我猜，他们这样做是要维持一种延续性，而这些站在陵墓顶的人物的可悲之处是，他们实际上是加入那个木乃伊的行列，藐视时间。这场面，你要么在电视直播上看见它，要么看见它作为一张劣质照片在官方报纸中数以百万计地繁殖。如同古罗马人通过把殖民地的大街永远定为南北向，来使自己与帝国中心建立联系，俄索人也通过这些照片来检查他们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我在工厂上班时，我们会在午休时间走进工厂的院子；有些人会坐下来打开包着的三明治，另一些人会抽烟或玩排球。那里有一个小花圃，用标准的木栅栏围起来。这是一排二十英寸高的板条，彼此间隔两英寸，由一条涂成绿色的横木板条连接起来。它落满尘埃和煤烟，就像那个四方形花圃里皱缩、枯萎的花一样。无论你去到这个帝国哪个地方，你都会看到这种栅栏。它是预制构件的，但即使是用人手做的，也总是按照指定好的设计。有一次我去中亚，去撒马尔罕；我正准备好要欣赏那些绿松石穹顶，欣赏穆斯林学校和宣礼塔不可思议的装饰。它们都在那里。接着，我看不见那道栅栏，连同它那白痴式的节奏，我心一沉，东方就此消失。那道窄栅栏的缩小比例的、梳子似的重复性，立即消灭了那工厂院子与成吉思汗古代活动中心之间的空间——以及时问。

再也没有比这些木板更远离大自然的了，尽管它们被白痴似的涂上了暗示大自然的绿色。这些木板，政府部门的铁栏杆，每一座城市每一条街道上每一群经过的民众身上所穿的那不可避免的军服式卡其色，每一份早报里永恒的铸钢车间照片和电台里持续不断的柴可夫斯基——这些东西会把你驱向疯狂，除非你学会把自己关掉。苏联电视上没有商业广告；在节目间隙中会有些列宁照片，或关于诸如“春天”、“秋天”之类的所谓摄影练习曲。再加上滔滔不绝的“轻”音乐，它永远没有作曲家，而是扬声器自己生产的。

那时，我还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理性和进步时代的成果，大批量生产时代的结果；我把它归因于国家，以及部分地归因于这个会追求任何不需要想象力的东西的民族本身。不过，我想我不算完全错。在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国家，难道不是更容易行使和散布启蒙与文化吗？在理论上，一个统治者比一个代表更有机会接近完美（不管怎样，他是这样宣称的）。这是卢梭说过的。很可惜，它在俄罗斯行不通。这个国家，拥有无穷词尾变化的语言，能够表达人类心灵最细微的差别，还拥有难以置信的伦理敏感度（其历史的好结果，那历史在别的的情况下都是悲剧性的），因而也具备造就一个文化上、精神上的乐园，造就一个真正的文明载体的所有必要条件。然而它却变成一座单调的地狱，连同其破烂的物质主义教条和可怜的消费主义盲动。

然而，我这一代多少能够幸免。我们从战后的瓦砾下冒出来，当时国家正忙于修补自己的皮肤，顾不上好好看管我们。我们进学校，而不管学校教给我们的是些什么崇高的垃圾，不幸和贫困都随处可见。你不能用一页《真理报》遮盖废墟。空洞的窗子向我们张开大口，如同骷髅的眼窝，而我们虽然很小，却能感知到悲剧。确实，我们无法把自己与废墟联系起来，但这不见得是必要的：废墟散发的味道足以中止欢笑。然后我们会颇无脑地恢复欢笑——可那毕竟是一种恢复。在战后那些年份，我们感知到空气中有一种奇怪的紧张；某种无形的东西，几乎像鬼魂。而我们年轻，我们是小孩。物品数量非常有限，但由于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所以我们不在乎。

自行车很残旧，都是战前制造的，拥有一个足球已被认为是中产阶级了。我们所穿的外衣和内裤是母亲用父亲的制服和补过的内裤改做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退下吧。所以，我们并没有培养拥有物件的趣味。我们后来可以拥有的东西都是劣质又难看的。不知怎的，我们喜欢关于事物的看法多于事物本身，尽管当我们望着镜子时，我们并不太喜欢我们所见的形象。

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供我们把女孩诱进来，我们的女孩也没有房间。我们的风流韵事几乎都是散步和谈话的韵事；如果按英里收费，那一定是天文数字。旧仓库、工业区的河堤、潮湿的公园里僵硬的长凳和公共建筑物寒冷的入口——这些都是我们最初的精神极乐的标准背景。我们从未享受过所谓的“物质刺激”。意识形态上的刺激，即使对幼儿园孩子来说也是笑料。如果有人出卖自己，那也不是为了物品或舒适；没这类东西。他出卖是因为内在匮乏，而他自己知道这点。没有供应，纯粹只有需求。

如果我们将作伦理选择，这些选择与其说是基于直接的现实，不如说是基于源自虚构作品的道德标准。我们是热忱的读者，我们陷入对我们所读东西的依赖。书籍以其绝对权力控制我们，也许是因为它们在形式上给人一种已成定局的感觉。狄更斯要比斯大林或贝利亚真实多了。而小说对我们的行为模式和谈话模式的影响，比什么都巨大，我们百分之九十的谈话都是关于小说的。这往往变成一种恶性循环，但我们不想打破它。

在伦理学上，这一代人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嗜书的世代之一，这真要感谢上帝。个人关系可能会因喜欢海明威胜过福克纳而闹翻；那个万神殿的等级制，是我们真正的中央委员会。它开始时是普通的知识累积，但很快就变成了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为此一切都可以牺牲。书籍成为第一和唯一的现实，而现实本身则被认为要么是荒谬的要么是讨厌的。跟别人相比，表面上我们的生活都是不及格或作弊的。但是想想吧，那种漠视文学中宣扬的标准的存在是低等的，因而也是不值得去费心的。我们这样想，而我想我们是对的。

我们直觉的偏好，是读书而不是行动。难怪我们的实际生活多多少少是一塌糊涂的。即使我们之中那些能够穿过“高等教育”——连同其不可避免地要向现行制度说空头话和卑躬屈膝——那层层密林而取得成功的人，最终也逃不过文学施加的良心不安，再也维持不下去。结果我们都打些零工，做下人或编辑——或某种无脑的活儿，例如刻墓碑铭文、画蓝图、翻译科技文章、做会计、书籍装订、X光显影。有时我们会突然出现在彼此寓所的门前，一只手拿着一瓶酒，另一只手拿着糖果或花或小吃，彻夜地谈话、闲扯、大骂楼上官员的白痴行为、猜想我们之中谁会先死。但现在我必须搁下代名词“我们”。

没有人比这些人更懂得文学和历史，没有人可用俄语写出比他们更好的作品，没有人比他们更深刻地鄙视我们的时代。对这些人来说，文明不仅仅意味着每日的面包和每夜的拥抱。与看上去的相反，这不是另一个迷茫的一代。这是唯一一代找到自己的俄罗斯人，对他们来说，乔托和曼德尔施塔姆比他们自身的命运更迫切。他们不修边幅，但仍能保持优雅，受过他们最接近的大师无声之手的指点，他们像兔子一样奔跑，逃离无所不在的国家猎犬，以及更加无所不在的狐狸；他们衰弱，变老，但依然保持对那叫作“文明”的不存在（或只存在于他们秃顶的头脑里）的事物的热爱。绝望地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他们觉得至少那个世界跟他们一样；现在他们知道那个世界跟别人一样，只不过打扮得更好。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闭上眼睛，几乎可以看见他们站在他们那些破损的厨房里，手里拿着杯子，扮出反讽的怪相。“好了，好了……”他们咧嘴而笑，“自由、平等、博爱……为什么没人加上文化？”

记忆，我想，是一个替代物，替代我们在愉快的进化过程中永远失去的那条尾巴。它指引我们的运动，包括迁徙。除此之外，在回想过程中尚有某种东西明显是返祖性的，原因之一是该过程从来不是线性的。还有，你记得愈多，也许你就愈接近死亡。果真如此，则你的记忆结结巴巴并不是坏事。然而，更常见的原因是，它盘绕，退缩，朝着四面摆开，如同尾巴那样；你的叙述也应是如此，哪怕冒着无关宏旨或沉闷的危险。毕竟，沉闷乃是存在的最普遍特征，而你会搞不懂，为什么它在如此努力追求现实主义的19世纪散文中，竟会有如此可怜的表现。

但是，即使一个作家设备齐全，在纸上模仿心灵最微妙的波动，想要全面复制那条尾巴的螺旋式辉煌的努力也依然白费，因为进化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多年之后回顾往事，会把往事简化至完全抹掉的程度。没有什么可使它们恢复过来，哪怕是以绕来绕去的字母构成的手写文字。如果那条尾巴碰巧落在俄罗斯某地背后，这种努力就更加白费了。

但如果印刷文字只是遗忘的一个标志，那也还好。悲哀的事实是，文字同样不足以描述现实。至少我的印象是，任何来自俄罗斯王国的经验，哪怕是以照相式的精准度描绘，一旦换成英语，就会一下子弹开，不能在其表面上留下任何可见的痕迹。当然，一个文明的记忆，不能变成，或许也不应变成另一个文明的记忆。但是，当语言不足以复制另一种文化的负面现实时，将造成最糟糕的同义反复。

历史无疑注定要重复自身：毕竟，历史如同人，没有很多选择。但是，当你在与弥漫于诸如俄罗斯这样一个陌生王国的特殊语义学打交道时，至少有一点你是可以告慰自己的，也即意识到自己正变成什么东西的受害者。你会被自己的概念性和分析性习惯累垮——即是说，用语言来解剖经验，从而使你的心灵无法得益于你的直觉。因为，一个清晰的概念固然美，但它永远意味着意义的简化，把松散的两端切掉。而松散的两端在现象世界却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互相交织。

这篇文章本身证明我远远不是在指责英语的不足；我也不是在哀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心灵处于休眠状态。我只是遗憾一个事实，也即一个碰巧被俄罗斯人占有的关于“恶”的高级概念，竟然因为有一种错综复杂的句法而被拒绝进入意识。你不禁纳闷，我们之中有多少人可以回想起一个直言不讳的“恶”跨过门槛说：“嗨，我是恶。你好吗？”不过，如果这一切都有一种挽歌气息，它更多是因为这篇文章的体裁而不是其内容，其内容应该是狂怒才对。当然，两者都不能产生过去的意义；挽歌至少不会创造新

现实。不管什么人发明多么精巧的结构来捕捉自己的尾巴，他最终只会得到满网的鱼但没有水。这使他的船慢下来并开始打转。而这足以引起晕眩或使他诉诸挽歌的音调。或把鱼扔回水里。

* * *

很久以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最不公正的国家。那国家被一群生物统治，这群生物用所有的人类标准来看，应被视为退化的生物。但没人作如是想。

还有一个城市。地球表面上最美丽的城市。有一条巨大的灰河，悬在其遥远的底部之上，如同巨大的灰天悬挂在那条灰河之上。那条灰河沿岸耸立着宏伟的宫殿，其正面的装饰是如此美丽，如果那个小男孩站在右岸，那左岸看上去就像一个叫作文明的巨大软体动物的压印。那文明已不存在了。

清晨，当天空还闪耀着群星时，那小男孩起床，在喝了一杯茶，吃了一个蛋之后，便沿着那白雪覆盖的花岗岩河岸奔向学校，一路上陪伴他的，是收音机宣布的炼钢新纪录；紧跟他的，是军队合唱团向领袖高唱的赞歌，那领袖的画像就挂在小男孩还温暖着的睡床边的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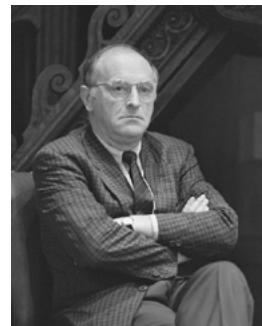
那条宽阔的河呈白色，冻结着，如同一个大陆的舌头伸入寂静，那座大桥向暗色的蓝天弓起，如同一个钢铁上颚。如果小男孩有额外的两分钟，他会在冰上滑行，再走二三十步，来到河面中央。这时候他只想着鱼在厚冰下干什么。接着，他会停下来，转身一百八十度，跑回去，一口气奔向学校入口。他会冲入大堂，把帽子和外衣扔到一个挂钩上，然后飞也似的跑上楼梯，进入教室。

那是一间大教室，有三排桌子，老师座椅背后的墙上挂着领袖的画像，一张有两个半球的地图，只有一个半球是合法的。小男孩坐下来，打开公文包，把钢笔和笔记本摆在桌面上，抬起头，准备听胡说八道。

1979年



本文摘自《小于一》，注释从略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黄灿然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1月



约瑟夫·布罗茨基

生于1940年的列宁格勒，布罗茨基的前生在母国苏联度过，他的大部分诗歌成就也是用俄语完成的；1972年，永别故土、定居美国的布罗茨基从零开始学习英语，进而一举成为英语世界卓越的散文大师之一。1986年，布罗茨基荣获美国国家书评奖，198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91年获选“美国桂冠诗人”。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淹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为远峰的自画像

专栏

我头脑中的幽灵

陆茵茵 | 作家之爱

和幻影搏斗时，别忘了放慢速度，
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呼吸。

01

两三年前，有一阵子我很喜欢看图像小说，集中看了一批。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波丽娜》《灯塔》《悬停的爱》《亲爱的陌生人》之类。当时，“图像小说”的概念被引入国内还不算太久，获过普利策奖的《鼠族》在2009年被翻译成中文时，用的还是“漫画小说”的说法。以及我超爱的《我在伊朗长大》，现在看起来也算是图像小说，但在2006年版的简介里，除了漫画之外，它还被称为“连环图”。

2017年，有一天在北京库布里克书店闲逛，遇见一个以图像小说为主题的小展览。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读到对这个概念的清晰界定：“图像小说源于漫画，但具有更多文学性，强调与北美主流超级英雄漫画之间的区别。最早在1964年由理查德·凯尔在一本漫迷杂志中提出，第一部以图像小说的名义出版的作品是威尔·艾斯纳的《与上帝有约》。”

查了查，威尔·艾斯纳是美国动漫之父，极具影响力的动漫界奖项“艾斯纳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996年，一个美籍日裔、从小受同学排挤的怪咖漫画家获艾斯纳奖提名。他叫Adrian Tomine，二十二岁，日本第四代移民，祖父母和父母都进过二战期间美国关押日裔居民的集中营。他兴冲冲飞到圣地亚哥，觉得在被嘲笑、被孤立的漫长求学时代以后，终于找到了同样爱看漫画的“自己人”。他和所有被提名者一起坐在台下，宣读名单的是弗兰克·米勒，十来岁时，Adrian很迷恋他画的夜魔侠。但慢慢的，Adrian长成了一个“另类漫画家”，和主流漫作者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他想象，如果一会儿胜出了，他要怎么和弗兰克打招呼。

挣扎了一下，他决定诚实地对弗兰克讲，“我小时候很崇拜你的作品。”

弗兰克则会幽默地回答，“什么时候？去年？”

他们相谈甚欢，成为朋友，约着一起出去玩。

然而事实是这样的——弗兰克把其他名字都念了一遍，轮到他时，不知道Tomine该怎么读。努力了两秒，弗兰克放弃了，暴躁地喊，“我根本就不想发这个音！”将他轮空，直接揭晓获奖者是谁。观众发出一阵爆笑，然后是热烈掌声，Adrian Tomine被遗忘在尴尬中。

Tomine是日本姓氏，意思是“远峰”。一开始我不知道，在看《闯入者》时，有点奇怪为什么要把作者名翻译成阿德里安·远峰。《闯入者》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我在那段时间看到的所有图像小说中，最喜欢的一部。原著出版于2015年，有一个更血腥的书名：《杀戮与死亡》。包含六个小故事，每一个都不长，十几二十页。但后劲和余韵都很足，那种感觉，就像光着脚在撒了玻璃碴子的沙滩上散步，又美又痛。

我来讲讲，一个典型的阿德里安·远峰的故事是怎样的。《杀戮与死亡》这一篇，画

了一个女高中生。相貌平凡，内向、自闭，有点口吃。她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对外界没有兴趣，偶尔心血来潮学了尤克里里、高架秋千，都半途而废了。她母亲得了某种重病，随着故事发展，我们看到她在画面里越来越憔悴、虚弱，头发变短，最后消失了，成为墙壁上的一张照片。她父亲是个半秃的中年男人，眉毛下垂，脸上始终带着忧虑的表情。就是这样一个女孩，有一天突然宣布，她想成为一名脱口秀演员。不是大声宣布，只是结结巴巴地说，也许可以上个培训班。母亲这时还没住院，坐在沙发上的毯子里，鼓励她，给她报了一个叫做“初级搞笑”的课程。父亲担心得睡不着觉，他了解女儿，怕丢人现眼会伤害她。课程结业时，母亲扎着头巾、拄着拐杖和父亲一起去听，让他们惊讶的是，女儿表现得非常优秀，赢得满堂彩。父亲难得地笑了，觉得这一次女儿似乎展露出他从未见过的才华。但快乐只维持了几分钟，父亲发现，博取众人笑声的这些段子不是女儿原创的，她拼拼凑凑，把别人讲过的内容拿回来锅了一下。过了一段时间，餐桌旁只剩下父女二人。女儿说，妈妈住院时告诉她，只要用心去做，任何事情都能做到，永远不要放弃。她准备去一个咖啡馆做即兴喜剧表演，类似于开放麦，演员一个接一个上，事先不准备，一切都靠现挂。父亲有点战战兢兢。女儿去了，他偷偷跟在后面。演出失败。她在一名很炸的黑人演员之后出场，抖了几个没响的包袱，踩到了敏感的外貌歧视、种族主义话题雷区，越说越冷，几乎被观众嘘下台。父亲抢先回家，懊恼地对母亲的照片说，都是你的错，然后用额头撞墙。女儿回来时，他顶着撞出的一个大包躺在地板上，说自己睡着了，问女儿怎么样。相当成功，女儿说，抬手帮他把散落在耳边的发丝覆盖回光秃秃的头顶。

幽默，心酸，苦涩，温情，我想这是我喜欢阿德里安·远峰的原因。他用一种很接近文学创作的手法把图文结合的叙事方式扩容，让它变得细腻、多层，可以传达更复杂、幽微、没有套路感，有时候指向性不那么明确的情感。而这一切又装载在短篇漫画的容器里，因此总是显得很简洁。

02

我看到过一条英国作家扎迪·史密斯对阿德里安·远峰的评价。大意是，他在二十个画格中所表达的东西比有的小说家穷尽一生还多。这有些夸张，但是我能理解一个文字创作者对他作品的喜爱。我曾经跟画画的朋友提起这本书，他就没那么喜欢，我记得原话是，画本身好像一般。阿德里安·远峰的画确实比较规整、含蓄，不是第一眼就特别抓人的那种，有兴趣的可以找找他给《纽约客》画的封面。不过对图像小说来说，倒不一定是缺点，因为极其强烈、完美的画面很难添加文字，而图文是一个整体，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和结构故事的能力，都为画面增色许多。



远峰绘制的一期《纽约客》

我反而在想，有时他的画法稍显晦涩，可能会把一些读者挡在门外。比如全书第一篇，标题有点拗口：《新艺术形式“园雕”的短暂历史》。主人公也是个中年男人，园丁，以十美元的时薪给人打理草坪。本来过得挺悠闲，有天泡澡时读到一篇关于雕塑家野口勇的文章，大受启发，想把他每天打交道的植物也做成雕塑。他搞来一些黏土，包裹在和人差不多高的小树苗外面，挖几个洞，让叶子探出来，修剪成圆滚滚的造型。看起来像那棵树骨折了，打了个巨型石膏。他把它称为一件活的、有呼吸的装置艺术，说这是他人生的追求，将园艺（Horticulture）和雕塑（Sculpture）两个单词拼起来，生造了一个新词：园雕（Hortisculpture）。我们在这时已经嗅到一丝危险的气息了。果然，根本没人买他的账，大家不明白好端端的树为什么要塞进黏土里，没法自由生长，花五百美金买回来，还要定期请他上门维护。有邻居投诉他摆院子里的丑东西，说有碍观瞻，破坏了社区环境。但他执迷不悟，在园雕的路上越走越远，原本的园丁工作做得少了，影响到了家庭收入。长期处在和舆论对抗的心态下，人也变得脆弱、易怒，连不喜欢园雕的小孩子也要怼，只能安慰自己，这个时代文化风气愚昧浮躁，“大众敌视艺术，就像敌视他们不能理解的东西一样”。从最初被艺术星火点燃，自己头上也冒出了创作的小火花，到现在困在园雕的死胡同里，已经六年了。妻子经历了怀孕、生产，女儿长成了半大的小姑娘。他做了一个决定，半夜留下一张小纸条，出了门。

他没有自杀，而是杀死了园雕。叫上女儿一起，抡起榔头，把歪七扭八的园雕砸碎了。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喜欢里面稍稍有点萌芽的邪典意味，和对更深层心理的探讨。但我也看到一个很逗的评论，说作者在嘲笑有艺术追求的普通人。肯定不是这样。相反，我能感觉到阿德里安·远峰在角色身上投射了一部分自己，很有可能是在自嘲。一个心怀梦想，自卑、受挫，常常觉得自己很可笑的形象。有创作经验的人大概更能感同身受，创作听起来是一个让人雀跃的词，近年来大家都喜欢说，要顺心流。但找到心流的过程十分玄妙，并不那么可控，一旦把创作作为职业，就无法回避里面艰难的、僵化的、坠入黑暗的一面。在黑暗中，孤身一人的创作者暗夜行舟，能

依赖的只有自己，海面没有刻度，有些时候真的无法判断，在不在一个正确、健康的位置上。那位园丁在砸碎园雕前，展开了一段和自我之间的对话，很有意思。他望着月光下，历经六年积累起来的作品，对自己说：“追求艺术的历程本身就是奖赏……名与利不过是过眼云烟。”“最糟糕的艺术家也强过最好的批评家。搞艺术就是要无视那些怀疑的人，并比他们更长久。”“没有什么能阻碍真正的艺术家……蔑视、冷漠、一败涂地或郁郁不得志带来的巨大威胁，都不能阻止他！”“XX，这些玩意儿真难看。”

如果哪个创作者说，内心从没闪过哪怕一丝这样的念头，我不信（此处带微笑符号）。我欣赏园丁最终把作品砸掉了，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光明的结尾。不是说他退回普通人的身份，不搞创作了，而是破除和拆毁本身就是创作的重要形式。勇猛地，选择和真实站在一起。无论是狭义的创作，还是更广义的，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创建，把不适用的、失去激情的、困住自己的东西亲手毁掉，那一个瞬间，就是创造之神降临的时刻。

上两个星期，我骑车路过一栋大楼，楼前种着几棵树。冬天防寒，他们用绿色的保温布把树干包起来，只露个头，让我带着一种偶遇熟人的心情，想起了园雕。

03

目前，阿德里安·远峰的图像小说只有《闯入者》这一本被译成了中文。出于好奇，我想看看他早期的作品是什么样的，于是买了2002年出版的Summer Blonde，暂且直译为“夏日金发女郎”。书中四个短篇，和《闯入者》比起来，绘画风格更偏美式漫画。那一年，阿德里安·远峰二十八岁，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对生活感到困惑，还没有学会如何用幽默去化解。所以这几个短篇的色调相对灰暗一点，内在冲突激烈，浮现到表面上成了一种到处都有水泡咕噜噜钻出来，令人不安的感觉。每篇都值得看一看。我想讲的是第三篇《夏威夷逍遥游》，它的主角挺特别，是一个华裔女孩。



Summer Blonde 封面

她姓陈，叫希拉里，父母年轻时从台湾移民美国，有个妹妹。母亲说话带着明显的中文口音，把ask（询问）的尾音吞掉，读成ass（屁股）。虽然也上了大学，但她没像妹妹那样走上医学生的精英道路，成了个废柴。住合租公寓，做没有技术含量的电话接线员，还因为顾客投诉被开除了。妹妹给她打电话时说：“妈妈很担心你，你应该走出来，加入个什么俱乐部，上些课。”

“是啊，这样我就能识别别的失败者了。”

她不懂得怎么和人交往。参加派对时一个人躲在阳台抽烟，想着，为什么那些人一走进房间就能大笑、跳舞，这是真实的，还是他们强迫自己表现得很开心？她的室友是个男生，刚搬进来就和她上了床。三天之后，室友说，他们最好结束这样的关系。他交了新女友，希拉里把不解和挫败转变为对她的攻击性。没想到他们进展得很顺利，搬出去同居了。剩下希拉里一个。她房间的窗外有一座公用电话亭，拨打电话亭的号码，随机地对路人发泄情绪成了她的新爱好。

她骂一位戴棒球帽的老人帽子太蠢。

骗穿黑T恤的男人，灌木丛里放着一袋子钱。

叫一个女人死肥猪，说自己正盯着她，随时准备扣动扳机。

恶意像子弹一样发射出去，然而，并没有让她更快乐。直到有一次，接电话的男人识破了她，问她是不是就站在哪扇窗户后面。她吓坏了。他没有大惊小怪，称赞她声音好听，说自己上学时也常玩恶作剧。他们约定第二天再打电话。时间到了，她望见男人等在电话亭边。她打过去，想和他倾诉些什么，但男人说，面对面聊天不是更好吗？

犹犹豫豫，希拉里还是现身了，他们去咖啡馆，坐在她孤身一人时的老位置。天聊得不错，无论希拉里说的话多消极，男人都能接住，劝她保持正面思维。他们吃了饭，去他的住处，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男人说自己没有女朋友，同事带他去酒吧，他想，我要找的女孩不会来这种地方。

“那你觉得她会去什么地方？”希拉里问。

“我原来想，她会在家里看看书，但现在，很明显……她在给陌生人打恶作剧电话，水平还挺差的。”

希拉里问他，能不能陪她出席外婆的葬礼，她不想独自面对家人。他同意了，说星期天中午来找她。希拉里等待着，穿上黑裙子，梳头，涂口红，打开收音机。主持人的声音逐格攀升，即将宣布，哪位幸运听众将获得唯一一个夏威夷逍遥游的免费名额。希拉里也参加了抽奖，和主持人一夜情，他说会把她加入候选名单里。她听着，中奖者不是她，她猜到了。

男人已经迟到了半小时，希拉里继续等。她想起十三岁时，全家一起去海边旅游。她没涂防晒霜，晒伤了，母亲面色铁青地教训她，说要把她装在箱子里寄回家。大家都出去玩了，她被遗留在旅馆，浑身起泡脱皮，又热又痒。她打开空调，拉出最大的箱子，真的把自己装了进去。

故事结束了。

所以结果到底怎样？——我好像听到有人问。问一个开放式结尾的故事，落点究竟在A还是B，其实没有意义。作者不想提供明确、单一的定论，给叙述打一个死结，那就让我们体会这种含混和多义吧。他可能没来，让希拉里的愿望再次落空。也可能来了，笑着说，你看，我说过的吧，要保持正面思维。

04

开放式结尾在《夏日金发女郎》里出现不止一次。有趣的是，2006年，也就是书出版四年后，阿德里安·远峰在无意间遭到一位读者的猛烈抨击，原因之一，就是读者认为开放式结尾是一种怯懦的把戏。

那天，他和女友在位于布鲁克林的一家日本餐馆吃饭。桌子和桌子距离很近，邻座也坐着一对情侣。男生忽然说，他终于把女生推荐的那本书看完了。报出书名，竟是《夏日金发女郎》。阿德里安·远峰以为自己邂逅了一位粉丝，内心小小窃喜。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是他绝对无法预料到的。

“你喜欢吗？”女生问。

“事实上……不喜欢，诚实地讲，很讨厌。”男生回答。

“什么？不是吧，这书很棒啊！”

“真的吗？哇哦……我觉得超级空洞，就是些过时的，X世代的假深沉……”

“好吧，我不知道。”女生退缩了，“我觉得有些故事还挺……动人的。”

男生叹一口气，“唉，那就是他想诱骗你产生的感觉！什么安静的绝望、被迫的多义性，全是些作家工作坊胡说八道的破玩意儿！”

女生被吓住了，渐渐抵挡不住攻势，开始松口。

“我好像也有点看出来了……”

“对啊，就给我来点实打实的情节，不行吗？别搞什么突然结束那一套，还假装是啥了不起的东西，其实就是懦弱啊！”

“但是，也许这种期待不是很公平呢。我还挺喜欢其中一些故事的，比较……我不知道……有诗意？”

“哦老天……别用那个词！这就像你用一把刀，把我对你仅存的尊重给扎没了！”

谈话进行到这里，已经是赤裸裸的PUA了。阿德里安·远峰被笼罩在他对这个女生和对自己双重的语言暴力里，气到快瘫痪，仿佛经历了一场幻觉。好几种感受夹杂在一起袭击了他，让他震惊、愤怒、羞愧。

“我简直羞愧到死！因为他不是个白痴，你知道吗？”他告诉女友。

“可他是个混蛋！”女友说。

“好吧，但他也是个有学问的、表达清晰的混蛋……”



The Loneliness of the Long-Distance Cartoonist 封面

以上整个过程，被画成漫画，收录进他最新出版的一本图像小说《The Loneliness of the Long-Distance Cartoonist》。书的装帧十分特别，做成一本笔记本的样子，黑色硬卡纸封面和封底，右侧一根松紧带，可以把纸页箍住。内页是淡蓝色小格子，漫画就用简洁的黑色线条直接画在小格子上。书名很长，据说是对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作家亚伦·西利托一篇小说的戏仿——《长跑者的孤独》(The Loneliness of the Long-Distance Runner)。而阿德里安·远峰画的，是自从成为漫画家以后，他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遭遇的孤寂时刻。

从1995到2018，整整二十三年。加上童年时梦想到做漫画家，被同学视为怪胎作为前传，三十六年，占据他全部人生的80%。如果说之前我在喜恶层面评判他的作品，那么这部，已经超越了喜恶，进入一种生命经验的共振。他从记忆库里选取了二十六个片段，对应二十六段窘迫、尴尬、难以消化的回忆，时光的结石，一一刻画了下来。从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他是谁，也得以见证一位创作者在长达数十年的漫漫路途中如何起伏跌宕，面对不同阶段涌现的问题。有的源于外界，有的源于自我，武断点说，过不去的大都源于自我。

05

耐人寻味的一点，是这些恼人事件，记忆幕上一只只虫蛀的小洞，并没有随着职业之路的晋升而减少分毫。我们通常以为，不成功才会和困窘、淤堵、失意这些负面词汇联系在一起，成功则一片清明。但从阿德里安·远峰的经历来看，不是这样。1996年错失艾斯纳奖带来的冲击，和2016年在安古兰漫画节上失利差不多，虽然过去了二十年。也很难说，1997年孤单单坐在签售桌后面，和2009年被摄像机指

挥着在街上散步，哪个更让人难受。长时间从事同一项工作，确实会使人增长经验与器量，有能力应对更多场合，但头脑中那个絮絮叨叨、总是站在阴影里的小幽灵，从来没有消失过。

在“纽约，2008”这一章节中，阿德里安·远峰正面描绘过这个小幽灵。他接受一档广播节目的采访，主持人是特里·格罗斯，很有名，他从小听她的声音长大。出版商费了一番功夫才争取到这次机会，他相当重视——几乎重视过度了。知道自己不擅长侃侃而谈，从几天前就着手准备，仔细研究往期节目。他摸索出一个规律，特里很喜欢在采访进行到一半时冷不防地结束对话，对嘉宾蹦出一句“谢谢你的到来”。嘉宾往往没有反应过来，突然被击中，一时间木讷、错愕，隔好几秒钟才傻乎乎地做出回答。为了让自己听起来酷一点，他对着电脑一遍遍练习，“谢谢，特里。”“非常感谢你，特里。”“谢谢你哦，特里。”

采访当天，他抵达卡内基音乐厅，感觉像走在梦中。奇怪的是，谈话不是面对面的，他被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还没来得及上个厕所、做做准备，就套上耳机，被告知访问开始了。特里的声音通过耳机传出来，“我是特里·格罗斯，不知道你熟不熟悉《新鲜空气》这档节目——”

他听见自己对话筒说，“我想我听说过，呵呵。”

幽灵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他体内抽离出来的，逐渐升空，飘到天花板附近。长得和他一样，一个分身，脸上带着嘲讽的笑容。“你在和特里·格罗斯说话耶，”幽灵说，“身在卡内基音乐厅这么高大上的地方，和这个孩提时代就在收音机里听过的声音聊天。”他不理幽灵，保持理智，嘴上还说着冠冕堂皇的话，“很荣幸来到这里。”

幽灵发动了它的恫吓。

“你心里很清楚，对于推书来说，《新鲜空气》就像圣杯一样重要。出版商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还有金钱，这是你迄今为止得到过的最大曝光了。数以百万计的人都在收听，你的家人，你妻子的家人，前女友的家人，还有其他漫画家和名人们……记得昨天你还在嘲笑别人吗，此刻换人家嘲笑你啦！”

幽灵越说越来劲，吓唬他，访谈录音会被传到网上，储存在节目库里，“如果你将来有孩子，他们也会听到，会发现你曾经是个多尴尬和紧张的失败者！”

如此一来，阿德里安·远峰更紧张了，一边努力集中精神对付特里的提问。她的问题都不简单，做过功课，甚至问到了他身为心理学家的母亲。而幽灵不断让他分心，把注意力引到窗外，“你看过窗户外面吗？好惊人的景观哦，竟然是个牙科诊所。他们好像正在进行一场特别可怕的牙齿手术哎！”

他抬头一看，果不其然，一位病人任牙医在他口中宰割，鲜红的血点子喷射出来，溅得空气中和衣服上都是。阿德里安·远峰惊呆了，五官拧成一团。

不早不迟，特里抛出了那句著名的“感谢你的到来”。尽管排练过无数遍，他还是和其他嘉宾一样，于不设防的状态下被击中，跳空几秒，才磕磕巴巴地和特里道别。

节目一结束，小幽灵就幸灾乐祸地溜走了。

我对小幽灵很感兴趣，觉得它是解读阿德里安·远峰作品的一个入口。有时它躲在主人公的脑袋里，以带气泡的对话框形式出现，发表一些令人气馁的言论。有时化身为作品中的某个角色，激愤、颓丧、忿，自我评价偏低，但归根结底是无害的。他创造的某些人物，尤其是女性，似乎有一种把自己放置在危险环境中的倾向，并对危险无所察觉。但她们会明显地对小幽灵化身的角色充满防备和敌意，以为它是有攻击性的。其实，它擅长的只是自我攻击。

06

为了佐证这个想法，我做了一件阿德里安·远峰害怕看到的事——跑到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网站上，把当时的采访音频翻了出来。想增加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看一看，一切真如他记录的那样糟糕，还是反应过度了。采访是2008年1月31日做的，距今十四年了，他和特里的声音听起来仍然十分当下。特里很有洞察力，在不到二十分钟的访问中，跳过浮泛的皮毛，触碰到了核心。比如，为什么他恐惧被人评价？有一个洞悉人心的母亲，如何影响他的创作？因反套路而生的独立漫画行业，是否也形成了自己的套路？

观察阿德里安·远峰怎么回答，是最好玩的部分。首先，他答得肯定不算糟糕，相反还挺不错的。他的语气有一点迟疑，句子开头和衔接处会有不确定的嗯嗯啊啊，但能听出他在思考，答案很诚恳。他谈起那几年创作心态的变化，一步步，从封闭走向开放，敢于让角色说出他真正认同的话，不再把自己隐藏起来，假扮一个睿智、全能的上帝。

怪不得我喜欢他的作品，他很诚实，这是非常打动我的一点。诚实不一定是写实，照搬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情，而更接近我手写我心，把真实的感受注入其中，和读者交流，并被这种感受引领着，不预期，看看能去往哪里。

过于诚实会产生暴露感，被人注视、窥探、讨论，引发不适。一场深邃的访谈也有这个作用。我注意到，每当特里问出命中靶心的问题，阿德里安·远峰就会以一些断断续续的语气词来防御。但在短暂的防御之后，还是会如实回答。对于不习惯袒露自己的人，这不太容易。也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采访之后他的感觉那么差——由于自我袒露导致的脆弱感，和“把事情搞砸了”造成的晕眩，或许有相通之处。

节目最后，特里确实是很突兀地说出那句致谢之辞的。前半句还在聊上一个话题，下半句紧接着感谢他的到来。而阿德里安·远峰的应答平滑自然，堪称得体，让我很想隔着十四年的时间长河，对他说一句，您多虑了。

多虑的人会穿越相似的风景，聚集到同一片丛林。我上一本小说集《台风天》出版后，经常看到评论里有人提及韩国小说家金爱烂。我把她的书找来看了，有一篇一直记得，叫《她有睡不着的理由》。讲一个多虑的女孩，临睡前反复回想白天的一幕幕，更睡不着了。而阿德里安·远峰的情况是，他在2018年被诊断具有焦虑症状，这是全书最后一篇，也是促使他画下这本“社死故事集”的发端。

焦虑发作那天，他以为自己心脏病犯了，去医院急诊。候诊时连遗书都写好了。但当护士念错他的名字，他竟然还匀出力气，很龟毛地纠正她的发音。一等几小时，

他坐立不安。护士说，“我见过很多人，进来时和你一样抱怨，后来直接从分诊台被抬进手术室，因为病情太严重了。我们有一整套优先级系统，你等了这么久，反而是一个好的信号。”

这大大宽慰了阿德里安·远峰。送他做进一步检查前，护士又说，“记住：保持冷静，呼吸。”

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我把它抄了下来，贴在写字桌右侧。过了几个月，记不清出处是哪里。为写这篇文章重读这本书，才想起来，是这位护士无意中的赠言。世界上和心灵间总有恐怖万象，有的是魔造的，有的是人造的，有的是头脑中的小幽灵造的。和幻影搏斗时，别忘了放慢速度，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呼吸。

2022.3



陆茵茵

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新闻学系，曾在媒体及非营利艺术机构任职。作品获第二十六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2018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台风天》。

作家之爱

这不是一个书评栏目，作者只是谈谈他们是如何“爱”上另一位作家，以及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是如何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个栏目和作家的私人阅读体验有关。



3月6日，德国柏林，大批乌克兰难民抵达德国避难，受到柏林志愿者的接济和救助。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专栏

谁能幸存于这个冬天？

王竞 | 在汉堡

谁漂到河对岸才被发现，
谁会一头栽进雪地，谁将沉到冰底

01

客厅里的座机电话响了。我听见我先生乌韦去接了，就继续在厨房里炒鸡蛋。我正在做西红柿意面。平日里，我往西红柿酱里放的是洋葱和牛肉沫。可上午去超市，从冷柜里拿起我每次买的有机牛肉馅，又放下了。边上的普通牛肉馅，已经涨到有肌肉的价格，而有机肉贵到让我手软。媒体早就发出了警告，德国超市里的肉类和奶制品要大幅度涨价。俄乌战事触动了全球的能源和农产品供应，生肉产业耗电高，饲料也属于受冲击的原材料之一，生产方和供应链都扛不住了，只好把上涨的成本部分转嫁给终端消费者。

读新闻的时候道理都明白，可在现场看到价签的感受又是另一回事。所以，我们家的意大利面条就走上中国路线，改成西红柿炒鸡蛋了。虽然鸡蛋也涨了价，但还在可接受范围内。再说，我爸刚给我发来消息，他独居在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小镇，那里因为疫情扩散，全体居民已经被要求“静默”一周，所谓静默，就是禁止全镇的人出家门。我爸的鸡蛋已经告罄。我应该感恩我们在汉堡还能吃到鸡蛋。感恩是俄乌战事发生后常来造访我的意念。以前，我常暗笑那些把感恩挂在嘴边的人，奇怪的是，物品开始紧缺，价格开始疯涨，正常生活滑向不正常，我自己反倒变得也有感恩意识了。是不是一个人在失去宝贵东西时，感恩会变成自保意识的一部分？其实，除了乌克兰人正在流血，在失去他们的生命和家园，到目前为止，在欧洲的其他人还没有失去什么。可我们变得越来越焦虑。前两天，我在柏林的好友芳妮打来电话，说她这回真的感到战争跟她直接相关了。2015年叙利亚难民危机中，芳妮把自己的三套公寓出租给十几个难民，几个月里成天跟他们打交道都没让她紧张；可这次，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德国政府放弃二战后德国一贯执行的不为战争地区提供武器的原则，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芳妮就知道，德国和欧洲不再是战争的旁观者了。欧洲将和乌克兰共同面对一个拥有核武器和谁都摸不透的俄罗斯。和我的很多朋友一样，芳妮为乌克兰捐过款，去难民中心做过服务，电话里她说，她失眠了好几天，受不了那些密集的战争新闻和图片了。她决定在疯掉前，开车去哈尔茨放空，就是海涅写下《德国，一个冬天里的童话》的哈尔茨山，那里的四月还落雪。我说，从柏林开过去得将近五个小时吧，现在油价已经涨到战前的两倍了。再贵我也得逃离柏林几天，她说，总比精神崩溃要好。

我自己刚从罗马回到汉堡。去之前，我白天还算正常，该做什么做什么，可一到夜里，就经常梦见自己还在柏林火车站做志愿者，跟从乌克兰来的难民在一起。我只不过去柏林帮过两天忙，在梦里却总是走不出那个装满了苦难的火车站。看来，大家都有出去透口气的愿望，跟被战争信息围困起来的日常做一个割断。订罗马酒店的时

候我甚至暗想，这会不会是我今后多年做的最后一次无忧旅行？我没敢把我的胡思乱想告诉芳妮。

鸡蛋和洋葱炒好了，这回不是用菜籽油或葵花籽油炒的，这两种油将长期缺货，超市里哪怕有几瓶上架也会被瞬间抢光。我现在才知道，我们平日里做菜用的油也是大多从乌克兰和俄罗斯进口的。好在意大利菜可以用橄榄油烧，橄榄油目前尚且充足。我把鸡蛋洋葱倒进西红柿罐头酱里，放在锅里慢慢熬，在另一个电磁炉灶上烧水，准备下意面。在等的功夫里，我看了眼墙上的挂历，发现从2月24日到现在，俄乌战争已经进行八周了。

诡异的是，直到俄罗斯向乌克兰出兵前，乌克兰的老百姓也像我们这边的人，无人相信普京会动真。我们这边的人，有德国政府、左中右各政党，还有媒体和民众。大家在反战这个问题上态度高度一致，但在对战争的起因分析和终结方案上吵得沸沸扬扬。

回想起战火前德国公共空间里关于俄罗斯问题的争论，主流的声音坚决反对跟俄罗斯交好，反对德国在能源上依赖俄罗斯。尤其是从去年底进入内阁执政的绿党，他们甚至可以放弃环保高于一切的大原则，支持从美国购买污染环境且价格高昂的页岩气，目的是抵制德国进口相对环保和低价的俄罗斯天然气。其态度之决绝，不知怎么让我联想起小时候学过的一个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二月中旬我去剪头发，发廊的收音机正在播新闻，说乌克兰呼吁德国提供武器援助，可德国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只承诺给五千顶头盔。基辅市长对此发出嘲笑：我们要的是武器，你们却送来头盔，下次是不是发枕头啊？这还是战前的口角，现在想起来如同儿戏。我的理发师喜欢开玩笑，说我的中国头发可比马鬃，我说他的德国软毛可比空气。我问他，他觉得德国应该答应乌克兰的武器要求吗，他摇摇头，说，武器是坏东西，谁都不能给。然后，他突然压低声音，对着我的耳朵说：“德国人在二战中杀死过上千万的俄国人……我不懂我们的媒体为什么总是负面报道俄罗斯。”我们都戴着口罩，只能在镜子里交换一下眼神。我好几次发现，如果有人说出跟主流意见相左的声音，他们会下意识地降低音量。

写《朗读者》的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曾说，德国这几年盛行道德主义，直接后果是主流声音占位太宽，以至让不同的意见很难被听到。在一个民主社会，各种意见都应该有被表达、被倾听、被争论的机会。

如果留神去听，还是有少数声音在德国公共空间中表达对俄罗斯政治诉求的理解。有一个说法很形象，冷战结束后，中国把自己定位为世界工厂，俄罗斯把自己变成了世界加油站。这些发出另一种声音的人，被贴上“普京理解者”的标签，其中有政治家、经济学家、媒体人等等，他们从国际政治、个人观察和经济发展的角度，讲述德国及欧洲跟俄罗斯合作的重要性，批评西方对解体后渴望投入欧洲怀抱的俄罗斯的傲慢排斥态度。

开战前，所有这些论争的焦点，都集中在一道可视化的政治红线上，即德国跟俄罗斯合作修建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德国是个能源依赖国，自己无油无气，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有悠久的历史，据说在整个冷战期间从没中断过。今天，德国虽然在大力研发绿色新能源，但这仍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投资。福岛核泄漏后，默克尔下令停止了德国的核电发展，而邻居法国的核能技术虽不及德国，却把核电发展成能撑起法国能源供给的主力之一。同时，德国政府给本国的煤炭开采定出了严格的退出时间表。辞退了核能和煤炭后，在新能源尚不能挑大梁的青黄不接阶段，默克尔政府选择了扩大跟俄罗斯的能源合作，现在的政治用语改为“能源依赖”。

除了2011年投入使用的第一条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德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还走一条从乌克兰过境的通道。而北溪二号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直通德国，目的是取代途径乌克兰的管道。以2017年德国广播电台公布的数据为例，这一年，有9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从俄罗斯经由乌克兰往西流向欧洲。乌克兰收取的天然气管道中转费为30亿欧元，占国家总收入的15%。它对北溪二号项目的激烈反对可想而知。默克尔在任期上的最后几件大事之一，就是一边力挺二线建设，一边安抚乌克兰，承诺北溪二号开通后的十年内，仍保证乌克兰不蒙受经济损失。2021年12月，默克尔结束了16年的执政，德国社民党、自民党和绿党三党联合政府上台，被疫情和政治论争拖累已久的北溪二号也终于完工了。新总理朔尔茨迫于来自美国、东欧和德国其他政党的内外压力，决定暂不开通北溪二号。

俄乌战事将让这条躺在波罗的海之下的管道一时看不见拧开的时间表。这些天，所有支持过北溪二线的政治家纷纷站出来发表道歉声明。战火给和平时期的能源部署打上了罪恶的嫌疑。

“在我们的时代怎么会发生战争？”超市里的红发收银员叹息过这么一声，她被顾客们面对空货架的牢骚搞得无奈。不是只有她不懂。在德国，除了八十岁以上的人，无人经历过战争，我们对战争的认识，还停留历史书和电影里。我们认为和平生活天经地义，唯一要防范的只是地球变暖。没有人准备好应对战争闯入现实，它怎么看都不应该是我们的现实，可怎么就变成了我们的现实呢？

02

乌韦到厨房来告诉我，刚才是老龚特打来的电话，问我们的梨树能不能让他搬走当柴烧。龚特是我们在乡下的邻居，一个七十岁的单身汉。乌韦的祖上给他留下栋老房子，在地处原东德的一个村子里，离汉堡有70公里的车程。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去乡下住几天，那里最大的好处和坏处都是一个，几乎不通互联网。去年狂风大作的一天，院子里一棵早就空了心的老梨树被刮倒了。我们问过龚特，愿不愿意把树拉到他家当柴火，他当时表示不感兴趣。那棵树就一直露着根，横躺在草地上，像一件当代装置艺术。

他怎么现在又想要这棵树了？我问乌韦。

还不是因为天然气涨价涨得厉害，乌韦说。

我们上周收到了电力局的通知，通知这个村子所在地区的电费要涨一倍。汉堡的电费早几周前就通知过涨价了，我们还嘀咕过，我们的村子是不是因为属于前东德地区，

生活水平偏低，就不给居民涨价了。现在这个通知还是来了。在德国的家庭开销构成中，电费和天然气比例一般是 1:2。暖气和热水烧的是天然气，做饭、照明和冰箱洗衣机电视电脑之类用电。乌韦和我住在汉堡，到村子里去得很有限，就马上想到了像龚特那种情况的村民对此会怎么反应。电费涨后，现在天然气跟着涨，他们怎么吃得消。

两德统一后，龚特就没有过正式工作，有时打点零工，很多上了岁数的村民跟他情况差不多。幸好龚特的母亲给他留下了祖宅，他自己有份微薄的退休金，整天在院子里养鸡种菜，备好整整齐齐的劈柴垛。最冷的时候他会开暖气，只要气温还行，他就用劈柴烧炉子，属于过日子能省就省的那种。

电话里他告诉乌韦，俄乌开战后，天然气的价格涨了三倍，他决定不开暖气，只烧炉子了。他的劈柴还够用，但他搞不准这个仗要打多久，就算不打了，也不知道天然气的价格能不能回到从前。乌韦问他，村里别人家怎么应对天然气涨价，龚特说，那些把老炉子拆了的人家就惨了。这个小村庄靠着森林，是有柴火可烧的。但两德统一后，大家都用上了暖气，但凡收入好些的，都把炉子拆了。去年政府和媒体大谈特谈应对气候变暖问题，暗示过不久将禁止烧炉子，以降低环境污染的指数。我还记得，龚特站在院子里，看着柴火垛直发愁。现在，环保要给战争引起的能源危机让道了。

乌韦让龚特去我家院子里自行搬树，这个复活节我们就不来乡下过了。

每年的复活节，我们都到村子里来过，因为那里有复活节火堆。这个古老的日耳曼习俗在城里变得很难，只有乡间还完整保留着。全村人提前一个月就在村操场上堆出一个巨大的干柴堆，复活节前夜，义务消防队负责点火，全村人聚过来，就着烧得噼噼啪啪的火堆喝酒、吃烤肠、畅聊，火光有种魔力，让人放下平时的疏远，进入忆旧的温情时刻。疫情期间，复活节火堆停办了两年。今年二月初，我们听说火堆会恢复，就一直计划着去。后来发生的事，应了大家现在见面最爱说的一句话：瘟疫还没结束，战争却来了。我和乌韦吵了几句嘴，就放弃了去乡下过节的打算。

吵嘴的原因当然是暖气。城里通过接到各家各户的燃气管远程供暖，用户仅需忍受燃气公司的提价。在乡下，情况更复杂些。各村各户都离得远，之间没有燃气管道相连通，暖气由每家自备储气罐，请燃气公司来灌气。一个储气罐能装两千至五千升天然气，供一户长久之需。北德四月的天气，还有零下的时候，我们去乡下住，不能不开暖气。一想到要动用自家储气罐里还剩不到三分之一的天然气，乌韦就变成了龚特，极其吝啬起来。他生怕情形再坏下去，燃气公司会有一天不来给续气了。这是全民的焦虑。上涨的价格还在其次，最让人不安的，是德国政府会不会有一天下决心，彻底掐断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经济部长已经公开指出，德国目前的石油储备只够坚持到今年十月，届时将不排除某些企业被强迫停工。他保证，民众的日常所需将被排在能源供给受限的最优先考虑级。这话能信吗？我问乌韦。这位部长不是刚让大家从现在起就要少洗澡少开车吗？乌韦冲我咧咧嘴，说，跟法国人意大利人比起来，德国人有信任政府的传统。这话里的百般滋味，比我的西红柿鸡蛋面丰富多了。

4月3日，乌克兰布查几百名平民暴尸街头的图片传遍全球，德国各界要求政府切断跟俄罗斯一切能源合作的呼声更加激亢。联邦政府立即公布了对俄罗斯的第五轮制裁清单，上面有禁运俄罗斯煤炭、木材和伏特加。石油和天然气会成为下一个禁运吗？很多朋友的预判跟我们接近，就是这种在和平时期绝对不敢想象的选项，现在已经变得不是没有可能。进入4月后，我们的心情变得怪异，连眼前的冬天还没有完全走出，我们就已经在忧惧下一个秋冬。

战火起燃后，北溪二号从媒体标题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能源禁运”这个概念。联邦总理、经济部长、州长们几乎天天被媒体“提审”，每次，政治家们都措辞谨慎，首先高举高打“想尽一切方法尽最大努力以最快速度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这个决心，然后话锋微转，对德国目前还做不到能源禁运的原因给出解释。德国40%以上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具体到数字，能源咨询公司 Aurora 做出的最新预测称，2022年德国天然气用量将低于以往，但需求也在至少 820 亿立方米，而且还是冬天不太冷的预估。在德国的天然气总量中，工业消耗占 37%，民用消耗占 31%。若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巨大的缺口将给德国带来深重的危机，且不论价格飙升对工业和个人造成的困境。

对德国施压最大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每天都在对欧盟特别是对德国进行谴责。直到开战前二月份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他还不过是欧美各国政要爱搭不理的一个小国领导人。现在，他脱下西装，换上军绿 T 恤，成为世界上出镜率最高的政治家，能去基辅拜访他，跟他握手，变成很多国家的政治家求之不得的政治资本。德国总统刚被他拒绝接见，没能拿到这份荣耀。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运气比德国总统好。4月9日，她坐火车去到基辅，把欧盟的又一次 100 亿欧元援助送到泽连斯基手里，同时把加入欧盟的申请表也一并递上。泽连斯基简短致谢后，立即对欧盟发出尖锐的批评，你们软弱，他说，你们只挑软东西进行制裁，起到的效果当然也是软的。只要你们还在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你们就是在支持他们打我们。”他也无暇理解德国的苦衷，德国的这份尴尬是有目共睹的：一只手给乌克兰送武器，另一只手从俄罗斯买东西。

“我宁可在家乡多穿一件毛衣，把暖气调低两度，如果能帮上乌克兰的话。”我的熟人里，有好几个都表达过类似的决心。可最近的一份权威民意调查却显示，大部分德国民众并没有准备好“为自由挨冻”。倒是乌韦，一声不响，早就把家里的温度从 21 度调到 19 度，为的是对冲上涨的暖气费。跟我爸住的东北小镇比，德国暖气设备可以在每个房间自行调节温度。而我爸那里，冬天室外气温常在零下二十多度，而室内的暖气会烧到零上三十几度，还奈何它不得。出于自卫，我爸不得不每天数次打开窗户，换点零下二十度的冷空气进来。想到我爸那里一个冬天大刀阔斧烧掉的煤，再看看德国此时的惜气如命，我实在拿不准，哪边的日子更加荒诞。

问题是，德国人每人少洗一个澡，每家把室温下调两度，就能摆脱俄罗斯，帮上乌克兰吗？世界会突然变得如此简单易操作吗？或是战争已经把我们的思维变傻了？

在一个采访里，巴斯夫的总裁呼吁全社会要警惕道德家的天真。巴斯夫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公司，也是消耗天然气的工业大户。这位在亚洲工作过十年的总裁指出，如果德国政府斩断从俄罗斯进口能源，以巴斯夫这样的大型化工厂为例，当它的生产陷入停顿，很多相关产业都将被拖下水，大面积失业会不可避免，民众生活会陷入混乱，国民经济将遭受重创，德国在长时间内会失去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巴斯夫的化工产品里，很多是化肥、药品的原料，油漆、塑料等也将断供。让全世界最大化工厂停产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记者逼问他说：可是很多高校和研究所里的经济学家已经做出了精密的模型推算，假如德国放弃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德国虽然会陷入经济萧条，但不至于跌入灾难。巴斯夫总裁反驳，说这话的人可能精通理论，可并不对他人肩负任何具体责任，而他要管几万人的饭碗。他很惊愕，那么多身居要职的人居然丝毫不懂，德国的繁荣富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更不懂产业链之间的深度关联。他说得痛心疾首：二战后德国建立起强大的经济体系实属不易，现在，我们不惜舍弃能源安全，把自己的经济搞垮，这对乌克兰又有什么好处？谁又能保证，德国这样做了就能终结战争？战争一来，政治和经济显然成了两本账。读到经济界的实力派跟政界、学术界和媒体杠起来，我只有一种水漫金山的无力感。这些大事反正不由我们说了算，我们拥有的常识，碰到这些专业复杂的问题也派不上用场。只有一点是明确的，由财政部长亲口说出：俄乌战争正在让每个德国人变穷。

乌韦帮着摆饭桌的时候，还不忘把龚特的最后一句话学给我听：咱们不能不支持乌克兰，要不，俄国一直打到波兰，下一个就是德国了。老龚特怎么会这么想？我听得一头雾水。龚特可能看了太多的二战电影，乌韦苦笑着摇摇头，战争会激起对战争的记忆。

03

我还清楚地记得 2 月 24 日开战那天。德国外交部长讲的一句话后来成了名言：“我们一觉醒来就到了另一个世界。”我那天早上醒来，并不知道世界已然不同。那是我做旅行的一天。我起得比平时早，匆匆忙忙往火车站赶。按计划，我将在柏林的一个创意空间主持关于中国科幻的对谈节目。既然邀请方出路费，我就想充分利用这趟差旅，早早到达柏林，花几小时去国家美术馆看展览。火车开动后，我喝了一口热咖啡，才打开手机读新闻。第一个标题是“战争：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从汉堡去柏林，火车朝东南方开，天布满了灰白色云层，原野和森林都是萧瑟的。眼前的景象，跟这里每个冬天的清晨都别无二致。可我忽然感觉很怪，认定自己坐上了一辆开往错误方向的火车。战争来了，我怎么还去聊科幻？这不是可笑吗？仅“战争”这个词，就有一头巨兽的体量，足够一口吞掉平日里的各种意义。火车的行进也在我眼里变成虚无。到柏林后，一切还是老样子，但又不一样了。我们的科幻对谈开始前，主办方请大家集体静默一分钟，为乌克兰祈祷和平。

从柏林一回来，我就拉上乌韦去超市抢购。疫情初期的情况在战争开始后重演了，所有人都忙着囤卫生纸、罐头及其他。我们开回家还没把车停稳，邻居克里斯就走过来打招呼。虽然天气远没到收拾花园的时候，他已经拿着一把剪刀，在修剪去年的枯枝。

克里斯八十开外，身体还很健朗。三十年前，他从北约的一个高级军职上退休。年轻时，他开过战斗机，两德统一后，他负责去东德地区收编东德部队。退休前，他的工作变得有些乏味，负责北约各国武器设备的技术标准化，比如德国接头跟比利时的是否匹配。

“真没想到普京会发动战争。”克里斯说。

“我们的朋友里没有一个人料到这一点。”乌韦说。

“但有一点他让我格外惊讶，没人这么干的。”克里斯又说。我们马上想起来，他在北约干了一辈子，有什么高见？

“战争一般都是在秋天发动，等地里的收割结束以后，”克里斯说，“普京怎么会在二月底发动战争呢？乌克兰这一年的收成都无望了。”

“我们今天就没买到面粉，”我插嘴说，“葵花籽油的货架也空了。”克里斯点点头，又跟我们分析起军队供给对战事推进的影响。

“你觉得北约东扩对今天的局面也负有责任吗？”这是各国媒体上讨论得异常激烈的问题，我很想知道我家门口这位老北约怎么看。

“我已经退休三十年了，今天的北约早已不是我工作时的那个组织，我不好说什么了。”他一脸严肃地回答。

我冲克里斯挤挤眼睛，知道军队把他训练出来的谨慎态度永远不会松懈。他又夸了夸我上次请他和太太来喝下午茶烤的奶酪蛋糕。我说，可能很长时间内我们都没有面粉烤蛋糕了。

“乌克兰是欧洲的大粮仓，”战争发生不久后，乌韦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周围出现了很多乌克兰色，无论是歌剧院门前悬挂的旗帜，还是各家商店橱窗上贴出的支持信号，到处是这纯净的蓝黄两色，荡漾着一番诗意。乌韦关于粮仓的说法，让我从颜色里开始想象乌克兰的万里晴空和金色麦浪。

我很惭愧，我对乌克兰一无所知。在俄罗斯文学里，我读到过第聂伯河和哥萨克兵，其他就记不清了。我还知道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2014 年俄国占领了克里米亚，默克尔率领欧盟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至今。我曾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梳金色麻花辫的年轻女总统，但她也像其他政客一样，很快就消失了。一年前，我读到过《南德意志报》的一篇长文，揭露乌克兰的寡头操纵政治。在一份有一百六十多个国家排名的反腐败名单中，乌克兰排在一百三十几位。

战争发生前，我不知道乌克兰国旗长什么样，叫不顺现任总统的名字，也没注意看过它的地图，除了基辅，乌克兰的其他地名一概不怎么熟。短短几天，我就能流利叫出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敖德萨……战火把它们摧毁得尽人皆知。我宁愿从未听说过这些地名，愿它们逃过轰炸和厮杀，愿那里的街道和房屋完整如初。在那些呈现出月球一般荒芜的战争图片前，我的心愿只是一堆泡沫。在德国的乌克兰名人

是一对拳击手兄弟克利钦科，大哥回到乌克兰后当上了基辅市长。我们的朋友熟人圈里没有乌克兰人。这种情况在德国不是例外。报纸上引过一位乌克兰作家的话，在欧洲人眼里，乌克兰从来在最遥远的欧洲边缘。

战争爆发后，德国广播节目里很快就有了对乌克兰文学的介绍，我记下两个被谈论得最多的名字，一是尤里·安德鲁霍维奇，2004年橙色革命后，国际文坛上把他视为乌克兰的声音。他被译成德文的散文集叫《最后一片领地》。另一位作家是写诗的乐手，叫谢尔伊·扎丹，广播里读了他诗集中的几句，记录的是他在某年圣诞节的前一天，到了一个战乱中的乌克兰前线城市：“你们这些男人，谁能幸存于这个冬天，谁漂到河对岸才被发现，谁会一头栽进雪地，谁将沉到冰底，用身上的肉喂鱼，用咸味的血浇地，变成一道回音，群鸦凄厉。”

我走进常去的书店，要买这两本书。女店员边在电脑里查询，边说，“要不是战争，没人会想起来读乌克兰作家的书。”我承认，我也至今连一本都没读过。她找了半天，最后说，这两本书要等大约一个月才有货。不会吧，我跟她解释，前不久广播里刚推荐过这些书，出版社肯定早就备好了货呀。我差点告诉她，我以前做过出版，是了解内部操作流程的。戴眼镜的女店员摇摇头，“我查了跟我们合作的中盘商，也查了出版社的库存，都没货，估计乌克兰的文学书全在重印中。”

她说的应该是实情。广播里采访了这两本书的出版社编辑。编辑说，多年来，德国出版社几乎只在意俄罗斯文学，对乌克兰作品的关注度微乎其微。直到不久前，连本德语—乌克兰语的辞典都没有，会乌克兰语的德文译者也寥寥无几。当然，德国出版社对俄罗斯当代文学的关注是带选择性的，从来不会引进那些充满帝国梦想倾向的作品。

我本打算在去柏林当志愿者的火车上读这两本书，只好作罢。到了三月，涌入德国的乌克兰难民人数日日在涨，柏林火车站是接收他们的第一扇大门，急需志愿者的协助。我在三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去柏林帮忙，跟上次去柏林一样，又是一大清早出发。路过家门口的街心公园，觅食的鸽子听见我的脚步声，骤然飞起，空气中留下他们拍打翅膀的刷刷声。在我住的地方，鸽子还能肩负象征和平的寓意，那些在乌克兰扇动翅膀飞翔的鸽子就难说了。它们知道怎样躲避炮火吗？

不知不觉，四月已经走向尾声，俄乌战争还在升级，越打越残酷。德国年轻的女外长强烈要求德国把重型武器提供给乌克兰，媒体都蜂拥在她周围，集体向总理朔尔茨施压。默克尔的前军事政治顾问发出警告，“通往地狱的路总是由善意铺成的”，他说，德国必须从军事升级的逻辑中拔出身来。如果德国答应乌克兰的请求，直接把重型武器输送过去，无异于德国变相参战，势必抬高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内务部长则号召，有地下室的居民要做好防核污染准备，将投建的公共建筑及私宅也须重视把地下室纳入必建工程。

也许是因为战争作为身边的现实已经延续了两个月，我们在惊愕、愤怒、悲伤、焦虑、恐惧、同情、迷惑等各种情绪中都趟了至少一遍，心理承受能力大增。政府政客及媒体的各种发声都无法让我们过于激动了。这两天，一直躲着媒体走的总理朔尔茨想出了一条权宜之计，德国仍坚持不向乌克兰直接输送重型武器，但给乌克兰再拨12亿欧元巨款，供他们在北约国家和美国自主采购武器，无论轻重。朔尔茨为这项决定辩护说，因为无法判断俄罗斯的底线在哪里，若德国不慎踩过红线而引发核战争，世界便没有回头之路了。

我想起芳妮的话，一听到援助武器就心慌。谁能讲得清，每送一次武器，是离和平近了一步还是远了一步？尽快终结这场战争的办法，是靠更多更重的武器，还是靠一场场谈判？我们既不是乌克兰人也不是俄罗斯人，也许我们对此根本就没有发言权。

给乌克兰难民当志愿者那次，柏林火车站的一块巨型广告牌给我留下了不适感。广告打的是德国巧克力品牌“骑士运动”(Ritter Sport)，2022年是它的110周年庆。即使不打广告，骑士运动也是德国最有名的巧克力，它用两个绝招稳定自己在市场上的辨识度，一是方块型包装，二是根据季节变化无穷的口味。我最喜欢的是朗姆酒泡葡萄干那款。据说它的生产无一例外都在德国南方的巴符州完成，在全球90多个国家的市场上只做营销和销售。

本来也没什么，可是，骑士运动偏偏在三月份成了所有新闻和社交媒体的众矢之的。起因是乌克兰国防部在推特上号召抵制骑士运动，谴责这家公司还继续他们在俄国的业务。

战争打响后，连西门子、德国海运以及包括宝马在内的行业巨头都立即终止了在俄国的业务。这就是战争，把全球化生长出来的经济合作突然掰断，如同大陆板块运动发生了断裂，每个企业要迅速做出决定，双脚站到深渊的哪一边，劈叉等于找死。作为家族企业的骑士运动怎么就认不清形势？

我也同样搞不懂，乌克兰国防部怎么会突然对准一块德国巧克力？它的推特配图十分血腥：在骑士运动尽人皆知的方块包装上，通过图片拼接处理，“骑士运动”的字样被改写成“希特勒运动”，大量的鲜血从高光的包装纸上往下滴。英语说明文字是：“儿童的血：153名被俄国人杀害的无辜儿童，他们再也尝不到巧克力的味道了。我们要求骑士运动离开俄国，从而终止为屠杀儿童的杀人犯提供子弹、手榴弹和火箭。”

骑士运动在媒体上做出的回应是这样的：“为了保障众多种植可可的非洲农民家庭的基本生活和就业岗位，我们将继续为俄罗斯民众提供巧克力。但是，我们早已终止了对俄国市场的投资及广告业务。”骑士运动并且做出保证，把在俄国的全部营收捐给国际人道救援机构。

我的不适感就这样出现了：在柏林火车站这个迎接乌克兰逃难者的大门口，赫然矗立着被乌克兰国防部描写成杀手帮凶的德国品牌广告，这场景本身就错得不能更错。每天成千上万涌入柏林火车站的乌克兰难民看到这个广告会怎么想？

两天志愿者做下来，我发现自己的担心纯属多余，因为除了我，根本没有任何人留意这个广告。逃难的乌克兰人一个个心力交瘁，他们千辛万苦到达柏林后，只想把最后的力气花在安顿下来，既没精力去读本国政府的英语宣传，也无心去看德国日常的安逸场景。受尽折磨、失掉了全部所有的，是他们这些人。他们比我们更知道，

该抓住什么和漠视什么。

我对乌韦说，以后咱们家就不要再买骑士运动这个牌子了。尽管我心里明白，变味的不是巧克力，而是我们的世界。

2022年4月23日写于汉堡



王竞

中西文化项目策划人 / 写作者 / 德国当代文学翻译者。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1年赴德国工作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和教育学博士。2013年至今生活在汉堡。

在汉堡

作家王竞说的是德国日常生活，却是你不会陌生的话题。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相隔很远的人想着一样的问题，近在眼前的人连共同的话题也无法说起。这是全球观察栏目之一种。



图片来自 [Pete Wright](#) on Unsplash

专栏

除了门口那两个石狮子，都需要核酸检测

王永智 | 王伯伯脑保健操

我只看到一种后遗症，那就是形式主义。

人在成长过程中有两个马很重要，一个是儿童乐园里的旋转木马，一个是夜总会里的声色犬马。成长至今，人到中年，生活里重要的马只剩下绿码了，真是应了那句曾听上去很悲壮现在觉得特别有远见的话，要想生活过得去，身上必须带点绿。如果鲁迅现在还生活在上海，被隔离的他肯定会憋出佳句：我家门前有两个石马，一个是绿色的，另一个也是绿色的。

柳湘莲肯定会很认同鲁迅的说法，因为他眼里，只有门口的石头动物才是干净的，在《红楼梦》第六十六回里，有洁癖的侠客柳湘莲曾说过，宁国府里，除了门前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有些疫情防控人员宛若柳湘莲的学生，在他们眼里，管它猫儿狗儿，都不干净，一律要进行核酸检测。

尽管世卫组织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家养的猫狗会感染新冠病毒，但依然有那么多猫狗或是被扑杀或是被检测的案例。世卫组织毕竟不是党组织，在某些人眼里，世卫组织秘书长的话肯定不如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话管用，更何况，很多人的逻辑是，你说“没有证据显示会”，那你“有证据显示不会”吗？即便你有证据，那也只是世卫组织这一科学社团的证据，不是政治社团的证据。当科学遇到政治，当政治不讲科学，当科学服从政治，当政治披上科学的外衣，荒谬就充满人间。

二十年前有部电影叫《惊变 28 天》，讲的是实验室病毒外泄，满城人感染变成丧尸的事，虽然现在这种丧尸主题的影视剧越来越多，但当年被深深震撼到了，特别是影片开头的空城镜头，放眼望去一片空寂，镜头扫遍各个建筑和主干道，没有活动的人，没有行驶的车，甚至没有一点声音，让人感觉时间停滞，文明磨灭，人类仿佛从没有在这里存在过。前几天看到无人机拍摄的空荡无人的上海街道全景时，我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可以拍《惊变 28 天》。上海的每条马路都有自己的故事，老上海人习惯把南京路叫大马路，九江路叫二马路，汉口路叫三马路，福州路是四马路。福州路地理位置优越，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鲁迅也经常与好友在福州路上喝酒聚会，并且不用出示健康码和核酸检测报告。当年的四马路被称为“文明与野蛮交织，光明与堕落并存”的地方，现在的世界依然如此，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普京的野蛮战争交织着，光明和堕落也并存着，但我们却不能跟病毒共存。有个段子说“病毒想要与人和解，我们也想与病毒和解，可是领导不想。”这就像一开始我们骑虎难下，后来老虎累了想让我们下来，但这时领导告诉我们，他想吃虎鞭喝虎骨酒了，不仅我们懵逼了，老虎也懵逼了。

这些天一直为上海的疫情揪心，今天看了《第一财经》采访世博方舱医院总指挥、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党委书记郑军华教授的新闻，心情稍微缓和了一些。郑书

记教授说除了对症治疗外，还给患者使用中医药的联合治疗，同时根据舱内实际情况，定制了相应的《中医防疫方》进行发放。“中医治疗在此次抗疫过程中发挥了较大作用，中医治疗率超过 98%。”虽然外界都在说轻症患者能够自然痊愈，但我觉得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不是强大的祖国和博大的中医文化做后盾，病毒哪会知难而退。以往核酸检测张开嘴巴时还要喊声“啊”，这很明显是西医的方式，后来有专家郑重声明，不要说“啊”，节约了时间也极大提升了检测效率。但检测这件事本身就是西医的做法，成本也极高，为什么不使用我们中医纲领性的方式进行筛查呢，中医是门语言艺术，它讲究“望闻问切”，我相信只要中医学者潜心研究，早晚能研究出不用棉花棒只需“望闻问切”即可分辨出阴阳人的方法，不要忘了，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方法就是中医的阴阳五行。

关于新冠病毒的变异株奥密克戎有一种谣传，说它有两百多种后遗症，这个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和感染管理科主任胡必杰教授辟谣了。这么多后遗症我也没看到，我只看到一种后遗症，那就是形式主义。一直都被大批特批的形式主义，借着病毒借着防疫死灰复燃且呈熊熊烈火之势了。前几天上海莱顿小城小区和保利叶小区的居委会通过微信群让业主们在晚上八点十五齐声高唱正能量歌曲，准备录下来传播出去，业主们不仅不配合，反而一起高喊“SB 居委会”，这不仅仅是对形式主义的抵制，也显示出了上海居民的腔调，这比公交站喝咖啡、核酸检测排队喝红酒以及变装更具有上海的海派腔调。科学防疫、有序防控，多点人性化管理，少一点僵硬死板教条形式主义，不用发动不用作假，自然有人给你们唱赞歌。

现在的幸福往往都是相对的，这句话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自己的幸福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从未想过自己会这么幸福，就是从未想过他人会这么痛苦，庆幸自己还拥有那么多，就意味着有人失去了更多……但这幸福的感受并不长久，因为你明白它随时会在你身上重演一遍，而你就成了他人幸福的对标者。这是这些天我从上海的朋友们那里得来的感受，特别是看到那些阳性儿童还那么小，就不得不跟自己的父母分开，被单独管理起来，管理能力如何尚且不知，但大家心里总归有点数，什么时候能够再相见也不得而知，不由让人感慨，这世间比病毒可怕的事情太多，而这些事情都是以防控病毒的名义不由分说地发生着。

在 4 月 4 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生健康委明确，如果儿童家长同样是阳性感染者，可以同住在儿童区域陪护照顾，一起接受观察治疗。看完这个我在想，这究竟是在考验父母对孩子的爱有多真，还是在考验父母让自己转阳的能力。我已经看了不少父母说如果真是这样，自己宁可变成阳性也要跟孩子在一起，甚至有几个已经在很认真的讨论方式方法了。病毒可怕，但是某些防疫政策已经可怕得让人不觉得病毒可怕了，谁说病毒不能与人共存，他们宁可与病毒共存，也不愿意与这样的政策共存。

我查了下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儿童感染新冠的救治建议，“尽量让儿童与父母和家人在一起，并尽可能不将儿童和照护人分开。如果不得不分开（如住院），应确保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经常联系，以便让儿童安心。”疫情防控当然重要，但它之所以重要，不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个体吗？当你打着防疫的旗号，做着一些违背常识、违背人性、侵害个体利益且不是少数个体利益的事情时，这种防疫已经变味了，已经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我宁愿相信这是缺乏专业能力，这是庸政懒政，也不愿意相信是因为他们缺乏人性。但看了《上海疫情中，一位清华校友的非正常死亡》这篇文章，我觉得这就是防疫大局之下的草菅人命。清华校友李昶去年因突发脑溢血住院，事发前在一家上海康复中心恢复疗养，因康复中心发现了阳性病人，于是所有被要求离开，这个所有人不仅仅是家属，还包含护理人员。但李昶尚未恢复语言功能，且无行动能力，极度依赖护理人员的精心护理，比如做吸痰等必要措施。于是丈夫要求自己和妻子一起隔离，没被允许。“为此，丈夫组织了在护理中心的全部家属，占领了一个房间，把门从内堵死。警察来了，他被以破坏抗疫的理由抓走。为了安抚家属，护理中心许诺会另外安排护理人员。实际是一个护理人员要管十几个病人，且护理人员不会吸痰。因没有语言能力，无法呼救，也没有人给她吸痰，痰堵在气管里……人就没了”。即便是现在，我依然不敢相信这是真事，我甚至希望我传播了一个谣言。这样的防疫，难道还引不起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反思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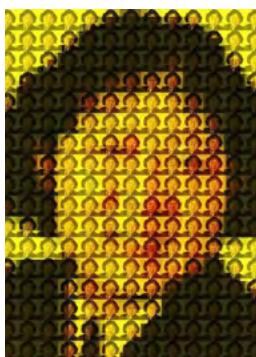
公共政策的制定，当然是以理性为主，但肯定要考虑到人性化的部分，理性这个东西，一旦太多了，就没人性了。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官本位……，这些先天与人性对立，而且很容易披上理性的外衣干着非人的勾当。普通群众都能明白的事，都能想出解决方案的事，你们怎么就不行呢？我看近期中纪委对孙力军和傅政华的通报，感觉找到了答案，“完全背弃理想信念，从未真正忠诚于党和人民”“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从未对党忠诚老实”，嘴上说的都是为人民利益，干的都是侵害人民利益的事，被人民揭穿，就公然用手中的权力打压人民，还美其名曰维护党的利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难道是对立的吗？难道不是具有一致性吗？“从群众利益出发”、“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真正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保证真正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尽全力保证真正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这些话术的变迁，越来越笃定的样子，只能说明群众利益、公共利益，该如何维护如何保障，他们根本没想过更不知道该怎么做。群众要的真不多，官员讲点人话，制定政策时把他们当人看待一下，赞歌肯定就唱起来了。就像前几天上海疾控中心接电话的那位女领导，说的都是常识，也设身处地的为困难群众考虑，虽然并不一定能解决来电群众的问题，但她至少在公共层面起到了温暖人心安定人心的作用。

与这位女官员相比，上海六院的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却极大伤害了疫情之下上海人民的感情，这篇文章题为《新冠疫情笼罩下的“丁丁保卫战”》，大意是一个来自高风险区且处在隔离观察期的外籍患者，阴茎异常勃起 50 小时，来到六院就诊，医院的书记、院长、副院长、高度重视、亲临现场，还有市领导指示全力救治……。不是说不该救治这个病人，而是不该如此区别对待，一方面那么多病人没有办法得到正常的医治，特别是那些重症急症生命垂危的患者，一方面各级领导全力保卫一根丁丁……，群众们心理上接受不了。你救就救呗，你还写出来，写就写呗，你还发出来。我们中国讲究个礼，《礼记·曲礼上》有这么一句，“邻有丧，春不相；里有殡，

不巷歌。”大意就是邻居家办丧事，就不能进行生产活动；邻里有人出殡，就不能唱歌作乐。懂点事吧。不过从这事上也能看出，西方某些国家的崛起，只是一时的充血，于人于己都没啥好处，而我们只要对他们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就能抑制他们的崛起。抗疫大局之下，对某些部门表现出来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满的还有鲁东大学2020级硕士研究生孙健同学，很多人都有不满，但他却公开说了出来，于是就成了鲁东大学的前学生，因为他被开除了。《关于给予孙健同学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该生无视国家、山东省和烟台市关于疫情防控的有关规定，擅自举牌在校园南、北区穿行，公然反对和抵制校园封闭管理和全员核酸检测的有关规定，严重扰乱了校园管理秩序。”原来前段时间孙健同学以公开信的形式给校领导提了诸多意见，排在首位的就是防疫政策过于严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及老师和同学不能一视同仁的问题，而校方对其的答复是：“没有大局意识”、“影响学校声誉”。于是他举牌在校内走动以示抗议，这的确很没有大局意识，影响了校领导的政绩大局，也的确影响了学校声誉，就连复旦的教授都惊呼鲁东大学能培养出这样的人才，鲁东大学配不上这样的优秀学生。得知被学校开除后，孙健同学做出了积极的回应“鲁东大学：你们以为解决我，比解决问题更方便，我今天在这里就要告诉你，你们这种处理方式，在我身上不好使。真的，不骗你们，我会坚决捍卫自己的权益。……我会就此进行抗争的，这个世界还没到你鲁东大学一手遮天的时候。只要你们没有就在我身上犯的过错，进行公开道歉，我就不会轻言放弃，我就是要以一己之力对抗你们这群官老爷！我赢面可能不大，但我的目标是让大家明白，你我到底谁野蛮谁文明！抗疫大局的重压之下，一所大学表现得像个没头没脑的学生，一个学生展现出了大学般的张弛有度和高贵气节。

看到野蛮和文明这两个词，我又想到了丧尸主题的电影，大部分丧尸片，讲的其实还是人，以及人性。在文明坠入深渊的时刻，人性将会展露出怎样的丑陋，比僵尸可怕的还是人类，特别是那些比他人多一点点权力的人。人人都知道死亡不可避免，死亡也就不再是最深的恐惧，而无底线的人性，才是无限的恐慌。人类的存在及其局限性，决定了人类社会难免会生出各种问题，有些能解决，有些无法解决，解决并不是最终目的，如何共同面对才是终极方案。电影《2012》讲的是世界末日来临，各国政府对末日消息进行了封锁，美其名曰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然而这封锁只是相对于普通人而言，对于有权有势的人而言，他们可以用财富换取诺亚方舟的船票，很残酷也很写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让我记忆犹新的片段，一位国家元首，决定以全球直播的方式，将末日来临的消息，告知所有的民众，这虽然无法挽救他们，但至少给他们一些时间与家人告别，他的台词深深打动了我，“我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把真相告诉民众。至少他们知道以后，可以与家人告别；至少母亲可以安抚孩子，而父亲可以请求女儿的原谅。”

我们不是大局的搅局者，我们就是大局本身，这件事，我们可以一起面对。很多事，我们有权一起面对。有些事，我们必须一起面对。



王永智

曾用艺名王五四，自媒体行业从业者，资深互联网创业失败者，百余微信公众号被剥夺者，坚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部分结果未显示。

王伯伯脑保健操

秦楼楚馆声犹在，黑夜总会过去，一个别有用心良苦的专栏，希望读者不明真相大白。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专栏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感觉

王永智 | 王伯伯脑保健操

我们时而无价，时而是代价。

我最近对什么都没感觉，一度有点怀疑是不是频繁的核酸检测把我的感官系统捅坏了，大脑好像也不太对劲了，明明生活在人类世界，却经常感受到他们的非人行径，或许是阴性阳性这两个词听的太多了，明明生活在阳间，却经常感受到阴冷，甚至对抗疫的大政方针也产生了怀疑，直到想起 1949 年第一批被劳动改造的妓女们曾经唱过的“千年的冰河开了冻，万年的枯树发了青。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会把鬼变成了人。”我才幡然醒悟，新社会都能把阴间的鬼变成阳间的人，难道还能把阳性人变成阴性人吗？当然，我们对待阳转阴这件事是很严肃的，不能因为一次检测结果是阳性就判定为阳性，也不能因为十次检测结果是阳性就判定为阴性，究竟要几次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科研机密吧，反正见了太多二十几次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的人，依然还要做核酸检测，大概是这个社会上的两面人太多了吧。

与我们的严肃认真相比，美国人对待新冠病毒的态度简直是在开玩笑，特别是他们的高级领导干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4 月 7 日被查出阳性，仅仅过了四天，4 月 11 日就宣布自己转阴，更可怕的是她宣布自己 4 月 12 日就结束隔离。要知道，这么短的时间，我们菜都还没来得及抢，她就结束隔离了，而且还是自己宣布的，没有通过居委会没有通过街道，没有经过卫健委甚至没有经过民主党组织部门的同意。

美国的政客对美国人民是如此不负责，要知道，在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普通群众往往要检测二十几次才能通过考验，因为新冠病毒的隐藏性是很强的，要久经考验，要久经检测，即便是几十年的优秀党员高级领导干部，也可能从未对党和人民忠诚，你佩洛西民主党的党性再强对美国人民再忠诚，也得检测个十次八次吧。令人不解的是，即便美国政府和官员如此对人民不负责，美国驻上海总领馆相关人员近日依然做出了“自愿撤离”的决定，不知他们是饿了抢不到菜，病了进不了医院，还是担心半夜被踹门而入拖进方舱隔离，但眼前这些困难都只是暂时的，他们难道没有组织学习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话吗？“在座的各位能够在抗击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你们乐了没，我是乐了。

疫情已经使得整个社会哲学化了，处处都是柏拉图式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在街头的每一个卡点，巷尾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小区门口，每一幢大厦岗前，严肃地发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而被盘问的人也早已熟悉这些哲思的提问，一遍又一遍重复着答案。

然而回答了无数次我是谁，我们却越发搞不清楚我是谁了。就像在“人民利益至高无上，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利益”这句话里，我们时而无价，时而是代价。在“我们理解你们所做的抗疫工作都是为了我们”中，我们既是那个被保护的对象，又是那个被伤害的对象，然而我们依然相信，我们之所以被伤害，是为了更好地被保护，在这些文字陷阱里，我们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时而血性时而理性，糊涂时被现实的耳光打醒，清醒时又被挥起的铁拳吓得假装糊涂，血管里流淌的血液只剩下维系心脏跳动的功能，血性已无，理

性成了替代品，就像人到中年，生殖器官也只剩下排尿功能，一身尿性。

在我们越来越喜欢用段子表达对生活的感受时，猛然发现生活是段子，那我们则是笑点，我们笑得有多开心，我们生活得就有多糟心。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虽说我们不清楚自己是谁，但总归知道自己是人科人属人种，感觉自己像个人。不像有些人，血管里只有政治属性在流淌，没有一点人味儿了，特别是在抗疫大局的作用下，他眼里只有阳性和阴性，而没有血性和人性了，九十几岁瘫痪的老人抬也要抬进方舱，出生二十几天的孩子抱也要抱进方舱，多危急的病人要么出不了小区，要么进不了医院，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阳性和阴性，而变得“阴阳相隔”，不是隔离在家，就是隔离在方舱，这些地方即便条件再差，好歹也是在阳间，有些人就真的和他们的亲人相隔在另外一个世界了。“阴阳相隔”这个成语，本是说明阳间死人活人的事，在抗疫大局之下，用在人世间因阳性阴性被隔离的活人身上，悲怆感阴冷感，一点也没减弱。

电影《阿甘正传》有一句经典台词，“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会是什么味道。”这就是巧克力里的盲盒。因为有巧克力打底了，那么盲盒里基本都是惊喜了，给人带来惊吓的是那种纯盲盒，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当你急需一份蔬菜时，打开盲盒却收获了一盒莲花清瘟胶囊，这是潘多拉药盒。当你急需一份救命的药品时，打开盲盒居然收到了一台《众志成城 同心守沪》的文艺联欢晚会没有底线的盲盒属于流氓盒，估计把病毒都整懵了，我还活着呢怎么葬礼先给我办起来了。

上海的晚会终究没有办法起来，否则对上海人民而言，不仅伤害性很大，侮辱性也极强。此时此刻的上海人民并非不需要精神食粮，他们只是不需要精神病食粮。随后，崔健老师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场线上演唱会，好评如潮；“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上海的方向”，这才是精神食粮。1986 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首次演唱了《一无所有》，这首歌给了当时迷茫的青年们当头一棒，敲碎了困住他们的透明玻璃屋，让他们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开始重新生长。就像隔离太久的人，突然间解封了一样。当时高尔泰说，“也许崔健及其摇滚乐，是中国目前唯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了。中国需要启蒙。”从此唱歌的不再只是唱歌的，他们成了时代的文化现象和流行符号。

三十六年后的今天，在疫情弥漫许久的今天，人们依然需要崔健而且无可替代。老崔唱的《假行僧》简直是道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我要从南走到北，还要从白走到黑”，封闭在家太久，人们需要出来走走，只是疫情期间，能从南走到北的，也只有国家领导了。当然，大部分人已经配不上老崔了，无论从勇气还是认知层面，人们都太理性和疲软了，他们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叫没感觉，治疗方式是逃出医院，光着膀子，迎着风雪，在雪地上撒点野。老崔的很多歌放在今天唱，依然火光冲天，他像个老中医，写的词曲都很贴合时代的脉搏，为时代治病救人，只可惜时代已经病入膏肓。看着刚过完六十岁生日的老崔，依然马不停蹄地在为这个社会输入血性和乳汁，挺心疼的，给营养不良的年轻人再哺一次乳，给锈死的中年人再上一次润滑油，然后崔健就真的要开始沧桑了。老崔再摇滚，可面对的也是一帮社会主义下的蛋，更何况，只能坐着听的摇滚，和有备案号的摇滚演唱会，终究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摇滚，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喜欢崔健歌曲的中年男子都坏不到哪去，万达集团的王健林很喜欢唱崔健的歌，《一无所有》和《假行僧》他都公开唱过。王思聪曾在一档节目这样回忆老王，“我爸一直很忙，但是在我去英国留学的那天，他去机场送我了，还说了让我终生难忘的四个字——振兴中华。”所以在我眼里，老王和小王都是为中华之崛起而做房地产和怼人的人，老王曾这样评价过小王，“很聪明，事业还不错，喜欢评价别人这点不太好。”我倒觉得这恰恰是王思聪的闪光点。

前几天王思聪大战莲花清瘟胶囊，4 月 14 日他微博转发视频《世卫组织推荐莲花清瘟，谁告诉你的？》，并建议“证监会应严查以岭药业”。该则视频消息质疑世界卫生组织推荐过莲花清瘟胶囊，并表示河北以岭医院院长贾振华在《植物医学》发表莲花清瘟防疫论文时，隐瞒了自己是吴以岭的女婿，以及以岭药业对其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事。这些事我们都见怪不怪了，也早就没有感觉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只是，这饱受争议的莲花清瘟胶囊被当作了治疗新冠的主要药物。抗疫大局，一直是官方认定的严肃宏大的事情，在这个大局之下，那么多个体都在不断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透支着自己的生命力，这时却突然冒出一个莲花清瘟胶囊，这就好比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大家又抵御住了一次洪水的冲击，为重新修筑大坝赢得了时间，这时你却派出了一支疑似豆腐渣工程队来修筑大坝……最后的结果是，这支工程队没咋样，举报工程队的王思聪被微博禁言了，能想象出思聪该有多么愤慨，这时的他需要来一盒莲花清瘟胶囊，具有清瘟解毒，宣肺泄热的功能。

这个社会需要善意，有些时候面对一些无法改变的事情，我们更要善意解读，比如说上海市民要正确认识并善意解读政府给你们发放莲花清瘟胶囊这件事，或许它只是热水伴侣呢，本意是让你们多喝热水。对待瘟疫这件事，要讲究科学，要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里找办法，在古代，只要有瘟疫发生，人们采取的都是“取媚神祇”的方法，期望求得神灵的庇佑，早日驱走瘟疫，你拜一拜莲花清瘟胶囊或许比吃了它更管用，吃了它也会效果，吃的时候用热水送服，喝热水治百病。2011 年，凭借对莲花清瘟胶囊的研究，以岭药业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还有一个治病的方法，仅供参考，东汉末年，瘟疫几乎连年不断，染疫而亡的人不计其数，张天师却能治得了这种病，张天师治病的方法是，让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回忆清楚，亲笔记下来写在纸上，然后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终结自己的生命。人们按照此法去做，诚心诚意悔改自己的过错，果然大家的病都好了，瘟疫消失了。张天师，东汉沛国丰人，今江苏丰县人，或许铁链女的错误被纠正了人们忏悔了，这瘟疫也就走了，对铁链女这事没感觉，那么当下社会的病很难治好。

前几天网上有一段录音，大概内容是，一对上海的夫妻按照正常的程序在家实行自我隔离，但是他们却被误诊成了“阳性”，防疫人员上门，要把他们送到方舱隔离。这对夫妻告诉防疫人员，他们其实阴性，是检测信息出错了，他们打电话跟医院沟通过，并称有跟医院沟通确认的录音。发现错误后，他们还申请核酸复测，但多天过去了，也没人来复测，却等来了转运的人员上门。因此这对夫妻要求执行人员出示报告证据，或者让他们复测一下核酸。可执行人员根本不理会他们，而是一门心思地带走他们：我们只是在执行

命令；我得到的命令就是把你们带走；你不走我就走执法程序；我们得到的通知你们就是阳性……听完这段录音我想起一个苏联政治笑话，“半夜有警察敲门，开门后警察说，伊万，你被捕了。房主说，你弄错了，伊万在隔壁。警察说，我只负责抓伊万，至于谁是伊万我无所谓。”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会从网上看到一些，看的心里难受，也很担心这样的事情有一天也会落在自己身上，很多人都爱说“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山。”其实一座山倒也还好，怕就怕这个时代正在经历一场沙尘暴，落在人们身上的是无数座大山。你们总说以大局为重，什么叫大局，群众切身利益就是大局，你们也总说要讲政治立场，什么是政治立场，人民利益就是最大的政治立场。在李雪健演的电影《焦裕禄》中有这样一段对话，焦裕禄对吴县长说，“……我们的工作不是做给上边看的，群众满意才是唯一的标准”，“你这话我不能同意，应该说党满意、群众也满意，这是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我认为这是一回事，群众满意的事，党会不满意？反过来说，群众不满意的事，党会满意？”吴县长说，“有时候群众的觉悟比较低，只顾到眼前一时的温饱，而看不到今后和将来”，焦裕禄说，“眼前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今后和将来。”这个对话很贴近现实，很多满口大局的人，在大局之下隐藏着自己的小，把自己对本职工作的无能懈怠，对群众的冷漠伤害，对组织的欺瞒糊弄，全都用大局这块遮羞布盖上了。

这样简单粗暴的干部最近出现很多，有时候我在想，他们会不会是连花清瘟胶囊吃多了，血性和人性都被当成毒给解了，当成热给清了，对为人民服务这件事没热情没感觉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把那些个粗暴对待群众，面对群众疾苦麻木冷漠的人集中起来做一下临床研究，搞个双盲实验，研发个连花双归补气和血胶囊出来，专治对群众没感情没感觉，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冷漠无情。

上海毕竟是上海，有那么多资源，受那么多瞩目，有那么多人能发声，会发声，但依然落得如此境遇那么那些小城市的人呢，那些镇上的人呢，村里的人呢，他们不仅仅人被隔离，信息也被隔离了。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人存在，但我们却对他们没有感觉，因为我们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王永智

曾用艺名王五四，自媒体行业从业者，资深互联网创业失败者，百余微信公众号被剥夺者，坚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部分结果未显示。

王伯伯脑保健操

秦楼楚馆声犹在，黑夜总会过去，一个别有用心良苦的专栏，希望读者不明真相大白。



电影《飞越疯人院》(1975)剧照

20世纪的不怎么样，有三个说法我觉得可以拿来佐证。

第一个，波兰或其他



《我的五个德国》

波兰拒绝给我身份证件，因为我的护照将德国列为出生国，将布雷斯劳（现为弗罗茨瓦夫）列为我的出生城市。（让我宣布波兰是我的祖国这让我觉得既违背史实又非常荒谬：我出生在德国，并且一句波兰语都没有说过。我向波兰大使馆提出申诉：难道一个波兰人出生在战前的利沃夫，1945年被苏联吞并，他就要在波兰护照上注明他是出生在苏联？没人给我回复。）

这段话来自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就像他说的那样，他对自己的德国人和犹太人出身深信不疑，但在论及家乡时就是一笔糊涂账了。按蒂莫西·斯奈德在《民族的重建》中的说法，1945年那个波兰与1939年被摧毁和瓜分的波兰是欧洲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战前波兰的一半领土在1939年被苏联吞并了，德国在1945年获得了战后波兰的三分之一领土。“波兰失去了维尔纳和利沃夫，得到了格但斯克和弗罗茨瓦夫”——后者就是德国人弗兰茨·斯特恩的家乡布雷斯劳。大体上波兰在六七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这样的事：

在战后波兰，波兰人的数量占有压倒优势：约有97%的波兰公民的自我认同是波兰人。但是如果我们把战后波兰的国界放在战前的欧洲地图上，我们会发现1939年生活在波兰战后领土上的有四个族群：波兰人、德国人、犹太人和东斯拉夫人（乌克兰人和兰科人）。1939年，在1945年归入波兰的领土上仅有五分之三是波兰人。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五分之三如何变成全部人口的大致概况：犹太人被谋杀，德国人被放逐，乌克兰人被驱逐出境，而苏联西部的波兰人被“遣送”回来。

这是我们选中弗里茨·斯特恩这段话为20世纪三个荒诞寓言之首的原因。荒诞主要在于没办法理解，你需要了解宗教、种族、文化、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东仪天主教、西里西亚、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极左与极右……

对于荒诞的东西我们没有什么非了解不可的必要，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些阅读理解上的问题，它共同组成荒诞世界的一部分。比如饶舌的西尔万·泰松像讲段子一样的话，初看以为是开个玩笑：

“向布考斯基致敬。”让-克里斯托夫说道，“西尔万会去跟她们说的，你会讲俄语，不是吗？”

“1989年以后就没有铁幕了，自此此后波兰的人们都能讲流利的波兰语。”



《攀登勃朗峰》

充满玄机。严肃的纳尔德·凯尔曼尼在《沿坟墓而行》里记录另外一段话。说明在那之后关于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事都还没有完结。

我的陪同一路上能用波兰语夹杂着俄语和这个男人有一搭没一搭地交流。他叫米卡尔，1939年出生，成长于苏联时期，立陶宛独立的时候，他已经太老了，学不会第三种语言了。

“这不是很怪异吗？”我问道，“在一个国家生活，却不懂这个国家的语言。”

“唉，还好吧，孩子们是学了立陶宛语的。我们老人就继续互相说俄语。您知道的，我们这儿都是普通老百姓，不论是立陶宛人还是波兰人。我们都没有什么区别。是

政治家们搞出的区别，不是我们。”

我问，他的家乡是波兰还是立陶宛。

“以前是波兰，现在是立陶宛。在这之间是苏联。”然后米卡尔就笑了起来，好像这只有对政治家来说才算有区别。

第二个，乌托邦或其他

米洛斯·福尔曼，《飞越疯人院》《莫扎特传》等电影的导演，捷克斯洛伐克人，1968年到巴黎，惊呆了。“我们费那么大的劲也打不倒的红旗，你们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竖起来？”记录这句话的是他的朋友，编剧让·克劳德·卡里耶尔，法国人，写了一本记录1968年的书叫《乌托邦的年代》。那本书里写又隔了些年，1986年，卡利耶尔到了布拉格，那时候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已经在苏联执政，新思维已经倡导，但卡利耶尔还是像18年前他的朋友一样惊讶：

来到布拉格我才明白，为什么米洛斯在巴黎听到周围的人们张口闭口呼呼社会主义会那样的困惑和惊讶。我们怎么可能向往这种奴役人的、欺世盗名的社会体制呢？怎么会以为马克思主义有了“人道的面目”，就能逃过一手把持革命的苏联人掌控呢？我们怎么会天真到那个地步。在布拉格市内，我每迈出一步，米洛斯都像对我说：看吧，这就是你们嚷着要的局面，好好看吧，你们没成功，可千万别难过吧。当我看到一些民族——像1979年的伊朗人民——义无反顾地、甘心情愿地投身到失望和痛苦中去，我就常常想起那个时候。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幻想，不论是依托于一套自诩现代的理念，还是依托于古老的天帝的幽灵，都不过是一个无从实现、也不容生存的海市蜃楼，它只是东拼西凑的一个烂摊子，表面上被胡乱地涂了一层新漆而已。凡是所谓的灵丹妙药，总归是导致卑鄙的结果，衍生出一帮新匪徒，他们以崇高的名义，随时去搜刮民脂民膏。

荒诞不是发生了这些，而是在1968年的时候，婴儿潮那一代人，正年轻着的时候——技术进步了，社会和平了，富裕社会一代越发迷茫了。他们在1960年代的反叛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你看他们在青春期之后做了什么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但凡意识形态的痕迹都要远远大于1968年在西欧和美国的反叛者身上留下的。我所说的荒诞，就是米洛斯·福尔曼所惊讶的，不过是一个代沟罢了，就引出如此多的困惑，这世界是有多脆弱啊？这世界似乎从来没有弄明白过卑鄙与崇高，无头苍蝇一样哄哄哄着去了这里，或者去了那里……

不过，要说，米洛斯·福尔曼所不解的，其实可能有那么一点点亮色。那些街垒中激情满怀的巴黎、纽约的年轻人，他们反对的只是父亲：父亲一代有的是纳粹，有的是绥靖，有的搞出了原子弹和冷战，而当时正在进入一个无意义的越战危机当中——上一代人留下了一个什么破烂的世界给年轻一代？20世纪有意义的遗产虽然大部分都有待历史验证，但对父权的质疑和否定还真是最值得肯定的遗产之一。当然，它的前提并非是对弑父的热衷，而是对权威的怀疑。这东西再不济也好过对权威的爱。

第三个，胜利或其他

《古拉格气象学家》。纳粹知识分子对苏维埃知识分子说，“如果你们赢了，我们将会灭亡，但我们也会继续活在你们的胜利中。”



《古拉格气象学家》

这话的有效期持续到什么时候？1953年？1956年？1991年？或者还继续活着？与形而上的问题有点接近，但更形而下之的一段话，阿城在《文化不是味精》那本书里有一章提到他的父亲。

火化前，来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亲消失者，这使得父亲像一个军人，但父亲只是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夏天，用布围住院子的角，提水来洗，冬天，公共澡堂像医院，等叫到号才挤得进去。父亲年纪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晕倒。在热水里，父亲紧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这里想问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父亲凡开会住可以洗澡的旅馆，必通知许多同命运者去洗澡，然后大家头发湿湿的坐下来谈洗澡以外的各种事。父亲住院时，也如此办。护士对湿头发的探视者并不奇怪。沐和浴在中国从上古就是与身体最密切的事，除了饮和食，而且严肃到与心有关。汉以后，日本学去了不少沐浴的制式，愈洗愈有名堂，父亲访问日本回来后，我问观感，父亲说：随时可洗澡；再问观感，说：胜得好惨。

02

荒诞在于之后发生的事

内森·英格兰德是个写小说的作家，专写犹太人。虽然他对犹太人苦难的关注要比一般的非犹太作家要多，有的时候也有点哭哭啼啼的，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真正正视苦难的人。所谓正视苦难，就是他能找得到这些苦难当中荒谬的一些东西。

在短篇小说《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中，他的主人公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想说的是——不管你们听不听得进去——你不能把一场可怕的罪行当成犹太教的基础。我想说的是对大屠杀的执念，你们把它当成身份的必要象征，当成唯一的教育手段。因为对小孩来说，除此之外根本就没什么东西能让他们产生认同感，没有其他东西能让犹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荒诞在于留下的是什么。我们都会遇到匪夷所思的事，整个人类迷了心智的时候也有，过了很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反应过来：我都做了什么啊……这种个体体验放在人类整体上也不少见。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荒诞的本质，我们没打算吸取教训：没打算。不可能。然后错误地进行总结。就像前面那段——那段罪行成了犹太教的基础。

小小的城市博物馆有一个关于1989年8月23日的展览。这日期会让你有什么联想吗？如果我再加上：波罗的海道路呢，还是想不到吗？不要紧，我也是在看到塔林经里加赴维尔纽斯的漫长人链时才记起来的。那是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的时候，在595公里长、穿越三个国家的路线上200万人手拉着手为自己的自由高声歌唱。这是些富于冲击力的、震撼人的照片，它们让人吃惊地感受到，民众完全不用暴力，只要如兄弟般团结在一起，也能发挥出多大的作用。在大陆的西边，人们已经忘记了，东边的人是以多大的勇气、经历着多大的绝望和牺牲，来为自己归属欧洲的身份而斗争的。

50周年已经忘了。1989年的游行和展览忘了。200万人手拉手这事忘了。东边的人付出的几十年的努力忘了。欧洲的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忘了。

在《沿坟墓而行》这部游记中，纳尔德·凯尔曼尼说，一个资深报纸记者还记得，“在苏联时代没有人会认真对待宣传新闻，就连冗员们自己也是这样，他们至少会挤挤眼睛，暗示说现实，嗯，要更复杂一些”……有点玩世不恭的苏联时代过去了，人们忘了真相在谎言时代的价值，忘了获得真相所要付出的代价。“今天他总是吃惊地发现人们真的会相信电视里的报道；‘他们所有人看待今天的世界差不多和他们的总统一模一样，这就不是偶然了’。与此相对应，他们并不怀念自由，因为俄罗斯人就处完全自由，也会选择弗拉基米尔·普京。如果他们说的属实——我也没有理由去怀疑真假——他们的朋友、熟人、商业伙伴或者同学多多少少也都和他们看法一致。所以人们也不讨论政治。

所以，在前苏联的另外一个地区，在克里米亚，鞑靼人发现民主帮不了他们，“我们曾经占这里人口的90%，现在只有12%了。民主也帮不了我们什么。”现在克里米亚已经回到了俄罗斯。

所以，以色列的心理学家发现一个恐怖的超现实：因为发生了大屠杀，德国人永远不会原谅犹太人。

上帝在人间的悲剧还没有结束——先是从教士这些专业骗子手里被解放出来，去中介化，功劳当然属于古登堡印刷机和马丁·路德；人成了可以解释上帝的主体，走到后来就是尼采这种上帝已死，或者是宗教大法官；再接下来，工具化人类，官僚科层制走马上场，他们倒是没有什么成体系的东西，也不大想思考，上帝跟文件夹里的文件一样，随时派发下去……所以，戈培尔会在日记中总结：“我把上帝包装得越伟大，越卓越，我自己就越伟大，越卓越。”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所以，不解的人类在经受苦难之后会发出疑问：“怎么会发生这种事？”纳粹党员也一样困惑。劳伦斯·里斯在《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中说他曾经拜访一位前纳粹党员：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以为他指的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于是回答说，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感到如此难过，这让我很欣慰。“我指的不是这个，我指的是英国人和德国人最后怎么会打起来呢？真是个悲剧。你的帝国也没了，我的国家也毁了，结果斯大林占了东欧。”

他说得好像都对。更荒诞的从来没有停止。自由主义的1968年，这个婴儿潮青春期的一年，弄了一身的标签，比嬉皮士还要波希米亚眼花缭乱：1968（它自身就是一个重要标签），自由主义者，弑父者，青春叛逆……极端成了嬉皮士。大部分人成了社会中坚。而在那一年开始，却是沉默的大多数登上舞台，弗里茨·斯特恩说，自由主义走上了一条弯路。

最终，根本没有暴徒的脚步声，但是无论如何，在美国还有一个资金充足的“沉默的大多数”的胜利，他们把理查德尼克松选上了台，伴随他的是他熟悉的主题法律和秩序”。尼克松和所有年龄段的激进分子适时地以他们的玩世不恭和偏执相互证实了对方。正如优秀的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最近所写的那样：“无论激进政治看起来是如何主宰了1968年的公众面貌，那个关键年份里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右派的崛起……从那以后，美国的自由主义就一直在政治荒野上游荡。”

03

“地狱是很棒的主题……”

中国的政治分析师们已经担忧起美国的南非化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担忧的时候很佩服他们的想象力和视野，我也是惊讶于我们操心之广。我觉得与其担忧美国的南非化，不如担忧地球上第二极的拉美化。对，就是我们自己。

很奇怪于为什么每个拉美作家都要把题材放到独裁者身上。略萨在《普林斯顿文学课》里说起多米尼加的独裁者特鲁希略，像所有独裁者一样，维持统治有点艰难——通常因为经济问题引发社会不满和动荡的时候——他就可以吃独裁的红利，去制造更大的社会动荡，特鲁希略选择杀隔壁海地在多米尼加的移民海地人，杀了四万。（这当然也是发生在20世纪的荒诞事迹，只是因为它远在加勒比海，又是海地人，绝对数量还不够多，虽然相对于海地总人口来说可不少了。）

后来负责善后的人是巴拉格尔，他去求见海地总统。之后发生的事情太离奇了，就像蹩脚小说家编造出来的故事情节。巴拉格尔和海地总统商讨后续如何处理，后者提出按人头进行赔偿，总共索赔50万美元，统统打进海地总统在美国的私人银行账户里。换句话说，对海地人民的屠杀，最后只不过让另一位有独裁倾向的领导人斯泰尼奥·文森特的个人腰包鼓起来。



《普林斯顿文学课》

相比之下，尿裤子这事对于特鲁希略来说就是一个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瑕疵。斯泰尼奥·文森特的后任者中有一位杜克老爹。马尔克斯对他有兴趣——马尔克斯是个独裁者搜集者，他在跟他的传记作者门多萨聊天时可说了不少：

门多萨：你非常惊讶，发现拉丁美洲的独裁者都十分昏暗虚妄。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你总给我讲一个从书里看来的这类故事。下令把黑狗斩尽杀绝的是哪个独裁者？

马尔克斯：杜瓦利埃，海地的杜瓦利埃博士，人称“杜克老爹”。他曾下令把全国的黑狗斩尽杀绝，因为据说他的一个敌人为了逃避逮捕和暗杀，竟变成了一条狗，一条黑狗。

门多萨：巴拉圭的弗朗西亚博士曾经下令全国21岁以上的男青年都得结婚，是不是？

马尔克斯：是的。他居然还把他的国家当成一幢房子关闭起来，只许打开一扇窗户递送邮件。弗朗西亚博士这个人怪极了，他居然还是一个颇有声望的哲学家，甚至能对托马斯·卡莱尔进行专题研究。

门多萨：他笃信鬼神吗？

马尔克斯：不，笃信鬼神的是萨尔瓦多的马克西米利安·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他让人把全国的路灯统统用红纸包起来，说是可以防止麻疹流行。马丁内斯还发明一种钟摆，据说进餐前先在食物上摆动两下，便知食物是否下过毒药。委内瑞拉的胡安维森特·戈梅斯有一种非常奇特的观念，似乎他具有一种预测未来的能力。

门多萨：他让人宣布他的死讯，后来又突然复活，这跟你这部小说里描绘的家长的情况一模一样。

这种集邮票式的举动当然不是目的。略萨为他们这些孜孜不倦层出不穷的拉美作家进行总结。当写作者越来越多的时候，当写作者都勇于去发现的时候，更深的原因就会被发现出来。

把独裁者看作反常的人，我觉得是个错误。这其实来源于我们内心无意识生出的防御机制：想着“那个人和我们不一样”。但可怕的是，独裁者们确实和我们一样。他们就是从我们这些人里走出来的，他们的行为在登上权力顶峰之前也都是正常的，是权力把他们内心的怪兽引诱了出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那种怪兽。独裁者也是普通人，只不过权力把他们变成了怪物。所以最好还是生活在一个权力不过度集中在某一个人手里的体系中，因为如若不然，居住在我们心里的那头怪兽就会被释放出来。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那种怪兽。略萨还说：“独裁不是一种过去的现象。它依然存在，就在我们眼前，是一种潜在的威胁，随时可能爆发。在所有的文明体制中，民主是最脆弱的：它就像是一张纤薄的胶片，很容易被人类最古老的传统击碎——我指的就是独裁。民主是一种现代现象，很新，也很有局限性。而那古老的传统则像一根粗棍，代表野蛮力量和横行霸道。”

还有孤独。雷蒙·阿隆说得对。在法国总统任期规定为七年，可以连任两届之后，他说，“我并没有忽视那些支持执政党的变化了的论据。十四年的总统任期，确实是太长了。谁能在如此长的时间中忍受住总统任期带来的孤独，抵制住包围着自己的奉承者？”这是荒诞世界的主要组成部分。过度的权力把他们变成了嗜血的野兽——“他一登上总统的宝座就开始集中权力，清除敌人。他心中的野兽日渐展现出强大的力量，集聚的权力越多，就越专制，越为所欲为。我认为所有的独裁者都是这样的，是过度的权力把他们变成了嗜血的野兽”。在长达一个世纪可能还要更久的军政府、独裁者轮番登场的拉美世界，有我们要了解的更多东西。是一群写小说的人，在不断地把这个恐怖的世界告知给世界，告知给所有人。如果眼前有若干件事要做、而这些事里恰好有一件事是“反暴政”的话，如果我们要做点什么事的话——只要它在这个list里。那么第一件事就应该是它。

它与所有我们痛恨的、荒诞的那些东西相关。警察国家，对言论自由的侵犯，审查制度，玩弄民众于股掌之上，所有。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在《我的疯狂世纪》中曾经记录与同事米兰·昆德拉的一段对话。

同事米兰·昆德拉委婉地问（或者不如说提出异议），我们是否该将社会主义的尝试当作历史的盲肠和漫无目的的转弯？萨特当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社会主义，不论有没有前途，都给整个时代刻上了烙印。也许意味着地狱，但地狱对文学而言是伟大的主题。令人失望的信仰，自己同志的死难道不是悲剧最时髦的表现形式？“肯定的，”我低声说，“地狱是很棒的主题，特别是当人不必生活其中时。”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沈阳铁路局职员，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荒诞笔记

荒诞凝视我们，而我们也回之以凝视。读书和观照现实，这个栏目由此交汇而来。



小鸟文学出品
卷十六，2022.04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